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文物中国史

8

明清时代

山西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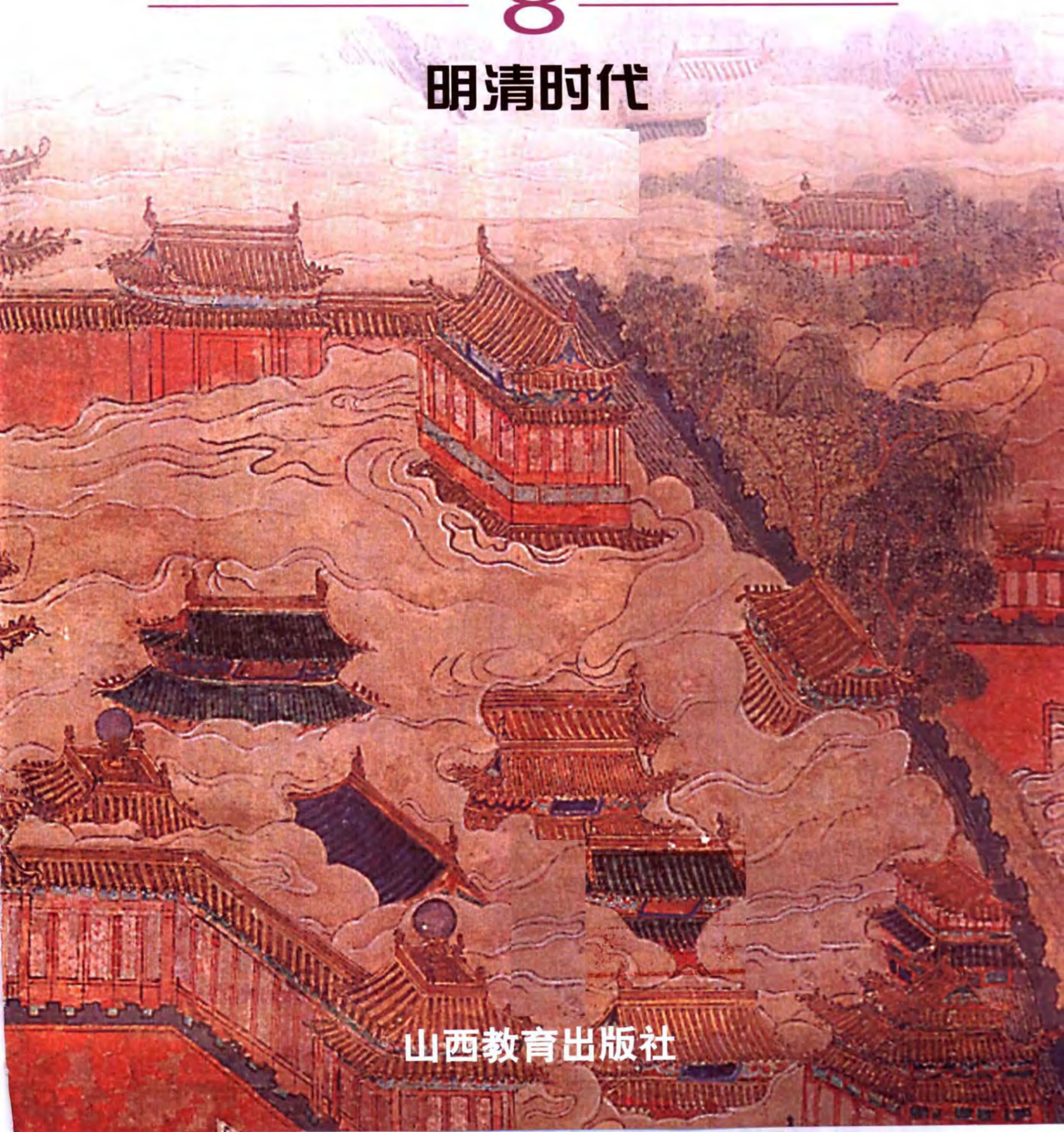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文物中国史

8

明清时代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物中国史·明清时代 /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12

ISBN 7-5440-2647-7

I. 文... II. 中... III. ①文物—中国—明清时代—图录

②中国—历史—明清时代—普及读物 IV. ①K209②K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1972号

《文物中国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与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

文物中国史·明清时代

编者: 中国国家博物馆

出版发行: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迎泽园小区2号楼)

总 责 编: 王宇鸿 张金柱

责任编辑: 原 琳

助理编辑: 薛海斌

复 审: 刘立平

终 审: 张金柱

装帧设计: 孟 孟(香港)

排版制作: 陈先英(香港) 李秋云(香港)

责任印制: 林佳年(香港)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万福工业区)

版 次: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全套定价: 800.00元

《文物中国史》编辑委员会

主任：朱凤瀚

副主任：李季 董琦

委员：王冠英 信立祥 孙国璋 高世瑜 王冠倬 刘如仲

编者：

史前时代：李季 安家瑗 孙其刚（绘图：郑婕）

夏商周时代：李维明

春秋战国时代：王冠英 韩钟

秦汉时代：陈成军 王永红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孙国璋 邵小萌

隋唐时代：高世瑜 胡晓建 梁丰

宋元时代：黄燕生 陈煜

明清时代：苏生文 王芳 李雪梅

编务：王永红 董青

前言

这部《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在读者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向读者说明。

一、顾名思义，所谓“文物中国史”，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当然与一般主要依据文献史料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同。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物化的历史。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历史。所以阅读这部《文物中国史》，要比读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更生动，对许多重要历史问题的体会也会更深刻、更切近真实，因而也更适合青年人阅读。这是我们编撰本书的原因。

二、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工作经验。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这应该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

三、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

种学科的交流、融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四、作为一部带有一定通史性质的著作，尽管是以文物为主述线索，仍需要有自己的科学的体系，使读者能够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较系统、较完整的过程。这是我们在确定这部著作体例时十分注意的。要保证体系的科学性，一个首要问题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本书没有采取以往较常用的以原始、奴隶、封建社会等经济社会形态名称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这首先是因为这种较传统的划分方式，固然有其理论依据和合理成分，但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众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的发展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并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古代文明发展历程进行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许多新认识。而且，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应是由各段社会形态特点的差异来决定的，仅以经济形态的一些变化来划分并以这些名称来概括也是不完全的。社会形态的划分，应综合考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社会长时间处于独特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中，其发展在总体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但同时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鉴于中国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几大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尤其是其从未间断过的悠久历史、广阔的地理分布，与在世界文明史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无疑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模式之一。所以，关于中国古代史科学的分阶段、分期问题应该从这一高度做更深入的研究。本书以分卷的形式，每卷包括中国历史上一个时段。虽然并非是对中国古代史做上述意义的分期，而只是从本书编撰方便出发设计的，分卷亦即分时段仍尽可能吸收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多年研究成果，充分考虑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以若干王朝相聚合为一历史时段，与纯粹的王朝体系是不同的。被归为同一时段亦即同一卷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均大致有其可以区别于其他时段的特点。

五、本书虽带有一定的通史性质，但是是以典型文物为线索展开叙述的，文字也要求简练。这样就不可能在每一卷中都像通史著作那样，对政治、经济、文化及事件、人物等都叙述得那么系统、详备，而是要突出时代特色，在叙述清楚各时段历史背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基础上，注意选择本阶段中那些最能体现社会进展，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对整个世界文明史有较大影响的内容展开叙述，并不要求面面俱到。希望通过这样的编撰方法，使读者能够在熟悉文物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基本内容有一个较清晰的印象。

六、作为以文物为线索来展述历史的著作，最理想的是所要叙述的每个重要史实，皆有典型文物来体现。本书虽致力于此，但显然难以完全做到。所以采取了如下方式，即凡史实能与文物结合、有典型文物表现的，即多着笔墨，以合乎本书之主旨；而无文物可表现之重要史实，则出于上述通史体例要求而必有所交代，但行文则略为简练。

说明了以上几点，相信会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的内容。专家、学者们一般都有体会，写稍普及的著作其实更难，既要专业用较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同时又要准确、深刻，所谓深入浅出，实非易事。本书各卷作者致力于此，为能使读者满意，已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但不尽理想之处与疏误仍在所难免，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与作者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朱凤瀚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五日

目 录



第一章 重归一统	2
第一节 明初中央集权的加强	3
第二节 “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	9
第二章 巩固边疆	18
第一节 奴儿干都司与永宁寺碑	18
第二节 乌思藏和朵甘	19
第三节 从土司制度到“改土归流”	21
第四节 瓦剌三王和俺答封贡	23
第三章 安养生息	24
第一节 农业生产的恢复	24
第二节 手工业的发展	27
第三节 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42
第四章 经世致用	52
第一节 徐光启与利玛窦	53
第二节 宋应星与《天工开物》	55
第三节 奇人奇书	56
第四节 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57



第五章	大家辈出	60
第一节	王守仁和王艮	61
第二节	“异端之尤”——李贽	62
第三节	汤显祖和《牡丹亭》	63
第四节	“四大奇书”和“三言二拍”	64
第五节	“独抒性灵”	68
第六节	“吴门四大家”及其他	69
第七节	解缙与《永乐大典》	74



第六章	四方宾服	76
第一节	郑和下西洋	76
第二节	对日、对朝关系	79
第三节	初遇西洋强盗	84



第七章	大明末日	88
第一节	“土木堡之变”和正统之后的政局	88
第二节	张居正施政	91
第三节	“国本之争”与天启党争	93
第四节	明末农民起义	95



第八章	清朝建立	102
第一节	满族源流	102
第二节	肇建基业	103
第三节	定鼎北京	115



第九章	安疆平乱	122
第一节	剿定三藩	123
第二节	收复台湾	125
第三节	雅克萨战争和中俄《尼布楚条约》	128
第四节	平叛西北	131
第五节	对西藏的管辖	136
第六节	多民族之邦	138



第十章	盛世滋生	140
第一节	农业	140
第二节	治河	150
第三节	手工业	153
第四节	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	161
第五节	对外贸易	164



第十一章	科学文化	170
第一节	清初启蒙思想家	170
第二节	编修类书、丛书	173
第三节	考据学与史学	176
第四节	文学和戏曲	178
第四节	科学技术	186
第五节	各派书画与手工艺品	192
第六节	建筑艺术	205



第十二章 列强入侵	210
第一节 鸦片战争	211
第二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219
第三节 中法战争	225
第四节 甲午中日战争	227
第五节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233
第六节 列强对中国的瓜分	241



第十三章 忧患中的中国	252
第一节 太平天国起义	252
第二节 求强求富——官僚买办办洋务	260
第三节 戊戌维新	264
第四节 清政府的新政与立宪	268
第五节 晚清经济文化的新潮流	270



第十四章 辛亥革命 帝制终结	276
第一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276
第二节 武昌起义	282
第三节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清政府统治结束	284

参考书目	288
------	-----



文物中国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一章

重归一统

元末红巾起义之后，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经过一段时间的兼并，最后形成了朱元璋、陈友谅、陈友定、张士诚、明玉珍等几股势力。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不久后消灭了残存的地方势力，统一了全国。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对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进行全面改革，废除中书省，取消丞相制，军队按卫所编制，中央设立五军都督府，皇帝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设立锦衣卫这样的特务组织，乃至罗织罪名，把开国元勋铲除殆尽，使君主专制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朱元璋去世后，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逐走建文帝朱允炆，夺得皇位。

为了更牢固地控制政权，朱棣决定把都城迁到自己势力范围的中心北京，并在北京

大肆营造皇城。皇城——紫禁城在建成之后的五百年时间里，成为明清两朝的都城，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历史上有许多朝代，第一代皇帝都是依靠血腥和强力来开创基业、巩固政权，到了第二代则开始走向仁治，政治上的血腥味淡化或消失了，百姓开始安居乐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明代的初创期则远不止一代，朱元璋去世后，第二代皇帝建文帝倒是个仁厚之君，但紧接而来的“靖难之役”以及明成祖无休止的南征北战，又把明朝引向了战乱的境地。一直到明成祖去世以后的仁宣时期，明朝才显现出仁治的气象，人称“仁宣之治”。因此，可以说，从朱元璋称帝到明成祖去世的五十多年时间，都是明朝的初创期。



第一节 明初中央集权的加强

一、建都南京

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安徽凤阳)人,自幼家贫,曾入寺为僧。元朝末年,朱元璋投靠红巾军郭子兴部。郭子兴去世后,朱元璋继为首领,在一班文武亲信的支持下,力量逐渐壮大,割据一方。后来,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明玉珍等几股势力,击败了元朝的军队。1368年,基本上控制了全国局势的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

朱元璋虽然在应天登上了帝位,但最初对在哪里建都并没有下定决心。当时有几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把首都建在北京,那里既有元大都的基础,又可以有效抵御残元势力的南侵;二是在中原的洛阳或开封建都,那里是中国地理的中心,又是多朝古都;三是



明太祖朱元璋像

选择朱元璋登基的地方——南京,这里不但在地理上是形势险要之地,又有长江天堑作为屏障,龙盘虎踞,可以立国,而且南京地处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可以解决财赋问题。经过反复考虑,朱元璋在登基后的第十一年(1379),正式下诏建都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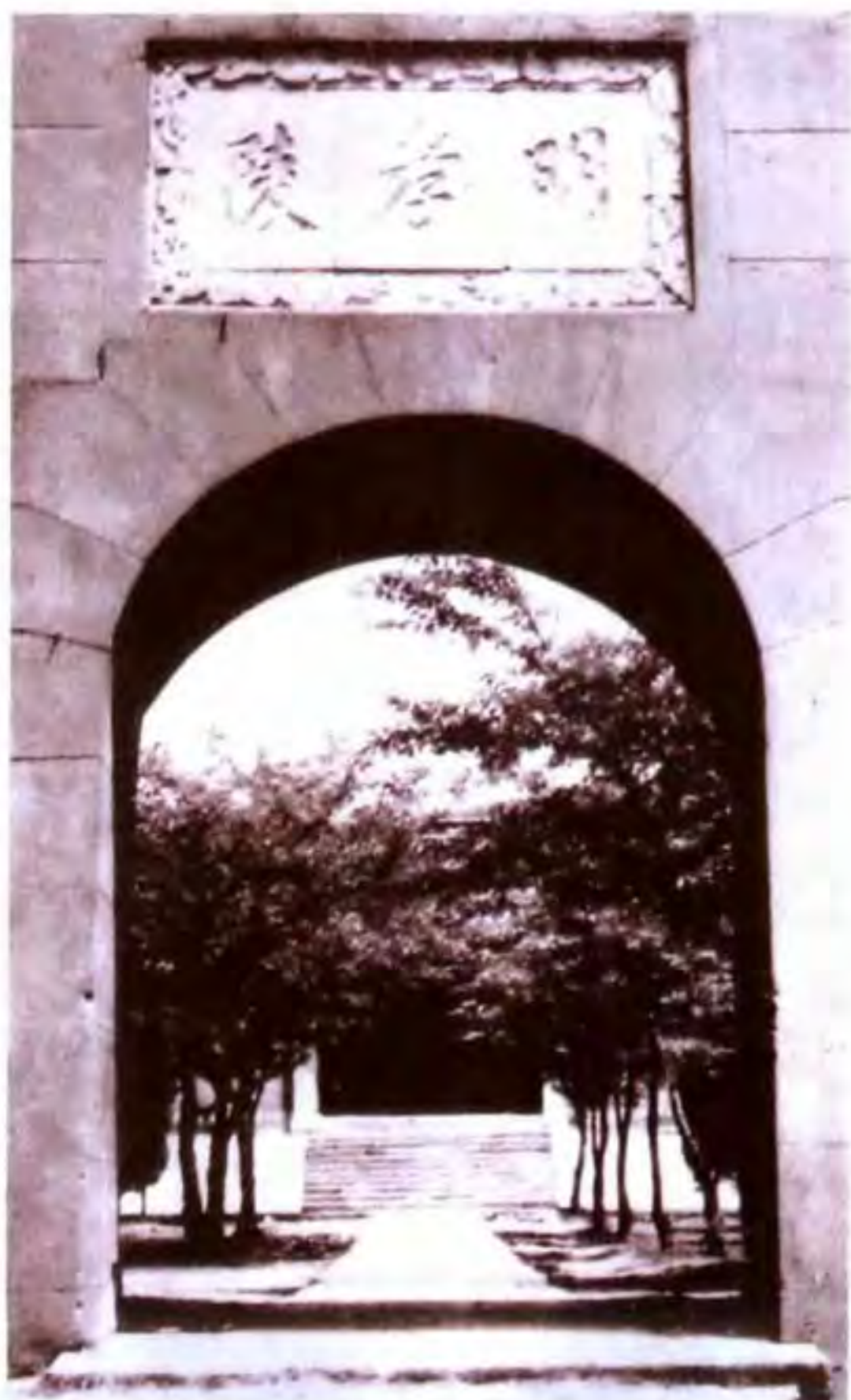
实际上,在此之前,朱元璋已经对南京



南京明故宫遗址

明皇城校尉铜牌

南京明宫殿遗址出土
宽10.5厘米，高12.9厘米
为洪武年间（1368—1398）
南京皇城校尉（武职卫士）
出入皇城的凭证。



明孝陵

朱元璋陵墓，洪武十四年（1381）始建，洪武十六年建成，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

城进行了一系列改建和扩建。早在朱元璋称吴王的时候，就在南京营建过王宫。称帝后，除对原金陵旧城进行整修、改筑和扩建外，还在钟山的南面建造宫城和皇城。皇城的三朝五门之制、前朝后寝的宫城布局，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北京皇城就是以此为蓝本而建的。遗憾的是，“靖难之役”时皇宫被焚毁，只留下残迹。

除了对旧城进行改造和新建皇城外，朱元璋还大规模地修筑内城和外城的城垣。内城建成于洪武十九年（1386），城垣周长48公里，有十三个城门，是世界上最大的砖石城垣。外城建成于洪武二十三年，周长90公里，共有十六个城门。

南京城越山跨水，设计巧妙，布局合理。城内有明显的功能区分：城东是皇宫和行政

区，中书省（明初袭元制设中书省，以左右丞相辅助皇帝治理军国大事）以及下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均坐落在此，另外还有通政司、翰林院、御史台、大理寺、太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詹事府、行人司、尚宝司、宗人府和太医院等机构；城北是军事区，驻兵二十万；城南为手工业区，聚集了十几万能工巧匠；城中的南市街和北市街则是繁华的商业区。南京城规模宏大，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即使在迁都北京之后，南京城的繁盛依然不减，万历年间，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游历南京时感叹道：“论秀丽和雄伟，南京城超过了世界所有的城市。它到处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与之媲美的。”

在营建南京城的同时，朱元璋还于洪武十四年至洪武十六年在钟山脚下为自己建造陵墓，这就是著名的明孝陵。1398年朱元璋病逝后，就葬于此。

二、专制的顶峰

朱元璋巩固全国政权后，吸取元朝因行中书省权力过大、造成地方割据的教训，决心削弱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他首先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丞相胡惟庸，并乘机取消了中书省，废除了丞相制，把权力分散到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由皇帝直接指挥。在地方，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负责本地的行政、民政和赋税征收。与此同时，设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掌司法和军政。行政、司法和军政三足鼎立，互不统属，有利于皇权对地方的控制。在军队，废大都督府，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也各不统属，分别管理京城以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负责军队训练与管理。五军都督府由皇帝直接掌握，军队的调动权和指挥权都揽到皇帝一人手上，这样皇帝就牢牢地掌握了军队。

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夜巡铜牌

宽12厘米，高14厘米

洪武二十年（1387）明政府在直接面对元朝蒙古残余势力的大宁（今内蒙古宁城附近）设立北平行都司，辖16个卫。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封第十七子朱权为宁王，落地即在宁城。这块夜巡铜牌，是北平行都司士兵夜间巡逻时佩戴的。



西安右护卫后千户所百户印

印面长、宽均为7厘米，通高8.4厘米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封自己的儿子为亲王，派往各地。为给亲王提供安全保障，每个封地设立护卫指挥使司，每司设左、中、右三护卫，卫下设有前、后、左、右、中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西安是朱元璋第二子秦王朱樸的封地。



明长随奉御出入宫禁牙牌

宽5.2厘米，高14厘米

明朝在内官十一监设长随奉御，官阶正六品，牙牌是内官侍从出入紫禁城的通行牌。



卫所是明朝常规军的设置。一百一十二人编为百户所，十个百户所称千户所，五个千户所组成卫。卫所遍布内地到边疆，在地方由都指挥使司率领，分别隶属于中央五军都督府管辖。

有明一代，特务统治登峰造极，而这种恐怖的统治方式，也是朱元璋首开其端的。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控制臣下，常常利用身边的亲信侍从充当特务——检校，“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监视群臣的一举一动，若发现有异端行为，由检校直接向皇帝告密。检校不属于某个正式机构，没有扣押人犯和处刑之权。胡惟庸案发之后，朱元璋对臣下的猜忌越来越深，防范也越来越严。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特别设立

了组织完备的特务机构——锦衣卫。锦衣卫设有专门的法庭和监狱，由皇帝直接指挥，对臣下进行恐怖的控制和镇压。检校和锦衣卫是朱元璋时期最主要的特务组织，其中锦衣卫一直延续到明亡，与后来成立的东厂、西厂一起，成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也是明朝统治专权和腐朽的象征。

朱元璋的一系列收权措施，使有明一代，中央集权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

三、《大明律》与《大诰》

制订法律是朱元璋加强专制的另一个措施。为了改变元末法制松弛的弊病，恢复专制统治秩序，朱元璋称王伊始，就命令李善长以《唐律》为蓝本，制订新的法律，他还同制定律令的有关人员一起讨论律义。经过多年的努力，洪武七年（1374），明朝的基本法典——《大明律》颁布施行。《大明律》共十二篇，六百零六条，洪武十三年重订，成为三十篇，四百六十条。

《大明律》贯彻了朱元璋“重典治国”的基本思想，以严刑峻法加强专制统治，维护封建伦常秩序：对“十恶”和进行秘密宗教活动的量刑比前代更加严厉和残酷，不论主从，一律凌迟处死，并且还扩大了“十恶”的范围，凡部民杀死所属知县、知州、知府，军士杀死百户、千户、指挥的，都属“十恶”中的“不义”罪，一概处以极刑；严禁官员结党，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禁止盗卖、换易、冒认及侵占他人田宅，若系强占，最高可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军户、匠户、灶户平时不能随意流动，私自脱籍要受严惩；限制养奴蓄婢的数量，规定贵族、功臣

之家最多不得超过二十人，一般庶民之家不许蓄养，否则杖一百，奴婢放免为良，如有诱骗和掠卖良人为奴婢的，杖一百，流三千里。另外《大明律》还专列“钞法”，如拒绝收受宝钞，或制造、使用伪钞，除追纳赔偿外，并处杖刑；禁贩私盐、私茶。《大明律》对贪官污吏的惩罚非常严酷，贪污一贯以下杖七十，贪污八十贯处以绞刑；御史犯赃，罪加三等。对擅权失职官吏的惩处也很严厉，监守自盗者，不分首从，并赃论罪，满四十贯即处斩。

《大明律》虽然屡经修订补充，相当完备，但原则性的法律条文并不能囊括复杂的社会生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立法部门又根据实际案例对一些律条进行诠释，编成《大诰》，后又有《大诰续编》、《大诰三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以便“臣民数观为戒”。《大诰》除了阐释《大明律》的功能之外，还起到法外加刑的作用。



明锦衣卫木印

印面长、宽均为11.5厘米，通高4厘米



《大明律》封面及序

四、《黄册》与《鱼鳞图册》

由于元末的长时间战乱,明朝建立以后,户口混乱的现象非常严重,漏口、脱户、隐瞒丁产者为数众多,从而引起赋役负担严重不均,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不利于皇权的巩固。因此,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是摆在明朝统治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洪武三年(1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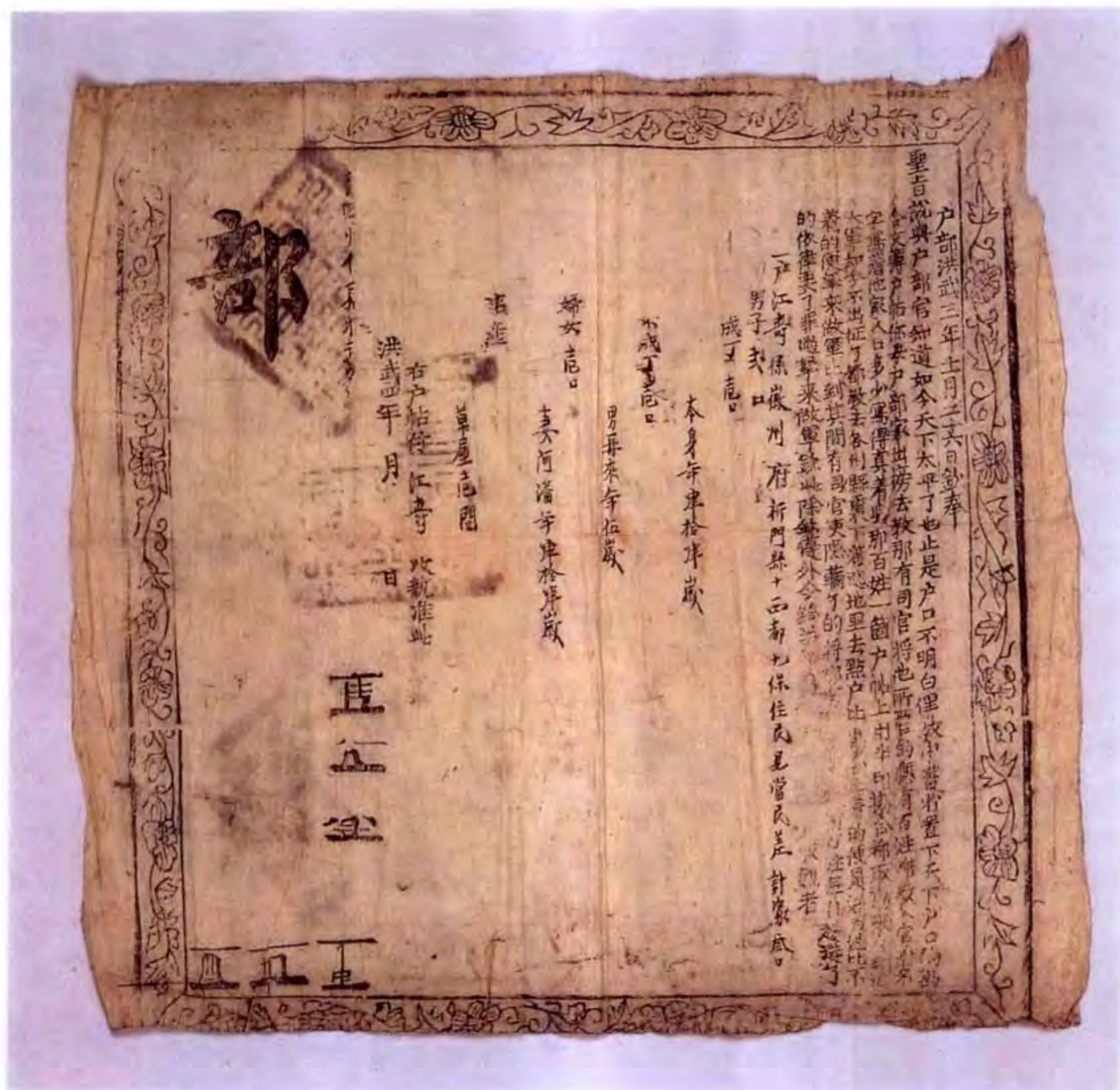
明政府开始着手清理全国户口,派遣户部官员到各州县去普查户口,颁发“户帖”,要求各家各户把全家人口性别、年龄、籍贯、产业等内容逐一据实填写,作为编制户籍册的根据。普查工作结束后,下令各府、州、县根据户帖编制户籍册。每里编成一册,由官府收藏,每十年更造一次。因户籍册封面用黄纸,称作《黄册》。《黄册》是征发赋役的依据之一,所以也叫《赋役黄册》。

《鱼鳞图册》是由朝廷派人或由地方官主持,逐田度量核实田亩,类编为册。因田土图形相接,有如鱼鳞,所以称《鱼鳞图册》。图册分为分图和总图两部分:分图以里为单位,将相邻的田土按顺序编号绘图,并将各号田土的名称、类别、面积、四至以及地主的籍贯、姓名记录下来;总图以乡为单位,把一乡之内的分图合并成大图,置于分图之前。

《黄册》和《鱼鳞图册》是明代征收赋役的根据,前者用于括户,后者用于括地,皇

明御制《大诰》





徽州府祁门县江寿户帖

纵 33.9 厘米，横 35.8 厘米
这是洪武四年（1371）明政府发给徽州府祁门县（今安徽省歙县）江寿的“户口卡”。

帝通过它们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编管起来，使人民附着于土地，以便向朝廷纳粮当差。

澄等人说服建文帝采取削藩的手段，先后把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人贬为庶人，最后把矛头指向燕王。

《鱼鳞图册》

第二节 “靖难之役” 与迁都北京

一、“靖难之役”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仁柔少断，许多割据各地的藩王——建文帝的叔叔们拥兵自重，窥视皇帝的宝座。其中，以年长势大的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1360—1424）的野心最大，他在自己的封地暗中厉兵秣马，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建文帝身边的大臣齐泰、黄子



明成祖朱棣像



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在得到建文帝即将对自己动手的情报后,便在北京正式起兵,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号称“靖难”之师,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史称“靖难之役”。

建文帝得到燕王起兵的消息后,连忙派大军北上迎击。两军大战于真定、济南等地,燕王先胜后败,数次处于危险境地,但因建

文帝在出兵前屡次告诫诸将“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明军不敢置之于死地,使之得以侥幸逃脱。

建文三年(1401),燕王重整旗鼓,先后于滹沱河、夹河、真定等地大败明军。建文帝驱逐齐泰、黄子澄等人,企图平息事端。但燕王并不满足,继续率军南下,直指南京。次年六月,燕军渡过长江,进抵南京金川门。金川门守将开门迎降,南京失陷。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与诸妃在宫中纵火自杀(一说出逃为僧。是为历史上一大谜案)。

燕王占领南京后,发布安民告示,全国传檄而定。建文旧臣有的投降,有的逃跑,有的自杀殉难,那些不肯屈服的则遭到燕王的血腥屠戮,祸及九族,名士方孝孺甚至被诛杀十族(九族以外加上门生),上演了一出历史惨剧。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浙江宁海人。建文帝时任侍讲学士,以才学闻名。方孝孺是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之一,建文帝对他十分尊重。遇到什么国家大事,建文帝总是要征求他的意见。建文帝好读书,有了

明城墙(内城)遗址公园

内城建于永乐年间,1969年修北京地铁时,内城城墙和大部分城楼被拆除,只剩下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东南角楼、西南角城墙和崇文门附近的一段残垣。这是崇文门以东至东南角楼残留的一段城垣,2002年开辟成遗址公园。





北京皇城遗址公园

疑难问题，总要请方孝孺为自己讲解。临朝奏事，或行或否，经常让方孝孺在御前拟旨批答。燕王起兵之后，朝廷所有的讨燕诏檄都出自方孝孺之手。

燕王占领南京后，方孝孺拒不投降，闭门不出，并为建文帝穿丧服，昼夜啼哭。燕王久闻方孝孺的学问，试图召用他，但他不肯屈从。燕王要他拟即位诏，方孝孺宁死不从，当着燕王的面投笔于地，一边哭一边骂道：“死便死了，我是决不会拟写诏书的！”燕王按捺着火气道：“你一个人死了也就罢了，难道你不顾惜九族吗？”方孝孺以更大的声音答道：“即使是十族，我也不写！”燕王顿时大怒，恨其嘴硬，命令左右将方孝孺的嘴割破，直割到两耳，然后下到狱中，并大肆搜捕其宗族门生。每逮系一人，就把他推到方孝孺跟前，但方孝孺却连头都不回。最后，方孝孺连同他的“十族”全被杀害。

燕王在血泊之中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建文四年（1402）为洪武三十五年，以次年为永乐元年。

二、营建北京

“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尤著。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自古以来，北京的地理位置就十分重要。金元之时，随着民族的融合，北京地区逐渐成为中国地理和政治的中心，金和元都在这里建都。明朝建立后，朱棣被封为燕王，北京是他的大本营。他当上皇帝后，北京自然也就成为他的“龙兴之地”。因此，把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以便把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也就成了明成祖的理想选择。

明成祖想把都城迁往北京，除了他的私心之外，还有其历史必然性。此时元朝虽然已经被推翻，但蒙古部落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并没有解除，把都城定在北京，有利于加强防卫。而且，明成祖即位后，成功地设立了奴儿干都司，使黑龙江下游一带尽入中国版



明北京宫城图

明早期北京紫禁城图。绘图者名已佚。图中所绘人物可能是承天门（今天安门）的设计者蒯祥。

图；又在西北地区建立了哈密等七卫，“幅员之广，远迈汉唐”。中国版图的日益扩大，也迫切需把中国的政治中心向北移动，以便有效地控制和管理东北和西北的大片疆土。

明成祖登基之后不久，就着手进行营建北京的工作，为迁都做准备，发配犯人到北京城郊开垦荒田，迁徙天下富民充实北京，派员到各地督采木料，烧造砖瓦，征发工匠，

调遣民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从永乐十五年（1417）开始，大规模的营建工作全面展开。

明成祖营建北京的工程主要有四个部分：内城、皇城、宫殿和庙坛。

在大规模营建北京以前，北京内城的城墙已经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动。元大都的南垣在今东西长安街一线，北垣在今德胜门、安定门以北2.5公里处。洪武二年（1369），北垣南移至德胜门、安定门一线。明成祖营建北京时，又把南垣往南移至今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一线，并把元大都的和义门改为西直门，把平则门改为阜成门，把崇仁门改为东直门，齐化门改为朝阳门（上述九门的称呼一直沿用到今天）。明成祖时期确立的北京城垣四至和九个城门，奠定了北京内城的基础（嘉靖时期拟修筑外城，终因财力不济，只完成了外南城，即今永定门、左右安门一线，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凸”字形城墙）。

明代皇城沿用元大都旧址稍向南移，随后又拓展了南、北、东三面。南墙正门即承天门（天安门），承天门前有大明门（清顺治时改称大清门，民初改为中华门），后有端门；北门为北安门（清顺治时改称地安门）；东门为东安门；西门为西安门。周长约9公里，东西宽2500米，南北长2750米，呈不规则方形。民国以后，皇城的大部分城墙和城门被陆续拆除。现皇城东垣被辟为遗址公园。

皇城中心偏南为紫禁城。紫禁城东侧为太庙，西侧为社稷坛，此即所谓“左祖右社”。紫禁城北为万岁山（清初改称景山）。紫禁城西，在原太液池南开凿南海，合中海、北海为“三海”，又称“西苑”。紫禁城东有东苑，后废圯。

紫禁城的修建是营建北京的核心工程。紫禁城又称宫城，是在元代宫殿旧址稍微向南移的地方兴建的。1406年始建，1420年基本建成。其规模、形制、名称都是以南京宫城为依据，后来虽屡有改建、重建，但基本形制不变。紫禁城呈长方形，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0米，总面积为72万平方米。四面各有一门，南为正门午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玄武门（神武门）；四隅各有一座结构精巧的角楼；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中心建筑以中轴线

为中心向东西扩展，左右对称。以乾清门为界，分前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前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东有文华殿，西有武英殿，建筑高大，庭院宏敞，充分体现了皇家气派。内廷区的乾清宫为皇帝住所，坤宁宫为皇后居处，交泰殿为皇后受贺之所。内廷区的东西两边各有六宫对称分布。紫禁城最北部分为御花园，是帝后休憩游玩之地。紫禁城建筑为木石结构，红墙、黄瓦、青白石座，加上华丽的色彩、精致的装饰、典雅的陈设，整组建筑色彩绚丽、金碧辉煌，是

《黄河运河图》（局部）

大运河和黄河在开封以东一带相交，由于黄河夹带大量泥沙，经常造成黄河决口或改道入海，从而使大运河受阻，严重影响了明朝的漕运。因此，疏通大运河与治理黄河密不可分。这幅《黄河运河图》将运河和黄河并列在一起绘制。





明长城之一——八达岭长城

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是我们祖先留给世界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除了内城、皇城、紫禁城外，天坛、山川坛（即今先农坛）也都是这时新建的。明成祖还把元代的齐政楼改为鼓楼，在北边新建钟楼，在东安门外建王府十五邸（今王府井大街一带），等等。

明成祖营建北京，使城内建筑的布局更加匀称整齐，设计更加科学合理，许多建筑巍峨壮观，显示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建筑风格。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从此，明朝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北京。

与营建北京密切相关的还有三项举世闻

名的工程。一是修运河，以解决京都的漕粮问题；二是修建长城，以解决北方蒙古部落的侵扰；三是修建皇帝陵墓，使驾崩之后的帝后有安身之地。

都城迁到北京以后，北京人口急剧增加，宫廷、衙门、民户所需的大量粮食和其他消费品需要从南方运来。运输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海运，二是（运）河运。明代虽然海运很发达，但河运仍然是解决漕粮问题最主要的渠道。元朝至元年间，曾开通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和北京的通惠河，使南方的漕粮可以直接运到元大都。但这条航道不久就淤积不通了。永乐迁都后，当务之急就是疏通会通河，解决北京的粮食问题。

大运河的修浚事宜由工部尚书宋礼主



定陵地下寝宫

持。山东、徐州、应天、镇江等地的三十万民工参加了这个工程。宋礼在修浚会通河的过程中，接受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于汶水下游东平戴村筑新坝，拦截汶水流入南旺，然后将十分之四的水南流接徐、邳，十分之六的水北流至临清，从而使南北大运河全线畅通，运粮船可直达通州码头。大运河疏通后，南方的漕粮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每年达二百多万石。

长城始建于战国时期，明初在已经废弃

的古长城的基础上，重新修筑。迁都北京之后，受北方蒙古部落侵扰的机会陡然增加，明成祖更是加大了修筑长城的力度。从明初到万历年间，前后经历一百多年，终于完成了这一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延绵一万三千里的浩大工程。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长城，主要是明长城的遗存。

历代统治者都重视自己死后的归宿，明朝的皇帝也不例外。朱元璋把自己的陵墓选在风景如画的钟山脚下（孝陵）。朱棣虽然在

万历孝靖皇后凤冠

1957年北京定陵出土
高27厘米，口径23.7厘米，
重2320克

孝靖皇后是明神宗两位皇后中的一位。此凤冠是孝靖皇后接受册封、谒庙、参加朝会时的礼帽。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前部饰有九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八只点翠金凤，后部也有一金凤，共九龙九凤。后侧下部左右各饰点翠地嵌金龙珠滴三博髻。此凤冠共嵌红宝石百余粒、珍珠五千余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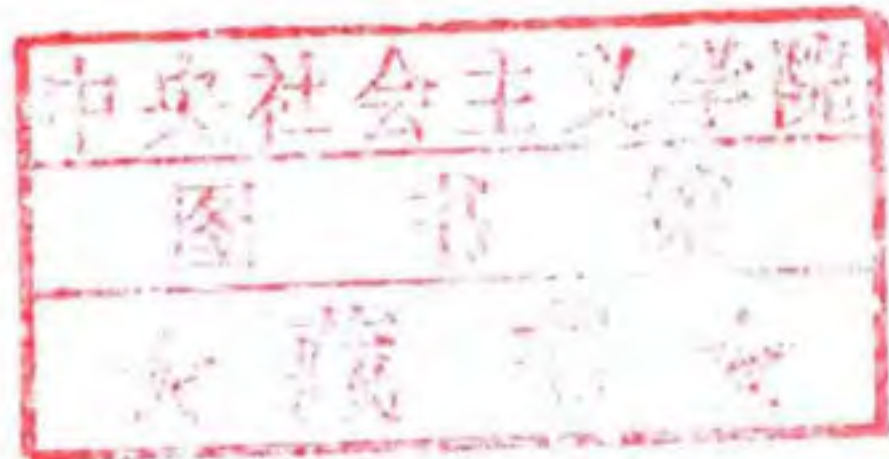




南京登上了皇帝宝座，但他的心依然留在北国，希望自己一旦龙驭宾天，能够魂归“故里”。因此，永乐五年（1407）当皇后去世的时候，尽管尚未迁都北京，朱棣还是把她安葬在了北京昌平的天寿山麓。朱棣去世后与皇后安葬在一起。朱棣和皇后的陵墓就是举世闻名的明十三陵的第一陵——长陵。继明成祖之后，明朝的历代皇帝也都在长陵附近依次为自己营造了陵寝，计有献陵（仁宗）、景陵（宣宗）、裕陵（英宗）、茂陵（宪宗）、泰陵（孝宗）、康陵（武宗）、永陵（世宗）、

昭陵（穆宗）、定陵（神宗）、庆陵（光宗）、德陵（熹宗）和思陵（思宗），合称明十三陵。其中定陵在1956年被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了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定陵的地宫也向游人开放，其他十二陵仍然保持原样。长陵是十三陵中最为高大壮丽的，地面部分由一组雄伟壮观的木构建筑群组成，有陵门、祔恩门、祔恩殿、明楼和宝城等，排列于南北纵轴线上，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构建筑群之一。明十三陵是世界文化遗产、著名的旅游胜地。

长陵祔恩殿



第二章

巩固边疆



明朝统一全国后，根据边疆地区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有的直接设立都指挥使司，归中央直接领导；有的采用传统的“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任命当地的部落首领或上层僧侣为行政长官或军事长官，并给予封爵，管理政教和军事；有的推行土司制度，利用土官进行管理（后来有些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被取消，实行改土归流）。这样，明朝的疆域大为扩张，多民族国家得以巩固和发展。

第一节 奴儿干都司 与永宁寺碑

东北地区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唐至辽、金各代朝廷均设置行政机构管辖。元朝设置辽阳行中书

省，并把女真、水达达等族编入户籍。明朝建立后，首先在东北设置了辽东都司。洪武四年（1371），元辽阳行中书省平章刘益奉辽东地图降明，置辽东卫，以刘益为指挥同知。



洪武八年，设辽东指挥使司，下设25个卫，管辖范围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洪武二十年，纳哈出降明后，明军进据松花江南北两岸，原处于元人统治下的女真等各部相继归附。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在黑龙江下游地区设置奴儿干卫，这是明朝在该地区建置的开始。之后，明成祖继续招抚，到永乐七年，先后设置了132个卫所。为了加强对奴儿干卫等卫所的管理，永乐七年四月，在黑龙江入海口处特林设置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范围西起鄂嫩河、北抵外兴安岭至库页岛、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辖184个卫、20多个所。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是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机构，直属朝廷管辖，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和都指挥僉事等官，均由明廷从内地派员担任。都司下辖的各个卫所，也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关，除军事职能外，也兼理民政。其大小官员也都由明朝政府委派任命，都司驻军，多时达三千人，平时也有二百至五百名戍守，戍期二年，而且各卫所必须服从朝廷的调发。奴儿干都司卫所的居

民，也要向明廷缴纳贡赋。

明朝廷除了委派官员对奴儿干地区进行管理外，还不时派员到奴儿干地区巡视。从永乐七年到宣德七年（1432），太监亦失哈等人多次巡视奴儿干都司及其附近地区。永乐十年，亦失哈与康旺等人巡视奴儿干各地以及苦夷（库页岛）诸部落时，康旺在奴儿干都司治所特林附近建立了一座供奉观音的永宁寺，并立碑纪念。碑文用汉、蒙古、藏、女真四种文字书写，记述了明朝政府对这一地区实行管理的历史。宣德年间，重建永宁寺，立《重建永宁寺记》碑。清末学者曹廷杰至此考察时，将碑文拓回，世人才知晓这一史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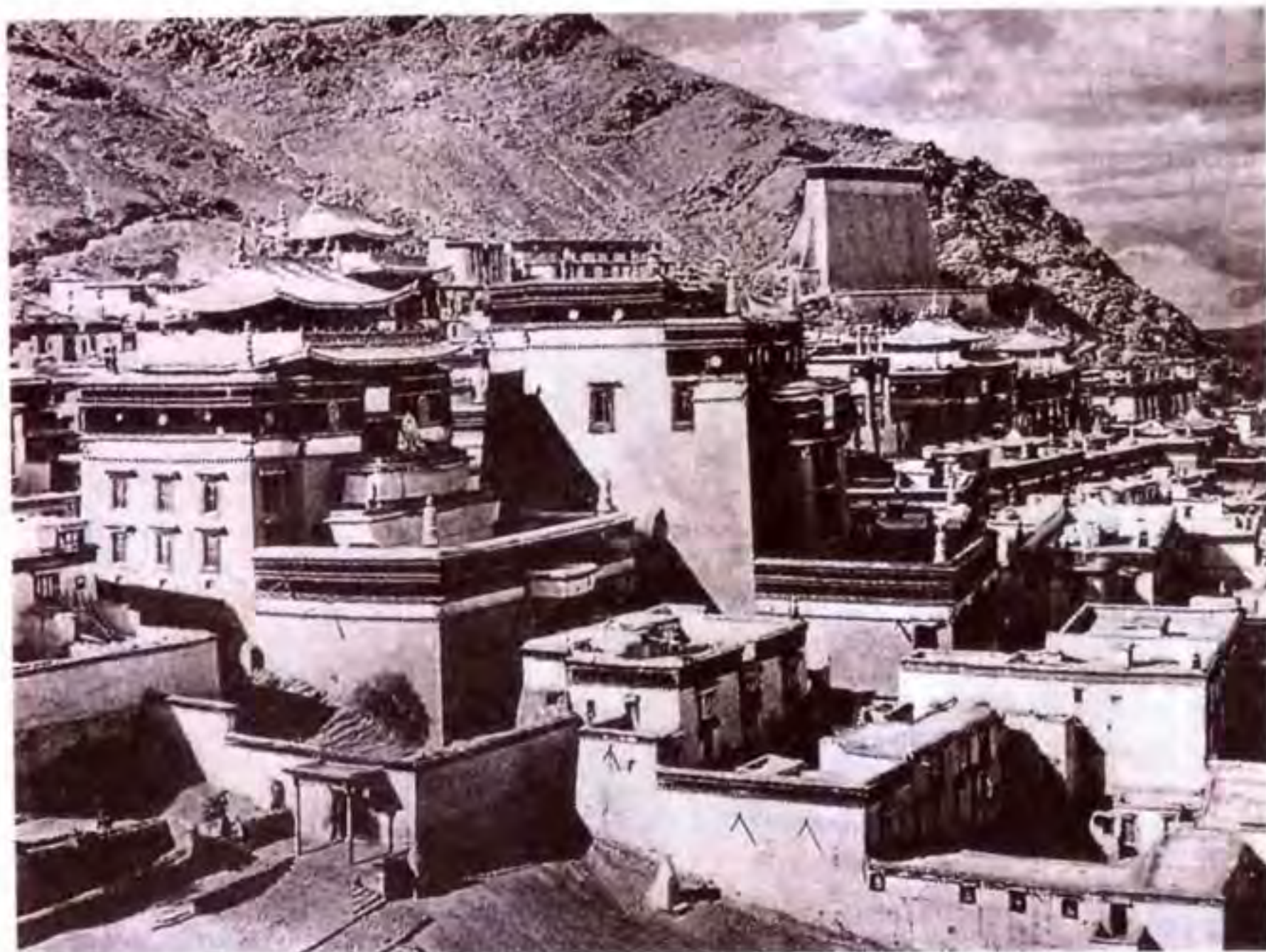
第二节 乌思藏和朵甘

乌思藏是藏语的音译，“乌思”为中央之意，指前藏，“藏”指后藏，是明代对今西藏地区以及四川西部巴塘、理塘一带的合称；朵甘是明朝对今西藏昌都地区东部和四川甘



《平番得胜图》

明
纵43.8厘米，横972.2厘米
描绘万历三年（1575）明政府派兵镇压洮州（今甘肃临潭）西番族叛乱的全过程。



扎什伦布寺

位于西藏日喀则，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由黄教宗师宗喀巴弟子根敦主持兴建。自四世班禅开始，班禅在此坐床，主持宗教与政治活动。

孜藏族自治州西北部的称呼。

乌思藏和朵甘地区是藏传佛教盛行的地区。早在元世祖时，就尊奉该地的萨迦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封其为大宝法王，统领十三万户。元朝历代帝师都由萨迦寺喇嘛袭封。朱元璋即位后的第二年（1369），便遣使到吐蕃地区告谕明朝建国，又派遣陕西行省官员前往各部落，招谕元朝旧封官员来朝授职。

宗喀巴像



洪武六年（1373），萨迦派摄（代）帝师喃加巴藏卜来京，被朱元璋封授为“炽盛佛宝国师”。同年，明朝在乌思藏设立卫指挥使司，置指挥同知等官，次年又升为行都指挥使司。

洪武四年，明朝在朵甘地区设置卫指挥使司，设指挥同知等官。洪武七年升格为行都指挥使司。洪武八年又在纳里（阿里）地区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

乌思藏、朵甘行都指挥使以下各级官员以及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的元帅，均由明廷任命的藏族贵族首领担任，实行军政一体的统治。

明成祖即位后，加强对乌思藏和朵甘地区宗教首领的笼络，先后封授了五个王。永乐四年（1406）封吉刺思巴监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国师阐化王，颁赐玉印并白金五百两及绢茶等。次年，封授馆觉灌顶国师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赐金印；封授灵藏灌顶国师着思巴儿坚藏为赞善王，也赐金印。永乐十一年，分别封授萨迦派思达藏的喇嘛南谒烈思巴为思达藏辅教王、噶举派必力工瓦喇嘛领真巴儿吉监藏为必力工阐教王。这五王既是宗教领袖，又各有分地，每三年向朝廷进贡一次。

明成祖还先后封授三位纯属宗教领袖但地位更高的“法王”。永乐五年封授噶举派的黑帽寺主哈立麻（哈尔麻）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永乐十一年封萨迦派的喇嘛昆泽思巴为“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永乐十三年封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为“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明宣宗时加封大慈法王）。

以上八王，明朝历代相承，各王定期或不定期地遣使向明朝进贡，他们带来马匹和

其他特产，明廷也以绸缎、布帛、茶和钞等回赐。回赐品的价值一般都比贡品高出数倍，所以各王都争先恐后地入贡。回赐对明朝中央政府来说已形成很大的负担，明中期以后，朝廷多次申明停止入贡，但来者却与日俱增。

藏传佛教有红教、花教、白教、黑帽、红帽、黄教等派系。花教在十二三世纪时最为得势。14世纪中叶，白教夺取了花教的权力。创建于15世纪的黄教（格鲁派）后来居上，影响日益扩大。该派的创始人罗桑扎巴因出生于宗喀巴（青海湟中一带），故称宗喀巴大师。他早年入藏学习各派佛法，鉴于各派僧官兼为领主，戒律废弛，因创新派，进行宗教改革，弘扬戒律，整饬寺院，地位日益尊崇。嘉靖年间，黄教采用活佛转世制度，形成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一直延续至今。

第三节 从土司制度到“改土归流”

中国的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明朝建立以后，基本上延续元朝对该地区的管理方式，任命当地本族的土司为土官，管理地方事务，由中央颁发符印，确定其等级，并规定了承袭、考核、缴纳贡赋、应征等制度。土司必须承担和缴纳中央规定的贡赋，听从中央的调遣和征发，但在土司辖区内仍然保留其传统的统治机构和权力。土官的官职可以世袭。广西、湖广和海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也保存着一定数量的土官。

在一些交通比较便利、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少数民族聚集区，明廷采取“土流合治”或“土流参治”的办法：在土官势力较强的地方以土官为主，任命当地原有的土官为土知



府、土知州和土知县等，另由政府派出流官任副职，起辅佐和监督作用；在土官势力较弱的地方，由政府派流官任正职，任命原有土官任同知、通判等副职。土官无论正副都可以世袭，而流官同普通州县一样，有一定的任职期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明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土司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有些拥有军政大权的土司在势力强大之后，往往不听从中央和各省都指挥使司或布政使司的调遣，割据一方，甚至反抗明廷。各土司之间互相兼并和仇杀的现象时有发生，土司内部争夺世袭权的斗争也很激烈。有些部族的人民由于受到土司和明朝政府的双重剥削、压迫和无休止的征发，爆发了反土司、反明朝的斗争。这使土司制度逐渐失去明初招抚和安定边远少数民族各部的作用。因此，明朝在稳固统治后，陆

明宣德铜铃、杵

铜铃通高19.5厘米，口径9.5厘米；杵通高12.7厘米。这两件佛教法器是宣德年间明政府布施给西藏拉萨寺院的。清乾隆年间，又由达赖喇嘛送给乾隆皇帝作为生日礼物。



云南丽江

丽江是纳西族的聚集地。元朝时设宣慰司，明洪武十五年置丽江府，次年以当地的土司木德为知府。因木德征战有功，知府一职由木氏世袭。

续在一些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废除世袭的土官，代之以临时任命的流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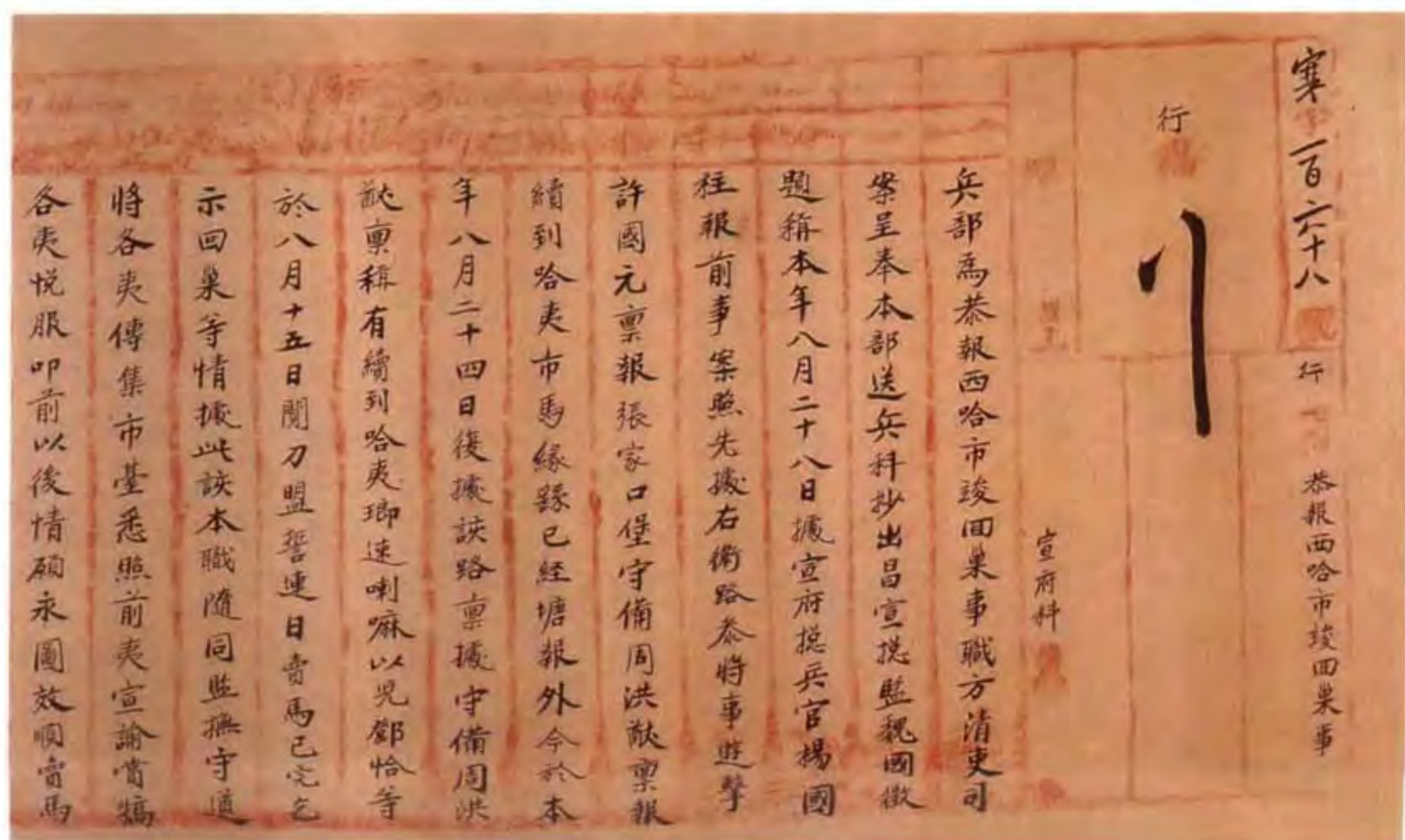
“改土归流”始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当时云南越州土知州阿资因作乱被杀，明廷便乘机废除了该州的土司，置越州卫。永乐年间，明廷又把贵州思南、思州两宣慰司分

割为八府四州，废除土官，派流官为府、州长官。万历时又把播州宣慰司分割为遵义、平越二府，任命流官为知府。改流的地区实行与内地相同的政治制度，登记户口，编制保甲，征收赋税。

但总的来说，明代“改土归流”所涉及

兵部报告张家口蒙汉马市完竣行稿

这是崇祯十年（1637）由地方官员奏请，经崇祯皇帝批准，兵部颁发的关于恢复蒙汉马市的执行命令稿。



的地域并不是很大，土司制度仍然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行政制度。

第四节 瓦剌三王和 俺答封贡

瓦剌是西部蒙古的总称，在明初时分为三部。三部的首领马哈木、太平和把秃孛罗应明朝的招谕来朝，被明成祖分别封为顺宁王、贤义王和安乐王，史称“瓦剌三王”。马哈木的儿子脱欢袭顺宁王后，灭掉贤义、安乐二王，立故元宗室脱脱不花为可汗。传至也先，瓦剌的实力最为强大，屡屡侵扰明境。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在土木堡大败明军，俘虏明英宗，兵临北京城下，制造了对明代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土木堡之变”。景泰元年（1450），也先送还英宗，恢复与明朝的正常关系。

东部蒙古各部在明朝时称鞑靼。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君长称可汗，设有知院、丞相等官。明初，鞑靼的活动中心在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一带。永乐八年（1410），明成祖亲征漠北，鞑靼各部被打散，分散到辽东、宣府（今河北宣化）至甘肃的广大地区。天顺以后，鞑靼的一些部落逐渐深入到河套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接触日益密切。为了与鞑靼进行贸易，明廷特在大同、张家口等处开辟马市，允许内地商人用茶叶、食盐、布匹、铁器交换鞑靼的马匹、牛羊，称“茶

马贸易”。

嘉靖末年，由于明朝和蒙古土默特部发生矛盾，马市被关闭。这时，强盛起来的鞑靼俺答部，迫切需要内地的工具、粮食和丝绸等，多次遣使要求重开马市，但遭到明朝的拒绝，俺答部便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大举犯境，围困京师，在京师周围往来掳掠达半月之久，史称“庚戌之变”。俺答部虽然没能攻入京师，但他们连年的掳掠使明朝不胜其扰。隆庆年间，明朝改变了闭市息贡的策略，重开马市，并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双方建立起正常的联系。

俺答汗死后，其妻三娘子主持蒙古部政务达三十年之久，坚持与明朝中央政府保持友好关系，被明政府封为忠顺夫人。

三娘子像



第三章

安养生息



明初，朱元璋虽然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统治，对官吏乃至功臣毫不留情，但他生于贫贱、起于草莽，深知民生艰难，因此，对下层百姓的态度还是比较宽容的。平定天下后，他实行安养生息的政策，采取一系列恢复生产、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官给耕牛、种子，奖励农民耕织、开垦荒地，实施移民垦荒；开展军屯，兴修水利；减免战乱地区百姓的租税和徭役。在手工业方面，对前代通行的匠籍制度进行改革，减弱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提高工匠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经过明初的安养生息，农业、手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为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十分活跃，在某些行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苏州的丝织业中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计日受值”的

经营方式。江南其他乡镇的丝织业中也分化出一批“以机杼起家”、雇人挽织的资产者，更多的人成了“听大户呼织”，把劳动力当成商品出卖的雇佣工人。很明显，这里的机工与机户的关系，已经是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占有者的关系，工人黎明立桥待雇的地方就是作为商品出卖的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主要是东南沿海一带的纺织业中的出现，这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崭新因素。

第一节 农业生产的恢复

经过元末长时间的战乱，明朝建立以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

绝”，劳动力严重不足，政府的赋税收入受到很大限制。因此，招徕移民开垦荒地成为明初安养生息政策的头等大事。

据记载，洪武年间比较重要的移民有几次：

洪武三年（1370），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四千多户到濠州种田，发给牛具、种子，三年不征租税。同年，又把江南民户十四万户迁移到朱元璋的老家凤阳。

洪武九年，迁山西及真定无产者到凤阳屯田。

洪武十五年，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降民二万四千余人到泗州屯田。

洪武二十一年，因山西人口日繁，便把泽、潞二州没有田地的农民迁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置屯耕种。

洪武二十二年，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没有田地的农民，迁往淮河以南滁、和等处起耕。

洪武二十五年，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五千六百户就耕于东昌。

像以上这样的大规模移民在洪武年间还有多次。凡移民垦田都由朝廷给予耕牛、种子和路费。洪武三年规定，开垦北方郡县荒芜田地者，户给地十五亩，又给菜地二亩，有余力多开垦荒地者不限，都免除三年租税。应公差者，可以在当差的当地开垦，官府为他们提供耕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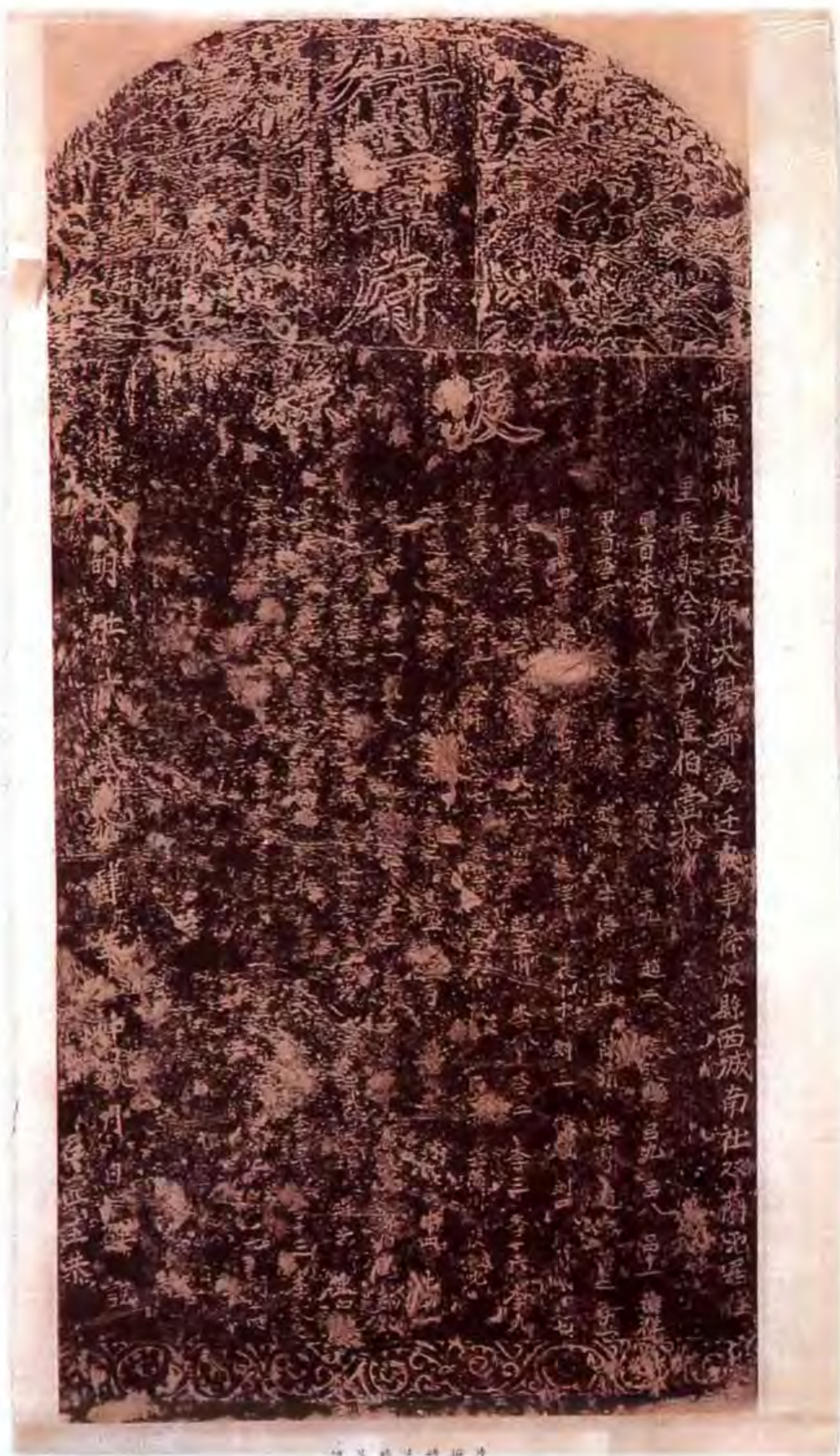
为了解决土地的产权问题，又规定：原土地所有者因战乱遗弃土地，致使土地荒芜，战后一时没能还乡，那些被遗弃的荒田已经被他人开垦为熟田的，土地的所有权归新主人而不是旧主人，旧主人所受的损失由官府另拨荒田补偿。这样就取消了开垦者的顾虑，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洪武二十八年（1395）又发布一条重要的法令，规定洪武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的田地，不论多寡，都不再收田租。如果有地方官擅自收租的，治罪。

以上一系列法令执行的结果，使全国大量荒芜的田地得到了开垦，自耕农的数量急剧增加，元末以来“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

《汲县移民碑》（拓本）

纵110厘米，横55.8厘米
原碑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立于河南汲县双兰池村。碑文记述了明初山西泽州建兴乡大阳都农民集体迁往河南汲县双兰村开荒垦种的史实，表明明初移民是由政府组织，按里甲编制进行的。





晓耕图

明 佚名绘

绢本设色

纵172厘米，横101.9厘米

此画描绘了明代江南农村
农民辛勤劳作的场面。

由于推行移民垦荒和屯田，耕地数字不断扩大：洪武元年（1368）的耕地面积为一百八十多万顷，到洪武二十六年则增为八百四十九万顷。人口也不断增加。同时，水利工程也兴修起来。生产工具和技术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农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水稻大面积推广，棉花自南向北大面积引种，同时还推广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以及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农业生产的发展达到空前的高度。

第二节 手工业的发展

明代以前，匠籍制度下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很强，除口粮外，别无报酬，行动不自由，社会地位低下，形似工奴，而且子孙承业，不得脱籍改业。洪武十九年（1386），明廷对传统的工匠制度进行改革，“议定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输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轮班匠。……量地远近，以为班次，且置籍为勘合付之，至期，赍至工部听拨”。按照这种新的规定，虽然工匠仍需为官府作无偿劳动，但是每年除服役三个月外，其余时间可以自行从事手工业劳动，和前代比，有较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减弱。

除轮班匠外，明成祖时又有一种住坐匠。住坐匠不像轮班匠那样需要千里迢迢赴京服役，只在本地为当地官府服役，每月十天，剩下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工匠制度的改革，使轮班匠和住坐匠在为官府服役后可以自由地生产手工业产品，提高了工匠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使明代的手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一批专业性



强、技术密集的手工业部门，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手工业城镇。

纺织、制瓷、冶金、造船等手工业部门都有长足的发展。就地区而言，江南的湖州、南京、杭州，山西的潞安，四川的成都、阆中，是丝织业的重要城镇；长江下游的松江府是全国棉纺织中心，有“松江布衣被天下”之誉；景德镇是明代最重要的制瓷业中心，所产瓷器品种和釉色都非常丰富；福建的尤溪、山西的阳城、广东的佛山等地是明代冶铁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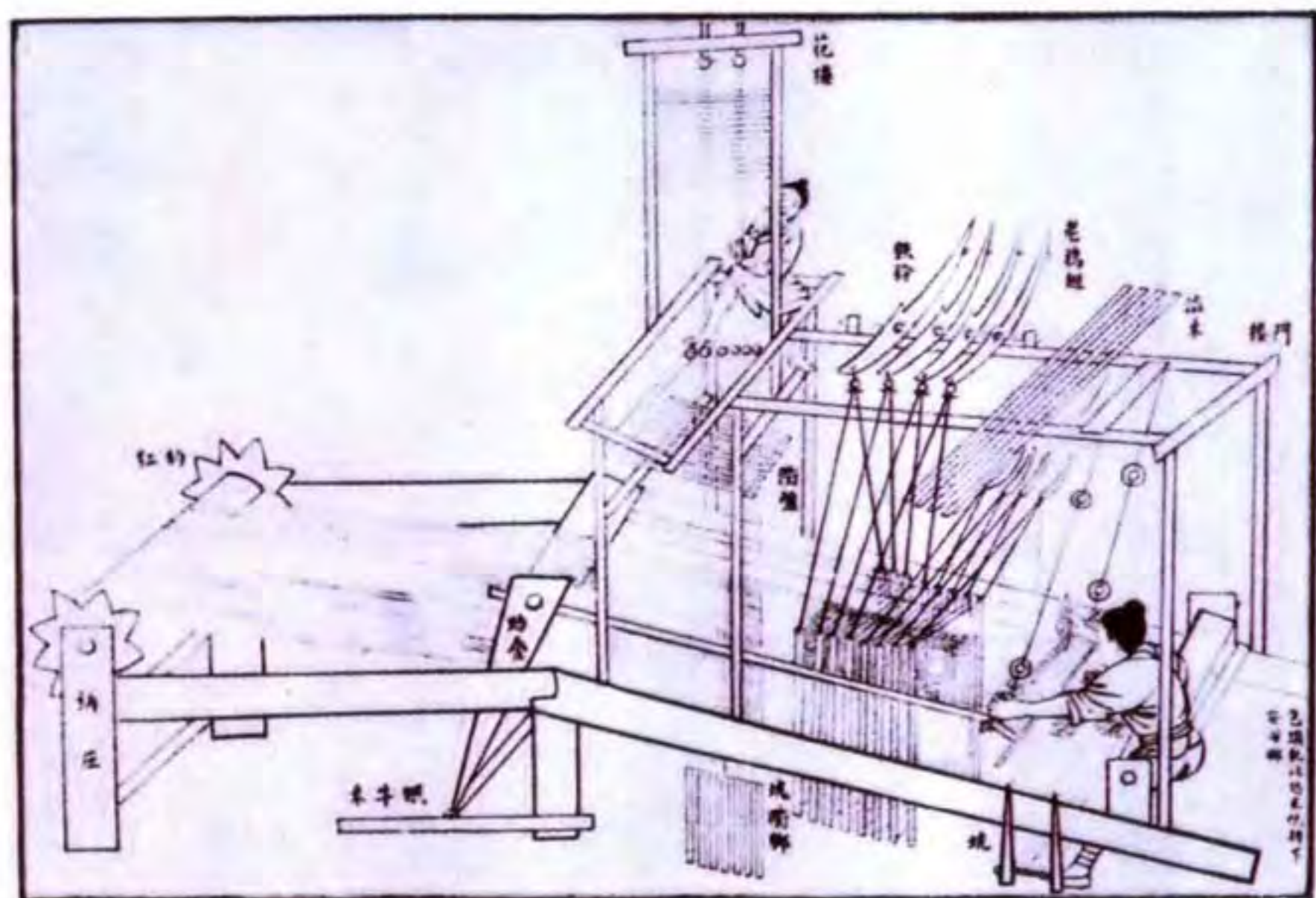
一、“巧变百出，花色日新”

明初规定农民必须种植桑麻，向政府交纳的赋税中就有丝绵和麻制品项。因而，明初栽桑养蚕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原料十分丰富，加上官营纺织业和民间涌现出了一批能工巧匠，对效率低下的纺织机械进行了改

《直隶开垦事帖》

明

纵60.2厘米，横46厘米
为明初政府发给南直隶徽州府祁门县农民黄玄生开垦荒地的产业凭证。帖中明确规定，农民开垦抛荒地，三年免除税粮。



花楼机

明

选自《天工开物》

进，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明代的纺织业远比前代发达，产量可观，花色品种增多，染织工艺精益求精，图案美观，正是所谓“巧变百出，花色日新”。江南的苏州、

杭州、南京、嘉兴，山西的潞安，四川的成都，福建的福州和广东的广州等地都是当时的织造中心。其中以江南的产量最大，质量也最精美。

丝织技术的革新，是明代丝织品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明代发明的花楼机，简便易行，效率很高，一人提花，一人梭织，可织出纹饰斑斓的锦缎，与前代相比有很大的改进。万历《福州府志》记载：“缎机故用五层，弘治间有林洪者工杼轴，谓吴中多重锦，闽织不逮，遂改缎机为四层，故名改机。”林洪革新的织机是把原来的五层织机，改为四层经线与两层纬线的织机。使用这种双层提花的交织方法，织出来的成品质地薄，表面滑润柔软，色彩柔和，而且花纹两面相同，是

寿字灵芝团龙妆花纱

明

北京昌平明定陵出土





水蓝印金杂花绦

明

纵 39 厘米，横 14 厘米

前朝所没有的。除“改机”织出来的新品种外，明代的丝织新品还有妆花缎、妆花罗、妆花纱等。江苏南京、苏州，福建漳州织造的妆花丝绒和金彩绒（天鹅绒）闻名中外。

在中国的丝织品发展史上，唐代的丝织品丰满秾艳，富丽有余而秀雅不足；宋代则素雅清淡，灰冷有余而艳丽不足。而明代则秾纤得中，修短得宜，丝织品的纹样结构比较严谨而又富于生动流畅的韵律，色彩鲜艳而又注意和谐统一，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纹样的处理手法上，明代丝织品已由以往纯粹的图案形式，逐渐趋向于写实的绘

画格调，但仍能巧妙地加以提炼、剪裁，做到既不完全失去素材的本来面目，又加强了耐人寻味的装饰性。依纹样分类，明代丝织品主要有以下几种：神仙人物，如仙女、群仙上寿、秋千仕女等；动物形象，如云凤、仙岩寿鹿、龟背龙纹、八宝双狮、五云翔鸾、瑞鹊衔花、鸳鸯莲露、游鱼落花、蜂蝶争春、盘绦团凤等；花草，如折枝花果、牡丹、花好月圆、延寿菊花、百花献寿、灵芝萱草、落花流水、五谷丰登、加银山茶、紫地莲花、缠枝番莲、折枝梅花等；几何纹和日用器物造型，如各式灯笼、金银锭、方格如意、龟背、



黑地五彩云龙海水锦
明
纵38厘米，横13厘米

盘绦、八达晕、六达晕、菱格、方胜、如意云等；吉祥文字，如富贵平安、吉祥如意、福寿有余、富贵吉祥、福禄寿喜、福寿常团等。

依其制作方法及艺术特点的不同，可以分作三类。

第一类是“妆花”。妆花是一种多彩的丝织物，织造时用装有许多不同色线的小梭，边织边配色，谓之“过管”。花纹色彩异常丰富，少者四色，多者十多色。花纹一般都比较，因此有“走马看妆花”的比喻。妆花有的完全用金线作地，不露缎地，因而称“金

包地”，后改称为“金宝地”。有的在缎底上起彩色花纹，同一花纹用同一色彩，在全幅中分成若干不同色段，多以芙蓉为饰，也被称为“芙蓉妆”。

第二类是“本色花”，通称库缎，或称摹本缎。具体的制作方法是，在缎地上起本色花，花分亮花、暗花两种，亮花浮于缎面，暗花藏于经纬之间。

第三类是“织金”或“织银”。此种织物是在缎地上用金线或银线织出花纹。也有金线、银线同时并用织出花纹的，称为“二色金库锦”。把金箔贴在线上成为圆形金线，然后织成花纹叫“库金”；用金线盘织在花纹的周围或渗织在金纹某些部分，叫“加金”；在图案中，某一部分花纹全用金线织成，其他部分不再用金的，叫“刻金”。其中“织金”最为富丽豪华，它或完全用金线织成底色，上面呈现彩色花纹；或是在其他底色上用金线织出丰满的图案。明代的织金，织作精细，显金面广，富丽之中又显出豪放。

明代的棉纺织业在元代基础上，特别是黄道婆在松江传播海南植棉和棉织技术之后发展很快。中期之后，棉花“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棉纺织业已经成为农民的主要家庭副业。棉纺织技术也不断得到改进，有了纺双纱或三纱的“天车”，出现以生产棉布为主的城镇和乡镇。松江地区（包括上海、华亭、青浦等县）产量很大，远销全国各地，有“衣被天下”之称。当时流传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在嘉善县）”的谚语。松江布花色众多，质地优美，“精线绫、三梭布、漆纱、剪线毯，皆为天下第一”。精致的松江布一度流入宫廷，有龙凤、斗牛、麒麟等花纹，染上大红、真紫、赭黄等艳丽色彩，有时一匹布价值白银一百两。



云纹花缎便服

明

1966年苏州王锡爵墓出土
衣长128厘米，袖长116厘米，宽44厘米

松江布

明

1956年江苏奉贤县杜士全墓出土
长229厘米，宽57.5厘米

除松江之外，江南一带生产棉布的著名城镇还有湖州、嘉定、嘉善、硖石、海宁、常熟、昆山、无锡等地。《湖州府志》记载：“正、嘉以前，南溪仅有纱帕；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嘉定县志》记载：“邑之民业，首借棉布，纺织之勤，比户相同。”

万历之后，北方的棉布生产也发展起来。据《农政全书》记载：“肃宁一邑，所出布匹足当吾松十分之一矣，初犹莽莽，今之



青地番莲纹印花布

明

纵35.1厘米，横14.3厘米



细密几与吾松之中品埒矣，其价格仅当十之六七。”万历时《嘉定县志》也记载：“今北方自织花，南方几弃织作。”这些记载反映出北方棉织生产兴起的情况。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生产一种著名的诸葛锦，系用白花棉线作经，蓝色损线作纬，随机挑织，自成花样，出产在贵州等地。

明代有许多棉织品仿照丝织品经过提花或印染加工而成，如《天工开物》中记载云花、斜文、象眼等布的织法，都是仿照丝织花机制造的，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青地番莲纹印花布，华彩如绘，鲜艳夺目，是花布中的精品。朱恩墓出土的松江布头巾，上面隐约可见本色花纹。

二、“四时雷电”

明代的制瓷业非常发达，瓷窑增多，所

产瓷器品质优良，造型美观，色彩绚丽。自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在景德镇之珠山麓建御器厂起，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高峰时有官窑58座、民窑900多座，“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这些人力大部分来自本乡本土，也有不少来自外府。万历年间，镇上以制瓷为中心从事各种生产、买卖和运输等行业的，每日不下数万人。万历时人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记录了当时景德镇的繁荣景象：“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畅销国内外，“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

明代制瓷业，无论在意匠上还是在形式上，其技术均已臻于完美。瓷器制作技术由

轮转旋坯代替了竹刀旋坯，由吹釉法代替了蘸釉法。永乐以后，随着波斯、阿拉伯艺术的东渐，阿拉伯艺术也融入到中国原有的制瓷艺术中，大大丰富了中国瓷器的内涵。明瓷的彩料，多采自外国，如青花瓷初用苏勃、泥青，至成化时，因苏勃、泥青用尽，乃用回青。三佛齐的红色彩料也多用于瓷业。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生产出来的瓷器造型美观，色彩丰富，彩瓷由单彩发展到三彩、五彩、斗彩，青花瓷愈出愈精，白瓷洁白如玉，美不胜收。

青花瓷是明代瓷器的主流。永乐、宣德

年间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纹饰优美，制作规整而享有盛名。彩料基本上用进口的苏勃、泥青。这种青花料含锰量较低，因而可减少青色中的紫红色调，在适当的火候下，能烧成像宝石蓝一样的鲜艳色泽。但同时由于含铁量高，往往会在青花部分出现黑疵斑点。这种自然形成的黑斑和鲜艳的青蓝色却又相映成趣，被视为永乐、宣德青花瓷器的成功之作。

除景德镇外，广东饶平地区的青花、惠阳窑仿龙泉青瓷等在明代也负有盛名。



宣德青花海水云龙纹扁瓶

明

陈设品

高45.8厘米，口径8.1厘米，
足径14.8厘米

明宣德年间（1426—1435）
景德镇御窑厂制造，是宣德
青花瓷中的典型产品。



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

明

陈设品

通高46厘米，底径24.8厘米

嘉靖年间(1522—1566)出品

这件瓷器是明代彩瓷中的精品。



成化斗彩花蝶纹罐

明
罐高9.3厘米，口径7.4厘米，
足径9.4厘米

宣德青花灵芝石榴尊(左下)

明
陈设品
高19厘米，口径6.3厘米，底
径9.5厘米
石榴尊是宣德青花瓷中的新
品种，胎体精细，釉色鲜明
艳，造型新颖，装饰生动，对
后代有很大的影响。

宣德青花缠枝纹贯耳瓶(右
下)

明
陈设品
高19.6厘米



青花八仙葫芦瓶

明

陈设品

高58厘米，口径6.4厘米，足
径19.2厘米



明代的彩瓷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化时期的斗彩，是彩瓷的代表，它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彩色相结合的新工艺，主要着色剂为铁、铜、钴、锰，但运用不同的选料和配比，做出了鲜红、油红、鹅黄、杏黄、姜黄、水绿、叶子绿、松绿、孔雀绿、孔雀蓝、葡萄紫等绚丽的彩色，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内容和装饰手段。到了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在成化斗彩的工艺成就基础上，又发展成了著名的青花五彩瓷器。青花五彩多

以青花为底色，再根据图纹需要添加红、黄、蓝、绿、紫五色或其中的几色，色彩浓艳热烈，填笔简朴自然，名重一时。

明代的单色釉瓷器也有很大的发展。永乐年间景德镇烧成的白瓷，代表了中国制瓷史上白釉的最高水平。永乐白瓷胎薄如纸，洁净如玉，几乎只见釉不见胎，能映见手指螺纹，胎上划纹更清晰可见。因其薄如卵壳，故称之为“卵幕”。其釉细腻莹润，微闪肉红色，给人以甜的感觉，又称“甜白”。甜白釉



米黄釉阿弥陀佛像

通高62.6厘米

在白釉的生产过程中要把铁的含量减少到最低程度，而后在脱胎、半脱胎的洁白胎体上施以纯净的透明釉，经高温烧成，技术难度极高。此外，永乐、宣德时期出现的霁红和霁蓝，为单色釉瓷的极品。霁红又称祭红、积红、宝石红，是以铜为着色剂的高温釉，在

强还原气氛中烧成，可谓中国古瓷技术中的一项绝技。霁蓝是以钴为着色剂的一种高温石灰碱釉。宣德的霁蓝独树一帜，釉色如蓝宝石，釉质肥腴。明代低温单色釉最突出的成就是成化孔雀绿（法翠）和弘治黄釉。前者是一种以铜为着色剂的色釉，烧成工艺始

素三彩菊花耳瓶

明

陈设品

高36.3厘米，口径10.5厘米，
足径11.5厘米

素三彩是明代新出现的瓷釉品种，以黄、绿、紫三种釉色为主，不用红色，在白瓷胎体上直接加彩或刻绘，然后罩一层“雪白”，再次入炉经低温烧制而成。以三色中某一色为地，即称为某三彩，如黄三彩、绿三彩、紫三彩。



于成化。明代的孔雀绿器以正德时期为多，这种绿釉呈色碧翠雅丽，与孔雀羽毛的色泽很相似。弘治黄釉的色调是纯黄色，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釉的最高水平，其釉色滋润明洁，有如初开的葵花，娇嫩晶莹，故有“娇黄”之称。它是一种用含铁的天然矿物作着色剂的低温铅釉。

除景德镇外，福建德化的白瓷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其白瓷产品质地细腻，透明度好，白中透红，被称为象牙白、猪油白、葱根白、建白、中国白等，是当时中国白瓷的代表作品。

三、景泰蓝和漆器

景泰蓝，也称掐丝珐琅器，是在金属胎体上用细铜丝铆焊成图案，加各种珐琅彩釉

料（主要原料是硅砂、石英、硼砂和碳酸钠等，加不同分量的氧化砷、氧化铬、氧化铜等着色剂），经高温成色，最后磨光成器。因这种工艺品的制作技术，在景泰年间（1450



剔红花鸟纹长方盒

明

长36.7厘米，宽22厘米，高11.2厘米

剔红是一种雕漆工艺。雕漆，是在器面上反复涂漆30多层后，再在厚厚的漆上雕刻图案纹饰，其中用红色漆的称为“剔红”。



掐丝珐琅鱼藻纹高足碗

明

陈设品

高10.4厘米，口径14.9厘米，足径4厘米

江千里制黑漆嵌螺钿执壶

明

高35厘米，口径6.3厘米，长7厘米

壶身为黑漆锡胎，四周嵌以红玛瑙、珊瑚、绿松石、螺钿，构成花鸟蝴蝶梅花图案。壶底嵌有“千里”二字，是明末著名镶嵌漆艺工匠江千里所作。



—1456) 日臻完善，成品多以蓝色为地，色泽晶莹，故名“景泰蓝”。

明代的漆器制造业很发达。宫廷内官监下设有油漆作；御用监有专人负责造办螺钿等漆器；内府供用库还特设丁字库，常贮生漆、桐油等物。在永乐至宣德年间又开设果园厂，调用著名漆工，专门制作漆器。民营油漆作坊分布很广，如浙江嘉兴、安徽新安、山西新绛，以至北京、扬州、苏州、云南、四川等都是重要的漆器产地。明代漆器品种已很齐全，主要有一色漆器、罩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犀皮、剔红、款彩、戗金、百宝嵌等。其中如嘉兴和新安的剔红、苏州和北京的描金、扬州的薄螺钿和百宝嵌、新绛的雕填和剔犀、大理的雕漆等，都名重一时，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明代漆器不仅品种繁多、色彩绚丽、图案精美，而且刻花、雕琢、镶嵌和仿塑瓜果、花卉、飞禽、走兽及亭台楼阁等，也无不精工，髹饰工艺已臻成熟。

潞王中和琴

明

弦乐器

通长120厘米，宽19厘米



明代黄成所著《髹饰录》(成书于天启年间),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漆工技术专著。该书分乾、坤两集,共十八章,一百八十六条。乾集主要讲述制作漆器的原料、工具和设备,以及漆工容易犯的各种毛病和原因;坤集主要讲述漆器分类和各类的不同品种,以及漆器的制作、揉饰和修复方法。《髹饰录》的突出贡献是根据漆器特征和工艺特点,为揉饰工艺提出了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同时也为品种繁多的漆器定名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

四、冶金技术的提高

明代的冶金技术,在采矿、冶铁、制钢、铸造、锻造和锌的冶炼等方面都超过前代,在世界上也处于先进行列。

明初,铁矿的开采和冶炼由官府专营,全国只有十三个官营冶铁所,产量有限。洪武末年,朱元璋解除了限制民间采矿的禁令,“令民得自采炼,每三十分取二”,极大地促进了民间炼铁业的发展。全国产铁地区达到一百多处,广东的佛山、山西的阳城、福建的尤溪、陕西的华州都是重要产铁地。炼铁的规模也是空前的,大炉一炉可熔炼矿石二千斤以上。明中叶以后较大的铁场,至少有六七个一丈高的炼铁炉,小场也有三四个。一般大场有雇工二三千人,小场也有一



千人左右。铁场多设在矿山、林区附近。有些铁场包括开山采矿、伐木烧炭、矿石冶炼、器具制造以及相互间的运输等,有科学合理的安排与布局,已经初具联合企业的雏形。这类大规模经营的铁场,“皆厚资商人出本,交给厂头,雇募匠作”。生产的铁制器具有铁锅和农具等。

与汉口镇、景德镇、朱仙镇并称为“天下四大镇”的广东佛山镇,在明初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村社。正统年间,因制锅业的发展而迅速崛起,成为全国铸造业的中心地之一。广东的铁矿品位高,质量好,有“铁莫良于广铁”之说。开采出来的广铁就近集中到佛山镇,铸造出铁锅、铁钟、铁线、铁钉

阿拉伯文带座铜炉

明
通高22.3厘米,口径24.1厘米
正德年间(1506—1521)铸造

钢剑

明
通长97.4厘米,剑长79.2厘米,柄长18.2厘米,鞘长83.2厘米
此剑至今锋利无比,柔性极好,锈蚀并不严重,是明代高超冶炼技术的见证。



明宣德铜熏炉

礼器

通高91.9厘米

宣德年间(1426—1435)制
宣德炉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
金属制品之一。该炉用优质
铜铸造,造型古朴,端庄沉
稳,以褐色、茄皮色、藏经
色等为多,深得世人钟爱。



和铁针等,销往全国各地。其中,铁锅远销南洋,是广州出口货物中的重要商品之一。

江西德兴、铅山的铜场和云南开采锡矿和银矿等的规模和产量也都很可观。清初云南的铜场又有很大发展,据记载“大场丁六七万,次亦万余”。最大的汤丹铜场,产量最高年产一千三百万斤,可见规模是很大的。

第三节 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农产品和手

工制品大量投入市场,使商品经济变得活跃起来。商品经济的活跃,又促进了原有商业城镇的发展和一大批新的工商业城镇的兴起。两京(北京和南京)、苏州、杭州、开封、济南等也由传统的单一的政治城市转变为集政治、文化和商业为一体的多功能城市。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初保守的货币流通体制也受到了冲击。白银逐渐取代缺乏信誉的宝钞和笨重的铜钱,成为市场上的主要流通货币,给贸易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富商大贾和小商小贩携带白银奔走于城镇乡村之间,往来贩运。他们往往以地域为纽带,互相帮助,相互提携,组成一个个叱咤商海



枫泾镇

明代江南商业名镇之一，当时属松江府管辖。

的商帮。有的富商还把生意做到海外。

一、市镇经济的繁荣

市镇经济的繁荣是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的一大特点。

北京和南京是明代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两个最大的消费城市。两京的商业区车水马龙，店铺林立，热闹非凡。中国国家博物

馆所藏的《皇都积胜图》和《南都繁会图》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繁华景象。

江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和运河沿岸地区是商贾聚集之处，涌现出一大批专业性很强的商业市镇，如松江府以及下属的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朱家角镇，苏州府以及下属的璜泾镇、南翔镇、娄塘镇、外冈镇、盛泽镇、震泽镇，湖州府以及下属的南得镇、



拙政园

江南园林是见证明代市镇经济繁荣的重要遗存，拙政园是其代表作。





《南都繁会图卷》（局部）

明 佚名绘

纵 44 厘米，横 350 厘米

图卷描绘明代南京城市商业兴盛的场面。画面从右至左，由郊区农村田舍开始，经城中的南市街和北市街，止于南都皇宫，着重表现纵横的街市，市面店铺林立，标牌广告林林总总，车马行人摩肩接踵。画卷内共绘有1000多个职业、身份不同的人物和109个商店的招幌牌匾，充分反映了明代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卷首署“明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尾署“实父仇英制”，但从绘画技法看，并非仇英的作品。



《皇都积胜图卷》(局部)

明 佚名绘

纵32厘米，横2182.6厘米
绢本设色

图卷描绘了明代中后期北京城市商业繁盛的情景。画面从卢沟桥经广宁门（广安门）进入北京城区，又经正阳门、棋盘街、大明门、承天门（天安门）、皇宫等街市，向北延伸至居庸关。画面着重描绘市区商业街道面貌，街道上车马行人熙熙攘攘，茶楼酒肆店铺林立，招幌牌匾随处可见，马戏、小唱集聚无数看客，金店银铺人如潮涌。



上海豫园



《货郎图》

明

纵190.6厘米，横104.5厘米

这是一幅民俗画。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货郎鸣锣呼唤，招来一群老少挑选商品。在当时，这样的货郎在城乡各地很活跃。

乌青镇、菱湖镇、双林镇，嘉兴府以及下属的濮院镇、王店镇、王江泾镇，等等。这些商业重镇分布非常密集，镇与镇之间间隔不过数里或数十里，构成了一个密切相关的市镇网络。

这些市镇的商品化程度高，手工业发达，人口较多，有比较稳定的商品市场、消费市场，商品经济比较活跃。苏州民间“好费乐便，多用储，悉资于市”。杭州“米珠取于湖（州），薪桂取于严（州），本地止以商

金花银

明

从正统元年（1436）起，明政府规定江南田赋折银征收，地方政府每年将收齐的散碎银两铸成银锭，上交中央户部。银锭上刻有地方名称、税别、重量、内耗及有关官员和银匠姓名等内容，称“金花银”。此锭是万历十六年（1588）福建上交户部的五十两银锭。



大明通行宝钞

又称洪武宝钞。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设宝钞提举司，开始印造纸钞，与铜钱并行。规定每钞一贯准钱千文，或银一两；四贯准金一两。



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江西的景德镇，既是瓷业生产的中心，也是贩瓷中心。

二、国内外贸易的发达

随着经济的增长以及商品交换的频繁，明中叶以后，货币的流通量急剧增长，给明初的货币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明初，政府实行严格的“重本抑末”的政策，强行规定只有“大明通行宝钞”和铜钱才是民间合法的通行货币，禁止用金、银交易。但政府在发行宝钞时不设钞本，没有准备金，采用行政手段强迫民间用钞，无限制地发行，因此宝钞在民间经济活动中缺乏信誉，价格大跌，逐渐被遗弃。铜钱因为携带不便也受到冷遇。而携带比较方便、价值比较稳定的白银自然而然受到市场的青睐，逐渐取代铜币和宝钞，成为商品流通的主要货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货币流通方式的变化最终促使明政府改变不合理的货币政策。明初向农民征收赋税，分夏秋两次，称夏税、秋粮，以实物为主。从正统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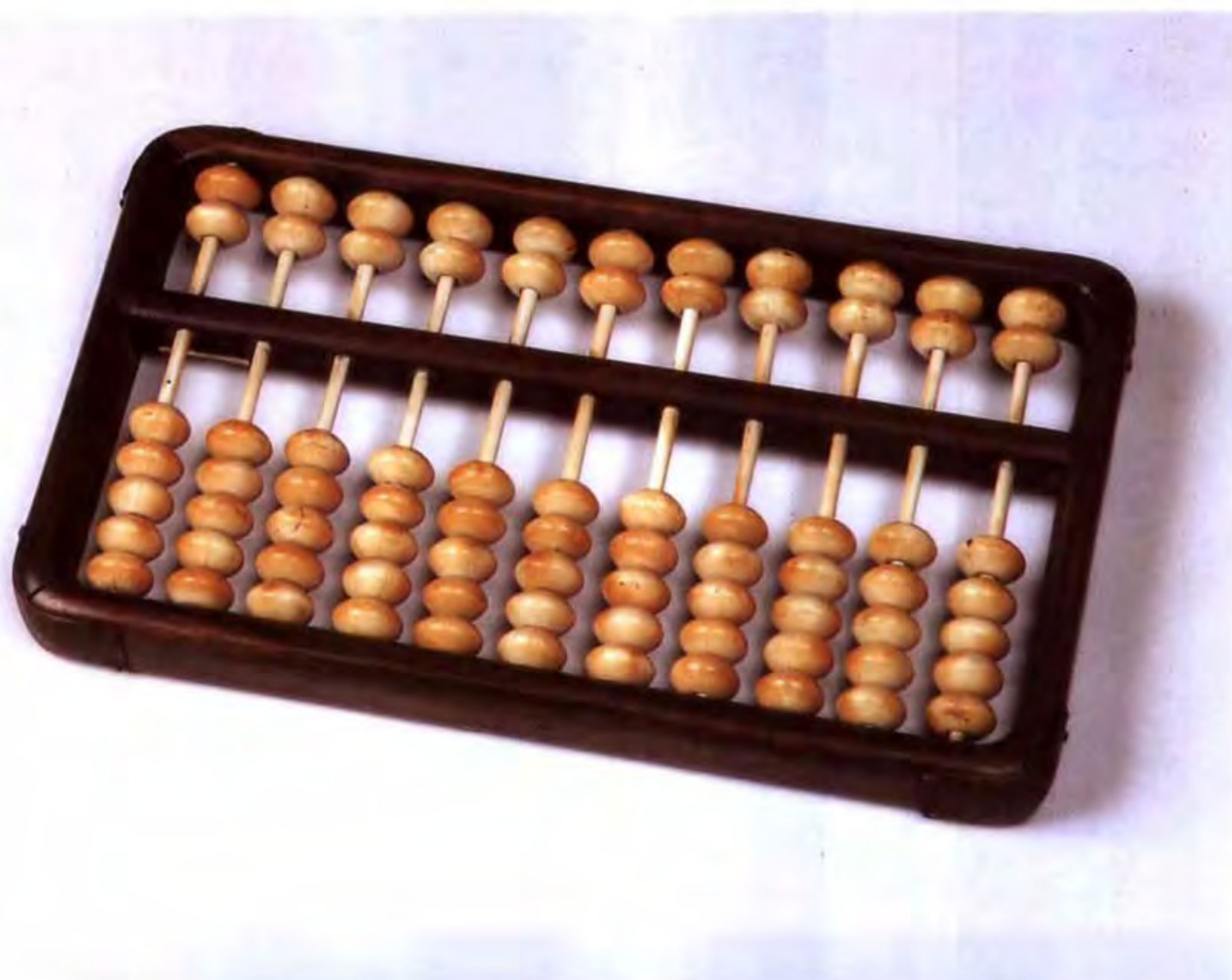
戥子

明
衡器

戥杆长31.1厘米,盘径8.5厘米,砣高4.7厘米,重94.6克
万历年间(1573—1619)制
这件戥子是称金银、药品等贵重物品的小衡器,制作精良,称量准确,可称出钱和分的重量。

(1436)开始,政府的财政征收也一改实物税收为货币(白银)税收,米麦一石折收银二钱五分。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应征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余两,称为“折粮银”,后被称为“金花银”。

这样,明初白银流通的禁令实际上已被完全解除,白银逐渐成为一种法定的秤量货币。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计亩征银之后,白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正式成为



象牙算盘

明
运算工具

长27.1厘米,宽15.2厘米

铜权

明
衡器部件
高5.5厘米，底径2.5厘米
建文元年（1399）制
权是衡器的一部分，俗称秤砣。



皖南民居——徽商曾经辉煌的印记



行用银本位的国家。

白银在民间的广泛使用，给贸易带来了便利，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明代中后期，国内贸易所辐射的范围非常广，形成了联络南北的商业贸易网络。当时北方的棉花价贱，但棉布价贵；南方则相反。因而北方的棉花装船运销南方，南方的棉布装船运销北方。景德镇的瓷器，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北直隶河间府的行商，从南京、苏州等地贩来丝绸，从河南卫辉等地贩来粮食，从临清、泊头等地贩来铁农具，从沧州、天津贩来食盐，从真定贩来木料，从徽州、饶州贩来漆器、瓷器等。

这些走南串北的商贩，多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结成地区性商帮，如徽州商帮、山陕商



肯尼亚出土的明青花瓷

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江西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等。其中徽商最为活跃，“尽天下通都大邑及穷荒绝徼，乃至外薄戎夷蛮貊，海内外贡朔不通之地”，“足迹无或不到”。

除了国内贸易，到明朝中后期，海外贸易（不含朝贡贸易）也因海禁的解除变得活跃起来。输入中国的商品以海外各地的特产和香料为主，还有暹罗红纱、番被、嘉文席、交趾绢、西洋布等少量手工业品。从中国输出的商品有生丝、丝绸、瓷器、铜器、铁器、食品、各种日常用具以及牲畜等，其中尤以

生丝、丝织品、瓷器为大宗。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海外输入的商品，除了供皇室贵族赏玩的珍禽异兽、珍珠宝石之类外，大部分都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输入的赤金、足色银、钱铜、番锡对于明代货币白银化和铜钱的制造起了相当的作用。一些中国没有的手工业原料，从国外输入，在国内加工，促进了中国手工业的发展。中国早有玻璃制品，但质量不高，这时国外的大量高级玻璃制品进入了市场。明代中后期，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商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已达到相当程度。

第四章

经世致用



有明一代，虽然通过科举考试走向仕途仍然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优秀知识分子改变过去那种贱工商、薄工技的价值观念，把精力转向探求经世致用的科学技术方向，以纯粹的求知兴趣而不是以功利为目的来探索科学，涌现了一大批集大成的科学家，如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宋应星（著《天工开物》）、朱载堉（著《乐律全书》）、方以智（著《物理小识》）和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在专门科学方面出现了不朽的名著，如徐心鲁的《盘珠算法》、程大位的《算法统宗》、黄成的《髹饰录》、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罗洪先的《广舆图》和《郑和航海图》、邝璠的《便民图纂》、朱橚的《救荒本草》、吴有性的《瘟疫论》、杨继洲的《针灸大成》、陈实功的《外科正宗》以及傅仁宇的《眼科大全》等。

明代末期的科学技术与以往相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西洋科技的引进。把西洋科技传进中国的是传教士。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技知识主要有欧氏几何、算术笔算法、对数和三角、望远镜、重心、比重、杠杆、滑轮、轮轴传动、斜面原理、火炮铸造、子弹和地雷制造等。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给中国带来了自成体系且在某些方面比中国传统科技先进的科学，揭开了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序幕，对促进中国科技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西学东渐所带来的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直接与明中叶以后形成的早期启蒙思想结合到了一起，无论是在中国思想史上，还是在科学史上，都留下了应有的位置。正如李约瑟指出的：“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耶稣会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

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

中西方之间的科技传播也是相互的，传教士也给欧洲带去了中国的文化和科技。和传教士白晋关系密切的莱布尼兹（1646—1716）从中国的周易中受到启发，发明了二进制算术。

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夷夏”观念和“源流”思想的屏障，传入的科技未能被广泛地接受，从而使中国错过了与世界科技同步发展的机会。

第一节 徐光启与利玛窦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松江府上海县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他思想开明，博学多才，在农学、天文、历算、数学、地学等领域都有所成就。《农政全书》是他最主要的科技著作之一。该书共六十卷，约五十多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等十二大目。其中的“农本”记述了历代有关农业生产、农业政策的经史典故及诸家论议；“田制”是他本人及其他古代农学家关于土地制度的研究和论述；“农事”总结了中国古代各种耕作方法和有关农业季节、气候的知识；“农器”用图的形式介绍各种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产品加工工具；“荒政”归纳了历代的救荒政策和措施，并对野生植物的利用



价值作了考察。《农政全书》是一部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之大成的农学著作。

徐光启所取得的科技成就，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密不可分的。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人，耶稣会教士。1582年他随传教团到达澳门，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他从澳门入肇庆，又到韶州、南昌和南京，并从南京到北京，最终在北京去世。



《农政全书》

徐光启著，明崇祯刻本。

利玛窦像

游文辉绘

利玛窦来中国之前,已有一些传教士到过中国。这些传教士依循一手持《圣经》,一手握宝剑的方针,企图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利玛窦到来之后,深深感到要在中国立稳脚跟,不能仅限于布道,而是要设法博得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当权者和士大夫)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好感。于是,他一面携带用欧洲新科技制造而成的“奇技淫巧”,如西式天文历算、泰西地图、自鸣钟等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皇帝,以讨中国皇帝的喜欢;另一方面他学汉语、穿汉服,精通儒家经典,以此博得中国士大夫的接纳,从而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利玛窦来华,首先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地图,打破了中国陈腐的“天圆地方”观念,

使中国人首次认识了世界全貌,产生了较大的启蒙作用。他又把欧洲当时最为权威的经典几何教科书《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几何学的内容,也完善了它的表述方法,“几何”、“平行线”、“直角”等译名一直沿用至今。此外,利玛窦还有《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勾股文》、《圜容较义》等西方数学的译著,涉及数学的大部分领域,对日后中国数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利玛窦还出版了《乾坤体义》,介绍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指出日体大于地,地体大于月,并亲自制作了天体仪、地球仪,运用和验证了“地圆学说”。他还首次引入“公历”计年法,后来成为中国历法计算的基准。利玛窦不遗余力地传播西方科学,使他渐渐在士大夫中赢得了尊重,被誉为“泰西鸿儒”。

徐光启早年在家乡认识了利玛窦,相交甚深,并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加入了天主教。后来,利玛窦来到北京,徐光启也考中进士,在北京任翰林院庶吉士。二人经常在一起研究天文、历法、数学、地学、水利等学问,合作翻译西方的科技著作。徐光启从利玛窦那里学习了欧洲天文学之后,很快用于实践。崇祯二年(1629),由于钦天监推算日蚀又发生了错误,徐光启受命主持历法改革工作。他不顾保守势力的阻挠,坚持以西方历法为基础实行改革,经过数年的努力,完成了一百三十多卷的《崇祯历书》。这本历书突破了中国传统天文历法的局限,融入了欧洲近代天文学和数学知识,在中国天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徐光启作为一位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封建士大夫,凭着务实的精神,不避嫌疑,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大胆地向那些被一般人视作歪门邪道的传教士学习科学技术,在闭

徐光启和利玛窦
17世纪铜雕版画





关自守的封建时代，这种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节 宋应星与《天工开物》

宋应星（1587—？），字长庚，江西奉新人，举人出身，曾在江西、福建等省做过地方官，后辞官回乡。宋应星虽然中过举人，也当过官，但对八股和官场并不感兴趣，在他的眼里，“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对世间万象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孜孜不倦地去学习、探求。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天工开物》这部科学著作里。

《天工开物》记述了当时全国各地农业和副业的生产过程及生产经验，包括作物栽培、养蚕、纺织、染色、粮食加工、熬盐、制糖、酿酒、烧瓷、冶铸、锤锻、舟车制造、烧制石灰、榨油、造纸、采矿、兵器制造、颜料制造、珠玉采集等。

在农业方面，《天工开物》记述了培育优

良稻种和杂交蚕蛾的方法。书中所述在冷浸田中使用“骨灰蘸秧根”的方法，是中国农业史上合理使用磷肥的最早记录；所述“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物种变异说，是改良品种的科学理论根据。在纺织方面，《天工开物》记载了用花机织龙袍、织罗的方法。在冶炼方面，记载了炼铁联合作业，灌钢、炼锌、铸

《坤輿万国全图》



《天工开物》书影

宋应星著。书成于崇祯十年（1637）。全书分三卷十八目，是总结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矿业等技术的科学著作。这是1959年根据崇祯刻本影印的。



《天工开物》炼铜图

钱、半永久泥型铸釜和失蜡铸造的方法，其中锌的冶炼技术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在采矿方面有排除煤矿瓦斯的方法等等。以上生产技术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天工开物》很重视实验数据，书中对单位面积产量、油料作物出油率、秧田的移栽比、各种合金的配合比等都有精确的记录，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宋应星还研究所收集的材料，提出不少科学的见解，如他根据煤的硬度和挥发成分，提出了一项符合科学原理的煤的分类方法，很有实用价值。对于一些长期流传的错误观点，如“珍珠出自蛇腹”、“沙金产自鸭屎”、“磷火即是鬼火”等荒谬的说法，都一一予以驳斥。

在《天工开物》这部著作里，宋应星提出了一种新的技术哲学思想，即“天工开物”的思想，认为人类依靠自己的智能和技巧，可以源源不断地从自然界开发出有用之物，为自己服务。

《天工开物》刊行后，很快传到日本，并在日本翻刻，广为流传。1869年有法文摘译本，后又译成德、日、英等多种文字，受到

世界各国的重视。它是有关中国古代生产技术，特别是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宝贵文献。

宋应星博学多才，不但熟悉多种生产技术，对天文、音律以至哲学等都有研究，他的著作除《天工开物》外，还有《谈天》、《论气》、《画音归正》、《野议》、《思怜诗》等多种。

第三节 奇人奇书

徐霞客(1586—1641)，江苏江阴人。他从二十二岁起，“驰骛数万里，踟躅三十年”，北到燕晋、西至云贵，对祖国的地理、地质进行了三十多年的实地考察。据说他在出游的时候，常常不治装，不裹粮，粮食断绝时，能忍饥数日，遇食即饱，徒步连走数百里而不累。他凌绝壁，冒丛棘，攀援下上，遇渡荡绳，捷如猿猴，健如牛犊。不管有路没路，不管是荒榛密棘，还是野兽出没，都挡不住他攀登的脚步；急流奔腾的大江大河，即使没有渡口，他也能过去。越是险峻的高峰，他越要登上绝顶；越是深邃的洞穴，他越要往里钻，以探个究竟。夜幕来临，就睡在大树巨石之上，饿了就以野草野果充饥。“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徐霞客把自己旅行的经历和考查的内容记录下来，写成著名的《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无论从文学角度而言，还是从科学角度而言，都是一部顶尖的名著，被称为“古今游记之最”，是“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钱谦益称徐霞客是“千古奇人”，《游记》是“千古奇书”，成为世人公认的至论。

徐霞客不但是旅行家，也是地理学家。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纠正了古人在某些地理上的错误认识，如查明长江的源头是金沙江而不是《尚书·禹贡》中所说的岷山。在比较福建的建溪和宁洋溪（九龙江）时，他推论二溪的分水岭高度相等，而流程与流速的关系是“程愈近而流愈急”。他还考察了石灰岩地貌的特征，成为世界上对大面积石灰岩地貌进行研究的第一人。他对于广西的峰林有很精彩的描述，如称阳朔四周是“碧莲玉笋世界”。他根据观察到的现象进行类比，厘定了一系列的名称，如峰林称石峰，圆洼地称环洼，天然桥称石梁等。对于岩溶洞穴的研究更为出色，他详细考察过一百多个洞穴，大都记有方向、高深、宽窄等数据。对溶洞、钟乳石、石笋等成因的解释，都基本上符合科学原理。此外，对于因高度和纬度的不同而产生的气候差异以及对动植物生态与分布的影响等都有很好的记述。

徐霞客的精神是科学的精神。《徐霞客游记》一书，完全是以求真的科学精神写成的。古来游记写作，目的在于抒发情志，而不在科学地客观考察，所以记叙描写多有失真。与此相反，在徐霞客那里，审美完全服从于客观的真实，求真始终是第一位的。他随身携带《明一统志》，又沿途广泛搜访地记、方志，将实地观察和文献记录认真校对，订正了文献记录中的不少错误。他有着精确的数量观念，也十分注意量的记录，道路远近、洞穴大小，他实测后，都详记具体数字。因此，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盛赞徐霞客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徐霞客的科学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对科学经验的重视，而且还表现在他努力从自然现象的相互联系中去探寻特定的自然现象所



产生的原因，突破了传统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思维方式的限制，开始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上深入探究自然的奥秘。

《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著，清嘉庆十三年（1808）活字木刻本。

第四节 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年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人。他出身中医世家，从小就受到医药方面知识的熏陶。李时珍自幼多病，每次大病都经他父亲精心调治才转危为安，因此久病成医，对医药的重要性有深切的认识。十四岁考取秀才后，三次参加乡试都未中举，于是他决定放弃科举，专心继承父业行医治病。因为医术高明，李时珍曾一度供职于楚王府和太医院。

李时珍雕像

黄杨木雕



李时珍的医学知识一方面来源于家传，一方面来源于在楚王府和太医院任职期间阅读的珍贵医学、药学和其他书籍，更重要的是他身体力行，勇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医学科学真理。他披荆斩棘，不仅走遍自己的家乡，还到过湖北的武当山、江西的庐山、江苏的茅山、南京的牛首山以及安徽、河南、河北等地，采集标本，收集单方，有时还进行类似药理学的试验。例如，为了证实古医书上说罗勒子能放入眼内治疗眼病的说法，他把罗勒子置水中观察，见它能胀大变软，才肯定了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为了证实穿山甲胃中有蚁升许的说法，就亲自对穿山甲进行解剖。在证实无误后，李时珍才把古书中的知识引用到自己的医药学著作中。

李时珍在学医的过程中，看到许多药物学著作中存在不少错误，例如天南星和虎掌原是同一种植物，却误为两种药；萎蕤和女

万历黑漆描金龙药柜

明

宫廷御药房盛药用具

高94.1厘米，长78.9厘米，宽57厘米

万历年间（1573—1620）制黑漆地，正面及两侧饰描金双龙纹，背面及柜内饰描金花蝶纹，四足镶铜下脚。



萎本是两种植物，却又混为一谈；在分类上，误把虫类列入木类，把有毒性的水银说成是无毒、服了可以成仙等等，因此他决定重编一部“本草”。

李时珍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着手编写《本草纲目》，历经二十余年和三次重大修改，至1578年完成。该书是在宋代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约1500种药物，2000多个医方）的基础上，增加了将近400种药物，8000个医方而成的。全书共一百九十万字，五十二卷，分十六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六十类，插图一千一百六十幅。该书将每类药物都分若干种，系统分明，分类科学。对每种药物一般都记名称、产地、形态、采集方法、药物的性味和功用、炮制过程等。全书纲目清楚，博而不繁，详而有要，表现了李时珍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本草纲目》与以往的医书相比，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它的纯粹的科学性。中国古代的医学多与道家相结合，即使像陶弘景、葛洪、孙思邈这样著名的医学家也不例外。而李时珍所要做的就是使医学摆脱宗教的束缚，从本草中驱逐道教思想。他特别憎恶道家服食丹砂求仙的行为，指出：“岂知血肉之躯，苟能堪此金石重坠之物久在肠胃乎？求生而丧生，可谓愚也矣。”

李时珍批判地继承和总结了中国古代医学的成就，更表现了追求真知的科学探索精神。他提出：“天地之造化无穷，人物之变化亦无穷。……肤学之士岂可恃一隅之见而概指古今六合无穷变化之事物为迂怪耶？”“古今之理，万变不同，未可一概论也。”因此他一方面重视发掘古代本草学的成就，另一方面又注重对古人未认识的事物及其道理作新的探索。《本草纲目》不仅新增加药物



374种，而且还提出了“优其所生而先其所因”、“同药异佐而入经有别”、“相恶而不相害，相反而主动”等具有新意的辨证施治原则。他强调认识自然规律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对病因和药性及其相互作用的原理有深刻认识，才能“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李时珍对病理、药理和辨证施治的论述，已经不像古代的医学家那样靠朦胧的直觉，而是靠科学的实证和理性的辨析，显露出一丝近代科学的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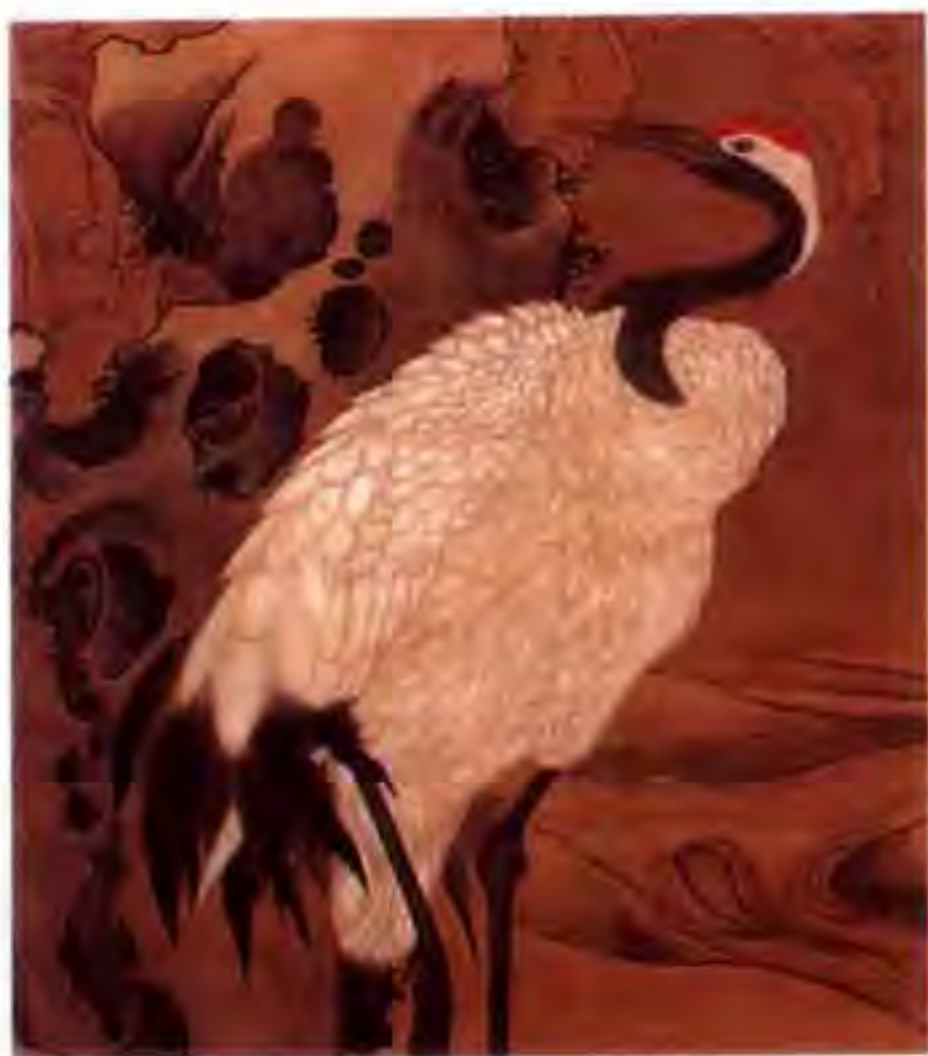
《本草纲目》初版于1596年，此后被辗转翻刻过三十多次，有许多不同的版本流行于世。随着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本草纲目》早在万历年间就已流传到日本，并在日本翻刻过九次。以后这部书传到朝鲜和越南。十七八世纪传到欧洲，先后有德文、法文、英文、拉丁文、俄文的译本或节译本。《本草纲目》对世界医药学和生物学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草纲目》

李时珍著，清光绪十一年（1885）重刊本。

第五章

大家辈出



明代中后期，与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相对应，抗议权威、冲破束缚、立论尖新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也悄然出现。反对传统封建教条和假道学、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呼唤个性解放逐渐成为思想的主流。王守仁的心学冲破程朱理学的礼教束缚，包含着浓厚的人文主义因素。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提倡人的个性，肯定人们的物质欲望，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驳斥道学的禁欲主义，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剧烈变动中的下层平民的要求，特别是反映了那些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城市市民的要求。“异端之尤”李贽继承了泰州学派的积极思想因素，抨击程朱理学的虚伪和晚明政治的黑暗，在行为上极尽叛逆之能事，对当时的社会形成极大的冲击力。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日益繁荣，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在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

和内容上，出现了世俗化、平民化的趋势。以“人的重新发现”为特征的近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吴承恩、兰陵笑笑生、冯梦龙、汤显祖、袁宏道等一大批著名文学家的作品中悄然出现。吴承恩的《西游记》通过孙悟空大闹天宫、与神魔鬼怪作坚决斗争的一系列情节，曲折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和统治者的昏庸残暴，寄托了下层民众要求冲破封建人身依附、争取个体自由发展的理想；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将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金钱的妙用、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融入作品中；袁宏道的“性灵说”、汤显祖的“至情说”和冯梦龙“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的情感本体论则以人文觉醒对抗伦理与异化，崇真尚奇，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到了明代中后期也因符合市民阶层的口味而广泛流传开来，并被赋予新的含

义。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意识的出现，在人文荟萃的江南画坛，文徵明、沈周、仇英和唐寅的画风具有了浓厚的现实主义风格，与宋元以来盛行的院画相比，画风有很大的不同，比较能突破拘束，体现个性。画如其人，这些画家在行为和思想上也是“每出名教外”，体现了一种傲诞的士风，是吴中地区商品经济发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另类。他们的思想也是早期启蒙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明代在清理历史文献、进行大规模图书整理和编纂工作方面也出现了一批大家，主持编纂《永乐大典》的解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思想文化上，明朝可以说是大家辈出的时代。

第一节 王守仁和王艮

明代中叶以后，继承宋代理学的儒学学术思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筑室阳明洞而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王守仁在继承宋代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著名命题，认为自己的内心就是宇宙，就是天理。因而，人们只要消除欲念，反求内心，就可以“致良知”，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这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与宋代以来的程朱理学（客观唯心主义）大相径庭，从而打破了几百年来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树立起了一个反传统的旗帜。



王守仁像

王守仁学说中包含的“只信自家良知”，“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五经皆史”等观点，具有近代人文主义的因素，在客观上成为人文主义的嚆矢。他的“心学”一经诞生，便异军突起，广泛传播，流派林立，形成了明代儒学学术思想的第一个高峰，对晚明乃至明清之际的思想发展都极具影响，泰州学派王艮的思想就是从“心学”中分化出来的。

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泰州人。他出身于平民家庭，早年经商，壮年时曾从学于王守仁门下。王守仁去世后，王艮回到家乡泰州讲学，自立门户，信徒甚众，从而形成了泰州学派，人称心斋先生。

王艮作为一名平民出身的学者，力图把高深的哲学变为士农工商“人人共明共同之学”。他继承了王守仁关于“致知格物高官平民人人皆可做到”的人性平等思想，认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与知能行即是道”，而且“百姓日用即道”才是“道”的核心，也是“道”的标准。圣人之道并不像理学家说的那么神圣，同百姓日用之道没有什

么区别，圣人经世，只不过是家常事。他把人们的饥欲食、寒欲衣等生理要求当作“道”，主张只有解决百姓的贫困冻馁才是真学问，才能安本立身，那些脱离百姓日用的玄谈，都是异端。

王艮提倡人的个性，肯定人们的物质欲望，驳斥道学的禁欲主义。他认为饮食享用、男女之性是“自然天则”，人欲就是天理，“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与宋儒“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直接对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第二节 “异端之尤” ——李贽

李贽（1527—1602），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名。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二十六岁中福建乡试举人，做过教谕、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知府等。五十多岁辞官，开始从事著

述和讲学活动。万历三十年（1602），明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李贽逮捕，七十多岁的李贽在狱中自杀。主要著作有《焚书》、《藏书》、《说书》、《初潭集》、《易因》等。

李贽继承了泰州学派的学说，但他的思想和行为激进的程度远过于泰州学派。他敢于对正统的儒教提出挑战，对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抱着轻蔑的态度，说这些书“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非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前遗后”，大半非圣人之言，即使出自圣人之口，也不过是因时而发，“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他反对神化孔子，宣称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要按照自己时代的标准来评价圣人的言行以及其他古今人物和历史是非。这种精神体现了李贽强烈要求社会变革的信念。

李贽的叛逆思想还着重体现在他强烈追求个性，歌颂人的价值，提倡及时行乐，反对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他认为人是天然平等的，“人见其有贵有贱，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曷尝有所谓高下贵贱者哉”。尤其可贵的是，他还提出了男女平等的观点。

李贽发挥了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见解，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他反对道学的禁欲主义，身体力行，并鼓励人们大胆追求世间的幸福和欢乐，“成佛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他主张顺应人们的生理要求和物质欲望，允许个性的自由发展，“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之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付物”，从而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望”。这充

《焚书》（明刻本）

李贽著



分反映了当时工商业者和城市市民阶层要求发展自主经济的社会心理。

李贽鼓吹个性自由，感情解放，猛烈抨击传统的封建价值观和伦理观，因而被人称为异端“教主”，迫害者有之，信奉者也大有人在。他的著作风行一时，洛阳纸贵，有人形容“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对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三节 汤显祖和 《牡丹亭》

戏剧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明中叶以后，随着城镇的繁荣，市民队伍的扩大，各种地方戏盛行起来。嘉靖年间，魏良辅综合南戏北曲创立了一个新剧种——昆曲。昆曲声调委婉，形式灵活，很快就流行开来，并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剧作家，晚明的汤显祖就是其中的代表。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若士，又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曾为小官，治绩卓著，后因不满太监的搜刮，毅然弃官归里，专心写作。他的主要剧作有《紫钗记》、《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南柯记》和《邯郸记》等。因这四部剧都出现梦境，所以被称为“临川四梦”；因他的书斋名玉茗堂，所以这四个剧本又叫作“玉茗堂四梦”。这些作品表现了对封建礼教的不满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是他寓居昆曲的发源地昆山时创作的。该剧围绕杜丽娘的生死展开。

杜丽娘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少女。有一天



汤显祖像

她在后花园里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在牡丹亭相会，两人互相爱慕，情投意合。梦醒之后，杜丽娘便忧思成疾，一病不起，临终前，苦苦请求父母将她埋在牡丹亭边。实际上，杜丽娘的梦中情人确有其人，名叫柳梦梅。他在赴京赶考的途中恰好借住在杜家后花园中养病，偶然间

《牡丹亭》木刻插图



拾到了杜丽娘临死前的自画像，便带回房中悬挂。入夜，杜丽娘的阴魂来与柳生幽会，并且告诉柳生，只要挖坟开棺，她就可以复生。柳生按照丽娘所说，打开了棺木，杜丽娘果真死而复生。两个年轻人由梦中情人变成现实生活中的夫妻。但好事多磨，杜丽娘的父亲起初死活不肯认这个女婿，父女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闹到皇帝那儿问题才得到圆满解决。为追求婚姻自主而坚决抗争的杜丽娘，终于赢得了幸福生活。

《牡丹亭》同情封建社会里受礼教束缚的青年男女，更赋予这些青年男女以美好的理想。汤显祖通过离奇的情节安排，使男女主人公在理想的境界中实现了在现实中不可能得到的幸福。这种写法摆脱了传统戏曲、小说一见倾心、互通款曲、私订终身的手法，巧妙地体现了杜丽娘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婚姻的理想。

汤显祖通过戏剧来否定现实社会，主张改良，崇尚理想主义。他的戏曲作品，在创作技巧上，敢于打破戏曲的音韵格律限制，

注重作品的流畅和大众化；在创作思想上，追求平等自主，主张作品的情感流露，“为情作使”，讴歌“情”的伟大力量——“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汤显祖十分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思想内容，有人指出，“明之中叶，士大夫的谈性理，而多矫饰，科第利禄之见深入骨髓”，而汤显祖则“一切鄙弃，故假曼倩诙谐，东坡笑骂，为色庄中热者下一针砭”，对现实社会的虚伪进行了无情贬斥。

第四节 “四大奇书” 和“三言二拍”

明代中后期，文学艺术在表现形式与内容上，呈现出世俗化、平民化的趋势，出现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通俗文学著作，有被称为明代“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以上两部小说虽然成书于明初，但直到明中叶以后才广泛流行）、《西游记》和《金瓶梅》；有被称为“性情之响”的短篇小说集“三言”和“二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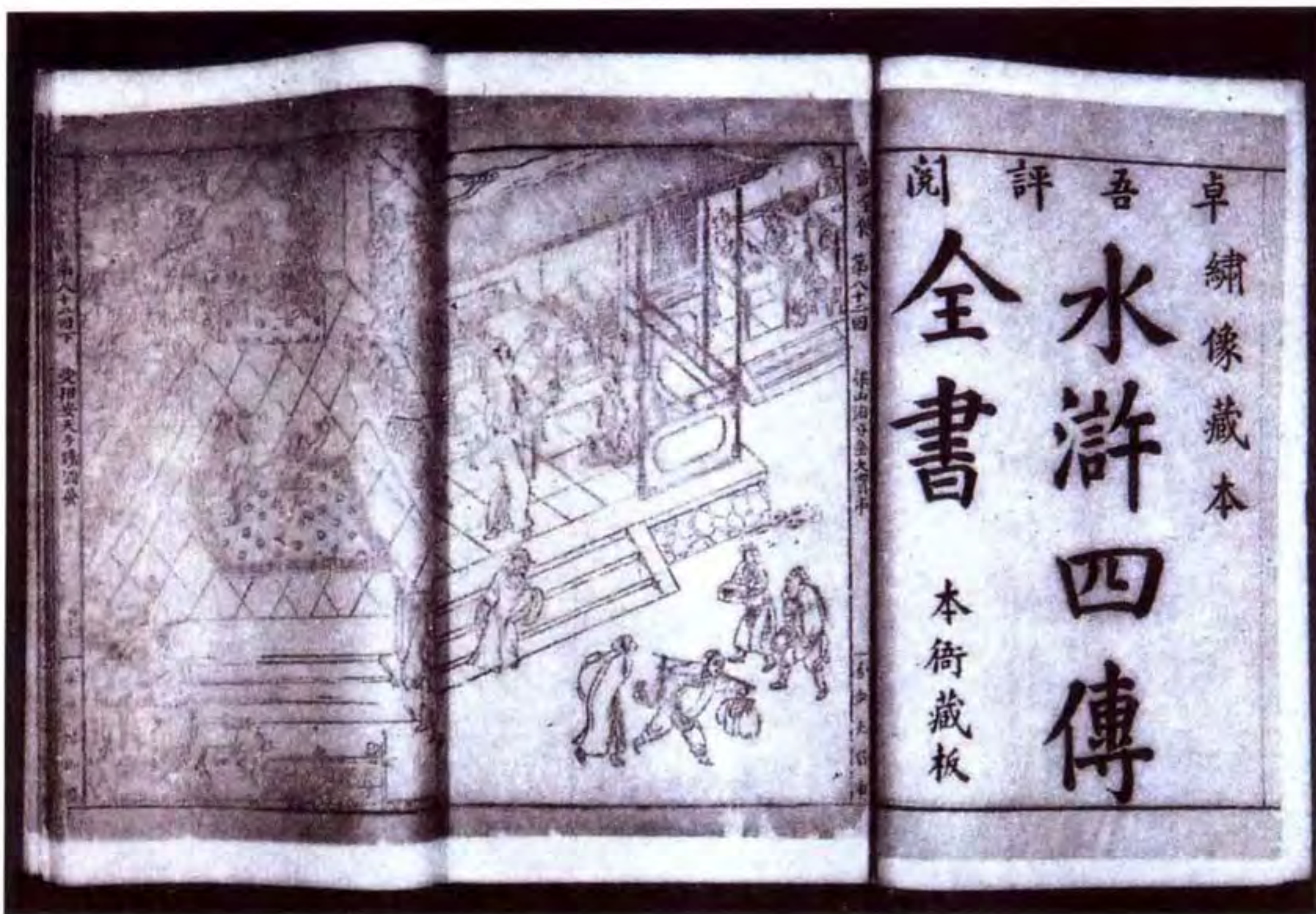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约1330—约1400），山西太原人。他在元代《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吸收大量正史资料，创作出了中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详尽描绘了魏、蜀、吴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作者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编织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示了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书中那些关于政治斗争的纵横捭阖与军事斗争的韬略计谋的描绘，多为后世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所取法，影响极为深远。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约1296—约1370），苏州人。他将民间流传的关于宋江起

《三国志通俗演义》（明刻本）

元末明初人罗贯中著。现存最早的《三国演义》是明弘治序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共二十四卷，流传最广的则是清康熙年间毛宗岗改定的一百二十回本。





《水浒传》（明刻本）

施耐庵著。流传较广的《水浒传》版本有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这是明刻一百二十回本。

义的话本、传说以及杂剧集中起来，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水浒传》。小说着眼于“官逼民反”，对朝廷的腐败虚伪、官场的肮脏黑暗作了有力的揭露，肯定了农民起义的正义

性。书中塑造了许多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好汉形象，描述了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三打祝家庄等有声有色的故事，引人入胜。但《水浒传》反映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显



《仿陈老莲水浒人物卷》

清 佚名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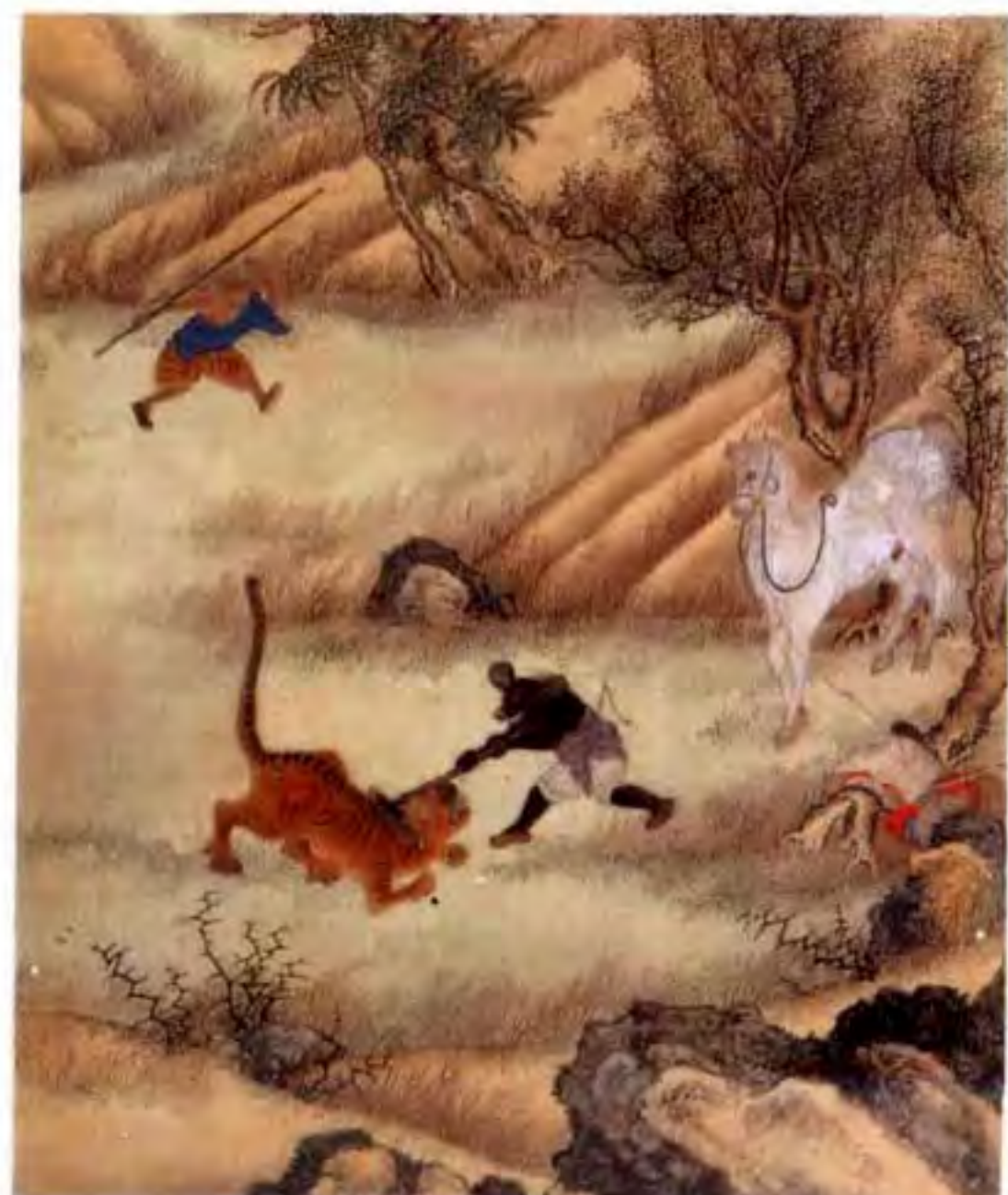
纵20厘米，横562.3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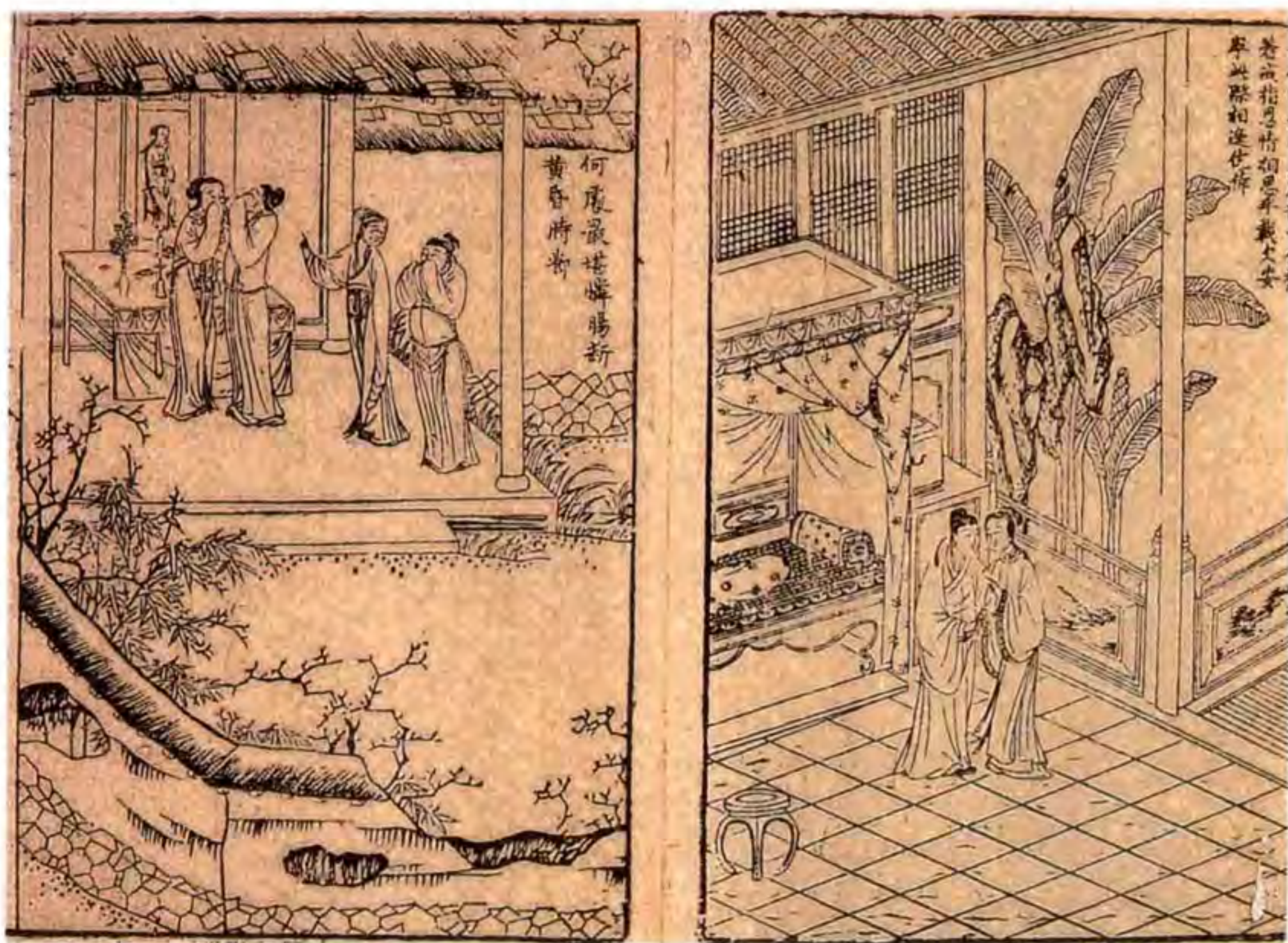
系仿明末清初著名画家陈老莲的水浒人物画而作。画卷中共有四十名水浒人物，每人右上方篆书其名，并冠以绰号。

《陈奕禧题西游记图册》

清

陈奕禧（1648—1709），浙江海宁人，工诗擅书。其题西游记图册，以图画配上简单的文字表现《西游记》的故事情节。





“三言”插图

示了其历史局限性。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约1500—1582），江苏淮安人。他在宋人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等有关唐僧取经故事的基础上，创作了这部长篇神话小说。吴承恩的《西游记》在它幻想的情节中，交织着深刻的现实内容。作品讽刺和抨击了现实的黑暗，表达出作者对当时腐朽政治的愤懑和自己的理想。作品通过孙悟空大闹天宫、与神魔鬼怪作坚决斗争的一系列情节，曲折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和统治者的昏庸残暴，寄托了下层民众要求冲破封建人身依附、争取个体自由发展的理想。但吴承恩并未能真正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在小说中也宣扬了佛法无边和因果轮回的思想。

《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作者署名为兰陵笑笑生。小说以土豪恶霸西门庆的发迹、荒淫、暴亡过程为核心，反映了嘉靖万历时期封建统治的没落、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社会风气败坏、伦理道德沦丧的黑暗现

实，同时也将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金钱的妙用、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融入作品中，把谁有钱谁就有地位，谁有钱谁就可以称王称霸、为非作歹的赤裸裸的社会现实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金瓶梅》中大量露骨的色情描写，反映了市民阶层庸俗的心理和情趣，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起了冲击传统观念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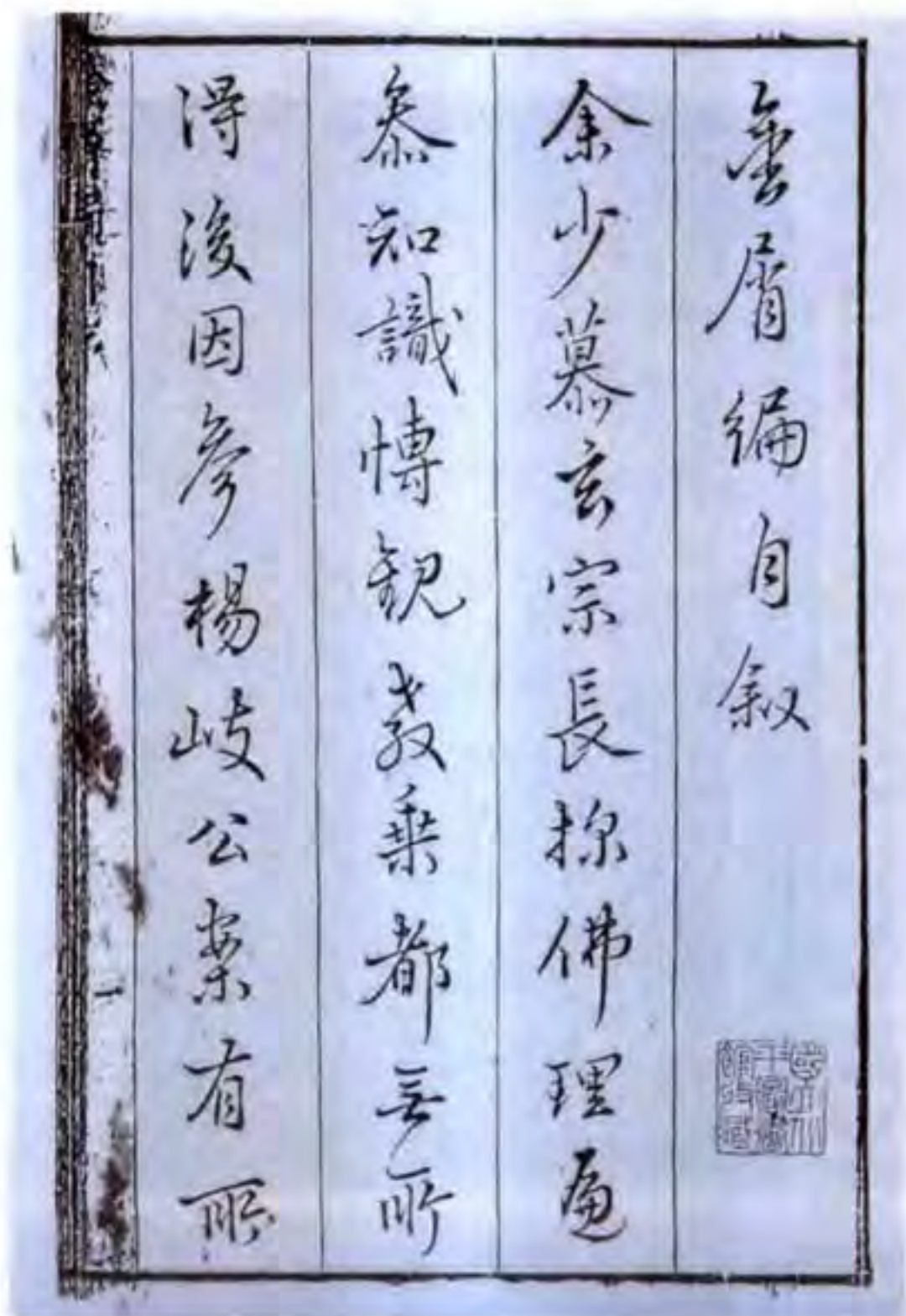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是明末著名小说家冯梦龙（1574—1646）在广泛搜集宋元话本和拟话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三部短篇小说集。“三言”的内容很广泛，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爱情故事，描写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歌颂了她们的善良、纯洁和刚强不屈，抨击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二是通过历史故事，描写朝廷内部忠奸善恶之间的斗争，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三是歌颂友谊、斥责背信弃义的行为，如《施润泽滩阙遇友》等；四是描写知识分子的

“二拍”插图



生活与科举制度的罪恶，如《老门生三世报恩》等。“三言”主要反映了明末商品经济发展以后新兴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状态和道德规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同时也有不少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迷信宿命和低级趣味的内容。

袁宏道《金屑编》书影



“二拍”是《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简称，作者凌濛初(1580—1644)。“二拍”的写作风格与“三言”相近，但在内容上多有消极的成分，在很多篇章中，充斥着色情描写、因果报应思想和封建说教的内容。不过，“二拍”写于明朝末年，取材十分广泛，接触到明末下层市民生活的不少方面，这对了解当时的社会，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第五节 “独抒性灵”

明中叶以后，由于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官场十分险恶，因此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途的热望大大降低，他们感到人生天地间，无可依凭，惟一值得珍视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他们的目光，已越来越多地由社会政治转向自我，或寻求自我的价值，发挥自我的生命潜能，或在个人内心世界求取解脱，在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构筑自己的一片乐土。他们追求隐逸、闲适的生活情调，而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他们或游历山水，为诗作画，或读书交友，参禅学道。这种处世态度，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则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把人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率性而发，把未经社会文化濡染的自然人性的真实袒露看作是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于是出现了一批性灵文学家，如“公安派”的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等。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袁中道(1570—1630)，字小修。三人是兄弟，均有才名，在文学史上并称“三袁”，其中以袁宏道最为突出。因他们是湖广公安人，所以他们所创

的文学流派也称“公安派”。

“公安派”在文学主张上反对明中叶以后形成的拟古风气（代表人物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袁宗道说：“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袁宏道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他们都看到时代决定文学的变化，时代变了，文学包括形式语言等等一定要变，一切对古人的模拟抄袭都是违背文学发展趋势的。袁中道以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那么，该如何变呢？袁中道认为文章应该由“性情”而发，“无所不吐”；而袁宏道则第一个明确提出了“性灵说”的主张。袁宏道认为，文章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所谓“性灵”，就是要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闺阁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唯会心者知之。……夫趣之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

自从袁宏道提出“性灵说”之后，继承、倡导此说者不绝于道，标志着中国散文史进入了“性灵文学”时代。

继“公安派”之后，湖广竟陵人钟惺（1572—1624）和谭元春又开创了“性灵文



袁宏道手迹

学”的另一个流派——“竟陵派”。“竟陵派”也反对拟古，主张“独抒性灵”，但又认为“公安派”的作品过于浮浅、直白，企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矫之，以致流于艰涩。

“性灵文学”的流风所及，一直持续到清代乃至近代。明清之际的张岱，清代的李渔、袁枚和近代的林语堂等一批富有才华的文人作家创作了大量的性灵小品，在文坛上形成了“芽甲一新，精彩八面”，“丽典新声，络绎奔会”的局面。“性灵文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六节 “吴门四大家”及其他

明代绘画沿着南宋以来的画院派画风继续发展，同时不断有所创新，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画家和杰出的作品。宣德年间，出现了戴进、吴伟和蓝瑛等院派的代表人物。吕纪是明中期院体花鸟画派的代表。嘉靖、万历年间，徐渭（徐文长）擅画水墨竹石、山水，

肆意淋漓，开始冲破宋代院派的影响，有所创造。明末陈洪绶的人物画形象高古奇特，手法夸张变形，极具真实感而传神，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早期市民阶层的兴起，一种源自民间、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人文画兴起，持这种画风的画家有许多是在科场或官场上失意或厌恶科场

《蕉岩鹤立图》

明 吕纪绘



和官场的文人才士，他们以恃才傲物、放诞不羁而闻名天下，其作品因迎合新兴市民的趣味而大受欢迎，其代表人物也大多生活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吴中地区，靠市场需求而生

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正如有人所说：“吴中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



《卧石老梅图》

明 陈洪绶绘



《李端端图》

明 唐寅绘

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宕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

明代最著名的文人画家是被称为“吴门四大家”的沈周、唐寅、文徵明和仇英。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年号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苏州郡守曾想推荐沈周为“贤良方正”，沈周没有答应，处士终身。他在文学艺术上有多方面的成就，是著名书画家，也是诗人。他的诗恰如其画，情感真实，风格自然，如得天趣，佳句如“溪山落木正萧萧，野客寻诗破寂寥；一路夕阳秋色里，不知吟到段家桥”，亦诗亦画，意境幽美。

沈周画作远追董源、巨然，近学元四家，中年得力于黄公望，晚年醉心于吴镇。他的山水画布局宏敞。笔墨有两种：一种是细笔，所谓“细沈”；另一种雄阔简疏，所谓“粗沈”，晚年的《夜坐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唐寅（1470—1523），字子畏，一字伯虎，晚年好佛，号六如居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二十九岁中解元，次年进京会试，因“鬻题受贿”案受牵连入狱，被剥夺科举资格，遭受不白之冤。出狱后，唐寅誓绝为吏，云游四方，领略江山湖海之胜。后返回苏州，筑室桃花坞，以卖画为生。唐寅性情任逸不羁，自镌一印章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作诗云：“青衫白发老痴顽，笔砚生涯苦食艰；湖上水田人不要，谁来买我画中山。”

唐寅擅长仕女画，他的仕女画受南宋院画的影响，人物小眉、小眼、尖下巴，面部设色用“三白”法，即额头、鼻梁、下巴敷白粉，体态趋于纤弱。鲁迅曾经说：“唐伯虎画的细腰纤手的美人，是他一类人物的欲得

之物。”唐寅的仕女画体现了明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观。清代改琦的《红楼梦图咏》的人物造形，就颇有唐寅的流风。

文徵明(1470—1559)，原名璧，字徵明，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史》说他是文天祥的后代。五十四岁时授翰林待诏，在京三年。辞官回家以后，一直过着文人生活。文徵明是诗、书、画的全才。在绘画方面，擅长山水、人物、花卉，以山水成就最高。人们崇拜他的画有书卷气，“翩翩文雅之趣”。他的画风格多样，主要有两种：青绿设色，淡雅秀润者，称为“细文”；雄浑郁茂者，称为“粗文”。晚年“粗”“细”兼用。

文徵明以诗画文章名天下，他乐于迎合市民阶层的要求和趣味，却傲视权贵。据说文徵明成名之后，上门求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对于穷人文士，他不吝施与，甚至明知道门下学生有作赝品卖钱糊口者，也不以为意；而那些权贵，尤其是王府中的人却轻易得不到他的片纸只字，充分体现了他的名士风度。

仇英(1493—1560)，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人，居苏州。初为油漆工，被周臣赏识，引为弟子。他刻苦钻研绘画，以至鼓吹阊阓之声充耳不闻。他曾住在著名收藏家项元汴家里，从事创作和临摹古画。他继承赵伯驹金碧山水传统，风格精丽雅逸。当时正是文人画兴盛时期，他的青绿山水使轻视此画种的文人们也为之倾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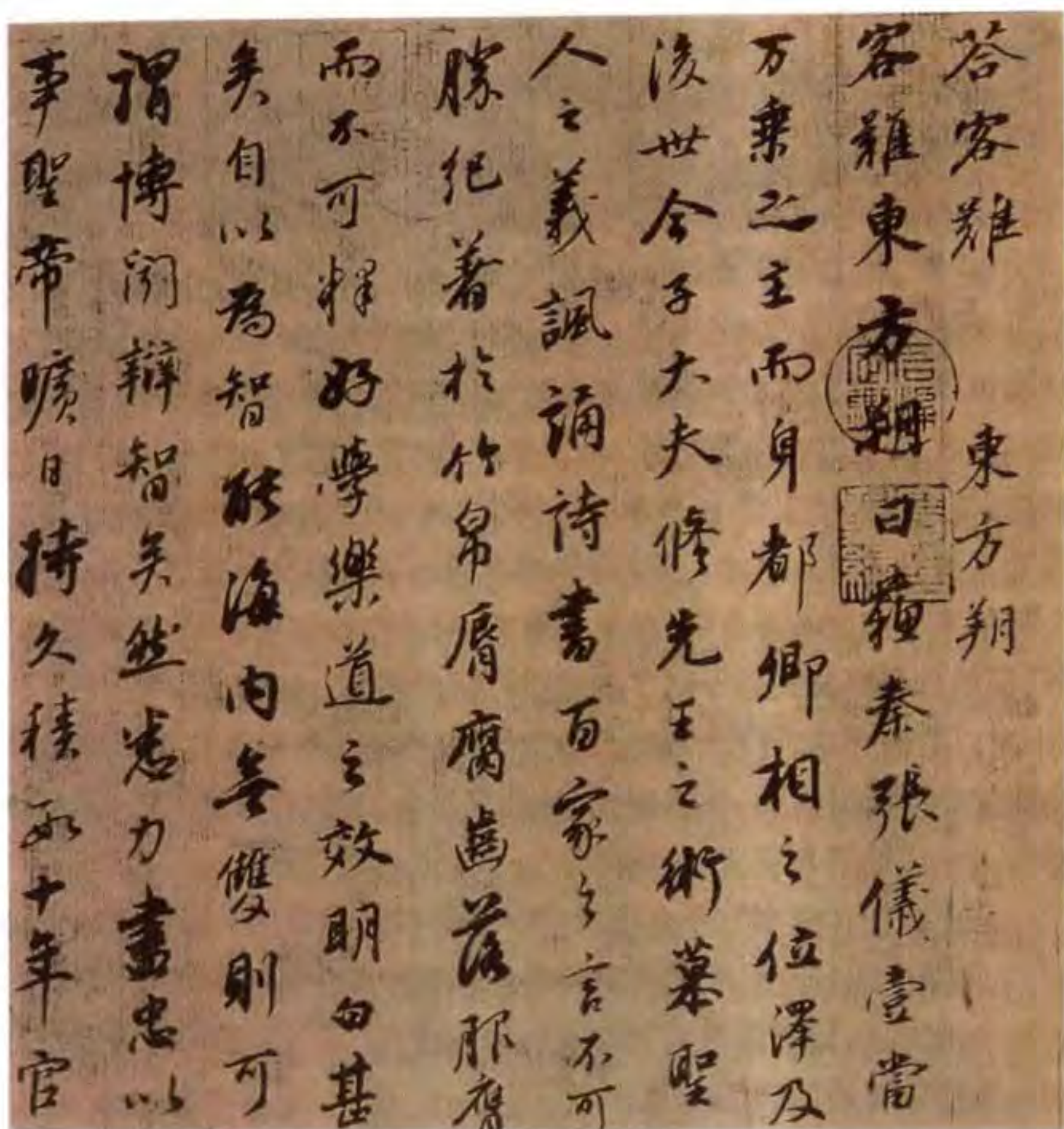
明代的书法艺术有很高的成就，特别是明代晚期，由于受到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书法艺术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狂放不羁的文人流派书法占据了显赫的位置，出现了祝允明、徐渭、董其昌、张端图、王铎等个性鲜明的书法大家，其中以董其昌为最。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



《万壑争流图》

明 文徵明绘



《东方朔答客难卷》(局部)

明 董其昌书

纸本

长 334 厘米，宽 26 厘米

翁、思白，松江府上海县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董其昌崇尚禅宗，在笔法上讲究“虚灵”，“不使一实笔”，以便达到

“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的自由境界；在结字上讲究精微、紧密而有势；在章法上讲究疏密相间，以字距大、行距大形成疏朗的调子，将结字的美与行间的空白产生有与无的对比；在用墨上讲究浓淡相间。用笔虚和而骨力内蕴，章法疏空而气势流宕，用墨淡润而神韵反出，这便是董其昌的书法风格。这种风格反映了文人士大夫崇尚自然的率真之趣，也就是所谓的书卷气。

董其昌虽身居高位，但对李贽却十分崇拜，不仅亲自聆听过李贽的教诲，而且自称与李贽是莫逆之交。他的书法虽然并不是以狂放不羁而著称，但也算是独辟门户，标新立异，同样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解放意识。

董其昌同时还是杰出的山水画家和精明的鉴赏家。他关于文人画的观点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绘画流派说——山水画分南北宗论，为中国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这种艺术观在其身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左右了整个绘画史的发展方向，并一直影响到现代。

第七节 解缙与《永乐大典》

明成祖是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为了展示自己的文韬武略，在南征北战之余，他很注意笼络知识分子，重视文化事业，获得了经书遗产和学者精英阶层的庇护人的美誉。他在位期间，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项文化活动就是任命著名学者解缙主持编纂大型类书《永乐大典》。

解缙（1369—1415），江西吉水人，洪武进士。成祖时入值文渊阁，累进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因解缙在洪武时曾经提议



《永乐大典》

编辑一部类书式的图书，因此被成祖任命为《永乐大典》的主持者。

第一阶段参与编纂的学者有147名，用两年时间将文渊阁所藏图书分门别类地编在一起，并不惜重金，向民间求购遗书，书成之后，被赐名为《文献大成》。但《文献大成》采摘不广，记载太略，成祖命令重修。解缙和姚广孝等被任命为监修，翰林学士王景等为总裁，前后共集中了三千余名文士，在文渊阁开馆编纂。第二阶段用了三年时间完成，全书正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万字，辑录先秦至明初书籍七八千种，包罗经、史、子、集、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技艺等。该书为中国古代文化成果之宝库，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全书按韵母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辑入与此字相联系的各项文史记载。第二阶段书成之后更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最大可取之处，在于完全照原书抄录，不像清代修《四库全书》那样对原书任意删改，因此保留了原书的真面目，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永乐大典》成书后，只有正书一部，初藏南京文渊阁，迁都后移贮北京。嘉靖、隆庆年间，又摹录副本一部，藏于皇史宬。正本约毁于明亡时，副本也渐散失。清雍正时移至东交民巷翰林院。乾隆时清点图书，仅存九千余册，散失了近三千册。乾隆后被翰



林私自“窃”走的也不少。1900年，八国联军和义和团在翰林院一带交火，部分副本毁于火，其余的被八国联军盗运回国，分藏于国外的公私图书馆。据统计，现在散藏于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约有八百卷。1960年中华书局根据历年征集到的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1986年再次影印，增至七百九十七卷。

《永乐大典》的编纂，是明代皇权专制全盛时期的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也是皇权高度发达的象征，因为以永乐皇帝名义编纂的这部大型类书，集中了当时所有可能搜集到的典籍，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搜集到的，这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中央的权威能够比较轻易地控制全国的局势，政令所及，畅通无阻。所谓“盛世修史”，在中央集权比较薄弱的时代，要编纂《永乐大典》这样的皇皇巨制是不可思议的。

北京皇史宬

位于北京南池子大街，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用来收藏皇家“圣训”、“实录”等典籍，还一度收藏《永乐大典》惟一的一部副本。

第六章

四方宾服



明初，张士诚、方国珍等武装集团余党逃亡海上，不时骚扰沿海，威胁到明朝的稳固，朱元璋因此实行严厉的海禁。明成祖即位后，海禁政策逐步松动，一方面禁止私人出海贸易，另一方面派使臣前往海外诸国诏谕朝贡贸易。从永乐至宣德年间，明朝七次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舰队下“西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亚洲、非洲各国的友好往来。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

明初，日本一些流浪海上的封建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勾结中国不法商人，侵扰中国沿海，史称倭寇。正统以后，由于明政府的腐败，海备松弛，倭患愈演愈烈，给沿海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嘉靖年间，抗倭名将戚继光与其他抗倭志士一起，为清除倭患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经过大小近百次的战斗，倭患基本上得到了肃清。16世纪末，中国军队还和朝鲜军民一道，击败了日本军阀对朝

鲜的侵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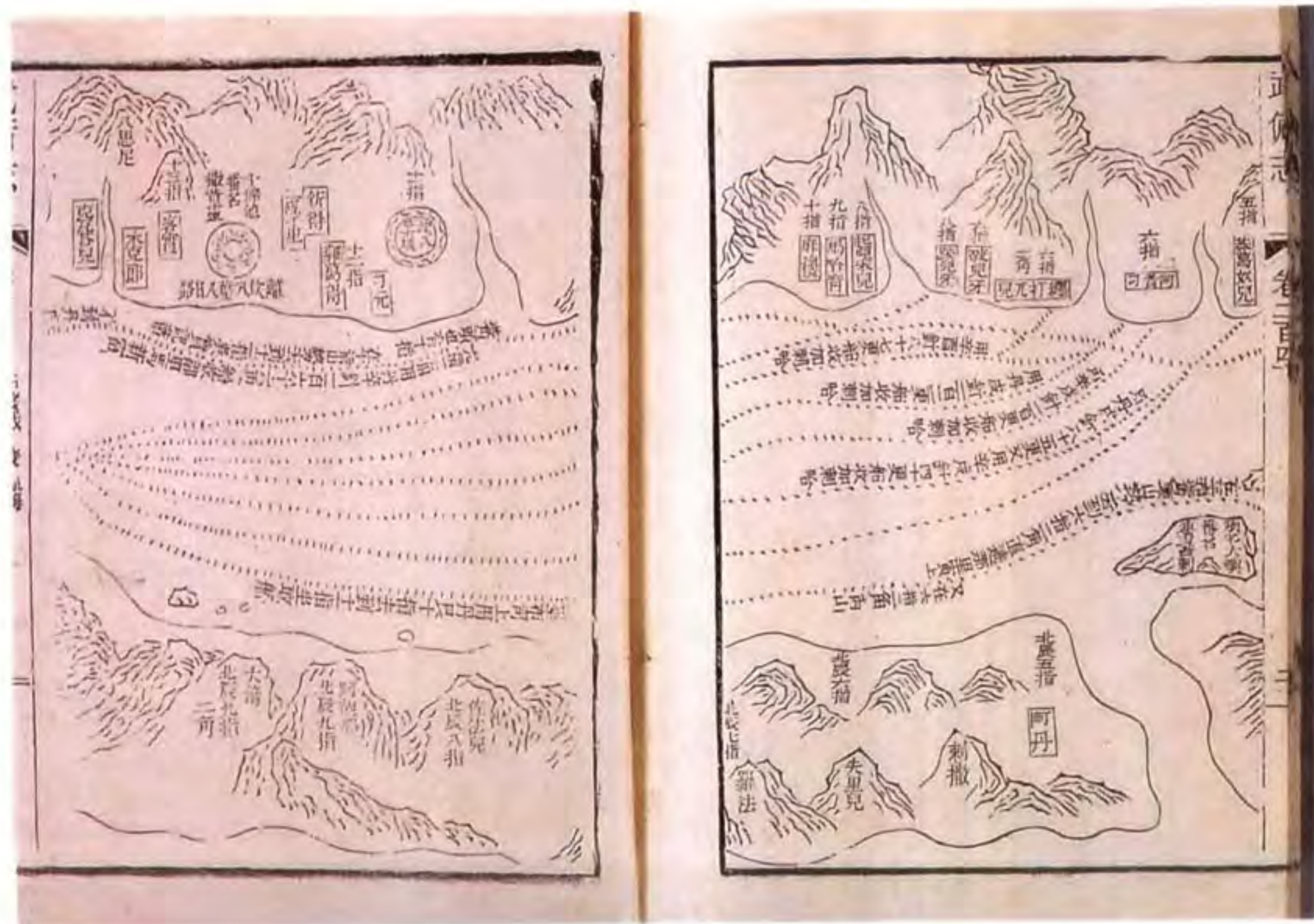
从16世纪开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国的殖民者相继来到东方，强占中国领土。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与冲突，是中外关系史上的崭新内容。

第一节 郑和下西洋

郑和（1371—1435），云南昆明（今晋宁）人，回族，本姓马，小名三宝。从永乐三年（1405）起，他前后七次奉命率领庞大的“宝船”队出使西洋（指中国南海以西海域）。第一次是从永乐三年至五年（1405—1407），第二次为永乐五年至七年，第三次是永乐七年至九年，第四次是永乐十一年至十

三年，第五次是永乐十五年至十七年，第六次是永乐十九年至二十年，第七次为宣德六年至八年（1431—1433）。先后到达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满刺加（今马六甲）、彭亨（今属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巨港一带）、爪哇、阿鲁（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日里河流域）、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榜葛刺（孟加拉）、南淳里（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忽鲁谟斯（今伊朗波斯湾口）、祖法儿（今佐法儿）、阿丹（今亚丁湾北岸一带）、比刺（在今索马里境内）、竹步（在今索马里境内）、木骨都索（今索马里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和天方（今麦加，属沙特阿拉伯）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每次出航，郑和统领军士、水手多达两万余人，分乘“宝船”六十多艘，最大的“宝船”将近150米长、60米宽，九桅十二帆，可容千余人。航行使用罗盘，夜则仰视天空星辰，昼夜行驶。其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实



郑和铸铜钟

明

发现于福建南平市

此钟铸于宣德六年（1431），钟体铭文：“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

《郑和航海图》

据明茅元仪《武备志》中《郑和航海图》放大摹绘。该图详细记载了郑和船队从南京出发到南洋以及印度洋各国的航道距离、各国方位、航向、停泊港口、礁石等。据研究，此图是郑和第六次远航的路线图。

榜葛刺进麒麟图

清陈璋临摹

纵118.3厘米，横46.5厘米
榜葛刺是郑和历次出洋的必经之地，与明朝往来密切。榜葛刺国王分别于永乐十二年（1414）和正统三年（1438）两次派使臣向明朝贡献麒麟（实际上是一种长颈鹿）。当时著名书画家沈度将这一盛况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这幅画是清人陈璋按沈度的原图临摹而成的。



为世界航海史上之壮举。船队所至，以瓷器、丝绸、金银、钢铁等换取香料及其他珍奇宝货，扩大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随同出使的马欢所著《瀛涯胜览》、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记录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山川道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第二节 对日、对朝关系

一、朝贡贸易

明朝建立之初，日本处于南、北朝分裂状态。明朝与日本南、北朝都有些往来，但不是很密切。洪武二十五年（1392），日本南、北朝统一，日本进入室町时代。建文三年（1401），日本统治者足利义满派使者到明朝呈递国书，中断近三个世纪的两国关系正式恢复。

中日关系恢复后，在日本衰落多时的汉文学又复兴起来，两国僧侣来往增加。日本著名的画家、诗人雪舟等扬随日使团来到中国度过了两个春秋，他与明代的画家和诗人广泛结交，互相磋商学习。他为中国朋友绘制的以富士山为代表的日本著名风景画，深受中国文士赞赏。他还在礼部衙门的建筑物上绘制精美的壁画。雪舟等扬归国后，专心创作，绘制的《山水专卷》、《秋冬山水图》、《天桥立图》等名作，都凝结着中日人民的深情厚谊。

中日恢复外交后，政府间的贸易又开展起来。当时日本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当权的将军们和上层统治者，只有依靠对外贸易来获取巨大利润。为了能与明朝保持贸易，获



取巨利，足利义满不惜在与明朝廷交往中自称为“臣”。永乐四年（1406），两国订立了“永乐勘合贸易协定”，也就是朝贡贸易。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等价的贸易。日本以朝贡的名义把自己的产品无代价地献给明朝皇帝；而明朝宫廷接受这些贡品后，要回赐给几倍甚至数十倍于贡品的物品，而且还要允许日本在中国出售随贡品运来的其他物品。日本统治者从以朝贡名义进行的贸易中能得到极大好处，牟取暴利。朝贡贸易由幕府以政府名义出面向中国索取勘合，其他如贡品的筹集、运输、商品出售等等，都由接近幕府的商人、封建领主以及寺庙僧人作为代理人来承办，幕府坐享其利。当时遣明朝贡船往返一次获利极大，从中国载回价值三万到四万贯的货物，一转手就可得利一万贯。许多日本客商搭乘遣明贡船往返于中日之间进行贸

《瀛涯胜览》

明 马欢著

马欢字道宗，浙江绍兴人。他于永乐十一年、十九年和宣德六年，三次随同郑和下西洋。此书是他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记载了占城、爪哇、满刺加、锡兰山、溜山、阿丹、忽鲁谟斯和天方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他将每个国家或地区单独成篇，以简洁的文字对其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山川地理、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等作了具体描述。书中对郑和在各地访问的情况也作了翔实的记录。



“五良太浦吴祥瑞造”青花瓷熏

熏香器

通高14.2厘米，口径8.2厘米
16世纪日本制造

五良太浦，日本僧人，正德年间（1506—1521）至景德镇学习制瓷工艺，并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吴祥瑞”。回国后，他在肥田的有田附近开窑制瓷，从此日本制瓷进入发展时期。他烧制的青花瓷不墨守中国成法而有所创造。“有田烧”至今仍是日本名瓷。

“天下一木濠大和守藤原信重作”大铜镜

1947年福建泉州开元寺出土
直径76.5厘米，重46.25公斤
为日本江户初期作品，大约在明末传入中国，供奉给泉州开元寺。



易，也获得很大的利润。因此，日本每次来中国朝贡，都跟随着许多商人，以致明朝方面不得不作出限制人数、船只的规定。

当时，从日本输入中国的货物主要是刀剑、硫磺、苏木等，从中国输出的物品主要有生丝、绸缎、药物、陶瓷、书籍等，另外，铜钱也是中国输出品之一。民间的贸易，明朝初期由于实行海禁而被禁止，但是地区性的交往依然存在。朝贡贸易能获取巨利，日本国内封建领主、寺庙僧人和商人相互争夺朝贡利润，到达中国后又互争真伪，甚至动武格斗。为此，明朝廷再次下达禁海令。当时江浙一带生产发达，有从事海外贸易的传统，禁海令直接影响了商家利益，不少商家为谋求生路，往往违反禁令偷偷出海从事对外贸易，有的与海盗倭寇相勾结，为患一方。

从两国史籍可以看出，中日朝贡贸易持续了近一百五十年，有记载的使节往来达到十九次。后来，由于江浙一带倭寇骚扰严重，中日间的正常往来也告终止。

二、名将戚继光

倭寇一直是困扰明朝的一大祸患。在中国的史籍中最早出现倭寇记述的是《明太祖实录》：“倭寇出没海岛中，屡次侵掠苏州之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倭寇的构成很复

杂，组成成分也不断变化。

倭寇之患大致以16世纪为界线分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指日本籍的海盗。他们多数是流落四方的无主武士，在失去生活保障的情况下，靠抢劫为生，还有一些则是破产的农民沦为海盗。此外，14世纪初元朝实行海禁，海上贸易受到严格限制。一些日商在日本九州地区封建主的支持下，和海盗勾结起来，组成武装船队，在朝鲜半岛强求贸易，后来流窜到中国北方沿海，成为早期的倭寇。

《抗倭图卷》

明 佚名绘

绢本设色

纵31.1厘米，横572.7厘米

这是反映明嘉靖年间（1522—1566）浙江沿海军民抗击倭寇侵扰的历史画卷。



但这一时期倭患为害尚不太严重。原因之一是日本方面害怕倭寇扰乱会影响两国的朝贡贸易，对倭寇采取打击政策。更重要的原因是明朝加强了海防，多次打击前来侵扰的倭寇，迫使倭寇不敢轻举妄动。

后期倭寇则以中国的海盗为主。16世纪以后，明朝廷政治腐败，国势日益衰落。特别是嘉靖初年，明政府撤消市舶司，实行严厉的海禁，驱使一批靠海上贸易为生的商人与倭寇合流，亦商亦盗，兼行劫掠，中国籍的倭寇比例大大增加，日本籍的倭寇比例缩小。《明史·日本传》认为：“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这些中国籍的倭寇与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得到这些官员的庇护，所以“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倭寇野蛮掠夺财产，肆意杀戮沿海百姓，俘掠劳动人口，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停滞，东南沿海原来是中国最富饶和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倭寇之乱，使这些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遭到严重的破坏。明政府对倭寇虽然一向采取剿灭政策，但是对那些御倭有功的官员却没有给予公正的待遇，甚

至听信诬告处死有功之臣，使海防废弛，倭寇肆无忌惮。嘉靖末年，朝廷重用名将戚继光抗倭，倭寇横行的局面才得到遏制。

戚继光(1528—1587)，山东蓬莱人，十七岁承袭登州卫指挥僉事。嘉靖三十五年(1556)，浙江倭患严重，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参将，驻防宁波等地。在得到朝廷准许的情况下，戚继光在浙江义乌招募以矿徒为主的“民兵”三千人，制定纪律，进行严格的训练。他总结战斗经验，创造了“鸳鸯阵”的战术，将盾牌、狼筅、长枪、叉、钯、棍、刀等长短武器联合使用，使战斗力大大加强。经过短短几个月的训练，戚继光招募的这支队伍就成为英勇善战、屡立战功的精锐部队，被誉为“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大股倭寇侵掠浙东。戚继光率部急趋宁海，扼桃渚，在龙山大败倭寇。倭寇逃遁，乘虚袭台州，戚继光回军再战，大获全胜。“戚家军”先后九战九捷，歼敌千余名。此后，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在宁波、温州一带大败倭寇，浙东倭患平息。

嘉靖四十一年，倭寇齐集福建，福建成为倭患中心，前线告急。戚继光被调入闽，在横屿、福清、兴化等地又获全胜。班师回浙

戚继光用过的军刀

明

通长 89 厘米

刀上部刻有“万历十年，登州戚氏”八字，是明万历十年(1582)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铸造的。



江不久，又有一批倭寇骚扰福建。明廷急调俞大猷、戚继光往剿。次年四月，明军分三路进攻被倭寇占领的平海，戚继光所率“戚家军”首先登上敌垒，其他二路人马相继突入，斩首二千余，取得平海战役的胜利；戚继光也以军功升都督同知，世袭千户，并代俞大猷为总兵官。次年春，戚继光相继在福建仙游、同安等地大败倭寇，斩获颇多，余倭掠渔舟出海逃去，福建倭患至此平定。之后，俞大猷又在广东击败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全部解除。

三、抗倭援朝

中朝人民世代友好相处。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就派遣使臣前往高丽通好。洪武二年（1369），高丽王派使臣来中国祝贺朱元璋即位。永乐时，明成祖对朝鲜“待以佳礼，他国不敢望”。

日本经过战国时代，到1584年，由丰臣秀吉形式上统一了日本列岛，做了关白（摄政相）。为巩固其统治，丰臣秀吉对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对外则推行扩张主义，于万历二十年（1592）率军十八万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

丰臣秀吉侵入朝鲜后，朝鲜国王向中国告急求援。由于中朝唇齿相依，而且当时朝鲜又是明朝的藩属，明朝廷不顾当时国力已经相当衰竭，仍迅速出兵援朝抗倭。先派史儒、祖承训，继派宋应昌、李如松率军援朝。万历二十一年，李如松大破日军于平壤，并乘胜收复了开城、汉城等地，把日军赶到釜山一带。

在抗倭援朝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明朝兵部尚书石星等人却主张和议罢兵。丰臣秀吉得到喘息机会，于万历二十五年集结十四万大军卷土重来，再次侵入朝鲜。



朝鲜折扇

第二次抗倭援朝期间朝鲜友人送给明军的礼物。相传折扇起源于朝鲜。朝鲜制扇工艺精良，经久耐用。

明朝派蓟辽总管邢玠为总督、备倭大将军麻贵为提督，第二次入朝作战。明军和朝鲜军民并肩作战，多次打败日军的进攻。万历二十六年，明朝水军将领陈璘、邓子龙和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指挥的中朝水军，在海上歼灭了日本海军的300多艘船只，击毙了日本主将乌津义弘，取得了重大胜利。中朝两位将领邓子龙和李舜臣也都在这次战役中牺牲。

经过六年半的战争，日本损失惨重。1598年，丰臣秀吉病逝，日本不得不结束这场侵略战争，抗倭援朝以胜利告终。抗倭援朝的胜利，保卫了朝鲜的独立，也保卫了中国的安全。中朝军民并肩反抗侵略的英勇精神，在中朝两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第三节 初遇西洋强盗

《澳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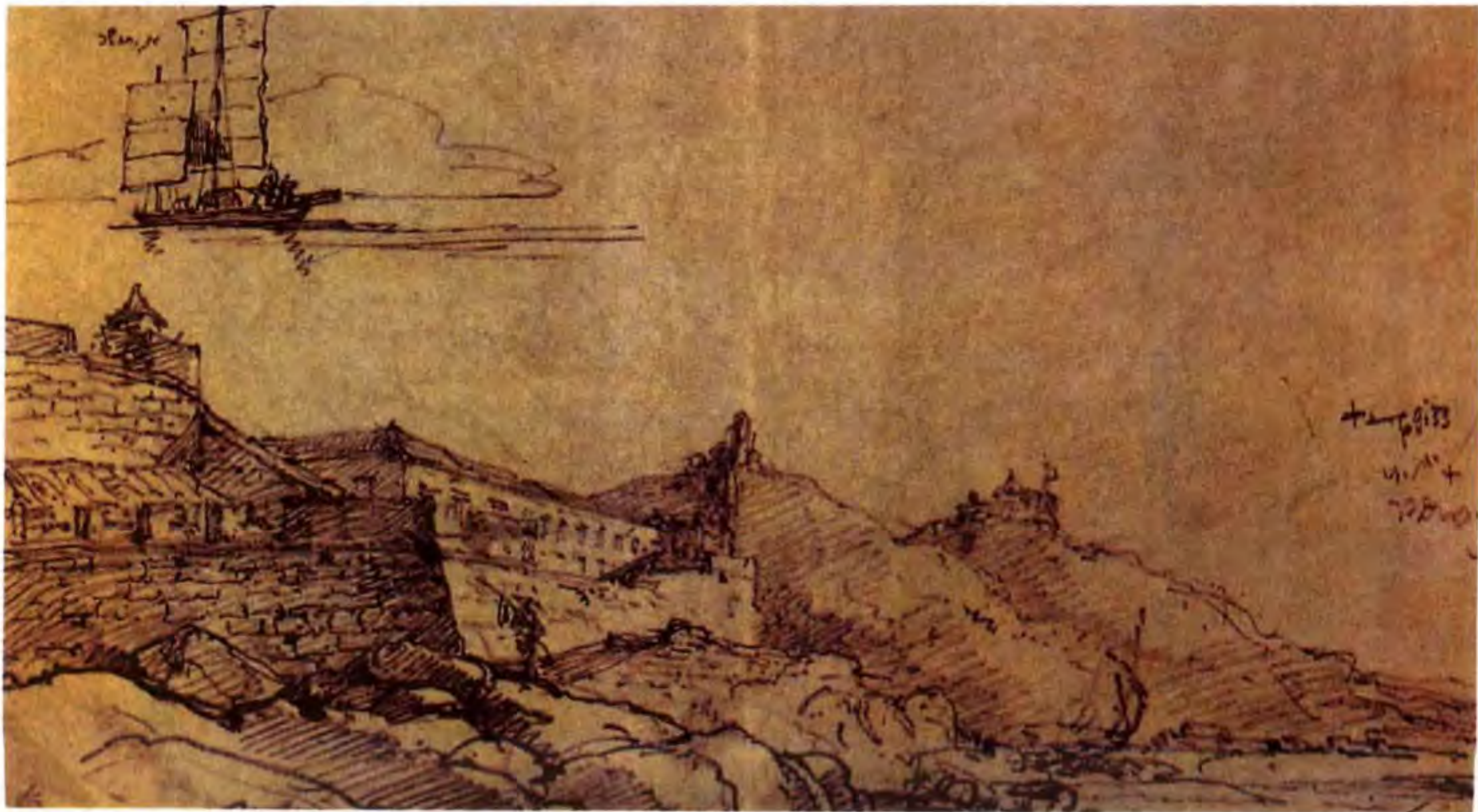
葡萄牙殖民者占领澳门后绘制

15世纪时，欧洲从落后中迅速兴起，从地中海地区开始，延伸到北海和波罗的海地

区，发展起了商业、金融和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在尼德兰的商业中心和意大利的城市国家里，孕育着伟大的文艺复兴，诞生了新的人文主义思想和人类应该了解并驾驭大自然和世界的观念。从此世界的重心开始西移，欧洲逐渐支配世界。

当郑和一行到达非洲东北角时，欧洲航海家亨利（1418—1460）的船队也正在沿摩洛哥海岸向南航行。1488年，迪亚斯终于发现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开辟了欧亚间的新航路。从此，欧洲人可以驾驶自己的船只来东方，不必再经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商船中转了。

1518年，葡萄牙人首次来到中国。中国人把这些身材高大、鼻子高耸、猫眼鹰鼻、卷发红胡子的欧洲人称作“佛朗机”。开始时，这些“佛朗机”和中国边民公平交易，他们带来胡椒、苏木、象牙等，价格便宜，而他们向中国人买米面、猪、鸡出的价钱很高，边民很乐意和他们交易。但也有一些葡萄牙人



由于贪财而胡作非为，甚至占据中国的海岛，设立营寨，杀人抢船，掠买人口，肆意横行，直接威胁到中国海疆的安全。对于这些强盗，中国军民总是予以痛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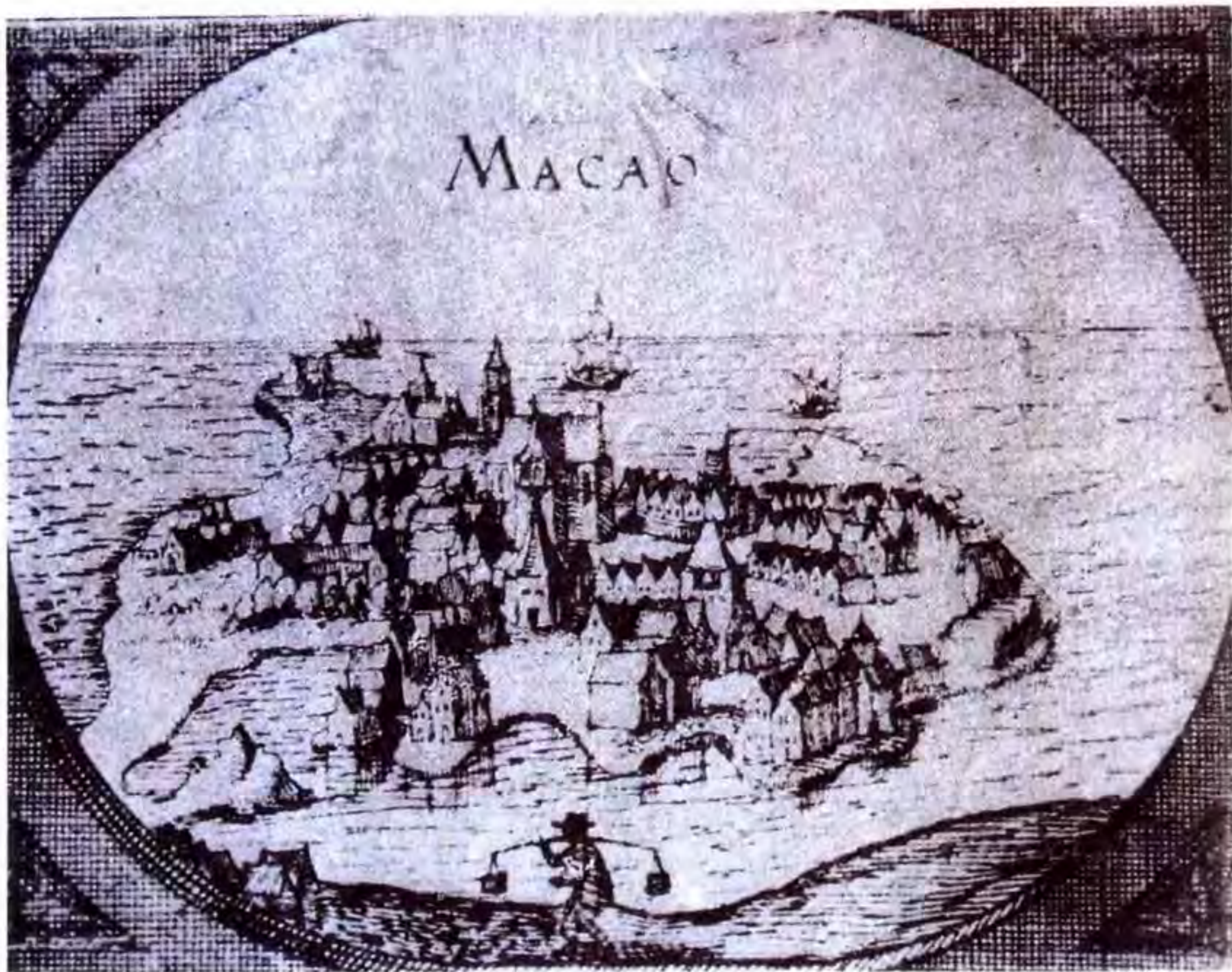
正德年间，明军将盘踞在广东东莞屯门岛的一伙葡萄牙人驱逐出去，取得了反对西

洋侵略者斗争的第一次胜利。嘉靖年间，又有一支葡萄牙武装走私集团与中国海盗和倭寇勾结，在闽浙沿海建立据点，走私贩私，为非作歹。抗倭名将朱纨奉命前往清剿，先后在浙江宁波的双屿和福建诏安的走马溪发动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把这伙葡萄牙强盗



葡萄牙人绘制的航行图

明末为防止荷兰人侵袭在澳门建筑的堡垒



驱逐出闽浙沿海。

葡萄牙强盗被赶出闽浙沿海后，其中一股逃到广东沿海继续寻求据点。1553年，他们来到了壕镜澳（即澳门），谎称自己的商船遭遇风浪，贡物被水浸湿，要求借地晾晒。当地官员受了贿赂，就答应下来。结果这些葡萄牙人乘机赖着不走，起初“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后来竟然“增缮周垣，加以铙台，隐然敌国”。澳门逐步沦为葡萄牙人在远东的商业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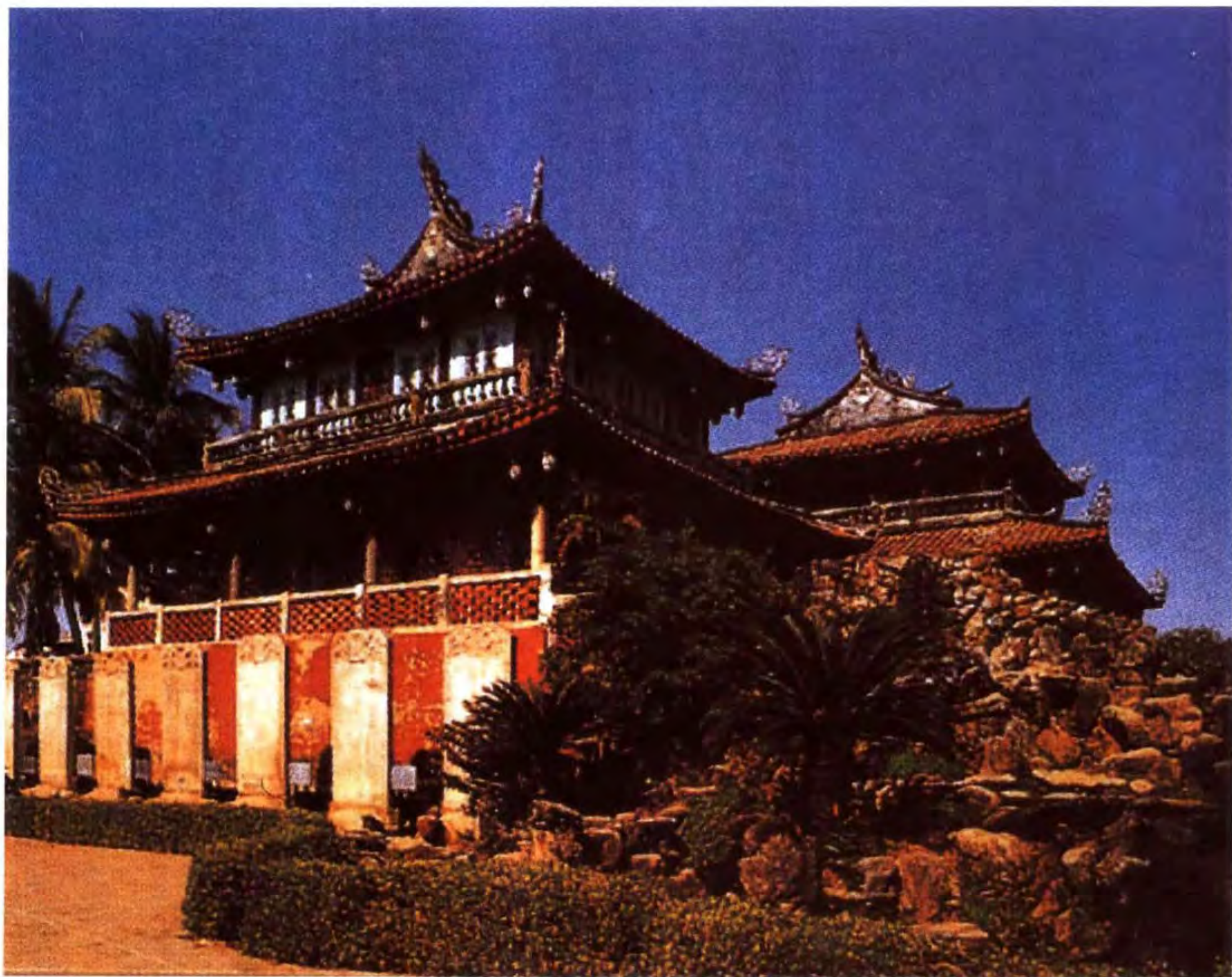
继葡萄牙人而来的是西班牙人。1598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派人来到广东，要求通商。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后，便将船队移泊珠江口的虎跳门，妄图长期占据。他们被驱逐出虎跳门后，继续沿海北上，1626年在台北鸡笼（基隆）登陆，修筑城堡固守。1629年又到淡水建立城堡，以鸡笼和淡水为据点，不断骚扰航行于台湾海峡的中国商队。

17世纪初期，刚刚摆脱西班牙人统治的

荷兰人也踏上了征服东方之路。1604年，荷兰舰队登上了澎湖岛，在那里伐木建房，准备长期占据；同时和奸商勾结，企图以三万金购买福建税监，以达到正式通商的目的。福建地方当局得知荷兰人占据澎湖后，南路总兵施德政立即派兵到达澎湖，勒令他们离开；同时派遣兵丁严守沿海要塞，声明沿海居民有和荷兰人通商的一律正法。荷兰人得不到物质上的接济，又自知兵力单薄，不敢顽抗，不久后退走。

1622年，由荷兰武装商人组成的联合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勾结，组建联合舰队，卷土重来，在妈宫（马公）附近登陆，再度占领澎湖，残杀、奴役当地人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在侵占澎湖的同时，荷兰殖民者还不断向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发动侵略，但都被沿海军民击退。

天启四年（1624），明军调集一万余人，战船二百多艘进攻澎湖，把荷兰人赶出了澎



湖。但荷兰人并没有远遁，而是顺势登陆台南，在台南建赤嵌城（后来郑成功把它改为平安城，即今台湾安平）。这样，荷兰和西班牙强盗一南一北，分别侵占着台湾的南、北港湾，对中国的领土完整构成了极大威胁。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末，荷、西之

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班牙的国势迅速衰落下去，而荷兰迅速崛起。新兴的荷兰不愿意有人分享台湾，便动用武力，向占据淡水和鸡笼的西班牙人发动进攻，最终把西班牙人赶出台湾。从此，台湾岛被荷兰人独霸，直到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为止。

荷兰人入侵台湾时建造的赤嵌城楼

第七章

大明末日



大约从明英宗时起，明朝开始由盛转衰。明英宗年幼即位，听信宦官王振的煽动，北上征讨瓦剌，轻敌冒进被俘，使明朝元气大伤。英宗之后的几位皇帝多耽于享乐，不思振作。宦官汪直、刘瑾先后弄权，首辅严嵩专权纳贿、结党营私，朝政一片黑暗，政治和社会危机逐渐显露出来。

明神宗即位后，首辅张居正为了挽救明朝与日俱增的危机，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措施，清丈全国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增加了财政收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明廷的腐朽政治有所改变。但张居正的改革与当权人物的利益有很大抵触，不能很好地推行下去。张居正去世后，新政被废止，挽救明朝衰亡的最后一场努力终以落空而告终，明朝统治的腐朽没落再也无法逆转。

万历末年是明朝的多事之秋，内有“国本之争”和明宫“三案”，外有东北女真族发

展壮大对明朝构成的巨大威胁。矿税太监的横行、赋税负担的加重以及自然灾害的频仍，极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明朝的衰征已经显现，故史家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的感叹。

天启七年（1627），陕西农民王二发动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并迅速燃成燎原之势。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推翻了明朝的统治。

第一节“土木堡之变” 和正统之后的政局

宣德十年（1435），明英宗朱祁镇继位，改元正统，以次年为正统元年。朱祁镇继位时年仅九岁，朝政为宦官王振等人所左右。



铜火铳

明

滑膛式火器

长26.1厘米，口径10厘米，
底径9.1厘米

铳身刻有“景泰元年造，天威三百八十三号”字样。景泰元年正是“土木堡之变”发生后不久，国家危机、战事紧张之际，当时铸造了大量此类火器，以抵御也先的进攻。

《宪宗调禽图》

明 宫廷画师绘

纵67厘米，横52.8厘米

在王振的煽动下，英宗一改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辅政时代对少数民族事务的羁縻政策，企图“示威荒服”。正统初年，云南麓川发生叛乱，朝廷在王振的操纵下发动大军前往征讨，结果劳师糜饷，陷入战争泥潭。瓦剌首领也先趁朝廷用兵云南之际，极力扩大势力，伺机进犯。

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看到时机成熟，亲率主力进攻大同，窥视北京。面对也先的进攻，好大喜功的明英宗在王振的蛊惑下，盲目轻敌，率领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由于王振在军事上专断无知，指挥不力，双方一经交锋，明军便一败涂地，被迫退兵。在退兵的过程中，王振为了让英宗到他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竟私自改道，致使明军因迂回奔走而耽误时日，被也先骑兵追上，围困于土木堡（今怀来县西南）。明军突围不成，连同英宗本人都成了瓦剌军的俘虏。这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宪宗元宵行乐图卷》

明 佚名绘

纵 37 厘米，横 624 厘米

明宪宗朱见深是明朝的第八位皇帝，年号成化（1465—1487）。他平庸无能，宠幸权监汪直，生活奢靡。该画描绘明宪宗正月十五在皇宫里庆赏元宵游玩的各种情景，其中演出、杂技、魔术、烟花爆竹及鳌山灯市等场面恢宏。这幅画是明代民俗画的代表作。

土木堡丧师、英宗被俘的消息传来，朝廷内外大为震惊，一片混乱。群臣聚哭于朝，有的人不知所措，有的主张南迁逃跑，只有兵部侍郎于谦一人挺身而出，力主死保京师。英宗之弟监国朱祁钰把于谦提升为兵部尚书，命其提督各营兵马，保卫北京。于谦受命于危难之中，显示出出色的指挥调度能力，他一边调集河南、山东、南京等地军队入卫，一边将京城九门守军及城外防务等组织起来，严阵以待。不久，瓦剌兵临北京城下，于谦披挂上阵，出德胜门亲自督战。城

内外军民在于谦的带领下，人人感奋，“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呼声动天”。经过数番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不得不挟持英宗北撤，明朝的都城得以保全。

“土木堡之变”后，朱祁钰即位，是为明景宗。景宗虽然是在危难之时登上帝位的，但此人却并无大志，只求营私保位，不思改弦更张。他表面上重用于谦，暗地里却派心腹太监对他百般掣肘。他在位期间，国事并没有什么起色。而此时已经被也先释放回来、正在南宫韬光养晦的英宗却虎视眈眈，



豹房勇士铜牌

明

武宗时，太监刘瑾擅权乱政，武宗却不闻不问，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他在东华门外别筑宫殿，造密室于两厢，称为豹房，广纳美女，寻欢作乐。最后年仅三十一岁的武宗病逝于豹房之中。

伺机夺回皇位。景泰八年（1457），英宗乘景宗病危之机，勾结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重新登上皇帝宝座。英宗复辟后，不但不思悔悟，反而杀害了保卫社稷的功臣于谦，继续宠信宦官。英宗之后的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等也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有的信任宦官，有的崇奉道教，有的沉湎于声色犬马，有的滥施淫威，朝政一片昏暗。

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严格实行官吏考核考查制度，果断裁撤平庸无能的冗员，奖励廉洁能干的官吏，使各级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为政令和各项变法措施的贯彻实行扫除了障碍。

第二，加强边防，提出“饬武备，信责罚，造兵将”的方略。重用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使北方地区的边防得到加强。改善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

第二节 张居正施政

隆庆六年（1572），明神宗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明神宗任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是明朝走向衰败过程中的一次回光返照。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湖广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嘉靖进士，隆庆元年（1567）入阁，万历初年任内阁首辅。张居正是位精明强干且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在他入直内阁和担任首辅的十几年里，实行



张居正像

《河防一览图卷》



王，并在大同等地设立多处茶马互市。对蒙古其他各部，也相继建立了“通贡”和互市关系。边防的修饬，为改革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三，整顿学校，核减生员，黜革学霸，大力整顿提学官和儒学教官。

第四，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赋役制度，实行“一条鞭法”。

第四点是张居正改革的核心部分。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严重。而兼并了别人土地的豪民却隐瞒亩数，逃避赋税，不纳田粮，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排除阻力，全面清丈全国土地，清理田赋。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都在清丈的行列，限三年完成。万历九年，清丈工作基本完成，共清出土地七百余万顷，比弘治十五年（1502）增加了许多。

张居正在清丈田地之后，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对赋役制度作了全面的

改革。

“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是把原来要交的赋（两税）役（里甲、均徭、杂泛）以及土贡方物等并成一项，折算成银两交纳，根据人丁和田地的情况分担。折银后，便于交纳、储存和运输，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役银由原来依户、丁征收改为以丁、田分担，使无田或少田的人减轻了负担，而且多占田者多交税，对当时盛行的土地兼并多少起到抑制作用。农民可以出钱代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担，这样就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隶属关系减弱，负担相应减轻，比较容易离开土地，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条鞭法”的实行，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

在张居正施政期间，他还重用了两位著名的人物，一位是戚继光，一位是潘季驯。戚继光的事迹在前面已述及。潘季驯是治河能手，张居正任命他担任河漕总督，负责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取得很大的成绩。

张居正施政是挽救明朝衰亡的最后一场努力。但他的改革不可避免地触动了豪强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后，新政的执行立即开始松弛。政府又不断实行加派，横征暴敛，改革措施逐渐被破坏，明朝的社会危机也随之愈来愈严重了。

第三节 “国本之争” 与天启党争

万历年间是明朝的多事之秋。明神宗晚年，为立太子引起了一场“国本之争”。

朱常洛为明神宗长子，按理应立为太子。然而神宗却宠爱老三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久欲废长立幼，但又碍于大部分廷臣的反对，只好作罢。朱常洛最终虽然被立为太子，但此后皇宫里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与立储相关的案件——“挺击”、“红丸”和“移宫”案。



明神宗朱翊钧像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棍，突然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并向前殿冲去。张差被捕后，经审讯，供出幕后指使者是太监庞保、刘成，但庞保、刘成死不承认。



《东林会约》

明顾宪成著，高攀龙序，为东林书院讲学纲领。

我不負國世負家
 大爺未曾改遷
 親娘未曾合葬 大姊二姊
 未葬三姊曾照顧得他
 初害了他一生 伊尤害尔半世
 又要害尔後半世 尔母汝弟俱
 果依我冤我債俱累尔汝破
 業必致仰懷之 藏形骸
 可也 瘞吹速三讀書明義理
 以補尔兄珠吹教養仰藉伊
 尤珠事長兄如父不得顧慢
 耕得長成便好未知天意何
 如一家痛癢猶相關務氣
 相字 莫聽婆子舌形不接話
 大姊婦居我家十年矣賢婦也
 次兒婦居我家十日矣似非
 全不聰明者一築安心守旁
 好親好眷不要去長往還晨
 宵了做不得也長訴女到之有知
 次孫世亦伶俐听之矣
 姑娘旁所以解生三兄弟同眼
 看之定有銀錢照看意思
 相國却曰耳我富了一家人之
 怨我罷了不要思我
 安貧
 讀書

魏大中绝命书

魏大中（1575—1625），浙江嘉善人，万历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因疏劾魏忠贤被捕入狱，杖毙。

朝臣中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指使，欲谋害太子。此案变成一个谜。明神宗和太子都不愿深究此事，便授意有关部门以疯癫奸徒罪处决张差，随后毙庞保、刘成于内廷。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明神宗驾崩，太子朱常洛即位，年号泰昌。朱常洛即位后不久，感觉身体不适，御医崔文升开了一服药，皇帝服用后，下泄不止。接着，鸿胪寺李可灼通过内阁大臣进了一粒红丸，皇帝服后，渐觉舒畅。李可灼又进一丸，皇帝服后却病情加剧，很快驾崩。这就是“红丸”案。

朱常洛死后，朱由校即位，年号天启。朱由校的养母李选侍欲居乾清宫，以把持朝政。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为防其干预朝事，迫使李选侍移居哱鸾宫。这就是“移宫”案。

对国本之争”和“三案”，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各持己见。当时官僚集团内有为数众多的派别，包括给事中元诗教为首的齐党、给事中官应震为首的楚党、宣城人汤宾尹为首的宣党、昆山顾天峻为首的昆党等，而势力最大的要数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浙党和东林党。

浙党首领是苏州太仓人王锡爵和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万历中后期，他们先后掌握着内阁大权，利用内阁的权利，排除异己，

从而形成浙党。

东林党人的首领是无锡人高攀龙和顾宪成。万历二十二年（1594），身为吏部文选司郎中的顾宪成受浙党排挤，被革职回乡，便与高攀龙一起在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权阉，逐渐形成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学术流派——东林学派。他们标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与赵南星、李三才、邹元标、冯从吾、周起元、魏大中、李应升、杨涟等在朝的正直官员遥相呼应，形成晚明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政治派别——东林党。

起初，浙党和东林党人在“国本之争”和“三案”问题上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借题发挥：东林党人攻击当政的浙党保禄因位，依违其间，充当郑贵妃的应声虫；当权浙党则抨击东林党人无事生端。浙党和东林党人的斗争具有党争的性质。

在东林党与浙党的党争中，东林党人逐渐占据了上风，掌握了朝政大权。而浙党以及那些不被东林党接纳的官员则投靠太监魏忠贤，形成阉党。天启之后，东林党与浙党之间的斗争逐渐被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所取代。

东林党人基本上都是科举出身，有学问，人品正直，思想也比较开明。在政治方面，他们极力抨击和反对大宦官、大官僚的

专权乱政，要求革新朝政，并提出“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把百姓看作社会的主体，提倡“依法而治”，试图以法治限制君权和“不肖者”的贪赃枉法。在经济方面，他们反对矿监税使的掠夺，提倡惠商恤民。东林名士赵南星则进而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把“商”与“士农”一样并列为“本业”，是对“重农抑商”传统思想的突破。在学术思想上，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以能否治世、“有用”作为评价和衡量一切思想学说的标准和尺度，反对脱离实际、言之无物、空谈心性，倡导“贵实行”。

阉党的魁首魏忠贤，本是北直隶的一名无赖，少年时在赌场上不得意，家境贫困，便净身入宫。天启元年（1621），魏忠贤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成为皇帝的代言人，开始全面干政。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又掌握了特务机构东厂，权势更加显赫。阉党的成员都是那些心理有缺陷的太监、品德不好的官员以及社会上的流氓无赖。他们为非作歹，残害忠良，代表着朝廷中的黑暗势力。因此，东林党人和阉党之间的斗争，历史上虽然称

为“天启党争”，但实际上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党争，而是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斗争。

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参奏魏忠贤二十四“大奸恶”。阉党恨之入骨，策划反扑。次年，他们借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失陷广宁事，大兴冤狱，不仅诏决熊廷弼，还将杨涟、左光斗等人杖毙狱中。后来魏忠贤指使爪牙作《东林点将录》、《同志录》、《三朝要典》等，将正直的东林党人逮杀殆尽。阉党完全控制了朝政，明末的政治更加黑暗。

第四节 明末农民起义

明代到中期的时候政治已经腐败不堪，但由于根基比较牢固，又不断有能干的大臣出来支撑局面，所以还能维持下来。到了后期，经过了二百多年的统治，各种矛盾长期积累，土地高度集中，民族矛盾激化，统治机构腐败，社会危机加深，加上天灾频仍，饿殍遍地，一场改朝换代的风暴即将来临。



明代后期农民的卖地契

《荒年志碑》(拓片)

碑于1957年在河南省内黄县发现

纵155厘米,横69厘米

碑文记述了明末河南地区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悲惨情境,和李自成在河南活动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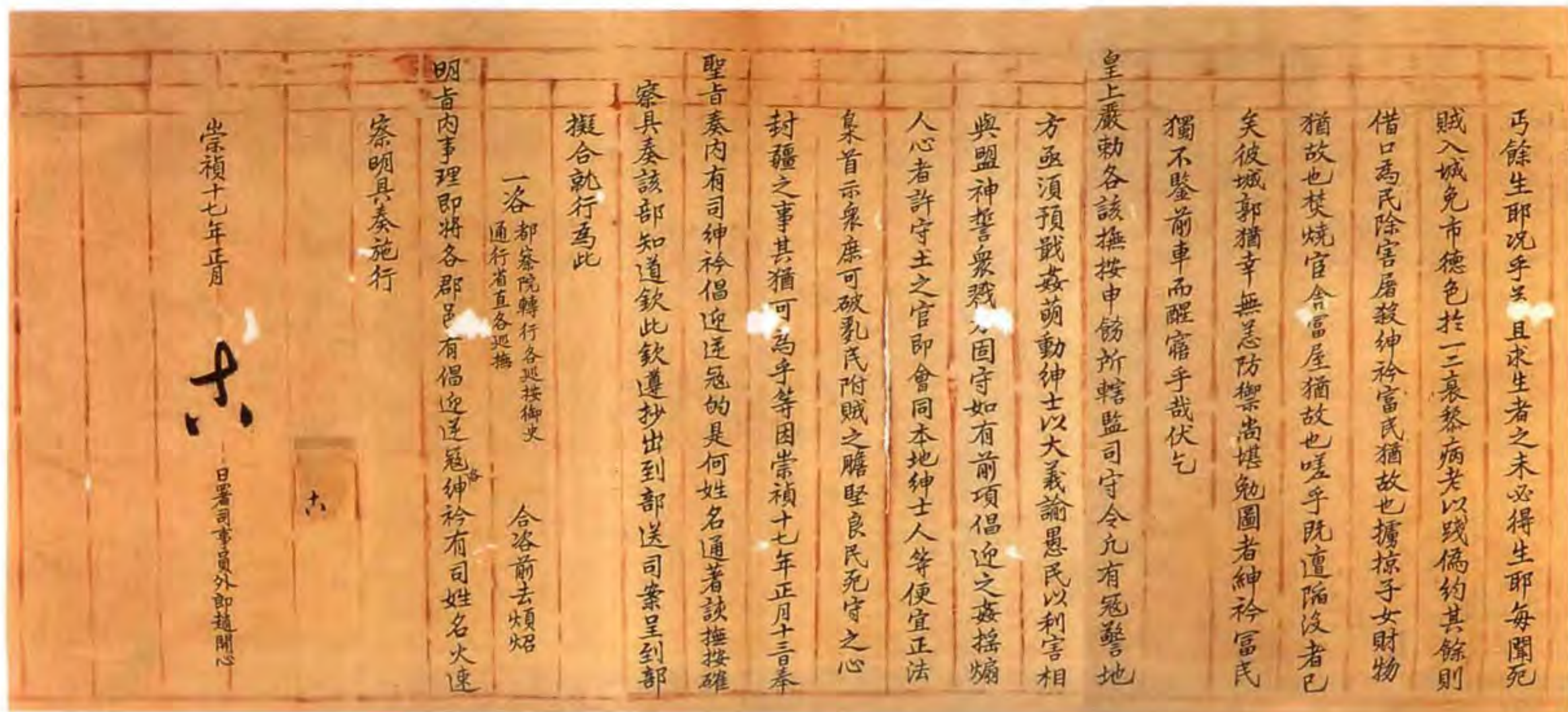
明兵部报告李自成活动情况行稿

纵33厘米,横157.5厘米

为明崇祯十七年(1644)兵部向各地下属机构发布的有关李自成活动情况的行稿。

明代中后期,由于皇亲国戚兼并土地,强占民田,使土地高度集中,富者连陌,贫无立锥。皇帝有“皇庄”,皇子、勋戚拥有“王

府庄田”。明代受封建藩的亲王有五十个,分散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江西等地。他们除了在京师附近有养赡田和





香火地外，在各自藩府地区又有大片庄田，有的庄田地跨两三省，如明神宗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在河南、山东、湖广就拥有庄田二万多顷。到了明末天启年间，全国王府庄田竟达五十万顷之多。

明末以来，政治极端腐败。张居正死后，明神宗二十余年沉溺于深宫，不理朝政。朝臣有的“悠悠忽忽，若罔闻知，一应票拟，动多错差，危而不持，颠而不扶”；有的则结党营私，为了一己或同党的私利明争暗斗，不

顾大局。官场里贿赂公行，贪污成风。宦官专权登峰造极，特务横行，残害忠良，使朝廷良类为之一空。

末代皇帝崇祯即位后，虽然励精图治，力图有所作为，但时运不济，未能扭转局势，最终做了亡国之君。所以有史家议论道：“熹宗（天启），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崇祯）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明末不仅政治腐败，天灾也频频降临，

《饥民图说》

明
刑科右给事中杨东明编绘
杨东明目睹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河南水灾后灾民的痛苦，编绘《饥民图说》，连同自己的奏折题本，进呈万历皇帝。



“工政府屯田清吏司契”铜印

1959年北京王府井出土
通高8.9厘米，印面7.9厘米见方

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建元永昌。这是永昌元年大顺政权铸造的印信。新政权把“部”改称为“政府”，改“印”为符、券、契、章凡四等。屯田清吏司是大顺政权专理屯田事务的部门。



并由此直接引发了饥民的起义。

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到崇祯十二年（1639）的二十年间，水、旱、蝗、雹等灾害连年不断，遍及全国，特别是陕西、河南、山东遭灾最重。如崇祯元年（1628），陕西延安府大旱，“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草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人皆为其所食”。又如河南，自崇祯七年起，接连三年大旱，“野无青草，十室

九空，……有采菜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而食者”。崇祯末年，山东、河南等地又遭虫灾，“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刳羊豕”。

在严重的灾荒面前，弱者填埋沟壑，强者铤而走险。天启七年（1627），陕西农民王二发动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并迅速燃成燎原之势，到崇祯三年（1630）已有上百股起义军，他们各自为战，分合不定，流动转战各地。其中，比较重要

“骠右营总兵关防”铜印

通高8厘米，印面长10.6厘米，宽7.1厘米

1644年，张献忠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这是大顺二年大西政权在成都铸造颁发的军营铜印。据记载，大西军分102营，按一定的政治或军事含义命名，如振武营、骠右营、援剿营、骠骑营等。每营设总兵官统领，颁给关防印信，通令全营。



的有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十三家七十二营。

崇祯七年，高迎祥率领的起义军一举攻占河南的陈州（今河南淮阳）、荥阳，声势大振。明廷急忙调兵遣将，企图把起义军消灭在中原地区。在明军压境的形势下，崇祯八年，高迎祥召集十三家七十二营起义军将领

在荥阳集会，讨论如何击退明军的围剿。大会同意了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所向”的战略原则，把各家起义军集中起来，分几路出击。

“荥阳大会”以后，高迎祥、张献忠率领的东路军迅速挺进淮河一带，攻下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不久，高迎祥被俘就义，众推李



《大西驍騎營都督府禁約碑》
(拓片)

纵129厘米，横73厘米
这是张献忠大西政权向军队和官员发布的禁约文告碑的拓片。碑文列举官员、军人不许违犯的纪律有：不许擅自招兵，不许扰害地方，不许擅自动用驿站人夫马匹，坐守武职不许擅受民间诉讼，不许无赖进入军队，不得娶本地妇女为妻等。

永昌、大顺通宝钱

大顺通宝直径2.6厘米至2.8厘米，永昌通宝直径2.5厘米至3.8厘米

这是李自成、张献忠政权铸造的钱币。张献忠政权设有铸钱局，铸大顺通宝通行于市。其钱背铸“户”或“工”字，有“一角”、“二角”、“三角”之分。李自成本政权铸永昌通宝，大钱值白金一两，小钱有“当五”、“当十”数种。



自成为闯王。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率军打下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不久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占襄阳，处死襄王朱翊铭。李自成、张献忠两大主力，各自拥有几十万大军。针对明末社会的矛盾，起义军提出了“均田免粮”、“三年免征，一民不杀”、“霸占土地，查还小民”以及“平买平卖”等口号。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李自成率军再次攻占襄阳，次年三月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被推为“新顺王”。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打下西安，以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十一月，张献忠进入四川，占领成都，改成都为西京，国号大西，改元大顺。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发布讨伐明朝皇帝的檄文，率领百万大军向北京进发。起

义军长驱直入，所向披靡，京师以西诸郡县望风瓦解，将吏或降或遁。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十九日，崇祯皇帝在煤山自尽，起义军占领北京，宣告了明朝的最后覆灭。

李自成的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明朝的残余势力在南京建立了第一个南明政权，企图伺机夺回失去的江山；吴三桂拥兵自重，在山海关游移观望；拥有强大军事力量、早有人主中原打算的大清军队大举驱军南下，以图乘乱夺取全国政权。在这个关键时刻，李自成和他领导的起义军却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没能改变以往的流寇主义作风，继续无节制地“追赃助饷”以解决军费问题，把一大批官绅推向

了自己的敌对面，甚至对应该积极争取的吴三桂的家眷也不例外，向其父“索饷二十万”，“刑掠且甚”。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还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占为己有，结果使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投奔了清军。

吴三桂投降清军后，与清军联合起来对付起义军。崇祯十七年四月下旬，起义军与清、吴两军在山海关打了一场大仗，结果起义军被打得大败，被迫退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匆匆忙忙中登基称帝，第二天便退出了北京城。五月一日，清统治者进入北京。同年九月，清顺治帝从沈阳迁至北京，定北京为首都，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朝代——清代。

李自成返回老根据地西安后，肩负起反

明抗清的双重重任。他们在陕西与清军打了几个大仗都失利了，但退到湖北一带时尚有余部数十万人。在武昌期间，大顺军改江夏为瑞符县，建立政权机构，设置官员，铸造永昌钱币。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突然袭击武昌，李自成弃城南走。六月，李自成率军到达湖北通山九宫山，在率轻骑探路时，遭地方武装伏击身亡。

李自成败退陕西时，张献忠便和李自成相约共抗清兵，顺治三年冬，张献忠迎击清军于川北西充的凤凰山，遇伏而死。李自成、张献忠死后，他们的部将李过、高一功、李定国、孙可望、李来亨等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前后达二十余年。

第八章

清朝建立



清朝是以我国少数民族满族的上层为主体建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王朝。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至清末宣统皇帝溥仪，历经十二帝294年。清前期指1644年清朝入主北京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时期，是清朝开基创业、建立中央政权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的阶段。

第一节 满族源流

满族的祖先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很早就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东北地区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一个少数民族——肃慎，就是满族的先世。其后，在汉文文献中，又有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称谓。

明代，女真人基本形成三大部（每大部

中又包含若干小部）：建州女真，分布于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海西女真，分布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曲折处；东海女真（野人女真），分布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大体从松花江中游以下到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建州和海西女真以从事农业为主，东海女真则以渔猎经济为主。明朝政府在东北地区设立卫所和都司，这是按照明朝政治制度建置的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它和内地不同的是除了军事职能外，还要管理地方的行政事务。明朝政府十分重视对女真人的管理，在东北女真人的聚集地，封女真部落酋长为都督、都指挥、镇抚等职，授以信印，规定他们各自统领其卫所，按时朝贡。明朝政府还在辽东通往女真地区的交通重镇开原等处设“马市”，便于女真人和汉人及东北各族之

间进行商业交易。交易的商品来自女真人的有马匹、貂皮、人参等，来自汉族地区的有铁制生产工具（铧、铲）、耕牛、种子、米、盐、布等。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由于其地域优势，与外界交往接触频繁，经济迅速发展，势力逐渐壮大。明朝中期后，明朝政府为了牵制女真族力量的发展，采取了使女真各部“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政策，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出身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登上历史舞台，带领女真族走上了统一之路，这才有了后来以建州女真为主体，吸收汉、蒙等族人员参加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第二节 肇建基业

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时期，是清朝开基创业的时期。努尔哈赤完成了统一女真族的大业，创建八旗制度，建立后金国，成为与明朝对峙的重要力量；其子皇太极继承父业，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不断集中权力，最后称帝，改女真族名为满洲，改后金国号为大清，同时还继续对明朝的战争。这一时期，他们主要活动在山海关以外。

一、努尔哈赤和后金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生于明嘉靖三十



八年（1559），他的历代祖先中有多人受到明朝的册封，为原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十岁时，没了母亲，因受到继母虐待，十九岁分家自立。为了生活，他采松子，挖人参，到抚顺马市出售（1464年，明朝天顺八年，明朝政府为建州女真开设抚顺马市），不久投靠明朝辽东大将李成梁，在李成梁军中屡立战功。这样的历练，使努尔哈赤成为一名足智多谋、武艺超群的人才。明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军镇压建州古勒山寨主阿台，其间

《皇清职贡图·奇楞人》

清 丁观鹏等绘
绢本

长1941.3厘米，宽33.6厘米
奇楞人，又称奇勒尔人，也是明朝所称的“野人女真”之一，清朝称为使鹿部。男女衣服皆以鹿皮、鱼皮制作。



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和印文

明

铜制

长8.8厘米，宽8.8厘米，通高11厘米

明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禾屯吉卫是其下辖的一个卫，该卫管辖土著人属“野人女真”的一支，辖区在今吉林安图古洞河流域。



清太祖努尔哈赤像

明军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努尔哈赤为报仇雪恨，以祖、父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兵征讨尼堪外兰，从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

努尔哈赤初起时，只是建州女真中一支弱小的力量，所以他先把征讨的范围限于建州女真内部，特别把矛头指向尼堪外兰，对相对强大的海西女真则避免冲突，对明朝中

央政府更是十分恭顺。万历十六年（1588），建州女真各部基本统一在努尔哈赤麾下。次年，明朝廷授他为都督佥事，后又晋封他为龙虎将军。

建州女真的统一和努尔哈赤的崛起，引起海西女真的震动，万历二十一年，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纳林布禄纠集哈达、乌拉、辉发等九部，组成三万人的联军，分三路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这是努尔哈赤起兵后的第一次关键性的战役。虽然九部联军声势浩大，但努尔哈赤正确地分析道：对方人多，首领也多，是乌合之众，作战时一定会观望不前。他满怀信心鼓励自己的战士：我兵虽少，只要奋力一战，一定可以取得胜利。在战斗中，努尔哈赤集中优势兵力，重点出击，斩杀叶赫部首领布斋，同来的其他首领大惧，不顾其兵，四散而走。对海西女真九部联军一战的重大胜利，为进一步统一女真各部奠定了基础。万历四十一年（1613），海西女真除叶赫部外（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灭叶赫部），其余部落都被努尔哈赤统一。对东海女真，努尔哈赤主要采取招徕和争取的策略，先后有不少部落归附。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首次派兵进入黑龙江、精奇里江。至此，东海女真各部基本被统一。努

努尔哈赤的剑

全长80.5厘米，宽3厘米
剑身钢质，鞘木质，外裹鲨鱼皮。



尔哈赤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结束了女真长期分裂动荡的局面，对女真社会的发展、加强和巩固中国东北边防，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开始形成。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为建立政权创造条件。万历十五年（1587），统一战争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他就在呼兰哈达山东南建筑了费阿拉城（今辽宁新宾永陵镇境内），俗称旧老城。万历三十一年（1603），在苏子河南岸建筑了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永陵镇境内），俗称老城。赫图阿拉城比费阿拉城不仅规模大了，而且有一定的布局，它是努尔哈赤管辖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1616年农历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称汗建国，尊号“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建立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年号天命。这时，他统治的地域已扩展到四千余里，人口增加到四五十万。

为了反抗明朝廷对女真族的压迫，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春，努尔哈赤借口报“七大恨”之仇，公开举起抗明大旗，开始了对明朝的战争。这七大恨是：明军杀害其祖、父；明朝对待建州与海西扈伦四部不公；明朝地方官不守界约；明朝偏袒叶赫，压抑建州；明朝遣兵驻防叶赫，叶赫才敢将已许嫁努尔哈赤的女子转嫁蒙古；明朝强占建州土地；明朝地方官欺辱建州。后金军首破抚顺关后，接着又拿下清河城，军事上节节胜利，明朝廷受到震动，决定出兵回击。为了应付战事，明朝政府连续加派田赋，这是造成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原因之一。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明朝各路兵马相继云集辽东，以辽东经略杨镐为总指挥，坐镇沈阳，分兵四路，计十多万人出边进剿



努尔哈赤盔甲

后金。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之战中，努尔哈赤的后金军大败明军最先出动的西路杜松所部；接着，又打败北路的马林所部、东路的刘綎所部。见此情景，南路的李如柏部撤退。此后，明朝与后金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明朝气势大衰，而后金力量大增。萨尔浒大捷之后，努尔哈赤决定夺取辽阳、沈阳。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努尔哈赤先后攻下沈阳、辽阳，先迁都辽阳，称东京；天命十年正式建都沈阳，后来称为盛京。后金将辽河以东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后，便进一步向辽西地区进攻。

天命七年初，努尔哈赤发兵渡辽河而西，很快攻陷广宁，又连陷四十余城，占领了辽河以西大片土地。天命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进攻山海关外的明朝孤城宁远（今辽宁兴城）。宁远城的守将袁崇焕原来是个下级文官，但很有谋略和胆识，广宁失陷时，他

《满洲实录·灭亡叶赫部图》



《福陵图》

清 绢本

努尔哈赤葬于福陵，位于今辽宁沈阳东郊。



曾单骑出山海关，遍视关外详情。他认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他修城练兵，多置大炮，坚守宁远。努尔哈赤强攻宁远，果真败在了袁崇焕的红衣大炮之下。这是他起兵四十多年来第一次失利，心中实在难以承受，加之本已受伤的身体又突发痼疾，当年八月逝世于沈阳附近，终年六十八岁。

二、皇太极定国号易族称

天命十一年九月，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即汗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天聪，后又改为崇德。

皇太极执政后，推行了一系列治国新政。他注重发展经济，知道经济是巩固政权、夺取天下的基础；他还优礼投降的汉官，原明朝的秀才范文程和蓟辽总督洪承畴等人投降后，都受到赏识重用。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设立文馆，分儒臣为两班，



满文“天聪通宝”

直径4.9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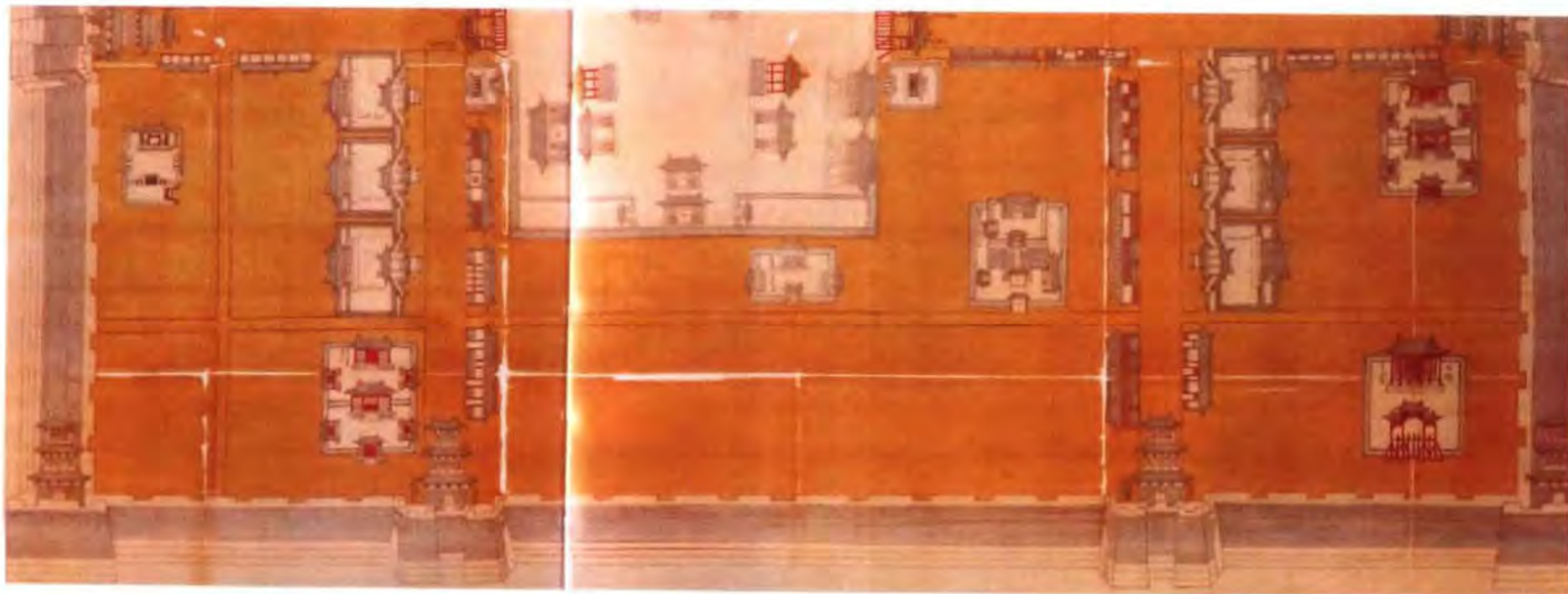
皇太极即汗位后，改元天聪，命铸新币，曰“天聪通宝”。以红铜铸造，分满文和汉文两种，清朝定都北京后，改为满汉文合璧。皇太极去世后，停止使用。

称作巴克什（汉语文书之意，后称笔帖式），也称文馆大学士，负责翻译汉文典籍和记注本朝政事，实际是皇太极的咨询机关和顾问团。天聪五年，皇太极听从汉族官员建议，依照明朝制度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不久皇太极就直接控制六部，集中权力，独主政务。天聪十年三月，他改文馆为内三院：内国史院，负责记录起居，撰写诏令、表章；内秘书院，负责撰写对外往来文书和对下属官吏的指令以及起草祭文；内弘文院，负责注译史籍和讲解经书。各院设大学士、学士三人，分别由满、蒙、汉人担任。同年四月，皇太极的同父异母长兄代善偕兄弟子侄及诸大臣拥戴皇太极为“宽温仁圣皇帝”。

皇太极既登皇帝宝座，便尊父亲努尔哈赤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他在即位的祝文中宣告，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皇太极建大清国后，继续完善政权机构，崇德元年（1636）设立监察机关都察院，以监察各级官吏；崇德三年，设理藩院，负责处理与蒙古的关系，后来职能扩大为协调各民族关系，乃至处理同各国的关系。皇太极为何要改用大清作国号，清朝的官修文书中没有说明，后人则有各种说法：有人认为北方许多民族信奉萨满教，而萨满教崇尚青色，故以同音字“清”命国名；有人从五行相克中去解释，认为明为火，清为水，以水灭火，清必克明；也有人认为历

《盛京城阙图·六部衙门》

图中标示六部衙门在皇宫大清门之南，位于御道东西两侧，东侧自南而北分别为吏、户、礼三部，西部自南而北分别为工、刑、兵三部。



史上灭北宋、与南宋长期对峙的金国，就是女真族建立的，因汉人对“金”的称号反感，皇太极遂改“金”为“清”。皇太极还改女真族称为“满洲”，并否认女真是其族称。他在给明朝将领祖大寿的一封信里说：你们明朝的君臣总是以宋朝之事作为借鉴，其实你们明朝皇帝并非宋朝之苗裔，我也不是金国之子孙，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由此可见，改族称和国号，是为了避免造成汉族的反感，以减少入主中原的阻力。实际上这时的满族是以建州女真为主，融合了蒙、汉等族人员的新的民族共同体。

皇太极一直图谋入主中原。当他认为需要积蓄力量时，就主动表示愿与明朝讲和，但这并不妨碍他一旦有时机就出兵明朝属地，以获得人力和财物，并了解明朝的实力。例如：天聪三年（1636）他曾率十万大军长驱直入，到达燕京（今北京）德胜门外，但他没有立即攻取燕京，他认为夺取京师易如反掌，但统治全国的时机还不成熟。他利用驻守宁远的明朝将领袁崇焕驰援京师之机，以反间之计，借明朝崇祯皇帝之手杀了袁崇

焕，为占领全东北除掉了一大障碍。

崇德五年至七年，清军攻下松山、锦州等城，明朝在山海关外的全部土地入于大清囊中，为清军入关铺平了道路。接着皇太极派兵先后深入河北、山东等地，旨在了解明朝在中原地区的军事状况。崇德七年十月，西藏达赖五世罗卜藏嘉木措的代表和厄鲁特蒙古首领戴青绰尔济等来到盛京向清朝通好。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八月初九，皇太极端坐清宁宫，无疾而终，年仅五十二岁，葬于沈阳昭陵。皇太极之子福临即位后，于顺治元年（1644）尊皇太极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庙号“太宗”。此时，灭亡明朝、统治全国，已是指日可待之事了。

三、制定满文

制定满文是满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满文是满族语言的书写符号。

满语属阿尔泰语系。金代曾参照汉字创制了女真文，有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两种。女真字是一种方块字，与蒙古拼音文字不同。元代，蒙古成为统治民族，蒙古语和女真语均属阿尔泰语系，在女真地区先是蒙古文和女真文并行，后来女真文逐渐衰落下去。到元朝末年，懂女真文的人已经为数不多。明中叶以后，女真人已不懂女真文，只能借用蒙古文字。这种讲女真语、写蒙古文的语言与文字的矛盾，已不能满足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成为形成满族共同体的一个障碍。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进程中，倡议并主持创制记录本民族语言的符号，此即为老满文，也称无圈点满文。他说，创制本民族文字的意义在于使自己的语言与文字臻于统一，创制的方

写在明朝公文纸上的老满文



法可以参照蒙文字母。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遵照努尔哈赤提出的原则，仿照蒙古文字，根据本民族语音的特点，创制了满文。

老满文在统一的女真地区推行了三十多年，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因初创满文，缺乏经验，同时蒙古语和女真（满）语的语音又存在差别，所以老满文尚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字母数量不够，清浊音不分，上下字无别（例如“塔”、“达”不分，如同一休），字形不统一，语法不规范等。因此，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又命巴克什达海改进无圈点的老满文，皇太极说，对老满文“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巴克什达海对老满文主要作了如下改进：编制“十二字头”，字旁各加圈、点，固定字形，确定音义，创制特定字母。改进后的满文，按语言学音素来说，有6个元音字母，22个辅音字母，10个专门用作拼写外来语的特定字母，共38个字母。满文的书写，字序从上到下，行序从左到右。

满文的创制和颁行，对女真统一的巩固和文化的发展、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都起



新满文《进士登科录》

顺治朝内府刻本

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族的过程中创建的一种社会组织制度。八旗，指的是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子。每旗管辖一定数量的属民，战时出征，平时务农，军政合一，兵民一体，它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三项职能。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和皇太



皇太极调兵信牌

木质

高31.1厘米，径20.3厘米，
厚2.5厘米



八旗旗幟

自上而下依次为：

正黄旗军旗、镶黄旗军旗、
正白旗军旗、镶白旗军旗、
正红旗军旗、镶红旗军旗、
正蓝旗军旗、镶蓝旗军旗。

极时代的根本制度。

八旗制度是从女真人实行的“牛录”组织演变发展而来。长期以来，女真人有一种习俗，凡遇出围开猎，都依照族寨而行，十人编一队称“牛录”，每人各出箭一支，其中首领称为“牛录额真”（大箭之主，后来的佐领）。这种组织形式是临时性的，出行则合，归寨则散。随着女真族统一的进程，聚集在努尔哈赤周围的人越来越多，管理他们的生产，组织他们进行军事征服战争，是八旗制度建立的直接因素。努尔哈赤利用“牛录”这个女真人熟悉的名称，对它加以改组、扩大，以适应新的需要。大体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先设立黄、白、红、蓝四旗，

规定每三百人编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管理该牛录的一切事务。明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当时除了叶赫部及少数边远地区的部落尚未降服外，绝大部分女真人都已归顺，于是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合为八旗。关于八旗的内部建置，仍以牛录为基础组织，在其之上，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后来称参领）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即旗），设固山额真一人（后来称都统），即为旗主，也称固山王，由努尔哈赤选用子、侄等宗室、亲近之人担任。八旗各树一帜，互不统属，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并有巴牙喇（直属精锐部队）五千余骑。各旗旗主也有人数不等的巴牙喇。

努尔哈赤主要以两类人辖领牛录：一是对集体来归顺的女真人，不打乱他们的血缘、地缘界限，以率众而来的首领或其子侄为牛录额真。如明万历十六年（1588），苏完部长索尔果率五百户来投，努尔哈赤把他们编为五牛录，使索尔果的子侄辖领。这样做，既可以不夺原首领的昔时权利，笼络人心，又可以使血缘关系很深、地缘观念很浓的来归人众比较容易接受新主的统治；二是对分散来投或战争中俘获的女真人，采取凑编牛录、赐与有军功的部下辖领的办法。如清朝开国名将额亦都，因家道中衰，生活贫困，投奔努尔哈赤后，领兵南征北战，军功卓著，努尔哈赤赐敕书与他，说额亦都作战英勇有功，给予三牛录，使之专管。

到清太宗皇太极时代，为了管理归附的蒙古人和汉人，又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八旗是军事和民事的统一组织，兼有统兵打仗和组织人们生产、生活这两种职能。



八旗辖丁皆有披甲当兵的义务。《八旗通志·兵志一》中说，八旗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表明八旗所辖丁口皆可披甲当兵。事实上，八旗就是后金国的兵员储备所，在任何时候都能根据需要按不同的比例抽出人丁，或驻守城寨，或出征厮杀。

八旗是行军打仗的行动单位。在行军时，如果地广，则八固山并列队伍；如果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不管地形如何变化，都可以做到整齐中有节次。八旗对其士

兵约束甚严，行伍中禁喧哗、禁纷杂；战争开始后，士兵绝对不可离开所在的旗、甲喇、牛录。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宣布大举伐明的部署时就下令：“自班师日，各军勿得离牛录、旗，违者执之详问其由。若五牛录之主不申法令于众，罚五牛录主及本牛录马各一匹；若谕之不听，即杀梗令之人。”

八旗具有行政管理和组织生产并负担国家经济的职能。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八旗时，

八旗甲胄

这是八旗兵的棉盔甲，以黄、红、蓝、白四色及镶边为标志表明旗属。



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本牌
清初八旗将领进行军事征战时，以此种木牌记录参战的旗属、进攻的地区及缴获情况，可视为战地档案。

就把所属的人丁均匀整齐点数，分隶各牛录，全部编入八旗，由旗主及八旗各级额真辖治。八旗成员不许擅离牛录，自由行走。努尔哈赤曾下谕，令牛录额真等将其所辖人丁严加管束，禁止外出乱走，每天早晚点名查看。八旗各牛录之下，分有四个叫达旦（意为窝或铺）的组织，劳动、出行要按达旦之人为班计。后金国还没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赋税制度，它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对八旗人丁的征赋敛税。八旗各牛录要提供官用粮

谷。如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曾命令：各牛录每十人出四头牛，于旷野处屯田，造仓积粮。与此同时，设置管理粮仓的官员，以执掌仓库粮谷的出入。各个牛录出人力、畜力为后金国“造仓积粮”的做法，实际上是国家向八旗全体人丁征收赋税的特殊方式。

综上所述，可以说八旗制度是包括军事、民政和经济各方面内容的后金国的根本制度。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到皇太极时代，随着皇太极加强君主专制集权，八旗旗主的权力开始下降，旗权和政权之间出现裂痕，八旗制度作为后金国的根本制度这一地位开始动摇。努尔哈赤晚年确定由八旗旗主共治国政，但皇太极即汗位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巩固和加强自己的集权地位。天聪五年（1631），他在八旗之外另设国家机构六部，并独自控制了八旗中的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实力大增，使得其余旗主均无力与之抗衡。

八旗制度对于满洲建立后金国和后来建立清朝，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各旗佐领图印





首先，它达成了女真族的政治统一，促进了女真族经济的发展。八旗制度建立之前，女真族虽属同一民族，但政治分裂，部落众多，相互抢掠，战祸连绵。在这种状况下，女真族的社会经济难于迅速发展。15世纪末，不少女真部落已经以农业生产为主，伴以渔猎、畜牧、采摘，但也有相当的部落专以射猎、采捕为生，经常“空落而出”，不经营农业生产。可见，其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即使以耕田种地为生的女真人，生活也得不到保证，铁制生产工具和畜力不能自给，从而使他们的生产带有很大的依赖性。八旗制度建立后，结束了这种混乱的局面，来自不同部落和地方的人被编在同一旗、甲喇甚至牛录之下，这就加强了人们之间的了解，密切了关系。在八旗制度的辖束下，他们都要遵守共同的法令，有共同的文字，旧有的差异逐渐消失，一致性日益增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八旗人丁的辛勤劳动下，后金国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这里“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手

工业已经有了专业分工，“银、铁、革、木，皆有其工”。女真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八旗生产力水平的趋于统一，是满族勃兴的重要物质条件。

其次，八旗制度成为女真族——满族灭明而兴的武力基础。女真族虽然是个骁勇善战的民族，但往日部落涣散，经济落后，不能组成强大的军队，因此也摆脱不了受明朝控制的困境。八旗制度建立后，彻底改变了这种被动的地位。后金国拥有了一支组织严密、指挥统一、兵员充足、粮草供应可靠的强大军队。努尔哈赤就是依靠八旗劲旅，以“七大恨”兴师伐明，用兵几十年，掌握了对明战争的主动权。皇太极继努尔哈赤之后，也是依靠八旗劲旅，为清朝入关铺平了道路。

八旗制度在清朝开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金国的军事、民政、经济各方面的任务，都是通过八旗制度实现的。旗权和政权合为一体，保证了后金国的成长壮大。皇太极即位，旗权和政权之间出现裂痕，但是，八旗制度的性质和作用并没有发生根

《冰戏图·转龙射球》

清 姚文瀚、张为邦绘
绢本

长563厘米，宽36.5厘米

冰戏原是一种滑冰活动，八旗军也作为军事训练项目，入关后逐渐演变为带有娱乐性的军事竞技表演。图中八旗兵肩插标志旗属的小旗，身着战服，足蹬冰鞋，在统领的带领下，盘旋冰上，张弓矢、举刀剑，欲将旌门上悬挂的天球射下。

本变化。旗权受到彻底的打击、君主专制集权的最后确立，是清朝入关后的事。

清朝入关后，八旗逐步演变为单纯的军事组织，分为禁旅八旗（京营）和驻防八旗两种。京营驻北京，守卫宫廷和京师。此外，清朝收降了几十万明军，并招募汉人，组建绿营兵（因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故名）。八旗军与绿营兵共同构成清朝军队的主要部分。

五、大政殿、十王亭

大政殿和十王亭是沈阳故宫的主要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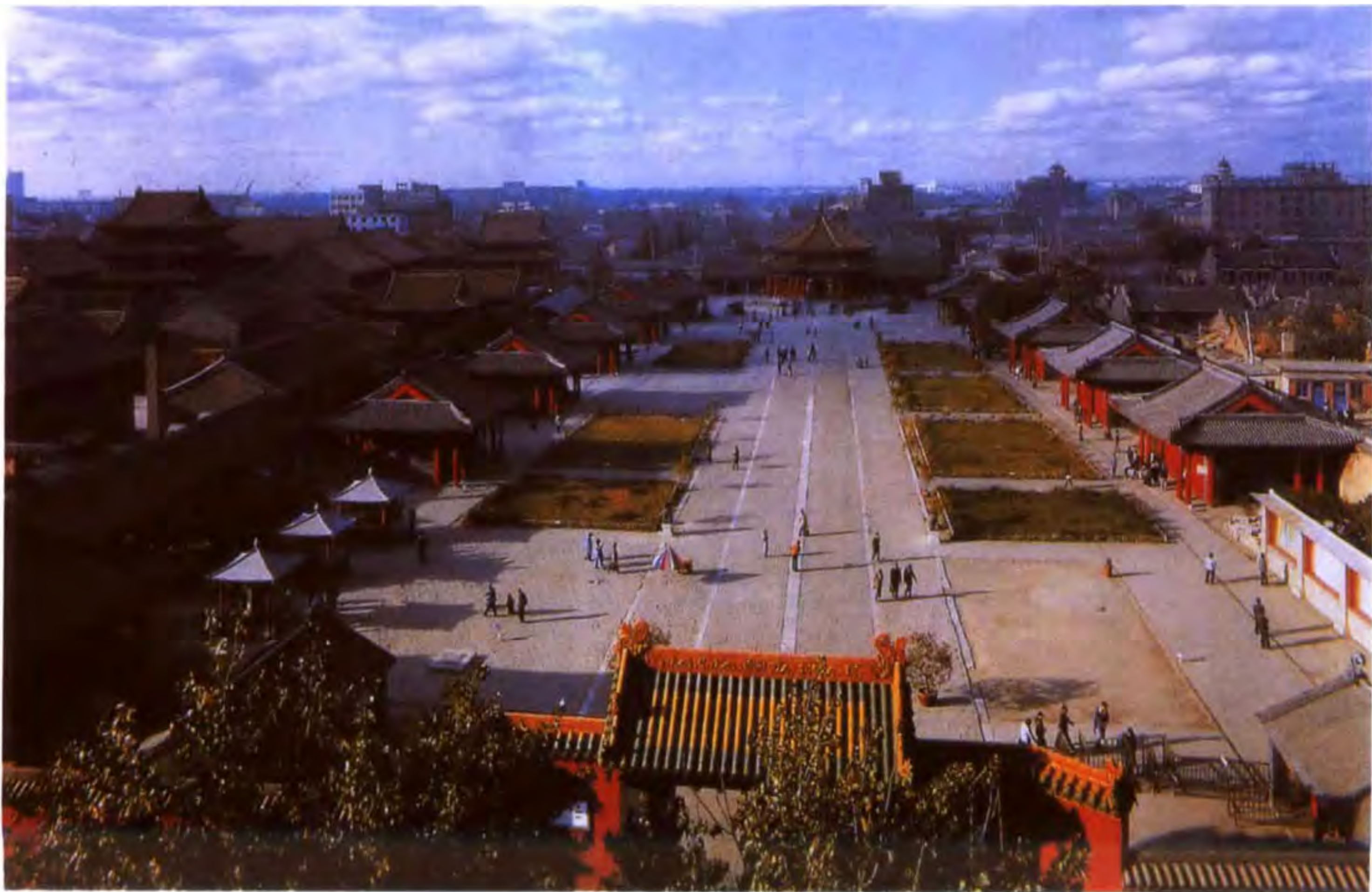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出于伐明战略考虑，决计放弃竣工不久的辽阳新城，迁都沈阳。

此次迁都事先没有做准备，数日内即作出决定并付诸实施，所以新都宫殿衙属均需

新建。努尔哈赤迁沈后所居之“汗宫”，位于城内北侧正中，是两进长方形院落，内院建于高台之上，坐北朝南，中宫三间，顶黄琉璃瓦镶绿剪边；东西配宫各三间，顶绿色琉璃瓦；前设内门一座，有台阶下通外院。各宫皆硬山出廊式。与后来沈阳故宫的宫殿相比，这里显得狭小简陋，但二者建筑空间和平面布局有许多共同特点，琉璃瓦装饰也基本一致。沈阳故宫大内宫阙部分建于皇太极天聪至崇德初年，属于沈阳故宫的中路；大内宫阙的两翼东所、西所及西路建筑，建于后来的乾隆年间。大政殿和十王亭是沈阳故宫东路的主要建筑，是最先建造的部分。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初，即着手建造国家权力机关的办公处所，修建汗宫的同时，在城内另择地点营建汗王议政的大殿。这座大殿在皇太极称帝、定宫殿名称时，被称为笃恭殿，后被命名为大政殿，是沈阳故宫最

大政殿和十王亭



早的建筑。当时这里是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是最庄严和神圣的地方，皇太极的称帝大典就在这里举行。此殿前方沿大殿中轴线的东西两侧，呈八字形排列方亭各五座，东侧为左翼王亭及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亭，西侧为右翼王亭及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亭，合称十王亭，应与大政殿同期或略晚建成。这样的建筑格局，体现了清初八旗制度的特色。当时凡八旗部队出征，首领居中，由亲兵护卫，将士分立左右两翼，每翼前各设一王，领导本翼四旗前进。据文献记载，天聪年间，汗王率八旗贝勒（亲王）出行时，也曾按与“一殿十亭”相同的形式安设帐幄，证明这是后金国的规制。站在大政殿向南望，会感觉前面的广场更为宽敞；而站在十王亭的南端北望大政殿，由于两列亭子的收拢，增加了视觉上的空间深度，使人觉得大政殿体量更大、更宏伟、更深远。这

种布局科学地利用了“透视改正”的原理，而且给人以强烈的导向感，天子独尊的思想被表达得淋漓尽致，体现了清朝统治者要取明朝而代之的政治抱负。后来，乾隆皇帝在御制诗中对大政殿和十王亭的布局这样描述：“大政居当央，十亭两翼张。八旗皆世胄，一体汇宗璜。”

第三节 定鼎北京

皇太极死后，其第九子福临在战功卓著的叔父多尔衮（1612—1650，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的带头支持下，被拥立即位，次年（1644）改年号为顺治元年。由于福临只有六岁，由多尔衮辅政，被尊为“叔父摄政王”。为了使福临长大后能顺利亲政，福临的母亲、皇太极的庄妃博尔济吉特氏（1613—



大政殿

大政殿坐落在今沈阳故宫东路，为努尔哈赤定都沈阳时所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曾于此处理政务，举行典礼。

孝庄皇太后像



1687) 下嫁多尔衮，福临尊她为皇太后。她去世后谥号“孝庄”，史称“孝庄文皇后”。

当时，明朝的统治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以多尔衮为首领的满洲贵族集团密切关注着关内明朝的形势。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

军攻占北京，崇祯帝于煤山自缢，明朝被推翻。四月，率军向山海关进军的多尔衮途中得知此消息，更加紧了前进的步伐。

京城危急之时，崇祯帝曾命宁远总兵吴三桂回师援救。吴三桂军至京郊丰润，得知京城已失陷，于是退兵山海关观望不前。李自成拘吴三桂眷属以逼降吴三桂，多尔衮也遣使致书吴三桂劝其降清。当李自成领军前往山海关征讨吴三桂时，吴三桂投降多尔衮。清军在吴三桂的配合下，打败李自成，入山海关进驻北京。九月，福临御驾由盛京沈阳入主北京紫禁城。十月，在天坛举行定鼎大典。数日后，多尔衮代表顺治帝（清世祖）于紫禁城“皇极门”颁诏天下：定鼎燕京，国号曰大清，纪元顺治。大清皇帝入登紫禁城，是大清从一个地方政权转而成为中央帝制王朝的标志。

一、政权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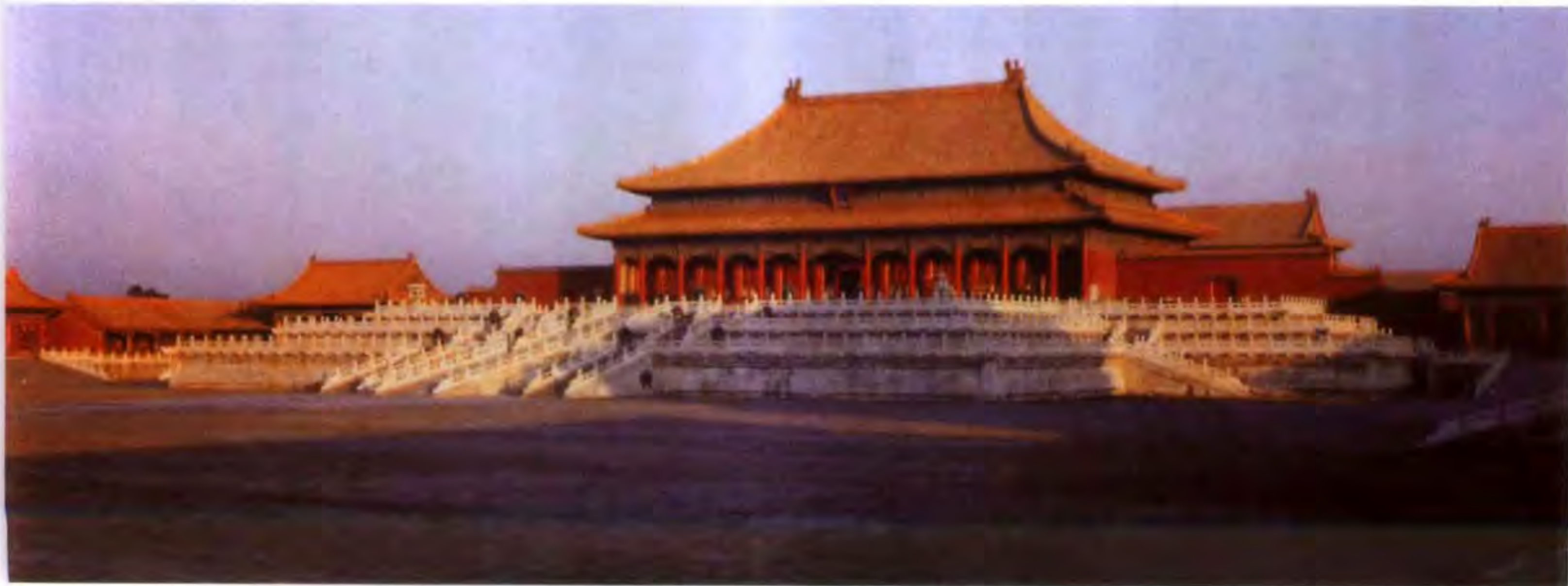
清朝的政治制度大多沿用明朝旧制，同时又有自身的特点。

（一）中枢机关

清代的中枢机关包括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南书房、军机处几个部分。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初最高的中枢机

紫禁城太和殿



构，其成员均为满族贵族，重要的军国大事都要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提出意见。其设置的具体时间无据可考。这种制度来源于八旗旗主会议，是其他的汉族政权所没有的。它将权力分散于一小撮贵族王爷之手，不适于帝制的专制集权统治，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帝取消了议政王大臣之衔。

内阁是清朝仿照明朝制度、为辅助皇帝处理政务而设立的。阁臣常在皇帝左右，充当顾问、宣布告谕、办理本章等。顺治十五年（1658），改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兼殿阁衔，共分四殿两阁：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乾隆时，减去中和殿，增加体仁阁，遂成三殿三阁之制。

南书房是进一步提高皇权、压制阁权的产物。康熙十六年（1677）在乾清宫南书房设南书房行走之官，人数不固定。南书房行走除了陪着皇帝做诗写字外，也秉承皇帝意

志拟写谕旨，发布政令，实际是皇帝处理政务的机要秘书班子。但自军机处成立以后，南书房就不再参与机密事务，而司文词书画等事。

军机处建制于雍正年间，当时清朝正与准噶尔作战，军机处便成为紧急处理西北军务和指挥作战的参谋部，后来边境地区日益巩固，军务日益减少，军机处的职责就渐渐超越军事范围，变成清王朝最核心的中枢机构，是皇帝私人的工作班子，直接听命于皇帝。它的特点是处理政务迅速而机密，但本身没有独立性。军机处起草的谕旨，有的先下到内阁，然后层层下达，叫做“明发”；有的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严密封缄，由驿马传递，直达督抚，叫做“廷寄”。军机大臣有满员，也有汉员，军机大臣虽权力显赫，但绝对听命于皇帝，没有丝毫独立行动和决策的余地。军机处的设立，使议政王大臣会议

天坛圜丘

位于天坛南半部，为明嘉靖九年（1530）建，现存形制为清乾隆十六年（1751）改建。清朝入关当年即定皇帝祭天大祀之制。从此，冬至祭天成为清帝亲行诸礼中的首要大礼。



南书房原址

位于紫禁城内廷乾清宫院落内西南角。



形同虚设，内阁权力也被大大削弱。军机处是帝制集权高度发展的产物。

（二）中央各部院衙门

清朝的中央行政管理机关仍沿袭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的职掌大致为：吏部负责办理文官任免的手续；户部负责办理全国田亩、户口、财政收支；礼部掌管国家的典礼、学校、科举；兵部名义

上是全国最高军事机关，实际上往往不过稽核额籍、考察弁员而已；刑部管理刑法案件；工部管理有关工程、生产方面的事务。各部首脑称尚书、侍郎，都对皇帝负责。皇帝通过他们控制国家权力。与明代或明以前历代六部官制不同的是，清朝实行“复职”制，即各部尚书不止一人，由满汉人员担任，以体现满汉并重。

军机处值房

位于紫禁城乾清宫门外西侧



都察院是中央的监察机关，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检察和弹劾。

清朝在加强和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立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理藩院的官员有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皆由满人或蒙人担任。理藩院还曾与礼部分管一部分对外国交涉的事务。

宗人府是管理皇族的机关，掌管皇族属籍、议叙或议处皇族官员、审理皇族中的诉

讼案件等。宗人府设宗令一人总领府事，在亲王或郡王内选充，下设左司、右司等办事机构，此外还有掌管宫廷事务、照料皇帝生活的内务府。

（三）地方政权机关

清朝地方政权机关有省、道、府、县四级。省是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组织。一省或数省设总督，各省设巡抚，代表皇帝统揽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督抚以下，各省设布政使司，由布政使掌民政，按察使掌刑法。布



《多铎入南京图》

清

多铎是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天命五年(1620)封贝勒，天命十一年为正白旗旗主。顺治元年(1644)随多尔衮进关，打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再率师南下，入南京，破扬州。

政使司下为府，知府是最高民政长官。省与府之间设道，乾隆年间始专设“守道”和“巡道”，守道有固定的辖区，主要管钱谷政务；巡道则分巡某一区域，主要管刑狱案件，长官称道员。府下是县，长官称知县。

北京设顺天府，盛京（沈阳）设奉天府，由中央直辖。

在边疆地区设将军和大臣。如在蒙古地区设乌里雅苏台将军；统一新疆以后，又设伊犁将军；乾隆时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管理西藏事务。

二、尊孔开科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已成了维系民族文化统一的象征，因此，清朝统治者对孔子的态度，就成为对汉人政策的重要内容。为了重新恢复和强化统治秩序，入关当年十月，顺治帝在登极诏书中就宣布承前代惯例，孔子之后世子孙仍袭封“衍圣公”称号。顺治二年（1645），顺治帝钦定孔子神位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多尔袞亲自“谒先师孔子庙行礼”。同时，清朝继续实行明代的科举

取士制度，笼络汉人知识分子，吸引他们加入维护清朝统治的营垒。顺治二年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因地方上存在“反顺为逆者”，建议清朝政府“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于是在这一年开始举行乡试，顺治三年在京会试天下举人，以大学士范文程等人为会试总裁官，接着又举行了殿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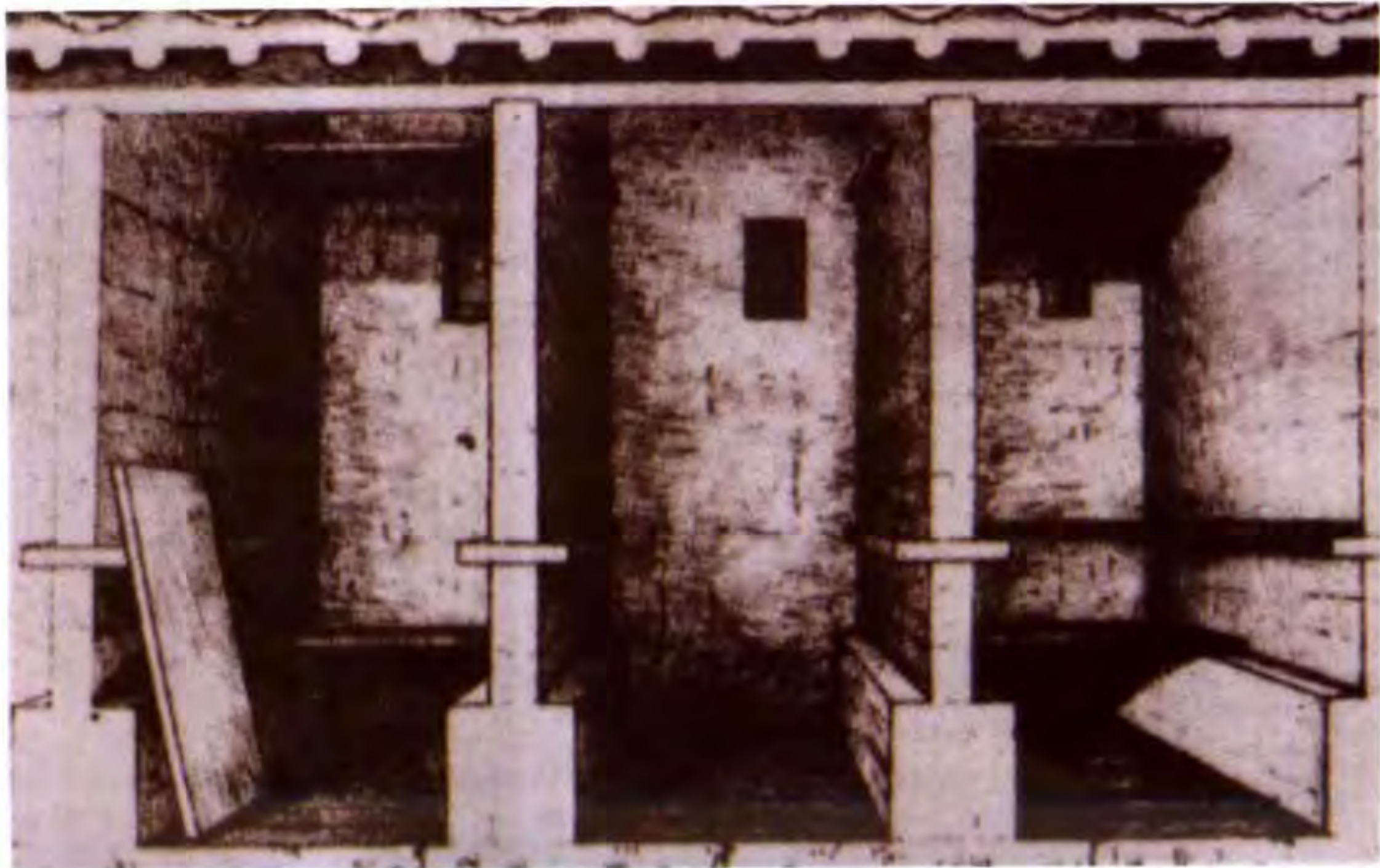
清朝的乡试、会试和殿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凡应考者称童生，童生通过院试（包括县试、府试）取得生员资格，才能参加乡试。乡试在省城举办，考中者称举人。举人赴京师考试为会试，考中者称贡士。贡士才有资格进皇宫内参加殿试，由皇帝亲定甲第。殿试分三甲，一甲取三人，即俗称的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可直接授与翰林院官职；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科举考试的内容仍用八股程式，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文体以八股、策论为主。

三、《赋役全书》和《鱼鳞图册》

清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朝，以田赋和丁

科举考场

北京贡院位于今东城区贡院大街，是清代会试和顺天府乡试的考场。图为贡院内的考试房间。



役作为国家的主要收入。顺治十四年(1657),清朝政府着手按明朝万历年间征收赋役额为准汇编《赋役全书》。另立《鱼鳞图册》(亦称《丈量册》),主要包括业主姓名、土地质量、数量及四至等;又立《黄册》,征收赋税时将《赋役全书》和《鱼鳞图册》、《黄册》相印证。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国的人口和土地数字有了较大变动,于是重修《赋役全书》,名曰《简明赋役全书》。

康熙五十一年,清朝政府进行赋税改革,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把全国征收的赋税额固定下来,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赋税额。雍正元年(1723),清朝政府正式推行“摊丁入亩”,也称“地丁合一”,将丁银摊入地亩,实际上废除了人头税,按土地多少的单一标准收税,这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九章

安疆平乱



清朝入关建立中央政权之初，还不能说同时就建立了稳固的全国性统治。当时，明朝朱姓藩王和南逃的明朝遗臣建立的南明政权还割据一方，农民起义军和广大汉人继续进行着抗清的斗争。

多尔袞入关之初，在京城及京畿地区推行剃发，把汉人是否剃发视为归顺清朝与否的标志。这一做法，激起了汉人的愤怒情绪。碍于当时清朝进关不久，立足未稳，战事不断，多尔袞不想因剃发引起麻烦，又很快下令停止剃发，各随其便。到顺治二年（1645），形势发生了变化，清军不仅击败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政权，而且血洗扬州后乘势渡过长江，占领镇江、南京，一举消灭了南明福王朱由崧的弘光政权。清朝政府遂于当年六月向全国颁发剃发令，规定自布告下达十日起，各地人民一律剃发，在州县的命令上，更写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等语。此

令使得天下哗然，特别是江南地区反应激烈，引发了广泛的抗清斗争，结果都被清军残酷地镇压下去。顺治三年，又有南明鲁王、唐王的几个政权被清军攻灭。同年，清军还进入四川，攻击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政权。张献忠战死后，其余部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继续抗清达十几年之久。至顺治十八年，清朝最后消灭了南明桂王的永历政权，统一全国。顺治帝在这一年病逝。终顺治一朝，清军铁流雄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清初统治者，一方面以武力消灭敌对者、征服反抗者，另一方面也实行了一些发展生产、减轻赋税的措施，以稳定秩序、缓和矛盾，使自己的统治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总趋势。到康熙、乾隆时期，康熙帝、雍正帝和乾隆帝，对于割据和分裂势力保持高度警惕，并予以坚决

打击，先后进行了若干次平叛之战，并收复了台湾，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加强对边疆的管理，并且有力地抵制了沙俄的扩张，使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得到空前巩固和发展。

第一节 剿定三藩

“三藩”指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三个汉人藩王。吴三桂、尚可喜及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都是降清的明朝将领。清朝进入北京后，他们充当镇压农民起义军和抗清力量的急先锋，立有战功，被清朝封王，作为镇守南方的藩篱。吴三桂被封平西王，镇守云南；尚可喜被封平南王，镇守广东；耿仲明及其子死后，其孙耿精忠袭爵，被封靖南王，镇守福建。

三藩各自拥有重兵，掌握着地方的军政大权，势力不断膨胀。其中吴三桂实力最强，他拥兵十万，以昆明为根据地，控制着云贵地区，云贵督抚也受其节制。他任命的官吏将领，清朝政府的吏、兵二部不得更易；他甚至可以向藩外选派官吏，时称“西选”。三藩又以“边疆未靖”为借口，向清政府勒索军需，仅顺治十七年（1660）据户部所奏，云南俸饷每年九百余万两，加上福建、广东两地，一年共需饷二千余万两，而当时全国一年的军饷也不过一千七百余万两，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而且他们享有独立的财权，财用不受户部稽核。三藩的存在和发展，越来越成为清朝政府稳定全国政权、巩固边疆的一大障碍。

康熙帝亲政后，将削藩列为当务之急，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治国的三件大事，书写在皇宫的柱子上，念念不忘。康熙十二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像



康熙帝龙袍



《蔡毓榮南征圖卷》(局部)

全长1102.6厘米,宽52.7厘米。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康熙帝调兵遣将,以蔡毓荣专督湖广,守荆州。蔡毓荣率水军驶入洞庭湖,与吴三桂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激战。洞庭战后,吴军败退镇远,蔡毓荣乘胜追击,直至云南平定。

年(1673),尚可喜请求告老还乡,以儿子尚之信承袭王爵。吴三桂、耿精忠也乘机上疏试探,请求撤藩。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撤藩问题意见不一,户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大臣主张撤藩;多数大臣害怕三藩势力强盛,担心撤藩会出大乱子,主张迁就姑息,直到吴三桂举兵叛乱,他们还力图与叛军和解。康熙帝没有动摇撤藩的决心,坚定而果断地下令撤藩。这时,吴三桂首先发动叛乱,他杀掉云南巡抚朱国治等清朝官员,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分兵两路,东掠贵州、湖南,北攻四川、陕西。接着,耿、尚二藩继起响应。

吴三桂叛乱之初,清军一度处于劣势。八旗兵入关三十年,在优裕的生活中磨损了

锐气,战斗力不强。叛军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贵州、云南等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暂时取得优势。吴三桂还派西藏的喇嘛致书康熙帝,要求“裂土罢兵”,以长江以南为界。康熙帝毫不动摇,斥退了喇嘛的斡旋,调度全局,正确部署:依战功破格提拔、大胆启用汉族将领,安置于前线重要岗位;以湖南为主要战场,以江西、浙江为东线,以陕西、甘肃、四川为西线,把叛军分割开;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同时对耿、尚二藩“剿抚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在这一策略之下,耿、尚先后归降。吴三桂负隅顽抗,于康熙十七年(1678)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未几病死,其孙吴世璠即位,改元“洪化”,奉吴三桂灵柩退回云南。康熙二十



年(1681)清军攻入云南,围困昆明,城破,吴世璠自杀,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终被平定。

第二节 收复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顺治十八年(1661),杰出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统帅大军扬帆过海,在台湾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了台湾。

郑成功(1624—1662),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清初,明太祖第九世孙、南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郑森和父亲郑芝龙在隆武政权中做官,得到唐王

的赏识,赐姓朱,改名成功,因被称为“国姓爷”。郑芝龙投降清朝后,郑成功“背父救国”,“不受诏,不剃头,其意如山”,在沿海组织义军,坚持抗清,先奉隆武年号,后奉广东的南明政权永历年号,永历帝桂王朱由榔封他为“延平郡王”。他曾在金门、厦门建立抗清基地,称厦门为思明州。顺治十八年,清政府发布“迁界令”,强迫从山东到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界外民房全被烧毁,渔舟商船禁止出海,以扼杀郑成功的抗清力量。于是,郑成功决定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建立新的基地。他收复台湾后,推行军垦、民垦,发展生产,设立学校,深得民众拥戴。

到郑成功之子郑经统治时,国内的形势

《纪功图卷》(局部)

清 黄璧绘
长714.2厘米,宽40.8厘米
画于康熙十六年(1677),内容表现江西总督董卫国平定江西三藩叛乱。笔墨之间再现了当时的衣冠制度、行军仪仗、兵器种类等史实。

荷兰殖民者向郑成功投降图

该图描绘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1661)包围普罗民遮城,荷兰殖民者投降的情景。



较清初已发生重大变化,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缓和下来,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统一为人心所向。康熙三年(1664)

一年中,郑芝龙的幼弟郑芝豹生母黄氏率子侄眷属等赴闽投降清朝,郑氏将领张灿、吴盛、黄廷等官兵及家属数万人向清朝投诚。康熙帝曾多次遣使赴台,希望通过和平方式统一台湾,但郑经却要求把台湾比作高丽、琉球一样,同中国保持藩属关系,企图成为一个半归附半独立的国家。康熙帝明确指出“郑经乃中国之人”,台湾“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死,郑氏集团发生争权夺力的内讧,康熙帝启用早年来降的原郑成功手下部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进行军事准备,并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由施琅率两万水师进取澎湖。澎湖为台湾门户,经过七天激战,清军攻占澎湖,郑经之子郑克塽震恐出降,清军胜利进驻台湾。此后,康熙帝谕令,清政府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台湾府,台湾、凤山、诸罗县),隶属福建省,使台湾的行政建制与内地划一。康熙六十一年清政府设置巡台御史,每年由督察院派遣满、汉御史各一人前往台湾巡查,住台湾府城,任期一年,有成绩者多留任一年,后又改为三年一任。巡台御史的具体职责为:监督台湾各级官员执行政务情

军用“国姓瓶”

高19.7厘米,口径16厘米,
底径5.3厘米
此瓶是郑成功军队使用过的
火药弹。





郑成功像

清 黄梓绘

《东宁陈氏番俗图册》

清人绘

这是一本描绘清前期台湾高山族社会生活的图录，共35开。东宁即台湾。



况并向中央参奏，建议地方机构的设置，清查审理历年积案，督促地方军队严防海务，并可过问经济、文教等事务。乾隆五十年停派巡台御史，巡台任务由福建督抚、福州将军及水师、陆路两提督负责办理。

第三节 雅克萨战争 和中俄《尼布楚条约》

满族世代生活在黑龙江流域，那里有茫茫的原野、连绵的高山、茂密的森林、纵横的河流、丰富的矿藏，有种类繁多的珍禽异兽，出产人参、貂皮、珍珠等。17世纪，满族建立清王朝，并入关夺取对全国的统治权。这时，沙皇俄国侵入黑龙江流域，染指中国东北边疆，破坏了边疆各族人民的和平生活。

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国家，原来和中国相距万里，并不接壤。16世纪末，沙皇俄国扩张势力越过乌拉尔山，占据西伯利亚，建立

了雅库次克等据点，成为中国的近邻。明崇祯九年(1636)，俄国从越境打猎的俄罗斯人那里才第一次听到有关黑龙江的消息。

一、雅克萨战争

崇祯十六年(1643)，雅库次克的督军戈洛文派出一支130多人的所谓“远征军”，携带枪支弹药，越过外兴安岭，向黑龙江窜犯，在乌姆坎河口找到我国达斡尔族居民的村庄。当地居民以好客的态度接待了这批不速之客，送给他们食物并介绍情况，告诉他们，这里的居民向中国皇帝交纳赋税，皇帝是个“伟大的人”，治下人口众多，每年两三次派兵到这里来巡逻。尽管戈洛文等人明知已经进入中国境内，但当探知西里姆底河口的达斡尔人村庄储存有粮食后，马上派一个分队前去抢劫。达斡尔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用简陋的武器和侵略者作战，打死了十名侵略军。此后，沙俄不断派兵入侵黑龙江流域，屠杀劫掠，甚至兽性大发地吃掉被杀害的达斡尔人。不甘屈服的黑龙江各族人民——达

斡尔人、鄂伦春人、赫哲人、朱舍里人（满族的一支）等对于沙俄的侵略暴行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清顺治七年（1650），沙俄派一个叫哈巴罗夫的人率领70名士兵入侵雅克萨以西地区（雅克萨为女真语，意为冲刷塌了的河湾子），那里是中国达斡尔族首领拉夫凯的辖区。当地居民得知消息，坚壁清野疏散。哈巴罗夫看到中国人民已有准备，便回到雅库次克，向督军法兰次别科夫求援。据齐赫文斯基主编的《17世纪俄中关系》记载，当时法兰次别科夫给了一道训令：“要博克多汗（指清朝皇帝）率他的氏族、部落和全体的人接受全俄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统治，永远做奴隶。……博克多汗本人和他的同族应当向沙皇进贡金银、宝石和刺绣织物。”哈巴罗夫在雅库次克督军的支持下组织军队，带着这道训令，于顺治八年再次窜到黑龙江，首先进攻达斡尔族首领阿尔巴西的村寨雅克萨，侵占了这个战略要地；然后继续在黑龙江中下游窜犯，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古伊古达儿村大屠杀，杀死村民男女老幼661人。到康熙四年（1665），沙俄政府进行新的扩张，一路南下，侵占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管辖的楚库柏兴（俄国改称色楞格斯克），东窜黑龙江流域，重占雅克萨，并建筑了雅克萨城堡，作为侵略据点。

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是对中国边境安全的严重威胁。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是清朝的发祥地，驱逐沙俄侵略势力是清朝政府的强烈愿望，也是东北边疆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清政府抗击沙俄侵略的战斗，仅从顺治九年（1652）到康熙帝亲政（1667）之前这十几年间，规模较大的就有七次之多。

康熙帝特别关注东北边防，他十三岁亲政之后，即留意于此（指沙俄侵占黑龙江流



《广舆胜览图·俄罗斯人》

清人绘

《费雅喀人画像》

清人绘

费雅喀为赫哲族的一支，居住于黑龙江口与库页岛北部。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开始招抚该部。



“神威无敌大将军”铜炮

清

康熙十五年(1675)造
重1000公斤,长248厘米
是清军在雅克萨自卫战中使
用过的炮。



瑷珲(即黑龙江城,黑龙江将军驻地)等地建城驻兵,贮存粮食,筹画屯田,并设黑龙江将军驻守,以萨布素为第一任将军;调集工匠,在吉林大规模修造船只;开辟由辽河、松花江到黑龙江的水陆运输线。康熙二十四年六月,都统彭春、副都统郎谈、黑龙江将

军萨布素等率大军开到雅克萨附近,先遣返沙俄俘虏三人,带去康熙帝致沙皇的信和彭春给盘踞雅克萨的俄军的信,要求俄军撤离中国。但沙俄侵略军不肯撤走,清军于是列阵包围雅克萨,并架设大炮猛烈轰击,俄军头目托尔布津在走投无路之下竖起降旗。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以俄军的战败、投降和撤出雅克萨告终。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后,清军没有留兵雅克萨,全部撤回瑷珲。不久,托尔布津卷土重来,再次占据雅克萨。为赶走侵略者,清军不得不于康熙二十五年再次出兵,这是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为了求得边界稳定、和平,清政府的军事行动虽然取得很大成功,但同时也努力争取与俄国谈判,曾委托从北京回国的荷兰使臣宾显巴志和葡萄牙传教士闵明我带信给俄国沙皇,建议休兵谈判。正当雅克萨旦夕可下的时候,俄国信使到了北京,向清政府请求进行谈判。清政府表现出极大的和平诚意,在自卫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同意停火谈判。此后,清政府和俄国开始准备谈判。

吉林叶赫驿站

为沟通与黑龙江前线的联络,清廷在吉林至瑷珲的途中设置十九个驿站。叶赫站是其中之一,位于今吉林梨树叶赫乡。



二、中俄《尼布楚条约》

康熙二十八年（1689）六月，清政府派出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的谈判使团，前往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的尼布楚城与俄国谈判。7月31日，中方使团到达尼布楚，受到先期到达这里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欢迎。俄方使团8月18日从莫斯科到来。8月22日，谈判正式开始，经过连续十六天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关于中俄边界东段划分的全面协议。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俄代表举行了签字仪式。因为会谈地在尼布楚，所以称为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明确规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界线以南属中国，以北属俄国；俄国拆毁在雅克萨所建城障，撤出雅克萨；严禁彼此越界入侵，双方不得收容逃亡者，以减少边境争执；中俄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可以过界来往，贸易互市。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是拉丁文本，另有满文本和俄文本。中俄《尼

布楚条约》的内容，曾用满文、汉文、蒙文、俄文和拉丁文五种文字刻成界碑，立于中俄边境线上。

第四节 平叛西北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在西北边疆生活的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家园。康熙至乾隆年间，清朝政府先后平定了西北边疆极少数分裂势力发动的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

准噶尔部是厄鲁特蒙古的一部。元朝灭亡后，蒙古以瀚海（戈壁沙漠）为中心形成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蒙古的首领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漠西厄鲁特蒙古的首领是元太师托欢之后。厄鲁特蒙古在元朝称斡亦拉惕，明朝称瓦剌，清朝也称卫拉特。大约16世纪后期，厄鲁特蒙古已分成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他

《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边界示意图





《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之一

清 郎世宁、王致诚等绘
《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描绘了清军先后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和回部大小和卓木三次叛乱主要经过。此图为《格登鄂拉斫营图》，描绘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达瓦齐叛乱时阿玉锡等勇士偷袭达瓦齐格登山（在今新疆昭苏县西特克斯河之北）大营的场面。

们生息于匝盆河流域和准噶尔盆地。其中，准噶尔部游牧在伊犁河流域的肥沃牧场上，与中原地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西藏及

中亚细亚的贸易往来较发达，力量逐渐强大。在康熙至乾隆年间，该部的上层贵族受到沙俄的煽动和支持，曾数次挑起事端，发



《西域图册·厄鲁特图》

清
每半开纵36.8厘米，横43.9厘米



动叛乱。

康熙二十六年(1687),俄国挑起事端,大举劫掠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军民与侵略者展开英勇战斗。就在这时,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却从背后向喀尔喀蒙古发动突然袭击。康熙二十七年夏,噶尔丹率三万骑兵,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被迫南逃。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举兵南犯,并公开与清军交战。初战取胜后,更加趾高气扬,二万余叛军逼进乌兰布通(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南境),距北京仅数百里,京师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命裕亲王福全(康熙帝之兄)为抚远大将军,率左翼清军出古北口;命恭亲王常宁(康熙帝之弟)为安北大将军,率右翼清军出喜峰口;康熙帝亲自出塞,指挥各路大军与噶尔丹叛军进行决战。常宁的右翼清军先遇噶尔丹,但是战斗失利。接着,福全的左翼清军与噶尔

丹叛军战于乌兰布通山下。噶尔丹把上万头骆驼捆住四蹄,卧于地上,驼背上搭箱垛,再盖上浸湿的毡子,形成一条防线,称为“驼城”,从“驼城”垛隙中放枪射箭。清军以大炮轰开缺口,突入“驼城”,叛军一败涂地,噶尔丹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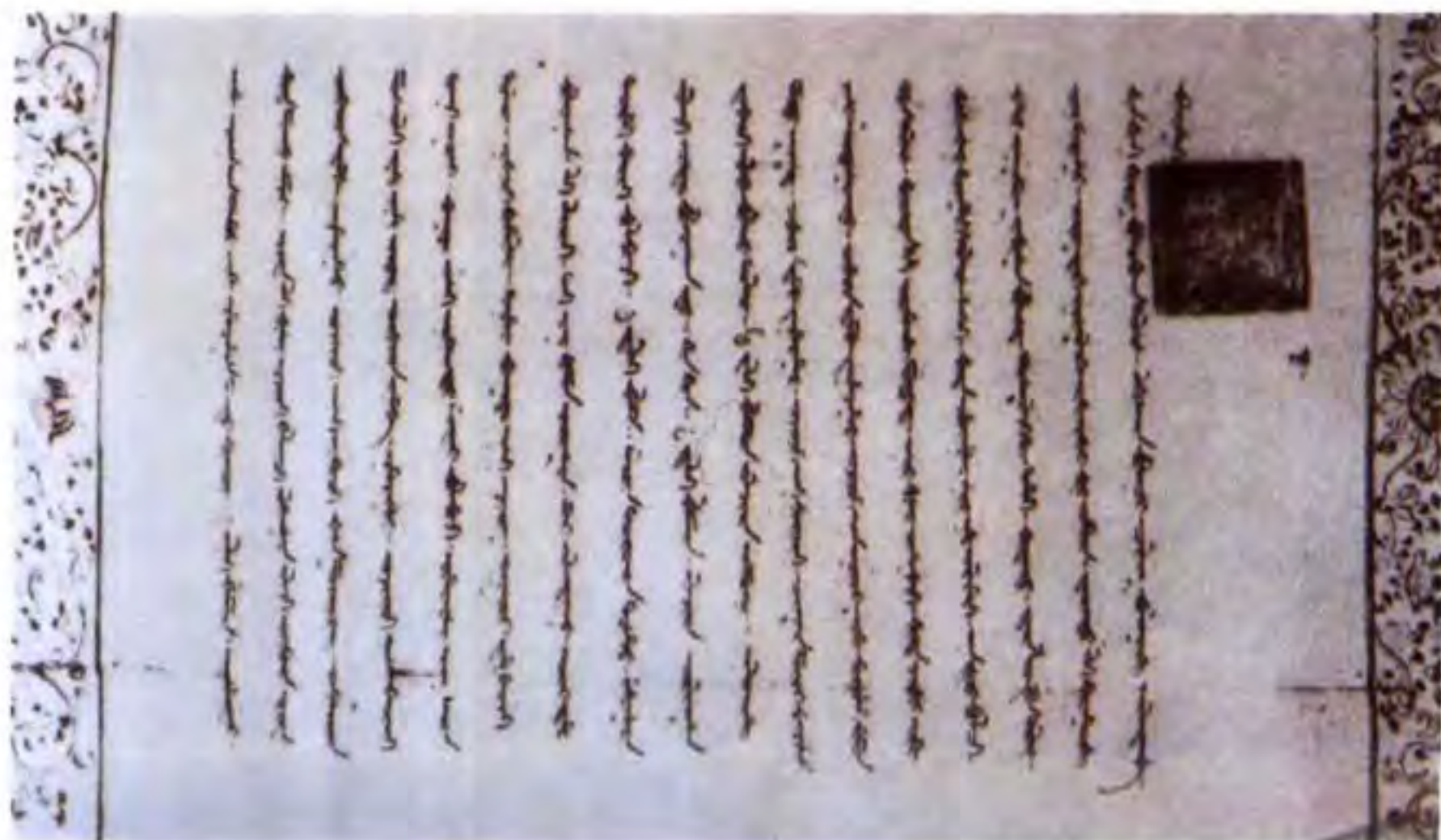
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帝屡次约噶尔丹会盟,促其服从中央的命令,希望和平解决问题,噶尔丹抗命不至,并变本加厉,遭

《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之二

此图为《郊劳将士图》,表现乾隆二十五年将军兆惠等人平定回部叛乱,振旅凯旋,乾隆帝命于京师良乡县城南新建郊劳台,并骑马亲至慰劳征战归来的将士。

噶尔丹致俄国沙皇信件

乌兰布通战败后,噶尔丹于1691年致信俄国沙皇,进一步勾结沙俄,发动侵略喀尔喀蒙古的战争。



《阿玉锡持矛荡寇图》

清 郎世宁绘

纵 27.1 厘米，横 97 厘米

阿玉锡原是“准噶尔部司牧臣”，他们归顺清朝，参加平叛，有力地说明国家统一是人心所向。



《抚远大将军西征图》卷(局部)

清 佚名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绢本

全长 692 厘米，宽 49 厘米
描绘康熙十四子允禔指挥清军入藏，平定策妄阿拉布坦叛乱的情景，图中特别展现了西藏人民欢迎平叛大军的场面。这一局部表现清军强渡拉萨河的情景。

兵侵略喀尔喀，又派密使策动漠南蒙古科尔沁等部叛离清朝。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又点起战火，率骑兵数万，沿克鲁伦河而下，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将大举内犯漠

南”。次年，清军分东、西、中三路出兵平叛，康熙帝亲率中路大军，对付噶尔丹主力。清军与叛军在昭漠多（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激战，经浴血奋战，歼灭了噶尔



丹叛军主力，噶尔丹率残部逃跑，成为一股日暮途穷的流匪，平叛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康熙帝认为噶尔丹对国家的统一危害极大，“一日不可姑留”，于康熙三十六年春，亲赴宁夏，进剿噶尔丹残部。噶尔丹最后想投奔沙俄，但这时沙俄对他已失去兴趣。在进退无路的情况下，噶尔丹服毒自尽。

到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以噶尔丹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和其子噶尔丹策零为首的准噶尔部又逐渐强大起来。康熙五十五年（1716），策妄阿拉布坦借西藏内部纷争之机，进兵西藏，攻占拉萨，杀死了主持西藏政务的实权人物拉藏汗，造成西藏局势混乱。康熙帝认为，“西藏屏藩青海、滇、蜀”，倘为准噶尔部所占据，“将边无宁日”。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安定西藏地方，康熙五十七年，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大



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像

军进藏平叛。乾隆年间，清政府又相继平定了准噶尔部贵族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的叛乱。



黑绒嵌银花撒袋

这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土尔扈特部首领敦多布达什进呈给乾隆帝的弓袋和箭囊。土尔扈特部本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约在明朝崇祯初年来到额济勒河（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居住。因受到沙俄政府的压迫，于乾隆三十六年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东返祖国，归附清朝。

清朝政府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二十四年又平定了天山南路维吾尔地区的大小和卓木的叛乱。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大小和卓木的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于乾隆二十七年设立伊犁将军，为新疆南北两路的最高军政长官。在伊犁将军之下，于乌鲁木齐设都统，于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治所在今新疆塔城市）。

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大小和卓木叛乱的胜利，对于维护清朝对西北边疆的统治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具有极大的意义。

乾隆粉彩多穆壶

清
高45厘米，口径13.6厘米
这是乾隆年间官窑烧造的瓷器。在清代，这类造型奇特的多穆壶，一般专为宫廷或蒙、藏上层人士喝奶所用。



第五节 对西藏的管辖

藏族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西藏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元朝在西藏地区开始全面行使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以来，历代中央政权都对其进行了有效管理。元朝忽必烈在中央政府内成立总制院，管理吐蕃军民事务；元朝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总制院名为宣政院。明朝对西藏地区的方针政策是在开国初年洪武、永乐两朝制定的。洪武朝三十多年间，基本完成了藏族地区行政机构的建制：洪武四年（1371），在西北藏区设置河州卫；洪武五年，设立了一系列的机构管理藏族事务，成立乌斯藏卫指挥使司、朵甘卫指挥使司，下设宣慰司、元帅府、招讨司、万户府、千户府、千户所等衙署；洪武七年，为把藏族地区统一管理起来，在河州设立西安行都指挥使司衙门，下辖河州、朵甘和乌斯藏三卫，后来，河州与乌斯藏又升为行都指挥使司。

清朝继元、明两朝后，对西藏地区的行政管理进一步加强。雍正时正式建立驻藏大臣制度，推行在驻藏大臣监督下由藏王主持藏政的行政管理体制。乾隆五十八年（1793），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它将此前在西藏实行的各项主要措施进一步制度化，又确立了新的制度，是清朝比较完备的治藏法典。其内容主要是：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地位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驻藏大臣有拣选西藏地方官吏之权力；达赖、班禅和各地呼图克图（活佛）的转世，必须在驻藏大臣监督下，采取金奔巴瓶抽签决定，即履行“金瓶掣签”的手续；建立西藏的地方常备军；在西藏对外交涉方面，俱由驻藏大臣主持；西藏地方政府的财



敕封第七辈班禅额尔德尼金册

清
纵22.5厘米，横134厘米



《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帝图》(壁画)

清
五世达赖喇嘛名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于顺治九年(1652)应顺治帝的邀请，率侍从三千人到达北京，受到隆重接待。这幅西藏布达拉宫五世达赖喇嘛享堂西平措大殿的壁画，生动再现了这一重大史实。



五世达赖金印

藏族龙柄铜执壶

清
高 33.8 厘米

政收支，统归驻藏大臣稽查总核等。这部法典对于西藏政局的稳定、西南边疆的巩固、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都起到了重



要作用。在清后期及近代史上，西藏政权始终置于中央政权治理之下。

第六节 多民族之邦

清代前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清代前期的疆域，东到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西抵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北至漠北和外兴安岭，南达南海的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等岛屿。版图之内，除京师（北京）所在的顺天府和满族的故乡盛京（沈阳）、吉林、黑龙江外，包括称为本部的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包括海南诸岛）、广西、福建（包括台湾、澎湖、钓鱼岛、赤尾屿等岛屿）、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云南、贵州十八个行省；还包括称为藩部的内蒙古、喀尔喀蒙古、唐努乌梁海、青海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这是秦汉以来中华各民族长期交往、融合的结果。



《职贡图·高山族》

清

全卷长1438厘米，宽33.8厘米

《职贡图》由乾隆帝钦定宫廷画师绘制，反映各民族的风俗民情。此图为关于南方各族的部分。



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居住着汉、满、蒙、回、藏、苗、维吾尔、壮、彝、黎、畲、高山、布依、朝鲜、哈萨克、侗、白、傣、佯瓦、哈尼、瑶、土家、傈僳、纳西、东乡、拉祜、水、景颇、羌、撒拉、锡伯、塔吉克、柯尔克孜、塔塔尔、保安、裕固、鄂伦春、土、达斡尔、鄂温克、怒、独龙、仡佬、毛难、仡佬、阿昌、普米、布朗、赫哲、珞巴、崩龙、门巴、京等五十多个民族。全国各族人口，据

不完全统计，乾隆五十五年（1790），已超过三亿，到道光十八年（1838），已超过四亿。

编于乾隆年间的《五体清文鉴》是用满、藏、蒙、维、汉五种文字对照的词典。乾隆帝还钦定宫廷画师，根据全国各地呈送中央的草图及注文，将本朝各民族形象绘制成《职贡图》，均为工笔重彩写实画，有满、汉文题记。

《畬族祖图》（局部）

清

全图长166厘米，宽50厘米
绘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是畬族祭拜祖先的神谱画像。内容为畬族女始祖与盘瓠通婚及繁衍后代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



第十章

盛世滋生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阶段，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圈地就是发生在其间局部地区的一个事件。清朝迁都北京，满族贵族、官吏、八旗兵丁及家属等大量涌入京师，为解决这数十万之巨的人口所需的土地和房屋，多尔衮制定“圈地令”，允许在京畿及附近地区圈占战乱后无主荒地或故明勋戚的土地。但在圈地的实施过程中，除了圈占无主荒地，也有将有主土地一并圈占殃及普通农民之事。史料记载，满族“诸大人之地广连阡陌，多至抛荒”，原来的耕地长满野草，被用来放牧牲口或者荒废，而失业的农民则背井离乡，流亡他处，“妇子流离，哭声满路”，由此，引发了农民的反抗斗争。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顺治四年（1647）后，清政府几次下令停止圈地，大规模圈地停止了，零散的圈地仍有发生；直到康熙八年

（1669），清政府再次明令停止圈地，延续几十年之久的圈地才基本停止。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并得到了显著发展，超过了前代的最高水平，号称“康乾盛世”。

第一节 农业

清前期，由于政府鼓励开垦荒地，加之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一些优质农产品品种移植和推广，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例如，在江南一带开始大面积地推行双季稻，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康熙时，已把南方的水稻移植于北京，后来逐渐改进为享有盛誉的“京西稻”；大约在明朝传入中国南方的番薯，这时在北方地区普遍推广。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特别刺激了农业中经济作

物的种植。

一、奖励土地开垦

清政府把农业生产能否恢复和发展视为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康熙政要》中说“兵饥则叛,民饥则盗”,强调农业生产是“人之根本”,提出“王政之本在乎农桑”。康熙帝还亲自种植稻谷,进行实验,并令臣下参观。

恢复农业生产的根本措施,是使因长期战乱而荒芜的土地重新得到耕种。清政府接二连三颁布关于开荒事宜的条例及规定。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批准河南地方开垦事宜,其中就有借给垦荒者牛、种,并将义社仓积谷借与垦荒之民,免其生息(不纳利息)这样的条款。康熙二十九年决定,由



云南布政使司发开荒执照

清

纵 52 厘米, 横 25 厘米



《耕织图·耕》(册页)

清 焦秉贞绘

焦秉贞, 山东济宁人。康熙中期画《耕织图》四十六幅, 甚受康熙帝赞赏, 命著名刻工朱圭镌版, 印刷版画, 广为流传。

于四川民少荒地多，因此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这一年，全国开垦荒地六万四千三百余亩。据《康熙朝实录》记载，康熙一朝，全国耕地面积增加近一百四十万顷。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不断发展，使人口也不断增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而待开垦土地逐渐缩小。于是，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这样说道：“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土地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生？”为此，他提出：向山间旷野尚未开垦之地，继续开荒；精耕细作，在单位面积上多产粮食；根据各地情况，开

展适宜的农副业生产。他责令各地方官员，动员农民在“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旷野，度量土宜种植树木”。他说：“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资用。”

乾隆帝也同样再三强调“五谷者，乃命之所关”，“垦田务农为政之本”，鼓励农民大力开辟山头地角可耕种土地，种植粮食，增加收获。他说：“向闻边省山多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或宜杂植，即使科粮纳赋，亦属甚微，而民夷随所得之多寡，皆是以资口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份《云南布政使司发开荒执照》。这张执照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发给云南丽江府鲁甸人沙立目的。执照中记载了当时云南的耕地情

《耕织图·簸扬》（册页）

清 焦秉贞绘



况：“滇省山多田少，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为使农业生产能进一步发展，宣布“山头地角、水滨河尾俱着听民耕种，概免升科”。据此执照可知，当时农民开垦了荒地，需报居住地的官府批准，由布政使司发给开荒执照才被承认。执照上写明了沙立目开垦土地的四至范围：“今开垦下则干地捌亩，坐落打麦冲。东至河止，南至□止，西至树林止，北至山脚止，永免升科。……沙立目收执。”执照上还附有一张1915年（民国4年）云南财政厅印发沙立目后人的验契，上注明：“不动产种类：干地捌亩；坐落：打麦冲；四至：东至河止，南至河止，西至树林止，北至山脚止。”两相对照，可知执照上“南至□止”中模糊不清的字，应为“河”字，所载土地数量、坐落及四至完全吻合。这就说明自乾隆三十三年云南布政使司发给沙立目开荒执照后，这片地就一直为沙家所有，也为清前期采取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政策、奖励垦荒务农措施的实施状况提供了一个例证。史料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全国征收的米豆麦共六百一十七万石；康熙六十年（1721），全国征收的米豆麦共六百九十万

石。到乾隆六年（1741），“各省通共存仓米谷”三千一百七十二万石；乾隆五十九年（1794），已达四千五百多万石。从清朝征收赋税的档案记载中可以了解到，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产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二、经济作物的种植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康乾时期棉花、甘蔗、烟草、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较大的发展，其中棉花种植在北方地区的推广又显得尤为突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乾隆御题《棉花图》册，详细记载了当时北方棉业的情况，为探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棉花图》是清朝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为向皇帝汇报棉事而制作的纪实性木刻版画图册，分上下两册，纸本，共21开。图册前有方观承的奏折，奏折后是乾隆皇帝“知道了，钦此”的批语，并以赋附之；图册的结尾，是方观承的跋。《棉花图》的主要内容，基本是按棉花种植和棉纱、棉布的生产顺序排列，分为十六项：布种、灌溉、耘畦、摘尖、采棉、拣晒、收贩、轧核、弹花、拘

《棉花图》（扇面）

清 余省绘

纸本

纵16.2厘米，横50.5厘米



《农具图·金犁 金鞭》(册页)

清

《农具图》描绘了当时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工具四十八件。



节、纺线、挽经、布浆、上机、织布、练染。不但有图，而且每图都附有题记和乾隆帝的御制诗及方观承的诗，图文并茂，十分珍贵。当时的直隶包括今天的河北地区和河南、山东、辽宁的部分地区。

《棉花图》中所说的棉花，是一年生的草棉。草棉在中国种植和利用的历史十分久远，1959年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发掘出东汉墓，发现了保存完好的蓝白印花棉布、白布裤和手帕。同年，在新疆巴楚县的唐代遗址中，又发现了草棉种子。在史籍中，对棉花和棉布的称谓有多种，棉花常被称为“吉贝”、“木棉”，棉布则常被叫作“帛叠”、“白叠”等。但是，早期的棉花种植都在边地少数民族地区，内地富人穿丝绸、皮裘，老百姓只能穿麻布，棉花和棉布很罕见。元朝初年，黄道婆把棉纺织技术从少数民族地区带至江南松江附近的乌泥泾。据元末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国初时，有姬黄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作造杆弹纺织之具。”清初人褚华在《沪城备考》中也记载：“黄道婆

为乌泥泾人，少流落崖州海峽间，元元贞间，携踏车椎弓归，教人以杆弹纺织之法，而木棉之利始传。”随着江南人民对棉纺织技术的掌握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棉花比之丝、麻的优点就显露出来。棉花能加工纺织成布，棉布比丝绸经久耐穿，比麻布细密温暖；棉花绒（即去子棉花）还可作为御寒衣、被的保暖填充物，更适合北方人穿着使用。《棉花图·织布》的题记中说，棉花的核，可以压油燃灯，其渣可以做肥料，棉秸秆可以烧火，种植棉花能一举多得。而且，在自然经济形态下，种植棉花也符合人们追求自给自足传统的心理状态和实际需要。自给自足经济最具体的表现，莫过于衣食两种生产劳动的结合，这种结合组织最自然的形态就是家庭。种植棉花，可以实现一个家庭的男耕女织，从《棉花图》反映的情况看，也正是这样。方观承在奏折中就说，棉花“盖一物而兼耕织之务”。

据《棉花图》所载，到乾隆时期，棉花已经“遍植中土”，直隶所辖的“冀、赵、深、



《太平欢乐图·收购棉纱》
(册页)

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什八九”。的确，这时北方棉花种植的范围、数量及投入的人力都进一步扩大和增加。时人李拔在《种棉说》中记载了他看到的情况：“予尝北至幽燕，南抵楚粤，东游江淮，西报秦陇，足迹所经，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土。八口之家，种棉一畦，岁获百斤，无忧号寒。”可见，在北方，尤其是今华北一带，棉花种植的规模很大，不少州县甚至十分之八九的农民都种棉花，这是空前的。

北方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利于植棉。这一区域多冲积土层，气温适宜，雨量适中，既无东南的高热、淫雨，也无西北的干旱、酷寒，棉花产量较高。据《棉花图》可以知道，当时直隶的棉花产量已达到“富于东南”的水平。《轧核》题记载：“稔岁，亩收子花百二十斤，次亦八九十斤。”

棉花种植能较迅速地在北方推广、普及，特别是到乾隆时，棉花在北方如此广种博收，除了前面讲到的原因之外，还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当时特定的社会经

济原因。当时有较稳定的社会环境，棉纺织业得以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对原料的大量需求，从而必然刺激棉花的生产。其次，是生产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成熟。棉花的生产、加工技术要求较高，北方人民积累了前人的实践经验，很快就形成了一套适合于北方自然环境的技术，使北方棉花的生产得到了必要的技术保证。

“布种”，是植棉的第一步。棉种的质量，对出苗及棉苗生长有较大的影响，选好种子非常重要。另外，棉籽的表皮较厚，出苗较难，且易生虫害，所以布种前十分讲究种子处理。《棉花图·布种》中记载了选种和棉种的处理方法，即棉种“选取表黑核，冬月收而曝之，清明后淘取坚实者，沃以沸汤，俟其冷，和以柴灰种之”；还进一步指出，植棉“宜夹沙之土，秋后春中频犁，取细列作沟塍，种欲深，覆土欲实，虚浅则苗出易萎”；而且，就北方地势高、少河渠塘池的特点，提出“北地植棉多在高原，鲜溪池自然之利，故人力之滋培尤亟耳”，“种棉必先凿井，一井

溉四十亩。种越旬日，萌及毕达，农民仰占阴晴，俯瞰爆湿，引水分流，自近彻远”。棉苗出齐后，如果植棉过密，会使棉花主干节间变长，果枝减少，少结棉桃，所以要间苗。明朝人徐光启在著名的《农政全书》中说这是一项“功须极细密”的活儿，需要反复进行多遍。第一遍宜密留棉苗，以备缺损，再锄仍宜稍密，三锄定苗。《棉花图·耘畦》说：“古法一步留两苗，虽不可尽拘，大要欲使根科疏朗耳”，“一月三耘，七耘而花繁茸细，犹之谷五耘而糠粃悉除也”，但“苗有壮硕异于常者，为雄本，不结实，然不可尽去，备其种，斯有助于结实者”。“摘尖”，就是在棉苗长到一二尺高时，摘去中茎的尖，又叫“打心”，俗谓“打风叉”。元代《农桑辑要》一书中，已有关于棉花摘尖、整枝的记载，说棉株长到二尺高时，即应打去冲天心，旁枝长到半尺，也应去心，这样才能使棉株节不空地开花、结实。《棉花图·摘尖》说：棉苗“高一二尺”时“视中茎之翘出者，摘去其尖”，“旁枝尺半以上，亦去尖，勿令交揉”，

“则花繁，而实厚实多者，一本三十许，甚少者十五六”。

农作物种植讲究天时，种棉花因时制宜也是至关重要的。从《棉花图》看，北方人民在植棉过程中，非常注意农时。例如，布种要“雨足清明”，种早了和种晚了都要影响结桃质量。这与徐光启所说种棉“清明前五日为上时，后五日为中时，谷雨为下时，决不宜过谷雨”是相吻合的。《耘畦》说，锄草、间苗“时维夏至，千锄毕兴”。《摘尖》说，“宜晴忌雨，趋事多在三伏时”。“自八月后”，棉桃成熟，“妇于日有采摘”，“霜后叶干，采棉所不及者，黏枝堕隄，是为腰棉”，“至十月朔，则任人拾取无禁”。

从《棉花图》看，乾隆时北方人民已具有较高水平的植棉技术，对棉花的习性及生长规律有清楚的了解。

北方的棉花加工、纺织手工业，到乾隆时也发展到工具齐备、技术全面的程度。例如“轧核”，即去除棉子，是棉花加工特有的工序，传统的丝麻加工都无此项工作。《棉花

《钦定授衣广训·耘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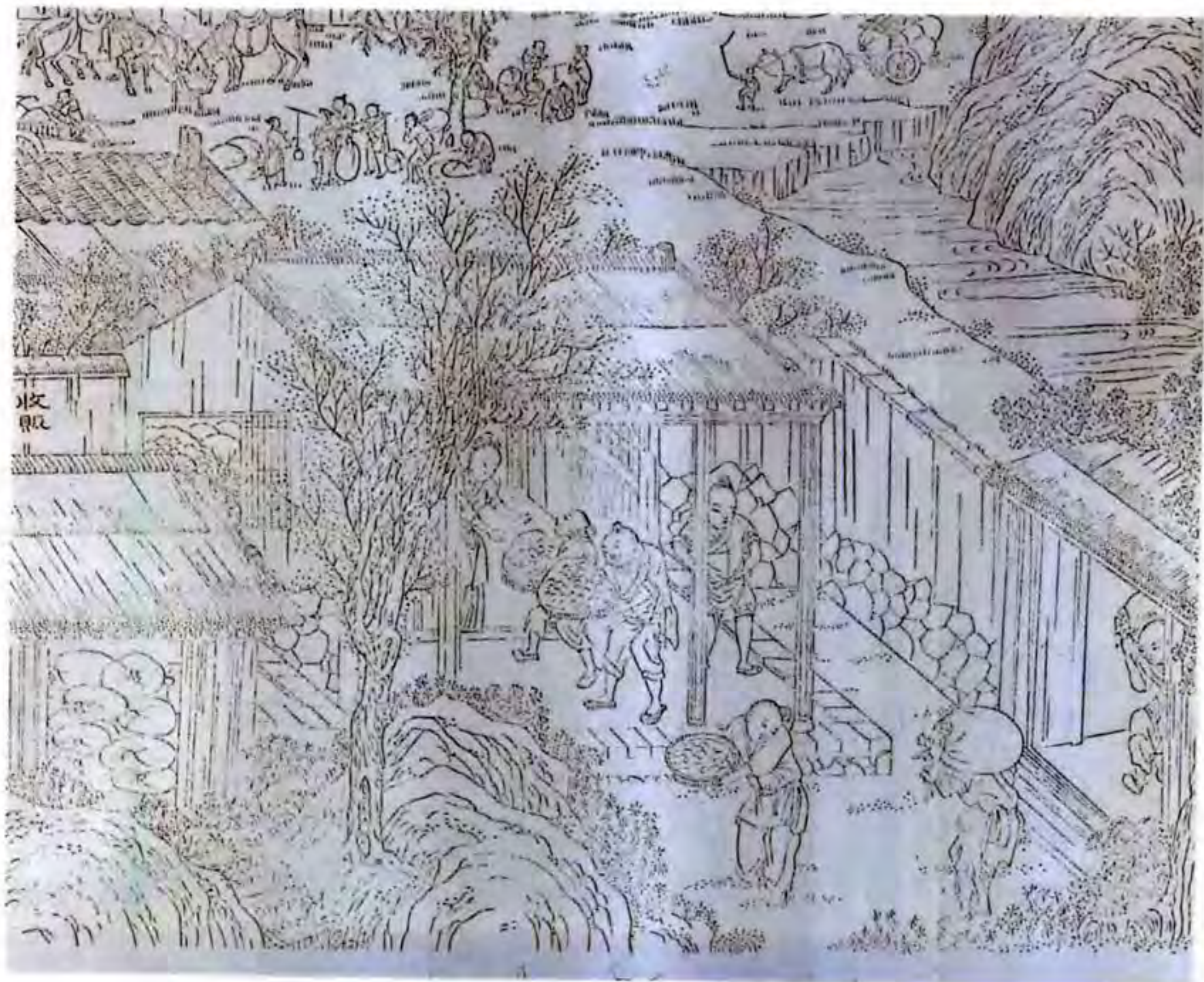
清 董诰等奉敕作
嘉庆十三年（1808）武英殿刻本
此册内容与方观承所绘《棉花图》略同，并收入康熙帝《木棉赋》及乾隆帝和嘉庆帝七言诗各十六首。



图·轧核》反映,当时北方使用的是轧车。“轧车之制为铁木二轴上下叠置之,中留少罅,上以穀引铁,下以钩持木,左右旋转,矮棉于罅中,则核左落而棉右出”。从图看,轧车构造简单,其巧妙之处在于“叠轴拳钩互转旋”,手摇铁轴,而拳钩又将木轴带动,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弹花”,就是把晒干的新花弹松,也是棉花加工才有的工序。弹花的工具叫“弓”。《棉花图·弹花》中的弓是“曲木为弓”,“张四尺许,上弯环而下短劲,蜡丝为弦,椎弓以合棉,声铮铮”。这种木制大弓,使用时要用弓椎打击弓弦,能够产生较大的弹力,“移时,结者开,实者扬,丰茸紫熟,着手生温”。棉纺织机械因为有传统的丝织机械的基础,也已非常成熟。

棉花加工、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促进棉花种植,棉花种植作为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的生产,明显具有了商品生产的性质。社会分工的细致和商品流通的活跃,正是《棉

花图》产生时代的显著社会特点。随着社会分工更加细致多样,许多不种植棉花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离不开棉花及棉布,所以棉花生产有着空前广阔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棉花种植实际上变得不再是单纯地为了自给自足,而是供应市场的需要,即为出卖而生产也成为棉农的主要目的。商品生产的发展,又刺激了棉花的种植。棉花种植的推广和产量的增长,造成棉花市场大为活跃。棉农靠棉花为生,每当棉花收获,就要把棉花拿去出卖,而棉花商人就乘机而入,从中渔利。《棉花图·收贩》就专门对当时的棉花交易作了描述。《收贩》图场面热闹,棉农们车拉手推,纷纷把自家种的棉花送到棉花交易处,棉商架秤收购。仓库中,已收购来的棉花成包叠放,高如小山。仓库前的院子里,有人扛着棉包鱼贯而入,还有人手端扁平编筐,其上码放棉朵。编筐上的棉朵,应是收购棉花时检验棉花质量的抽样。《收贩》题记



《棉花图·收贩》

清 方观承绘

《耕织图·采桑》(册页)

清 焦秉贞绘

植桑养蚕是一项为历朝所关注的重要经济活动，清朝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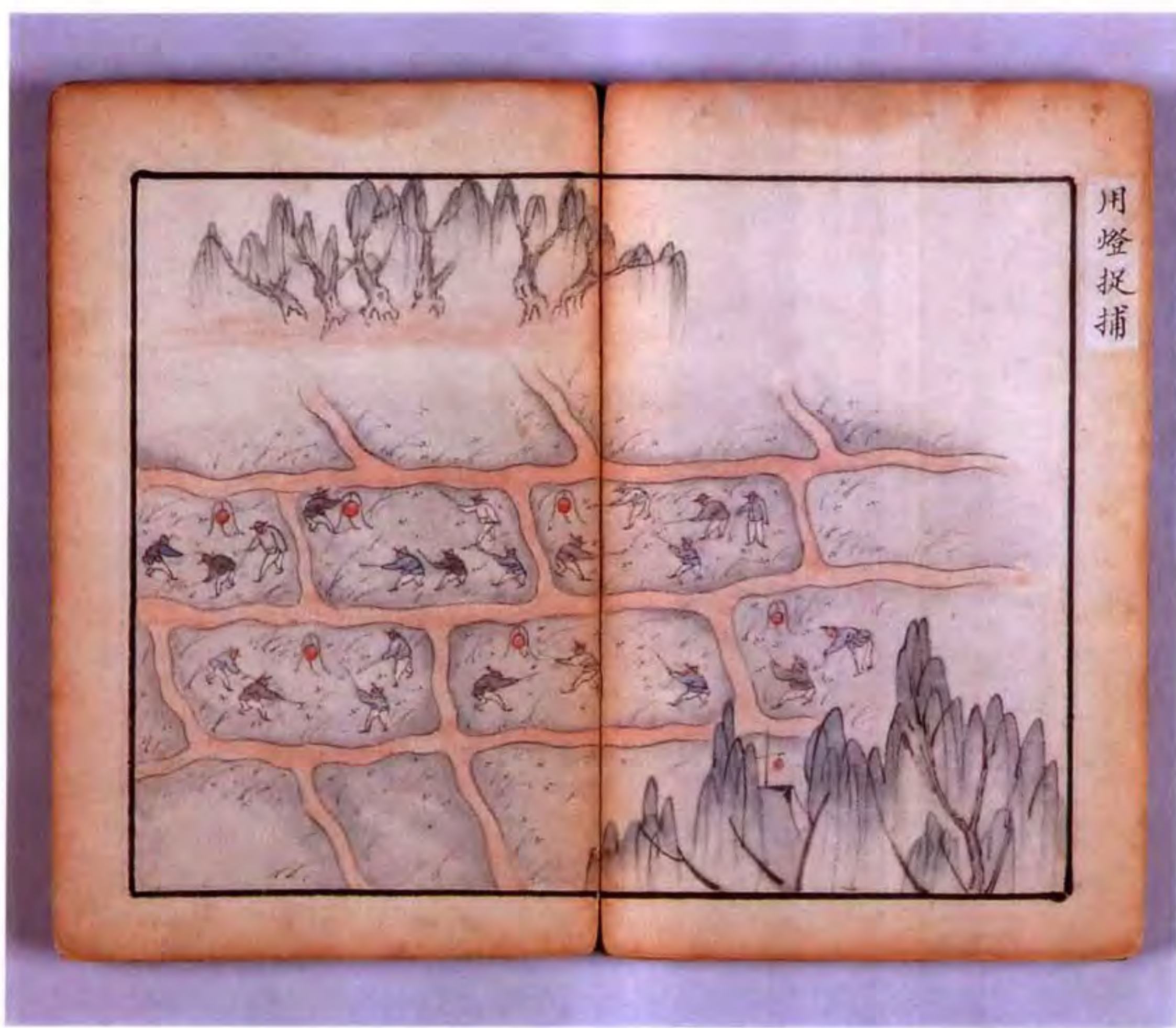


载：“每当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掌车以赴之，村落趁虚之人莫不负笈纷如。棉有定价，不视丰歉为增减，惟于斤衡论轻重。凡物十六两为一斤，棉则以二十两为一斤，丰收加重至二十四两，仍二十两之直（值）也。转鬻之小贩，则斤循十六两而取赢焉。”就是说，在秋季棉花上市的时节，棉商和棉花居积者，从四面八方赶来，从棉农手里收购当年新花。虽然棉花的单价一般不变，但是，一斤棉花包含的数量却看年景如何而定，一般年景以二十两为一斤，丰收年景加至二十四两为一斤，收购时不管棉花是否丰收，只看斤两，实际上棉花越是丰收，收购价就越低。当棉商转卖棉花时，一斤棉花的数量又按社会

上通行的十六两计算，实际抬高了棉花的出售价格，实现了低价收购、高价售出的不等价交换。从棉花生产的个案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种植得到发展的深层原因。

三、防治虫害

蝗虫可以大面积地吃毁庄稼，是农业生产的一大灾害。据统计，蝗灾在清朝的顺治年间发生过8次，康熙年间发生过32次，雍正年间发生过3次，乾隆年间发生过27次。人们不断地了解蝗虫的习性，制定捕蝗的方法。《捕蝗图册》是乾隆年间李源在江苏淮阴太守任上，对当地人民扑灭蝗虫经验的总结，也是现存最早的、有实际意义且图文并



《捕蝗图·用灯捉捕》(册页)

清 李源绘

茂的捕蝗图。图册纸本设色，共22开，10开图，10开题记，2开题跋，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图册记载的灭蝗方法计有十项内容：翻耕盖蝗，扑捕飞蝗，用灯捉捕，收买蝗虫，放鸭吞蝗，挖沟驱入，芦帘围倚，空地围打，搜挖蛹子，五更捕蝗。扑捕飞蝗，就是用细竹、手网等工具扑打捕捉飞蝗；芦帘围倚，就是顺风摆放缸盆，密排以芦帘围倚缸盆旁，将蝗虫缓缓赶入芦帘方向，使其缘芦帘堕入缸中，即可取而灭之；五更捕蝗，就是在五更时分，当蝗虫沾濡露水翅软力怯时，将其捕获。李源的《捕蝗图册》不仅总结了捕蝗的经验，也包括了治蝗的方法。“翻耕盖蝗”题记说：“蝗蛹扑灭之后，荒地亟须翻耕，盖蝗虫遗子多在扳荒地内，不行翻耕，来年势必复出。”“放鸭吞蝗”题记说：“蛹子初出土时如蚁、如蚋，聚于一处，最易捕获。……至于散入秫田豆地不能遽扑者，则多觅鸭子纵

入地内吞食……”既不损坏庄稼，又能大量消灭蝗蛹。“搜挖蛹子”题记说：“善防患者，恒于未然，故治蝗必以蛹子为先，凡土中有蛹子之处，地面必有小孔可寻”，应于每年交春后，“劝谕农民，广为搜掘”，送官府“查



《河工器具图说》书影

清 麟庆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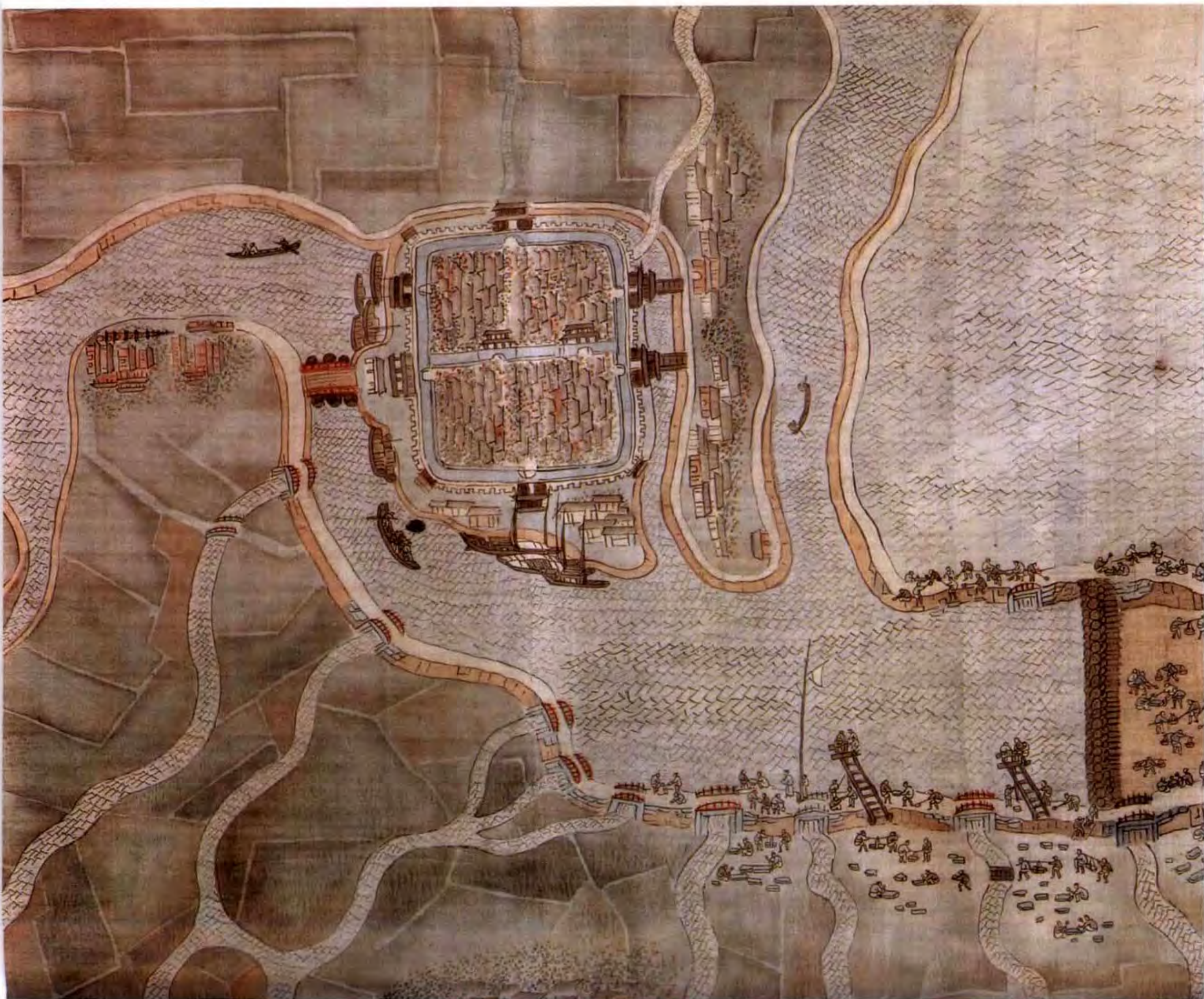
该书分上下两册，专讲河防水利工程中所用器具，按各类工程需用器具分为“宣防”、“修浚”、“抢护”、“储备”四卷。每一种器具都有图和文字说明。

点焚烧”。应该说，这本图册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农业防治蝗虫的种种情形，在中国古代农业防治虫害方面也具有经验总结的价值。

第二节 治河

黄河水患是中国历史上的痼疾。康熙初年，由于黄河多年失修，下游堵塞，黄淮合流，不能入海，黄河南北，一片汪洋。特别

是黄、淮、运交织于苏北一隅，黄淮泛滥，倒灌入运，又使南北的交通运输断绝。清朝建都北京后，每年要依靠河运从东南地区漕运四百万石粮食到京，如果运河梗阻，漕粮就不能按时运到，京师将会陷入困顿状态。为了“济运通漕”，确保社会秩序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清政府十分重视治理黄河，康熙帝多次派大臣前往沿河两岸视察情况，自己也先后六次南巡视河。康熙十六年（1677），清朝在平定“三藩”战争中已赢得优势，康熙



帝任命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全面负责治河事宜。

靳辅识拔和重用书生陈潢，以为助手共同治河。他们前往淮阳地区察看河道形势，实地调查后，靳辅写成《河道敞坏已极疏》和《经理河工八书》上奏。他指出，运道的阻塞是由于河道的变迁，河道的变迁是由于向来治河之人多数只在漕船经过的地方尽力修治，而对其他地段不予重视。只有将黄、淮、运进行综合治理，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河道弊

病。靳辅、陈潢的治河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康熙十六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77—1683），主要是疏浚黄、淮下流，堵塞各处决口，使黄、淮各归故道。基于治水必始自下流，下流疏通则上流就不会饱涨的道理，他们决定首先治理海口，即黄、淮合流入海之处，采取疏通和筑堤结合的方法，引导河水流入大海。这一阶段完工后，黄、淮两河出现安流的局面，黄河自清江浦以下至海口的入海道路畅通无阻，自徐州以下的黄

《治淮图》卷

清 赵澄绘

全长543.5厘米，宽46.3厘米



河两岸大堤，像两条长龙，紧拥河水向东流去。第二阶段从康熙二十二年到康熙二十七年（1683—1688），将工程稍往黄河中游转移，修筑河南堤防，在黄、运两岸添建减水闸坝多处，以排泄洪水和保护堤防，开挖中河，使运河和黄河基本分离。他们治河十余年，“水归故道，漕运无阻”，大见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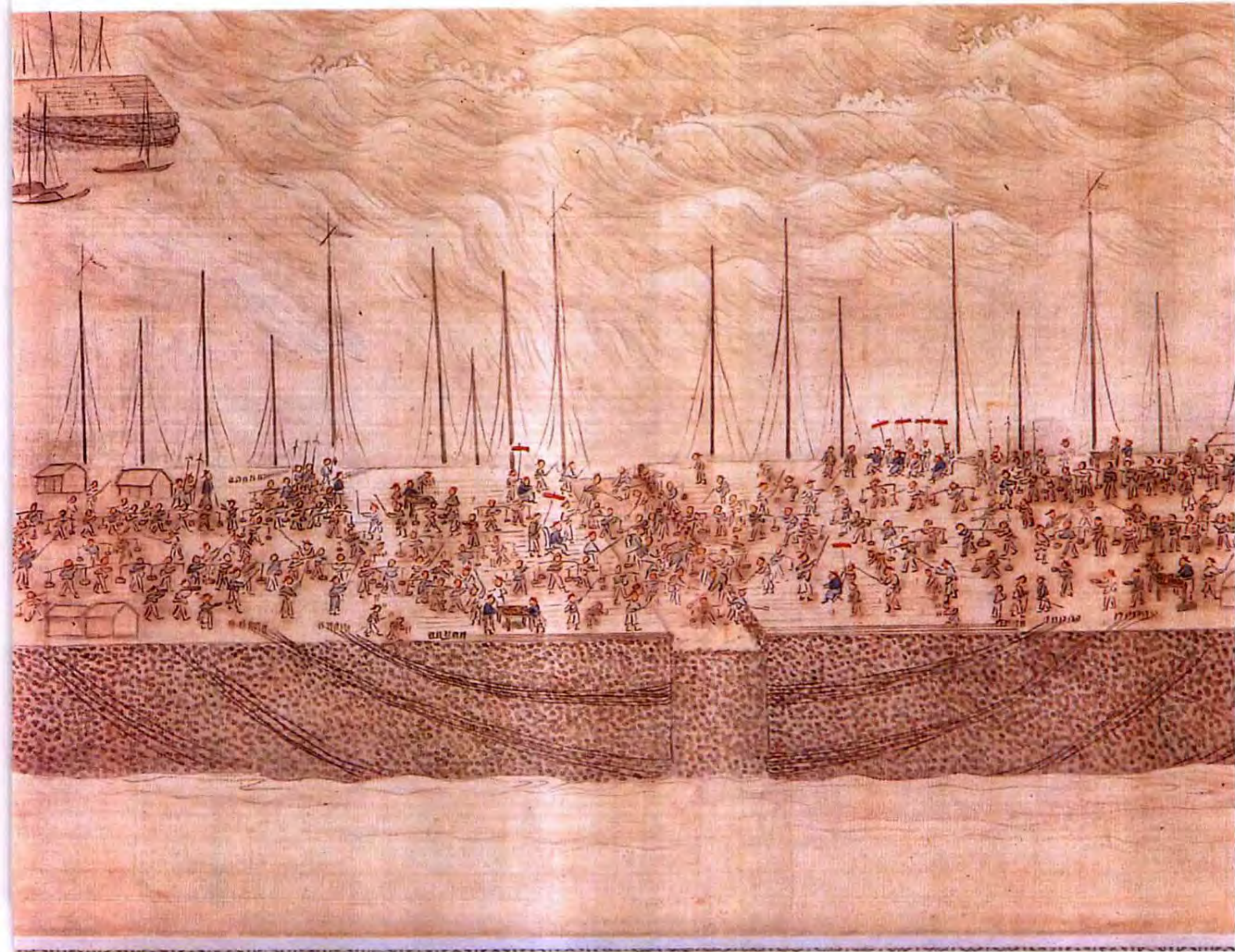
《黄河筑堤图》（册页）

清
纵30.5厘米，横22厘米
在清代前期，治河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本图描绘了清初整治黄河的具体情况。

康熙朝对永定河的治理也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工程。永定河原名浑河，从山西黄土高原东流，夹带的大量泥沙经常淤塞河道，酿成水灾。康熙三十七年至四十年间（1698—

1701），清朝调动大批民工开掘河道，修筑堤防，使河水安流，不再泛滥，康熙帝赐名“永定河”。由于这条河的湍急、淤积等情况与黄河相似，康熙帝主持运用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总结的“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经验在治理永定河的过程中进行试验，试验取得一定成效后，康熙帝认为，“今永定河修筑之法甚善，河身直，河底深，所以淤沙尽皆冲刷。今治黄河亦用此法为益”。

雍正朝以后，治河工程继续进行。乾隆帝对治理黄河也非常重视，他南巡的主要内



容中就有视察黄河一项。乾隆三十年(1765),他第四次南巡时,来到清口徐家渡黄河一段视察,宫廷画家徐扬在《乾隆帝南巡图》中特别描绘了当时的情景。除了治理黄河,兴修海塘也是乾隆朝重要的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临海处。乾隆帝六次南巡中四次巡视海塘工程。乾隆晚期,先后在浙江修建了二百四十八里的鱼鳞石塘。修筑坚固耐久的石塘代替原来的土塘,

有力地保护了吴越平原富饶的鱼米之乡。

第三节 手工业

匠籍制度的废除,是清代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有利条件。唐宋以来,历代均设立工匠的专门户籍。凡属匠籍的工匠,世代相传,不许脱籍。清朝顺治二年(1645),实行各地应



《乾隆帝南巡图卷·视察黄河》

清 徐扬绘
绢本

上图描绘在黄河左岸处,彩亭及牌楼已搭好,官员们正在迎候乘舟而来的乾隆帝。下图描绘扈从乾隆帝南巡的官船行驶在黄河上。





粉彩镂空转心瓶

清

乾隆年间制

高30厘米，口径8厘米

其形制的独特之处在于瓶中套瓶，内瓶可以灵活转动，从外瓶的窗式镂空处，可看到内瓶上的彩绘图案。内瓶粉彩绘婴戏图、洋人进宝图，外瓶纹饰繁复，从上到下分别绘如意云纹、番莲纹等纹饰。



粉彩描金海晏河清瓷尊

清 乾隆年间制

高31.3厘米，口径25.1厘米
通体施霁青釉，独海燕形双耳为白色。腹部以上至口沿分布金彩叶纹和缠枝莲纹，腹部以下至底沿饰粉彩突雕莲瓣、莲实和连珠纹各一道。海晏河清一词，形容天下太平。该尊霁青色象征河清，双耳的海燕则与“海晏”谐音，故名。相传原放置在圆明园海晏堂。

征匠役“按工给值”，并陆续废除匠籍身份。这样就解除了匠籍身份对手工业者的束缚，有助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清代的手工业到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有显著的发展，具体表现为生产工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生产规模扩大、分工细密，产品种类多、质量高。制瓷业、丝织业、棉纺织业、冶铁业等的生产水平都超过前代。在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上也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情形。

一、制瓷业

清代制瓷业的生产技术成熟，总体水平发展到历史高峰，其主要成就表现在瓷器装饰改进和提高，创烧出粉彩、珐琅彩和各色彩瓷新品种。

粉彩瓷器是清朝彩瓷新创品种，始创于康熙年间，盛极于雍正时期。粉彩和五彩的制作工艺有相同之处，都是在已烧制成型的



珐琅彩三友橄榄瓶

清 雍正年间制

高16.9厘米，口径3.9厘米，
足径4.8厘米

天藍釉菊瓣尊

清 康熙年間制
高17.3 厘米



松石綠梅瓶

清 雍正年間制
高30.1 厘米



素瓷上施彩，然后再入低温炉烘烧。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是：第一，粉彩一般需先在图案的轮廓内用“玻璃白”打底，后施彩，五彩则不使用玻璃白。玻璃白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铝、氧化硅、氧化砷，其中氧化砷具有乳浊作用，产生不透明的效果。第二，在绘画方法上，粉彩多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没骨法，浓淡相宜，富于立体感；五彩则用单线平涂法。第三，颜料上，粉彩部分使用进口料。第四，第二次烘烧的炉温，粉彩在700℃以上，五彩在800℃以上。粉彩的烧成温度较低，所用彩色比五彩更多，成色淡雅柔丽，故有“软彩”之称。需要说明的是，粉彩中的矾红是在瓷面上直接平涂或洗染，不用玻璃白填底。

珐琅彩瓷器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创烧成功，雍正时更趋精细，是名贵的宫廷御用瓷品，产量不大。因其使用铜胎画珐琅的彩料画在瓷胎上，也被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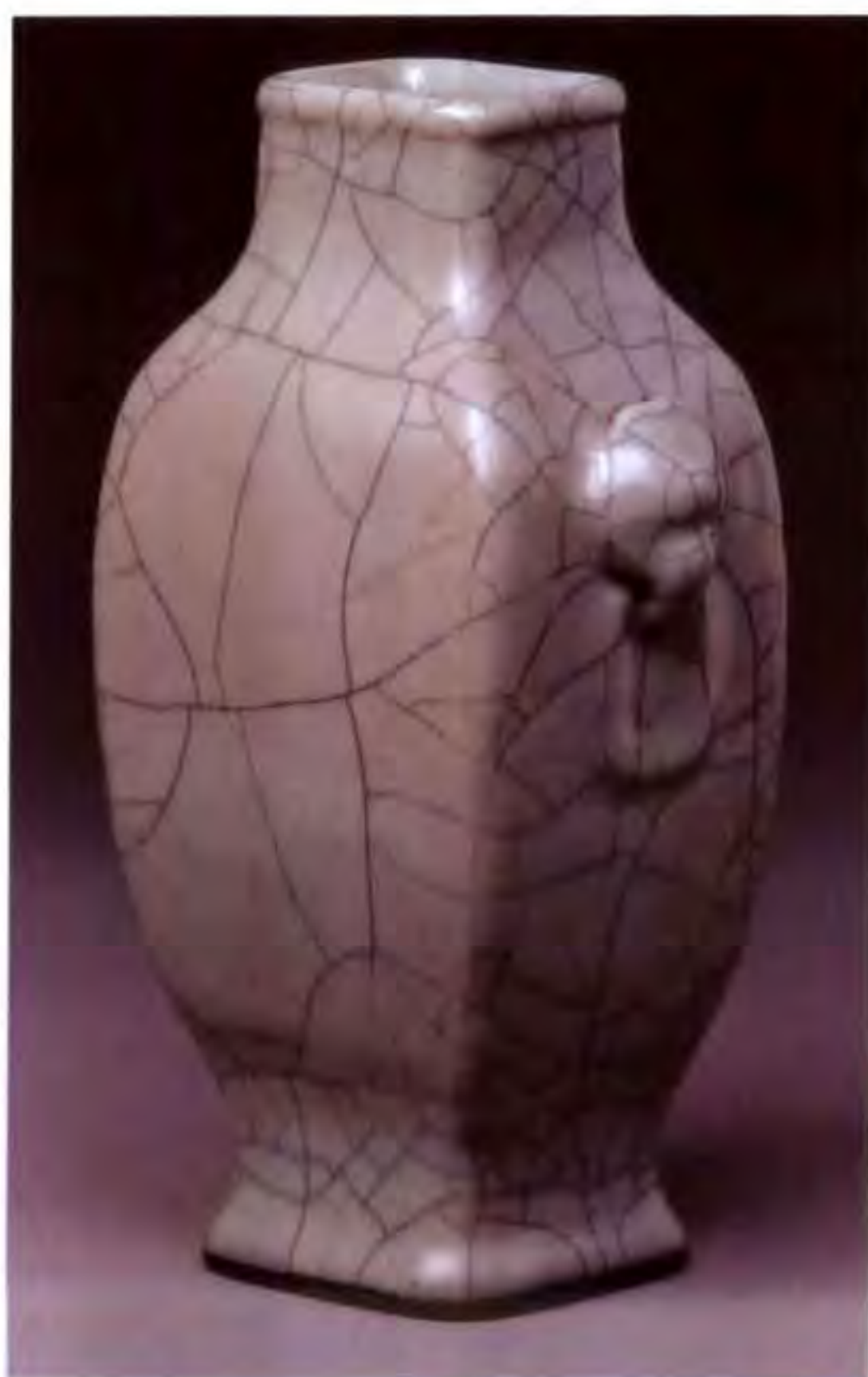


斗彩海水团花天球瓶

清 雍正年间制
高52.2 厘米

为“瓷胎画珐琅”。珐琅彩瓷器的彩料较厚，有堆料凸起的感觉，增加了色彩的立体感。据雍正时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的记事档记载，当时的珐琅彩瓷是先在景德镇烧成薄胎白瓷，然后送到北京，由造办处如意馆画师精心彩绘，再由珐琅作在彩炉中低温烧成。制造过程中，炉温必须掌握得当，温度过高易炸釉剥彩，温度过低色泽黯淡无光。由于其彩绘和烧成工艺都不在景德镇进行，所以不属于景德镇窑制品。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制瓷业的高度发展，可以代表整个时代的制瓷业水平。当时朝廷在景德镇设立御厂，专门管理供宫廷使用的瓷器即官窑器的生产，并派员监督。但官窑数量不多，景德镇繁荣局面



仿宋官窑兽耳瓶

清 乾隆年间制
高22.3 厘米

的形成，主要是由民窑烧造瓷器造成的。乾隆时督理景德镇御厂的唐英在《陶冶图说》中记载：“景德镇袤延仅十余里，……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万。”官窑器也大多在民窑中占用最好的窑位烧制，叫搭烧。康熙十九年（1680）后，将这种“官搭民窑”的做法作为固定制度实行。清代除皇帝赏赐外，贵族所用的各种瓷器，都是来自民窑的优质产品，叫“官古器”。

景德镇的民窑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烧窑户，即自己有窑，但不制坯，专为别人烧制瓷器；第二类为搭坯窑户，即先在自己的作坊内制陶坯，然后在别人窑内烧成；第三类为烧窑窑户，即基本自造自烧，是制瓷业中较大的工厂主。窑户所用的工人全是雇佣而来，分工很细，如按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分工，有陶泥工、画坯工、烧窑工等。每个工序还有分工，画坯工中，学画者不学染，学染者不学画。

清前期色釉瓷器的成就主要反映在景德镇的官窑器上。当时能烧出的色釉名目繁

多，如红釉就有铁红、铜红、金红之分，蓝釉有天蓝、洒蓝、霁蓝之别，绿釉更有瓜皮绿、孔雀绿、秋葵绿之异，还有茄皮紫、乌金釉等。当时大量烧造的仿宋代汝窑、官窑、哥窑、钧窑釉色以及茶叶末、蟹壳青等都属于色釉的范围。

元明以来占彩瓷生产主流地位的青花瓷器，这时仍然是景德镇瓷器最大宗的产品。特别是康熙青花瓷器，有成熟的生产工艺，可造成不同层次的深浅色调，使纹饰的表现内容更加丰富，有“青花五彩”之誉。

二、纺织业

清前期纺织业与明朝相比有进一步发展，主要反映在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从业者数量增加，生产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产品种类多、质量好。如江苏乌江地方的丝织业，在清代以前就有，但为数不多，仅能满足进贡的需要。至乾隆时发展成“邑中盛有之”的局面，尤其城西南的居民“多业此”，且品种繁多，以所产地之村镇为名者就有溪绦、荡北、南滨之类。工艺精高者，更以织方纹和龙凤纹著称。至于苏州地区，更是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下万家。南京的丝织业也很发达，“业此者不下千数百家”，“金陵之业，以织为大宗，而织之业，以缎为大宗”。浙江杭州地区也几乎是家家从事丝织业，正是“机杼之声，比户相闻”。仅临平务（即临平镇）一地，就有轻绸机二三百张。浙江桐乡濮院镇更是“万家烟火，民多织作绸绢为主”。而且织工的技艺精湛，所织丝绸品种，绢有花绢、官绢、箩筐绢、素绢、帐绢、画绢等，绦有花绦、素绦、锦绦，罗有三梭罗、五梭罗、花罗等。

这时的棉纺织业同样发展迅速。在江苏地区，一般居民多以纺织为生，松江“俗务

镶花涤蓝漳缎女夹马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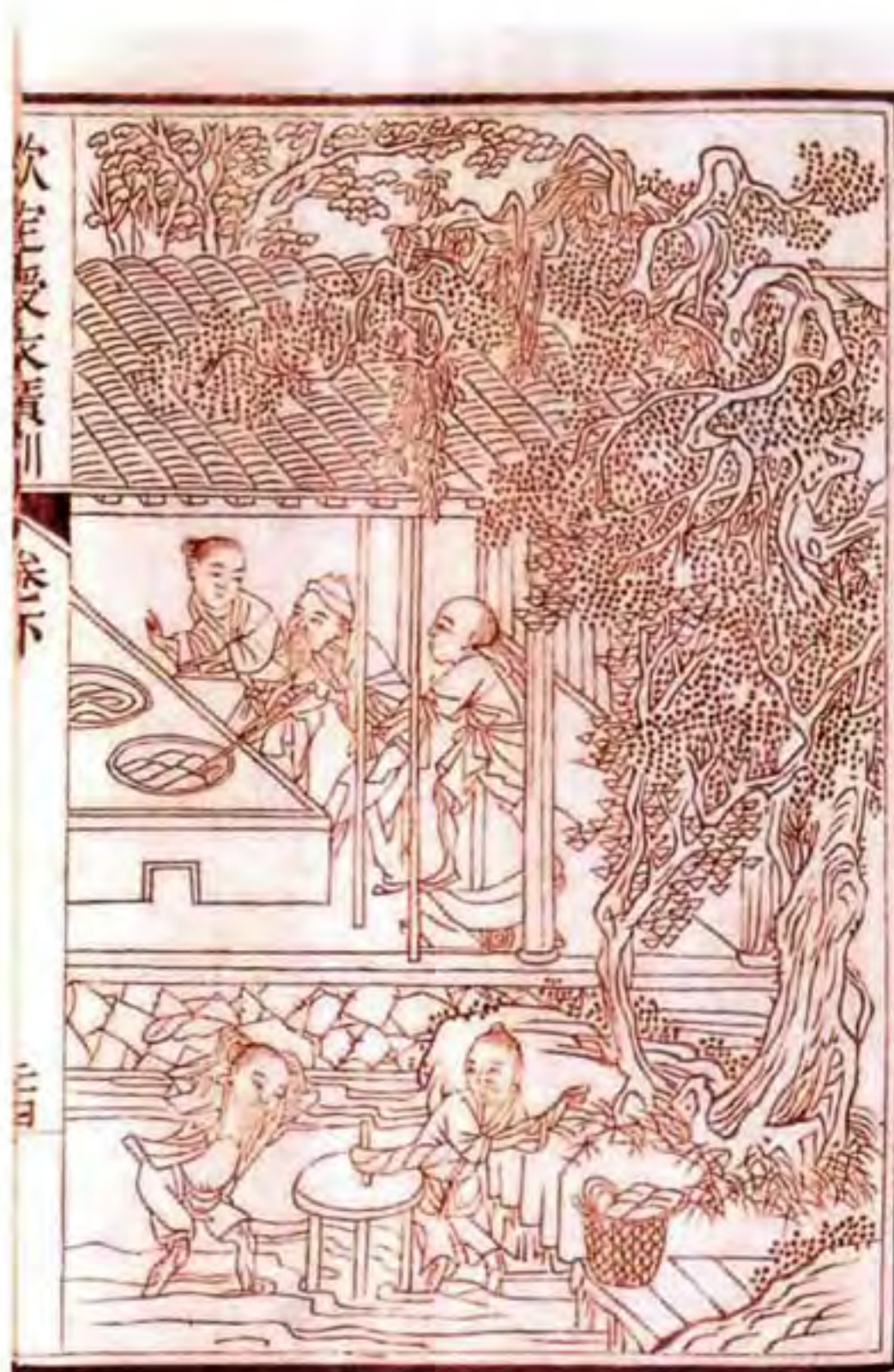
清

漳缎产于福建漳州





《钦定授衣广训·织布图》
(左)



《钦定授衣广训·练染图》
(右)

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皆为天下第一”。上海县更是“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是一般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当地的生产技术高，纺线“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即脚车），人劳而工敏”。浙江桐乡不仅丝织发展，而且棉纺织业更为兴盛，“俗朴民勤，以纺织为业”，所产棉布驰名各地，种类有龙潭布、桐乡布、眉公布、陡门布、建庄布、乌镇布、笕布等。棉纺织业在四川、广东、福建、江西等地也有发展。北方的直隶、山东等地棉纺织业很兴旺，据《棉花图》所载，北方的纺车，是“植木以驾轮，衡木以衔锭”，“纺者当，左握棉条，右转轮弦锭，随弦动自然抽绪”。这种纺车由一个妇女操作，左手捻纱，右手转轮，“单绪独引”，均纺单根纱。这与北方的气候条件有很大关系。“北方风日高燥，绵维断续不得成缕”，所以不宜纺多根纱。肃宁是北方棉纺织较发展的地区，当地人“穿地窖数尺，作屋其上，檐高于平地二尺许，穿棖以透阳光，人居其中，借湿气纺

之”。北方所使用的织布机，操作时“手足并用”，用脚移综，使两组经线上下错成交口，以手投梭，让带有纬线的梭从交口中穿过。

与棉纺织发展相适应，北方的棉布练染业也渐次兴起，这在《棉花图》中也得到反映。从《棉花图·练染》看，北方已经有专门的染房。练染，要经过漂煮、洗晒等多道

番莲纹印花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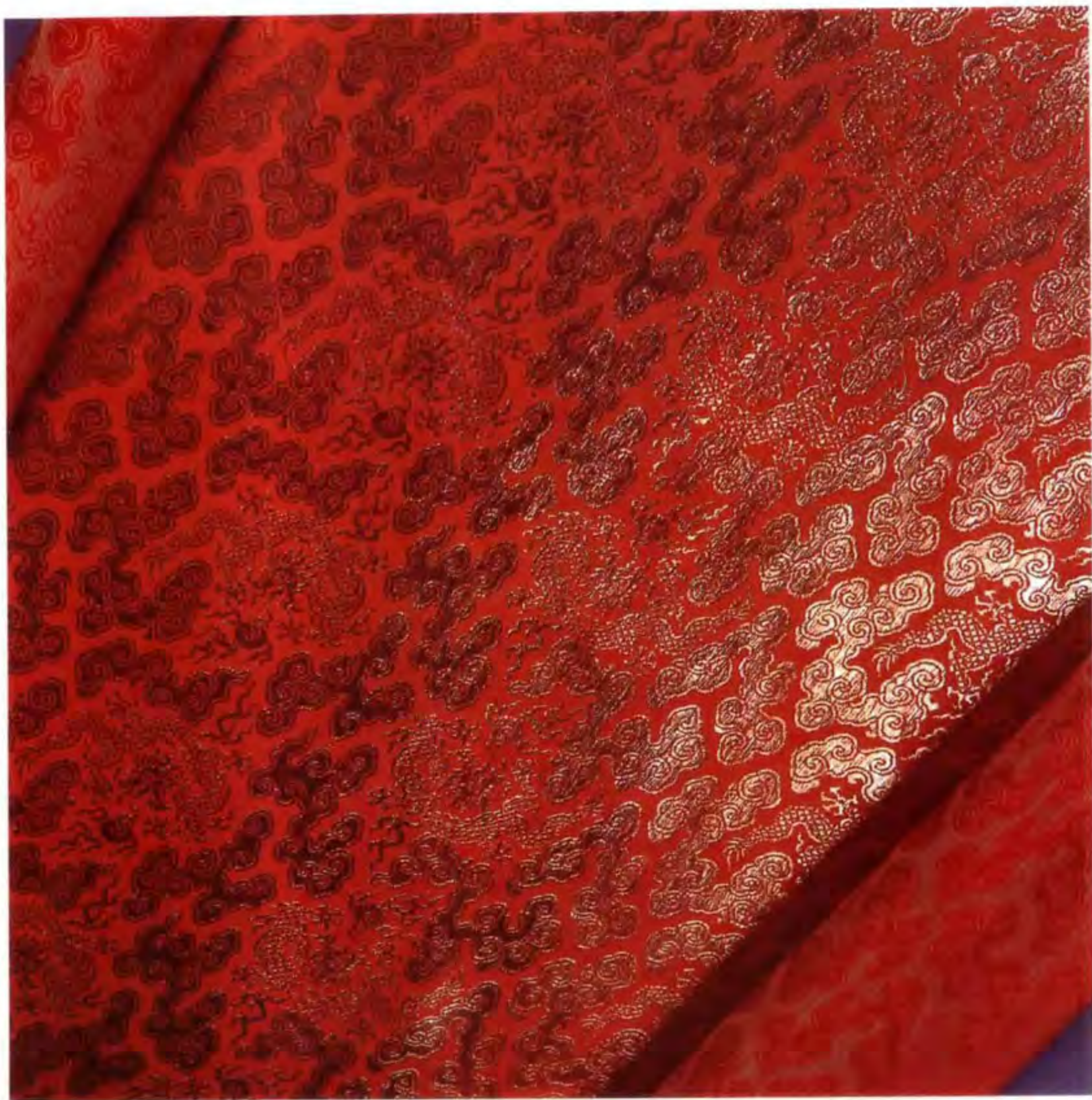
印花工艺是以油纸刻成花板，然后蒙在白布上，用石灰、豆粉和水调成防染粉浆刮印，待其干后，揭去花板，用染料染色，再干后，刮去粉浆，即成花布。



红地织金云龙缎

清

全长 686 厘米，宽 76 厘米
以红缎为地，金线织云纹和
龙纹。这种龙纹的缎料多由
江南的织造局为宫廷专织，
非民间所用。



连续工序，技术较为复杂，设备要求也较高。其中有踹布一项，“下置磨光石版为承，取五色布卷木轴上，上压大石如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踏两端，往来转运之，则布紧薄而有光”。踹石要性冷质滑，碾布时不易发热，一块好的踹石很贵重，可值银十几两。练染所需的各种设备，不是一般小农之家能一一置办得起的。“练染”图描绘的染房，前有铺面，后有漂煮、晾晒房，一旁有浆洗池，全部是男劳力在工作，显然超出了家庭内部生产的范围，而形成生产作坊。北方的染房，可以染出“元、黄、朱、绿”各色“比丝新”的棉布。

雍正十二年（1734）立于苏州玄妙观机房殿的永禁机匠叫歇碑，碑文记载了机匠为

要求增加工资而叫歇（罢工），机户勾结官府禁止机匠叫歇的情况。有织机的机户出钱雇佣机匠（织工）进行纺织劳作；垄断丝、棉等生产原料的供应商，以原料换成品，进而控制丝绸、棉布等成品的收购，切断机匠与原料市场和成品市场的联系，这样的事情已不新鲜。这些表明当时在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上都出现新的情形。

除了民间纺织业外，还有官办的织染局和织造局。织染局即京师织染局，织造局有江宁、苏州、杭州三局，专门承做御用礼服及四时衣服和皇子、公主朝服、衣服等。各局专设官员管理，局内工匠分工很细，如织染局原属工部，后改属内务府大臣管辖，工匠大致分为织匠、络丝匠、络经匠、挑花匠、

拣绣匠、染匠、画匠等。

三、其他手工业

清前期造纸业发展显著。康熙年间广西容县便有造纸厂篷百余间，造纸工人数以千计。陕西洋县是蔡伦封邑，有悠久的造纸历史，这里“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密，取以造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处处皆有纸场”，该县西乡一地就有纸厂二十余座。除造纸业外，广东、四川、台湾的制糖业都很著名，尤其台湾在历史上就是产糖区，康熙年间，台湾、凤山、诸罗三县，每年产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十八斤，往往“糖斤未出，客人先行定买，糖一出手，即便装载”。此外，四川的井盐业、云南的铜矿业、广东的冶铁业等都远近闻名，涌现出技艺超群的高手艺匠，如广东铁匠庞秉权，他家世代打铁，本人是制炮专家，技术“精利绝伦”，康熙初年曾参加铸造红衣大炮。

第四节 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城市以及一些市镇也日益发展繁荣起来。除京师外，江南最大的都市之一江宁（今江苏南京）非常繁华，《儒林外史》描写说，“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稠集，金粉楼台”，“大小楼台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

苏州在康熙时是江苏布政使司驻地，以丝绸生产而驰名，在顾禄《清嘉录》中被称为“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之地。乾隆时宫廷画家徐扬在《姑苏繁华图》卷中，



描绘了苏州自灵岩山至虎丘的景况，其中胥门、阊门内外和万年桥一带最繁华的地段，商肆鳞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永禁机匠叫歇碑记》

杭州以丝织业著称，据陆以湜《冷庐杂识录》记载，杭州的其他工商业也十分发达，“百货所聚”，汇聚了杭州的茶叶、藕粉、纺绸、纸扇、剪刀，湖州的毛笔、绉纱，嘉兴的铜炉，金华的火腿，台州的金橘、鲞鱼等

各地特产。

自隋唐以来扬州就以盐业闻名。扬州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西濒运河，东临大海，方圆数百里之内，河湖纵横，是中部各省食盐供应基地，也是南北漕运之咽喉。据《乾隆淮安府志》记载，扬州城“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供应绸缎的店铺集中在缎子街，酒楼茶肆集中在北门桥、虹

桥附近。

另外，以瓷器生产著称的江西景德镇，长江上下游的总汇之地湖北汉口镇，以冶铁业特别是铁锅、铁线（铁丝）生产著称的广东佛山镇等，都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市镇。

北京不仅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当时北方商业贸易的名城，最繁华的地区在宣武、正阳、崇文三门外。到乾隆时，正

《康熙帝南巡图·江宁商业》
(局部)

清

绢本

全长2559.5厘米，宽67.8厘米

此图取自《康熙帝南巡图》第十卷。



阳门外大栅栏一带已经成了商铺、摊贩的汇聚之地。北京的手工业主要是珐琅、玉、雕漆等工艺品的生产制作，而生活用品大多仰赖各地运来，因此商业比手工业发达，是一个消费城市。北方还有许多大商业城市，如直隶的天津、山东的济南、河南的开封、山西的太原等。

在商业贸易中，广告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商人借助各种形式的广告宣传自己的商

品，招徕顾客。幌子和招牌是当时的商业店铺较多使用的广告形式。幌子是一种形象广告，如卖靴子的店铺以靴为幌，卖烧酒的店铺以酒葫芦为幌，卖酱肉的店铺以酱肉坛子为幌。幌子有的是实物，有的是用模型代替，如针铺以木质针的模型悬于门外为幌，还有用图画表明所售商品的画幌。幌子不仅可以表示经营的商品类别或不同的服务项目，还用以标志店铺的规模。如线麻铺挂数缕麻为



《姑苏繁华图》(局部)

清 徐扬绘
辽宁博物馆藏
绢本

全长1000厘米，宽36厘米
原名《盛世滋生图》。图中可见水路运输是当时商贸经济的重要渠道。

《乾隆南巡图·前门街市》

清 徐扬绘



北京王麻子刀剪铺店铺门面
在清代，北京的店铺建筑形式大同小异，但各家店铺都有不同形式的字号门面，而且店铺门面装饰华丽美观，各具特色。

幌，为专营白麻的中心店；挂一缕麻，则为代销店。饭店挂双幌，表示烹饪技术较高，能包办酒席；挂单幌，则表示只经营简单的饭菜，是小吃店。招牌是文字广告，用写在牌子上的文字标明店铺的名称、服务项目等。商家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往往是招牌、幌

子联用，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乾隆南巡图》中，描绘前门外棋盘街上的一家靴鞋店，铺面前挂着两只特大的靴子模型作为幌子，门前横招题写“本铺定做时式朝靴缎鞋镶袜俱全不误主顾”。此外还有一种是竖于柜台上的招幌。据粗略统计，《姑苏繁华图》画卷中，街道上可辨认的招幌有二百三十余家。



第五节 对外贸易

清前期的对外贸易政策，经历了由禁海闭关到开禁设关，由多口贸易到严加限制的广州一口贸易的变化。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三年（1644—1684），这四十年是实行海禁时期。1644年清军人关夺取全国政权，为了与占据沿海的南明势力和台湾的郑成功斗争，巩固统治地位，实行片帆不准下海的“海禁”，当时的航海贸易几乎全部停止。第二阶段从康熙二十三年到道光二十年（1684—1840），这

150多年开禁设关，是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与各国进行贸易，但实行严格限制的贸易政策。康熙二十三年，宣布废止海禁，开海贸易。康熙帝认为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固，平定了“三藩之乱”，统一了台湾，开海条件成熟，他说：“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而且开海贸易“可充闽粤军饷，以免腹里省份转输协济之劳”，有利国计民生。康熙二十四年，在广东（广州）、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管理来往商船，负责征收关税。

开禁后，清朝政府实行严格限制的贸易政策，对出海贸易的商民及船只，作出了种种规定。规定出海贸易的商民，必须要申请、具保、核准，发给执照，才能出海贸易。康熙五十六年（1717）还规定“南洋、吕宋（菲律宾）、噶喇吧（雅加达）等处不许前往贸易”，违者严加治罪，并严令已在南洋一带的出海商民，限三年回国，否则不得复归故土。雍正五年（1727）取消了往南洋贸易的禁令，但仍规定“其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乾隆十九年（1754），这项规定也取消了，但对出海贸易的船只、贸易的货品仍有各种限制。清朝实行严格限制的贸易政策的原因，一方面是基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据着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不需向他国购买商品，也不急需向别国销售货物，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戒惧内地与海外多有联系而不利于自身统治。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又决定限定广州为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并由粤海关加强管理，撤销其他三处口岸。统管粤海关全部事务的是清政府任命的海关监督，受户部管辖。粤海关的管辖区域为总口七处：看城大关、澳门总口、惠州口、潮州口、雷州



口、琼州口和高州口。每个总口下又设若干小口。粤海关的管辖范围包括了广州、澳门等处的整个广东沿海。

清前期对外贸易港口示意图

粤海关制定了管理对外贸易的具体实施

东印度公司在澳门设立的商馆



《广州十三行图》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批准于广州设置十三行,专营对外贸易。



办法:凡外国商船至广东,应先在澳门停泊、申报,经批准后,方可驶入海口;外国商船到达即应申请引水员,经批准拨给引水员,引入虎门,停泊黄埔;外国商人应把装船货物清单交给行商,由行商代付一切码头费用后,才准将货物运至商馆;外国人住在商馆内交易;外船出口,应由行商通知开船日期,并听候查验,派引水员引航出海等等。从外国商船入口停泊到出口起锚的一切事务,包

括完纳进出口税,完全由行商向海关办理。所谓行商,是指清政府特许的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他们设立的店铺叫“洋货行”,简称“洋行”,统称“十三行”。洋行的共同组织是“公行”,广州的行商制度又称“公行制度”。公行成立于康熙年间,由广东商人组织,专为中外商人进出口贸易作介绍,并划定市价,后得到政府认可,作为政府与外商的中间人。凡政府命令和外商呈文,都通过行商;外商是否遵从通商规定,政府责成行商担保,行商取得对外贸易的专利权。商馆,是外商在广州为经营贸易向公行租的房屋。

清朝前期,中国与近邻的朝鲜、日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政府间不断派使臣互访,民间交流和商贸活动更加频繁;与南洋各国及东南亚各国也保持着经济文化交流。英、美、法等国与中国也有大量的贸易。

清朝出口日本的商品,主要有生丝和丝织品、各种药材(人参、大黄、黄芩等)、糖以及纸张、书籍等;从日本进口的,主要是铜和一些海产品。“南洋”即东南亚地区,包

象牙

清

长150厘米

这对象牙是18世纪越南赠送清政府的礼物。中越两国的贸易也十分发达。中国的帆船满载瓷器和绸缎驶往越南,越南的金银等矿产、象牙不断进入中国。



括吕宋（菲律宾）、噶喇吧（雅加达）、越南、暹罗（泰国）、柬埔寨等。清朝输往南洋各地的商品，主要有丝、茶、糖、药材和瓷器，从南洋输入的，主要是大米、胡椒、香料、牛角及一些海产品。

18世纪，英国进入了产业革命阶段，棉纺织业中首先采用了各种机器生产，接着蒸汽机普遍应用，技术革命扩及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近代的工厂制度勃兴，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力突飞猛进。稍后，美国、法国在经过独立战争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也进入了与英国产业革命大体相似的过程。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日益需求更大的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也就成了更受注意的目标。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不但享有经营印度贸易的专利权，在印度建立了殖民统治，而且享有经营中国贸易的专利权，独占英国对华贸易。英国能够在中国销售的有毛织品、金属以及从印度转贩的棉花，而中国的产品茶叶、生丝、土布在欧洲市场也有较大的销路。据统计，乾隆二十九年（1764），从欧洲输入中国的商品总值为银一百九十一万两，而从中国输往欧洲的商品总值达三百六十四万两，出超一百七十三万两。直到19世纪初鸦片大量输入中国时为止，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保持有利的顺差。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是贩运贸易，以广州为中心，转辗贩运中国、美国、欧洲及东南亚等地的产品。美国商船来广州，所载的货物并非完全由美国运来；由广州运出的货物，也并非都运销美国，在沿途港口以获得厚利为原则进行辗转贩卖。这一时期，英国、美国已经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是一种吸上了瘾就不容易戒绝的毒品，需要量会不断增加。雍正五年（1727），英国首次向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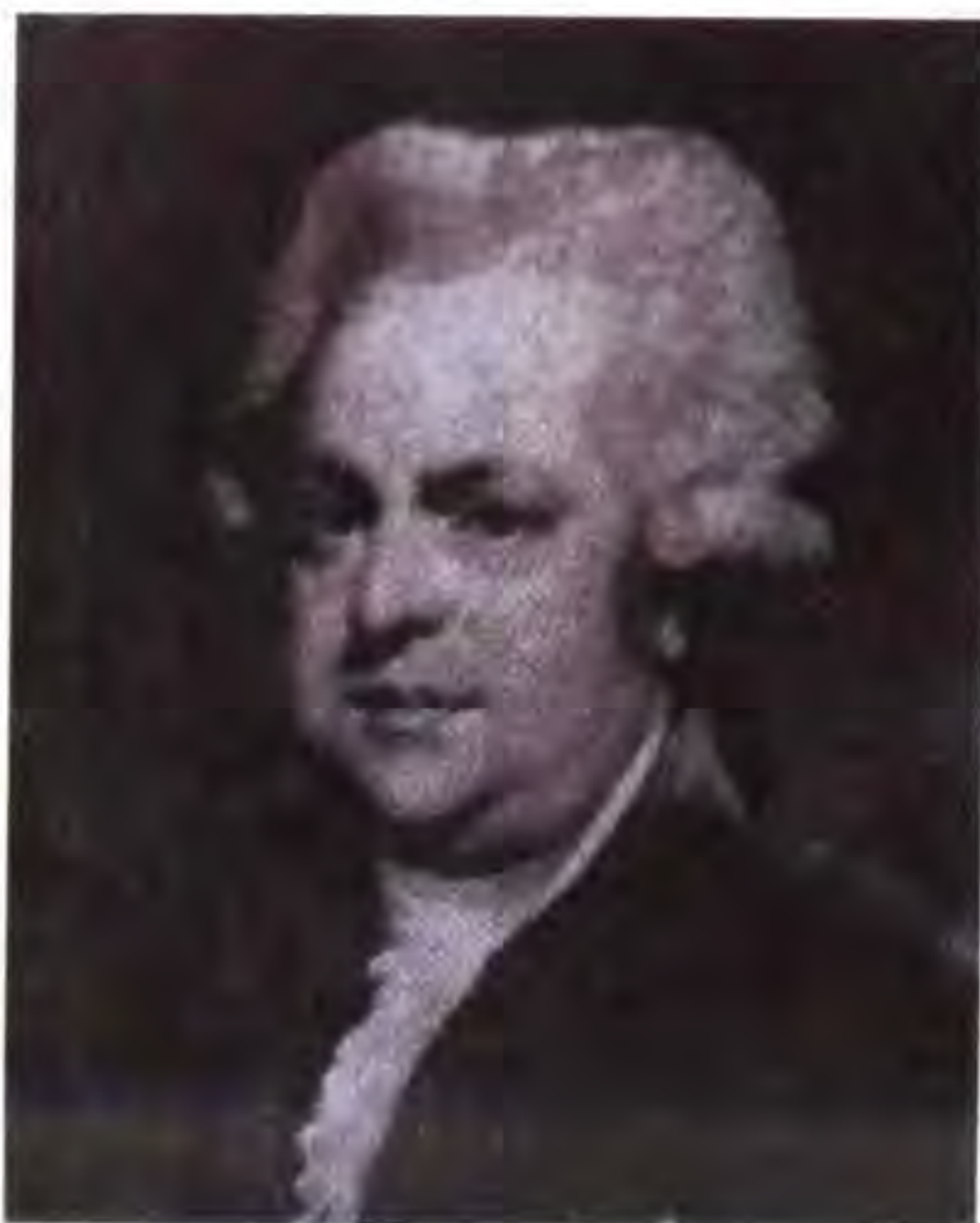


“永源成记”青花人物碗

清高13.2厘米，口径22.1厘米。在大量的清代出口瓷器中，标有生产作坊名称的瓷器占一定比例。“永源成记”瓷器在国内国外均有市场，商品化程度很高。这是一件出口商品。

输入了200箱鸦片，每箱重133磅。雍正七年，清政府第一次公布了对吸食鸦片的禁令。之后，尽管清政府一再重申禁烟，英国仍以各种走私手段继续向中国输入鸦片，以平衡其对华贸易的逆差。美国大约在清嘉庆十年（1805）或更早一些时候，也向中国输入鸦片，据不完全统计，清嘉庆十年到道光十七年（1805—1837），美国走私鸦片总数达万箱左右。

为了“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致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



马戛尔尼像

马戛尔尼送给乾隆帝的腰刀



乘舰船前来中国。事前东印度公司派专人到广州通知两广总督。使团一行七百余人，携带大量礼品，有天文与地理仪器、乐器、钟表、船只模型等，于1793年7月25日到达大沽口登陆，稍事休息，即往北京。除留部分人在圆明园和故宫安装所带仪器外，主要成员赴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清政府官员与使团成员曾就觐见皇帝行跪拜礼发生争执，最后马戛尔尼行单膝下跪之礼。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会见了英使团。英使团

返回北京后，向清政府提出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于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存放货物等用；在广州附近占一与上述权利相同之地，听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凡自澳门运广州的英国货物优待免税或减税等要求。清政府拒绝了英国使团的一切要求。虽然英使团的要求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应允，但马戛尔尼一行通过实地观察，

《乾隆帝给英国王上谕档》 (局部)

在这篇长文中，乾隆帝详尽论述了英国国王请求清政府允许英人在华京师居住，是件“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殊觉无益”之事。



收集到大量情报。据当年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记载，马戛尔尼得出如下结论：“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 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在乾隆帝晚年的时候，中国与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相比已经落伍，但盛世光环下的阴影并没有被警觉。英国使团没有实现开拓东方最大市场的愿望，乘着舰船回国了，但几十年后，当乾隆帝的孙子道光帝当政时，英国舰队又来了，他们要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



第十一章

科学文化

文化事业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过长期的积累。清朝处于中国古代历史长河的末段，时间上的优势使之可以席丰履厚，在发展文化事业上起点高于其他朝代。清朝又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密切的文化交流，对于各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及新成果的创造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时中国内部新兴市民和工商业者阶层的思想意趣以及与外部西方文化的不断接触，也都势必影响到中国的文化发展。而在另一方面，在清朝的统治比较稳定之后，统治者又数次兴起文字狱，即以文字作品定罪，甚至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任意罗织罪名，实行残酷处罚，在文化思想方面进行严密控制。如雍正年间，江西考官查嗣庭，根据科举制度的规则，以《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文句“维民所止”命题，被认为是将“雍正”二字砍

去脑袋，因而被关进大牢，死后戮尸。其亲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

第一节 清初启蒙思想家

清初，中国思想界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位集大成式的人物，被尊称为“三先生”。他们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主义色彩。他们学识渊博，在学术上的建树和贡献各有特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其父为明朝御史黄尊素。明朝灭亡后，他曾在浙东

组织武装抗清斗争，失败后回家隐居，致力于著述。他后来对清朝的态度有所转变，但直到去世，一直拒绝做官。

史学是黄宗羲的专长，《明夷待访录》是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全书二十一篇，实际是明朝历史经验的总结。书中具有鲜明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在《原君》篇中，他说，专制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专制君主“为天下之大害者”。在《原臣》篇中，黄宗羲斥责专制君主下面的官吏是一群为君主而敲剥人民的奴仆。他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做臣子的“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他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平等的，都以“天下为事”，一同治理国家。在《田制》篇和《财计》篇中，他论述了自己对社会经济的主张，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工商皆本”，即手工业和商业都很重要，在当时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反映了工商业者的利益和要求。黄宗羲对明朝的历史研究极深入，有《明史案》、《明儒学案》等有关明史的著作。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中，具有物质决定精神的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在《明儒学案·河东学案》中，他提出，“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表明他把物质性的“气”看成是第一性的，是精神性的“理”的根源；而精神性的“理”则被看成是第二性的，是物质性的“气”的派生物。

二、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世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朝灭亡后，他曾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只身北上，来



黄宗羲像

清人绘

往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考察山川形势。晚年定居陕西华阳，至死不仕清朝。

顾炎武博览群书，对经学、史学、天文、地理、音韵、金石等都很有研究。在治学上，他提倡“经世致用”，坚决反对空谈，强调要从具体的事物中探求真理，而不是从主观冥想出发。由于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他把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具体事物当成考据的主要对象。他在读书时，坚持每天做笔记，曾把二十一史、明十三朝实录中有关国计民生的内容，分类抄录，旁推互证，并结合实地考察，写成《天下郡国利病书》。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日知录》也是一部读书笔记，内容是有关经济、官吏、财富、典章制度、地理、艺文等方面的心得，并加以穷源溯本，考证谬误。他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应该“众治”。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段话被后人提炼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思想具有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思想色彩。

顾炎武的哲学思想散见于《日知录》等

顾炎武像

清人绘



著作中，有明显的唯物主义成分。如关于世界本体问题，他提出了“盈天地之间者气也”的观点；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他肯定物质是第一性，而精神是第二性的。他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他认为规律（道）不能离开具体事物（器）而独立存在。

王夫之像

清人绘



三、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明朝灭亡后，他曾从事抗清斗争。失败后，于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著书，故世称船山先生。康熙年间，吴三桂等发动“三藩之乱”，曾以衡阳为根据地，其手下劝王夫之合作，王夫之拒绝，逃进深山。清政府听说后，十分赞赏，派人赠送粟帛。王夫之借口有病不见来人，但只退回了帛，把粟留下。这件发生在王夫之逝世前不久的事情，说明他不肯与先降清又反清毫无民族气节的吴三桂合作，也说明他晚年时反清立场有所变化。

王夫之的著作很多，如《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噩梦》等。他的这些著作继承和发展了宋代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通过对宋、明以来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建立起超越前人的唯物主义体系，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推向新的高度。他认为物质性的气是世界万物的本体，在《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中提到气细微，人看不到，但聚集起来就形成了物，有了形状，可以被看到。气“聚而成形，散而归于太虚，气犹是气也”。就是说，宇宙由客观存在的实体“气”构成，气是运动变化、聚散往来而永远不灭的，即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是不灭的。他在该书《乾称篇》说：“人于所未见未闻者，不能生其心。”就是说，认识由客观存在的外界事物引起，离开客观对象，就不会有认识。他具有辩证法思想，认为事物之间互相联系，彼此影响。在该书《动物篇》中他说：“万物之成，以错综而成用。”在《思问录·外篇》中，他列举江河之水等事例，肯定一切事物均在变化，“江河之水，今犹古也，而非今水之即古水”，动是绝对的，静是



王夫之故居

位于湖南衡阳西曲兰石船山。就是在这间小屋，王夫之度过了晚年的十八个春秋，写下了包括《读通鉴论》和《宋论》在内的数百卷论著。

相对的。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学与思兼用，在《四书训议》中提出：“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

第二节 编修类书、丛书

类书是一种分类汇编各种材料以供检索之用的工具书，或者说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唐、宋时期的《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都是类书。明代编修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继此之后，清代编成了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丛书与类书不同，并不将各书拆散按内容分类编辑，而是将众多单独的书籍汇集在一起，冠以总的名称，辑成一部书。清代编修的《四库全书》就是这样的大丛书。

从实用价值看，类书便于专题研究之用，丛书保存资料更加完整。

一、《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部头最大的类书。其主要编辑者陈梦雷，字则震，一字有斋，福建侯官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他侍皇三子诚亲王允祉读书，其间奉诚亲王之命，从康熙四十年开始编纂，到康熙四十五年完成初稿。当时这部书称《古今图书汇编》，后康熙帝定名为《古今图书集成》。“汇编”编出后，没有马上定稿、刊行。直到雍正时，由蒋廷锡等主其事，经过增删润色，于雍正三年（1725）定稿。全书分为历象、方輿、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编下又有乾象、岁功等三十二典，典下又有六千一百零九部，每部下包括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目，约为一亿六千万字，卷数定为一万。雍正四年刊印，为清内府铜活字本，雍正六年印毕，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雍正六年(1728)内府铜活字初印本。



共印六十四部,另有样书一部。每部分订五千零二十册,装成五百二十二函,此为殿本。光绪年间印过铅字本和影殿本。

类书是查阅资料的宝库,而《古今图书集成》比一般类书的作用尤大,因为其分类细,分量大,修撰的时间晚,收录的文献多,且检寻方便。

纪昀像
清人绘



二、《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乾隆时纂修的一部规模宏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之定名,典出唐玄宗在两都分四库以贮经、史、子、集四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朝廷开设四库全书馆,着手编纂《四库全书》,在馆内先后参加纂修的有360名官吏和学者,总纂官纪昀(1724—1805)等人出力较多。全书于乾隆五十二年缮写完毕,历时十五年之久。以后又检查书籍内容,校对错误缺漏,并补充一批书籍,直至乾隆五十八年编纂工作才完全结束。全书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卷,分经、史、子、集四部。为了整齐美观,全书一律手抄,先后共抄成正本七份,另有底本一份,分别藏于紫禁城文



《钦定四库全书》

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文溯阁、杭州文澜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底本藏翰林院。

《四库全书》著录的图书，除小部分御制作品和奉旨撰述的官书外，还有从残存的《永乐大典》中辑出之书、各地征集来的书、各地藏书家进献的书和坊市流行的书。在编纂过程中，把收到的全部书籍，分为应刊、应抄、应存目几种，其中应刊、应抄的皆收入了《四库全书》。纪昀等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时，对收入了《四库全书》的书籍和未收入而应存目的书籍都作了介绍和评论，简要叙述每部书的内容，评论其优劣得失，探讨其学术源流和版本同异。四库全书馆还另撰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并择最精粹的书籍编成《四库全书荟要》小丛书一部。

中国古代的书籍，在战乱和社会动荡之中，损失严重，清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搜集全国图书，辑录已佚书籍，其中有不少珍本，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典籍。但乾隆帝也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对全国书籍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许多他认为是“悖逆”和“违碍”的书籍，遭到查禁、销毁和删改。

《四库全书》现仅存四部，文渊、文津、文溯三部基本完整；文澜阁所藏于太平天国

文渊阁



期间一度散失，后渐收集和补抄，基本齐全；文宗阁和文汇阁所藏则于太平天国期间毁于兵燹；文源阁所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存翰林院的底本，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掠夺得残缺不全，八国联军之役又遭抢劫，散失无余。

第三节 考据学与史学

有清一代，由于文字狱的影响，文人缀文命笔动辄得咎，个个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接触现实，将精力用于对古文献的整理、诠释上，考据之风大盛，成为一种学问。考据学即清代所称的汉学，又叫朴学，以乾隆、嘉庆时最盛，分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为代表，皖派以戴震为代表，他们以钻研儒家经典为核心，对古代文献及遗存器

物作辨伪、汇辑、校勘、训诂等。在考据学的发轫之初，阎若璩是重要的代表人物。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山西太原人，生长于淮安，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他考证古文《尚书》之伪，铁案如山，《四库提要》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惠栋（1697—1758），字定宇，江苏吴县人。他治经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经书中的意义。由文字音训以求义理，是汉学家共同信奉的原则。他专精周易，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等。《四库提要》评惠栋“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代，其短亦在于泥古”。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他对音韵、文字的考据很有成就，长于审音，从审音入手，区分声类，音声相配，平衡韵部；又从古文字的音与声，推求其意义，发现了“故训音声相表里”的规律，认为必须通音声而明转注、假借，才能搞清楚许多古文的意义。他对于名物、制度、经籍的考证也很多，在古天文、古地理的研究方面颇有成就。他不但是有成就的考据学家，也是卓越的哲学家，《孟子字义疏证》是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他用训释《孟子》字义的形式，阐述自己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人性论和理欲说。戴震的嫡传弟子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等人把音训考据之学推上了新的高峰。他们善于“发凡起例”，即运用归纳法，从纷繁的古书中，探求“条例”，然后再以此作演绎，弄清古文字的音读训诂。段玉裁最重要的著作是《说文解字注》，王念孙著有《读书杂志》和《广雅疏证》。

清朝的史学考据特点也很突出，一些史家把精力多用于对古史的考订、补阙、辑佚、注释等方面，有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

钱大昕像

清人绘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江苏嘉定（今上海）人。他于音韵训诂多有创见，注意古声母的研究，史学上长于校勘考订。



汉书集解》，全祖望的《经史问答》，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等著作问世。

尽管当时对古史的研究发达，但对当代史的著述也并非绝无一人。当时着意史学理论探讨的学问家章学诚（1738—1801）强调史学经世的主张，他不满意考据派的脱离实际、博杂琐碎，认为“作史贵知起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后人将他的著述辑成《章氏遗书》刊行于世。清朝人私撰本朝史的有蒋良骐的《东华录》、魏源的《圣武记》、钱仪吉的《碑传集》等。清朝设有国史馆，专门纂修纪传体的本朝史，乾隆年间蒋良骐曾充任国史纂修官，其间凡遇到与自己所负责的列传有关的资料，他“以纸片录之”，“逐年编成”，“积之既久”，竟成一书。《东华录》的内容起自天命元年，迄于雍正十三年，共五帝六朝，后来有人增补至十一朝。

魏源在嘉庆、道光之际寓居北京，“得借视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搜集到许多本朝资料，以纪事本末体著《圣武记》，叙述了清初到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并记述了各项军事制度。《碑传集》是清代人物传记资料汇编，所收资料包括“碑版状记之文，旁及地志、杂传”，始于天命，迄于嘉庆。

清朝刊印了《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形式的历史书籍的统称。唐朝以前，通常把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和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合称为“三史”。后来加上西晋陈寿的《三国志》，称为“前四史”。到北宋时期，加上《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十三部书，合称“十七史”。明朝增加了《宋史》、



清乾隆时刊印的《二十四史》（书影）

《辽史》、《金史》和《元史》，称为“二十一史”。乾隆四年（1739）《明史》修成后，再加上《旧唐书》、《旧五代史》，经过皇帝钦定，作为正史刊印，合称“二十四史”，总计三千二百四十三卷，有武英殿刊本。从唐朝开始，中国开始形成朝廷设立史馆修撰前朝史的传统。清朝修明史，始于顺治二年（1645），定稿于雍正十三年（1735），乾隆四年（1739）进呈皇帝。刻版印行的《明史》，一直是乾隆四年进呈本。《明史》的列传中新增了“阉党”、“流贼”、“土司”等传，反映了明代的历史特点；但对清朝入关以前的历史，特别是其中与明朝发生关系的部分极力隐讳，不愿提及其先祖与明朝廷的君臣之分。

另外，地方志与边疆史的研究发展迅速，政府规定各府州县地方必须定期撰修本地方志，各地方志中，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自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八年（1685—1743）还官修了《大清一统志》，全书共有三百四十二卷，按照行政区划记载了全国各地的情况，每省皆冠以图表，说明其所属府、州、县，然后记述其分野、建置沿革、形

势、职官、户口、名宦等。全省概况叙述之后，续述各府和州的情形，内容按照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等二十一门加以记载。此书编成后，由于情况不断变化，因而重修两次。第一次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成书五百卷；第二次先后于嘉庆十六年（1811）和道光十六年（1836）两度重修，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共五百六十卷。由于这部书能够反映出变化后的新情况，因此很有价值。

第四节 文学和戏曲

清代文学的主要成就，突出表现于小说和戏曲。著名小说有《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戏曲方面，地方戏盛行起来，举世闻名的京剧由此而孕育。除此之外，诗词、散文领域也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

《聊斋图册》

清人绘



作家和作品。

一、小说

(一) 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清初出现的一部优秀文言短篇小说集，作者蒲松龄。中国的文言小说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盛行，《聊斋志异》继承了文言小说的传统，并使之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人，蒙古族。出身于一个商人兼没落地主家庭。他参加过童子试，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声大振，但后来参加科场考试屡次不中，没能进入官场。中年后，曾应聘做幕宾，更多的则是设帐教书。科举的失意和生活的清苦，使他能更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应该说，这些对于他写作《聊斋志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全书近五百篇，大多数是当时民间和下层文士中的故事传说，也有作者的亲身见闻。主要的题材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如《梦狼》通过梦境让白翁看见自己做官的儿子是吃人的老虎，其他官员胥吏都是豺狼，官府的阶庭中“白骨如山”；《促织》描写由于皇帝喜欢斗蟋蟀，地方官员为献媚邀宠，乘机勒索百姓；《画皮》描写饿鬼装扮成美女，启示人们看人要透过面貌看本质。二、抨击科举制度。如《司文郎》描写试官还不如一个瞎和尚通过嗅觉来识别文章的好坏；《僧述》以冥间的“捐纳之科”影射人间科举制度的金钱交易；《三生》描写落第秀才大闹阎罗殿，秀才们将主考官和阅卷官抓来，要挖他们的眼睛。三、赞扬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和妇女的聪明才智。如《莲香》描写女鬼李氏热爱桑生，不得不分手时也“愤不归墓，随风漂泊”，终于

到张家借尸还魂，与桑生结成美满姻缘；《小谢》描写男女双方相爱后，患难相助，终于结为夫妇；《颜氏》描写颜氏女子代丈夫考试和做官；《甄氏》描写甄氏女子“与论古今”，使男子“茫然不知所对”。四、肯定诚信商人的品格，客观反映经商的艰难和风险，表现出对商人的理解。如《惠芳》中的马二混，“货面为业”，“日得蝇头利，仅足自给”，他最大的特点是为人“朴讷”，这个特点使他得到仙女惠芳的青睐，过上神仙般的生活；《雷曹》中乐云鹤“去读而贾。操业半年，家资小泰”，而他在经商过程中，一次渡江，“风涛暴作，估舟尽覆”，人、货全部落水，幸得神助，才化险为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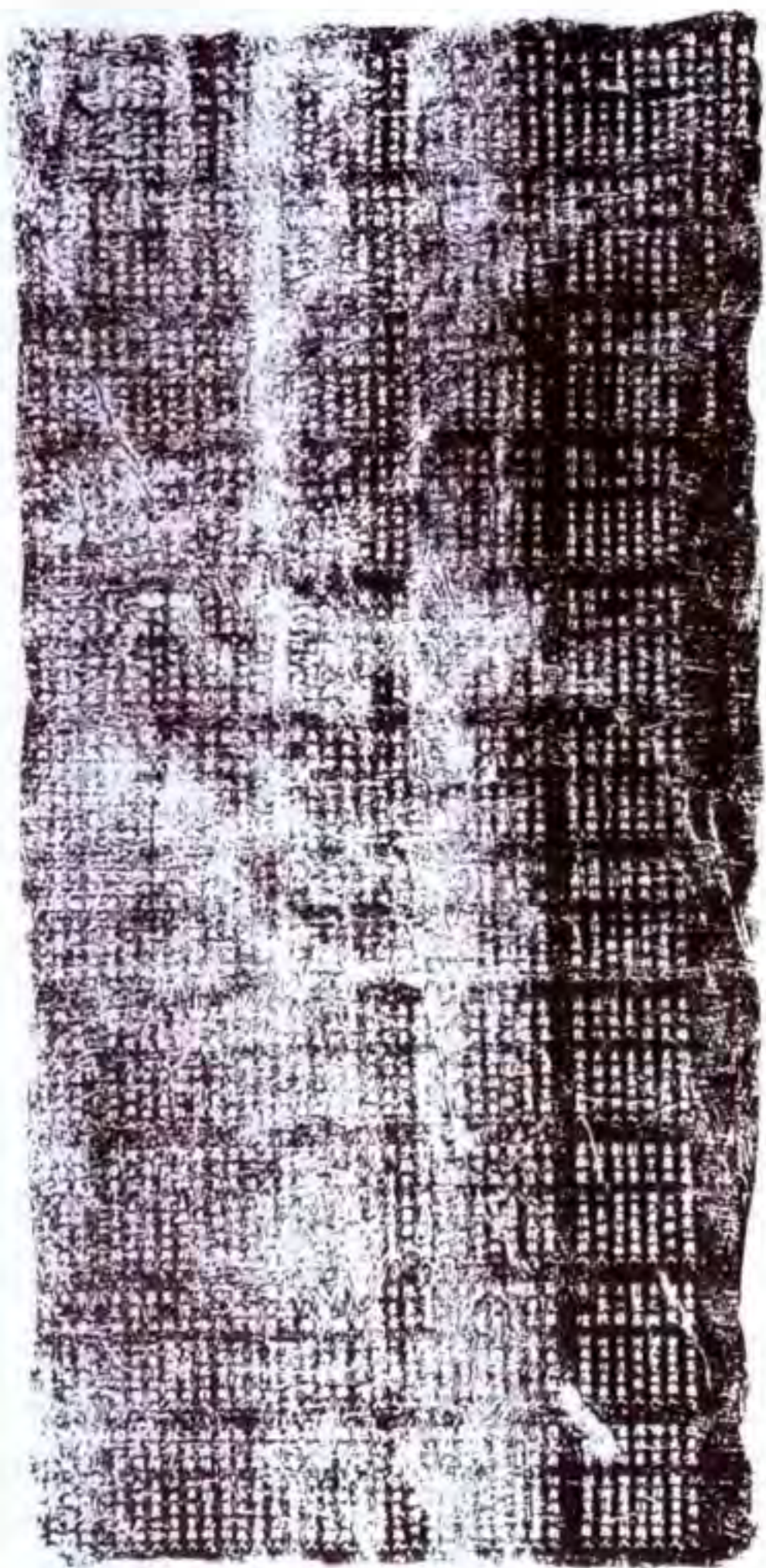
《聊斋志异》不仅在主题思想上有积极的方面，艺术技巧也值得称道。蒲松龄借写狐仙鬼怪、鱼精花妖、海上仙山、阴间地狱故事，反映社会现实，揭露黑暗和丑恶，利用幽冥世界所具有的超现实的力量，解决现实无法解决的矛盾，表现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使作品具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儒林外史》(书影)

《顺治三年进士题名碑》(拓片)

顺治三年(1646)刻,存留在今北京国子监。清代沿袭前朝,以国子监为最高学府。



相结合的艺术特色。

(二) 吴敬梓和《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著名的章回体长篇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他幼年聪明,过目成诵,很早就考中秀才。他有祖业继承,却不习治家,性格豪爽,遇贫即施,把家产用尽。后来移居南京,自甘贫困,厌弃功名。他生平喜爱有真才实学的人,讨厌热衷功名、专做八股文的人。晚年喜好研究儒家经典。

《儒林外史》以讽刺科举制度为内容,通过描绘科举制度下追名逐利的文人的种种丑态,揭露科举制度的弊害,呼吁读书人保持自尊和人格。如连考二十多次的范进,听到中举的消息,竟喜极而发疯,直到挨了丈人

的耳光,才清醒过来。匡超人本出身庄稼人家,自己劳动赡养父母,但听了马二先生走“举业”之路的劝诱并得到李知县的赏识后,逐渐丧失纯朴品质,丢下重病的父亲去赶考。考取秀才后,在杭州和一伙假名士及衙役潘三鬼混在一起,堕落为放私债、卖妇女、冒名顶替无所不为之人,还抛弃原妻与贵府千金成婚。

《儒林外史》具有很高的讽刺技巧。作品的讽刺意味,往往通过情节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其结构上也有显著特点,全书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人公,但故事发展环环相扣,并不松散。书中描写的人物分别表现某一方面的社会生活,合在一起则深入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三) 曹雪芹和《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其成就达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顶峰。《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原题名《石头记》,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合在一起,以活字版排印,并定名《红楼梦》,从此一百二十回本流行。

曹雪芹(1724—1764),名霁,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满族人。自其曾祖父曹玺始,其祖父曹寅、父辈曹颀等人,于康熙初年至雍正初年的近六十年中,三代世袭江宁织造,负责为皇家采办衣物等。康熙南巡时,有五次以织造署作为行宫,后四次皆在曹寅任上。曹家不仅地位高,而且富于文化修养。曹寅是有名的藏书家,曾主持刊印《全唐诗》,自己也能写诗词戏曲。曹雪芹于康熙末年出生,幼年过着锦衣玉食的公子生活。但雍正初年,曹雪芹只有十几岁时,他父亲因事获罪,丢了官,还被抄家,自南京迁往北京,家境一落千丈。从此,曹雪芹的

生活日渐贫困。曹雪芹晚年是在北京西郊度过的，去世于乾隆中叶，终年不到五十岁。曹雪芹一生经历了家族由盛至衰的剧变，对他写作《红楼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线索，极其广泛深入地触及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揭示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塑造了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叛逆形象，并采取肯定的态度，体现了作者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书中以世为姻亲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主角，以金陵应天府“护官符”上记载的“俗言口碑”反衬四大家族势力之大、财力之厚。全书穿插始终的贾雨村正是凭着与贾家、薛家的关系，几年间由知府转升御史、吏部侍郎、兵部尚书、京兆府尹等职。但是，生活在贾府底层的丫鬟奴婢中却不乏反抗者，芳官、司棋、金钏、晴雯、鸳鸯等为了维护尊严、追求理想而奋起抗争，甚至舍了性命。书中的男主人公贾宝玉是贾家公子，女主人公林黛玉出身“书香门第”，寄居贾家，但他们都是叛逆者。贾宝玉蔑视“男尊女卑”的传



统观念，宣称“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得浊臭逼人”。他厌恶科场功名，斥责劝他“立身扬名”的是“混账话”。林黛玉的思想观念与贾宝玉相投，所以两人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可是遭到了家庭的压抑，其恋爱婚姻也成了悲剧。作者已敏感地觉察到，以贾氏荣国府为缩影的那个陈腐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没落衰亡的命运。

《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

《大观园图》

清
纸本

纵137厘米。横362厘米
大观园是《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等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红楼梦怡红夜宴图》(局部)

清
纵 87 厘米,横 233.5 厘米
描绘了小说《红楼梦》第六十三回群芳为宝玉做寿的夜宴情景。

《红楼梦》的结构严密而完整,头绪虽多但组织得有条不紊、主次分明,情节和章节的转换如同行云流水,浑然天成,绝无生拼硬凑之感。书中人物众多,但各有特色,栩栩如生。

二、戏曲

(一) 李渔和他的戏曲理论

李渔(1611—1679),字笠翁,浙江兰溪人。康熙年间流寓金陵,晚年移家杭州。他写过许多剧本,家中设有戏班,常外出演出。他著有《闲情偶寄》,论述戏曲理论,包括创作和演出两个部分。在戏曲创作方面,他很注意作品的全局,主张一个剧本应该有“主脑”即主题,有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从这一点出发,要“密针线”、“减头绪”,“凡此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有“照应”,有“埋伏”,使剧本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塑造人物方面,他主张突出人物个性,把剧中人心灵深处的东西表现出来。他还提倡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视演出效果。

(二) 洪昇和《长生殿》

洪昇(1645—1704),字昉思,浙江钱塘人。他善写词曲,撰有《长生殿》等剧本。他的《长生殿》一剧写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轰动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

非此曲不奏”,以至妇孺皆知“洪先生”之名。

《长生殿》写的是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唐明皇宠爱杨贵妃,但在逃避安史之乱的途中,被迫令杨贵妃自缢。后来唐明皇思念杨贵妃不已,最终两人在天上相会。关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的题材,唐中叶以来,在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中多有采用,洪昇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把传说和历史融合在一起,以丰富的社会内容为背景,三易其稿,完成了这部戏剧作品,共五十出。全戏从定情、密誓、埋玉,一直到月宫团聚,从生写到死,从人间写到天上,从悲写到喜,词曲清丽凄切,人物栩栩如生。

(三) 孔尚任和《桃花扇》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号东塘,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他喜欢诗文,精通乐律,《桃花扇》是他的戏剧作品,脱稿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演出也获得很大成功,“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

《桃花扇》以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再现南明弘光王朝的覆亡悲剧。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的时候,十分重视历史的真实,“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但他并不是自然主义地照录



红缎织金彩绣女戏衣

清
宫廷内演戏时旦角的着装之一。

历史，而是对典型人物进行了艺术“点染”，达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较好结合。

（四）地方戏的兴起和京剧的孕育

清代流行的地方戏种类繁多，富有特色。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到江南巡视六次，每次都要经过花柳繁华的扬州。扬州交通方

便，盐商云集，一些大盐商为博取皇帝的欢心，征集了许多戏班，每逢乾隆帝路过，就在运河两岸搭起戏台，上演各种戏曲。演出的有专唱昆曲的戏班，也有各种地方戏的剧团。当时的文人奉昆曲为正宗，昆山腔的曲调和唱词又非常高雅，所以被称为“雅部”，



《村市生涯图册·凤阳花鼓》

清 周鲲绘

绢本

凤阳花鼓是江南民间的一种说唱表演形式，以安徽凤阳最为著名。

《长生殿》和《桃花扇》都是昆曲剧本。而各地方戏曲花花杂杂，种类甚多，就统称“花部”。因清朝皇帝喜欢昆曲，后来昆曲进入北京，接着弋阳腔等地方戏也先后入京。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岁诞辰，安徽名艺人高朗亭率领有名的徽剧三庆班进入北京朝贺演出。徽剧富有吸收能力，在表演上吸取昆曲载歌载舞的一套完整程式，还擅长一套独有的武打技术；在声腔上吸取昆曲、弋阳腔、梆子腔等剧种的唱腔，初步形成了一个唱、念、做、打并重的剧种，很快受到北京观众的欢迎。以后又兴起四喜、春台、和春三个徽剧班，和三庆班合称“四大徽班”，盛极一时。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湖北的汉剧艺人在北京以“楚调新声”得名。汉剧和徽剧有时一处搭班，两个剧种互相影响而自然结合。这两个剧种歌唱部分以二簧、西皮两种腔调为主，即主要的唱腔是分别来自徽班的二簧调和来自江汉的西皮调，故称“皮簧”。皮簧戏发展为后来的京剧。

三、诗词和散文

(一) 诗

清前期的诗坛出现了不少风格各异的诗人。清初最著名的诗人有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等，雍正以后著名的诗人有翁方纲、龚自珍等。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明万历进士，明末官礼部侍郎，南明福王时，为礼部尚书。清军南下后，投降清朝，被留用，未几去官。他论诗主张“有本”，认为《国风》、《小雅》、《离骚》皆从肺腑中出，无不有本；诗乃“志之所之”，各言其所欲言而已。他的诗歌风格接近晚唐和宋代，技巧纯熟，有创造性。他的理论和诗文对当时诗坛有很大影响。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明亡后先隐居，后被迫出仕，为国子监祭酒。他的诗以七言歌行见长，辞藻华丽，音律协调，既委婉含蓄，又沉郁悲凉，内容多以明清之际的历史事实为题材，如《圆圆曲》、《松山哀》等，故有“史诗”之称。他也是对当时诗坛有一定影响的人物。

王士禛(1634—1711)，是钱谦益、吴伟业之后的著名诗人，字贻上，号阮亭，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论诗主张“兴会神到”、“得意忘言”，倡“神韵”说，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

为诗歌的最高境界。他的诗多为流连风景、咏怀古迹之作，如《江上》诗“吴头楚尾路如何？烟雨秋深暗白波。晚趁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好似一幅风景画。他著有《渔洋诗话》等。

翁方纲（1733—1818），是嘉庆年间诗坛的一位领袖人物，字正三，号覃溪，直隶大兴（今北京市）人。官至内阁学士。他论诗提出“肌理说”，所谓肌理，是指义理和文理，要求作诗以学问为根柢，内容质实，形式雅丽，其用意是纠正神韵之说。他本人擅长经史考证，所作的诗是相当典型的学问诗。

龚自珍（1792—1841），字璚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道光进士。他是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先驱，他的诗别开生面，包含丰富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强烈追求个性解放。如著名的《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二）词

在宋代发展到高峰的词，元明时期有所下降，而到清代出现“中兴”之势，词的创作和词学研究都有不少成绩。

纳兰性德（1655—1685），满族。原名成德，字容若，故世多称成容若。大学士明珠的长子。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授乾清门侍卫。他工于词，以小令见长，多抒写离愁别恨和个人哀怨，艺术特点是天然不事雕琢，清新朴素，感情真挚。著有《饮水词》、《侧帽词》、《词韵正略》等。

清代词坛出现过不同的词派，各有特点。学者朱彝尊，字锡鬯，浙江秀水人，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他辑唐、五代、宋、金、元词五百余家为《词综》，为词学研究集中了重要资料。他的词效法南宋姜夔、张炎，多



纳兰性德像

在字句声律上下功夫，细致绵密，圆转浏亮。有同乡友人以词与之唱和，逐渐形成浙西词派。浙西词派在清代词坛有百多年居于统治地位。嘉庆年间，浙西词派由于一味拟古，寄兴不高，呈现衰颓之势，这时常州词派兴起。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江苏武进人，嘉庆进士，辑有《词选》。他主张词心以比兴寄托为主，又要有温柔含蓄的感情。周济（1781—1839），字保绪，江苏荆溪（今江苏宜兴）人。嘉庆进士。他学词于张惠言的外甥董士锡，发展了张惠言的理论，著有《介存斋论词杂著》。他提倡以词反映社会现实，特别推崇辛弃疾，辑有《宋四家词选》。

（三）散文

清前期以散文著称者有侯方域、方苞、姚鼐等人。

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商丘人。他的文章潇洒流畅，鲜明清丽，但

有些未免浅薄、做作。《李姬传》、《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等篇，均能代表其散文特色。

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又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乾隆时官礼部侍郎。有《望溪文集》。他一生致力于古文复兴运动，建立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他主张作文的目的在于通经明道，所以必须重视义理，求其根源，继承孔、孟、程、朱的道统。他还提出“古文义法”，“义”就是“言有物”，说文章要有内容；“理”就是“言有序”，说文章要讲究形式。他写过一些语言简洁、寓意深刻的文章，其《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篇是清代散文中的优秀作品。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号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任四库馆纂修官，有《惜抱轩全集》。他选辑的《古文辞类纂》流行颇广。他将方苞的“古文义法”加以发挥，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八个具体方面，前四者是文章的内容，后四者是文章的形式。他较著名的散文有《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等。

几何体比例规

清

康熙年间清官造办处制造
铜镀金

长33.3厘米，宽6.2厘米
这种便于计算的数学工具，
最初由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
发明。



第四节 科学技术

清代的科学技术也取得较大进步，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科学家，他们注意参考西方科学技术的成果，在各个领域都有所发明，成绩斐然。特别是康熙一朝，无论从研究范围之广，还是探求问题之深，都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康熙帝本人雅好科学，算学、天文、地理、光学、测算、医学、解剖学……无所不好，十分关注西方科技，尤其对比较先进的法国更感兴趣，当时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兼科学家白晋、张诚等人，就曾每日侍讲于康熙帝身边。在宫中，康熙帝还设有实验室，对生物、化学、药物等进行研究。康熙帝重视科学成果的运用，例如，他积极推广种痘免疫法预防天花。据不完全统计，康熙帝先后写出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有九十篇左右，康熙六十年(1721)，他写的名为《地震》的文章是其中之一。这篇文章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地震的起因、对地震过程的认识，以及中国地震分布状况等。康熙帝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浓厚兴趣，对推动当时科技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天文和数学

清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天文历算和数学方面的成就尤为显著。天文学家王锡阐和数学家梅文鼎、明安图等，在各自的研究中，都取得很大成绩，堪称代表人物。

(一) 王锡阐和《晓庵新法》

王锡阐(1628—1682)，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他博览群书，对天文历算尤为精通。

王锡阐兼通中西历法。当西方天文历法知识传入中国之际，他采取了“考古法之误

而存其是，择西法之长而去其短”的态度，既吸收前人的优秀成果，又注意参考“西法之长”，获得显著成绩。他留下的天文历算著作达十几种，重要的有《晓庵新法》、《历说》、《历策》、《五星行度解》、《日月左右旋问答》、《西历启蒙》、《测日小记》等。其中《晓庵新法》最为著名。

《晓庵新法》共分六卷，主要内容有历法、历法表、大统历法启蒙、杂著。第一卷中研究了以割圆之法求三角函数的问题，这是天文计算中不可缺少的基础数学知识。他提出把圆周分为384等分，这种分法要比中国历来的 $365\frac{1}{4}$ 等分分法和西法360等分分法优越得多，因为它被4除等于96，96的 $\frac{1}{3}$ 是32，32是 2^5 ，可以连续平分下去，直到1

为止，这对于提高刻度的精确度是大有好处的。第四卷中讨论了昼夜长短、行星和月亮的视直径以及月亮和内行星的盈亏现象等，其所用的方法，有些已经是现代球面天文学中所用的方法。第五卷和第六卷中提出了月体光魄定向（日心和月心连线的方向）的算法、日月食的初亏和复圆方位角的算法，这是王锡阐的首创。此外，他还提出了金星凌日和五星凌犯的计算方法，这在中国以往的文献中也是第一次谈及。

在《五星行度解》和《日月左右旋问答》中，王锡阐对天体运行的理论作了很有价值的探讨，已经注意到各星球间的相互吸引现象，是讨论引力的先声。王锡阐十分重视实际观测，他在《历策》中说：“测愈久则数愈



齐彦槐制天球仪

齐彦槐（1774—1841），字梅麓，婺源（今属江西）人，清代科学家，对天文学和农田水利的研究都有卓越成就。这座天球仪，是根据天象计时的仪器，内部仿效钟表的办法，用“钢肠”（发条）作动力，自动运转报时报刻，制成于道光十年（1830）。

古观象台

位于北京建国门立交桥西南角。现存的观象台始建于明朝正统年间。清康熙八年至十二年(1669—1673),由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主持设计并制造、采用欧洲天文学度量制和仪器结构的赤道经纬仪等六件天文仪器,安装在观象台上。



密,思愈精则理愈出。”他常常夜晚登上屋顶,观测星象,整夜不眠。

(二) 梅文鼎在历学和数学上的贡献

《割圆密率捷法》

梅文鼎(1632—1721),字定九,号勿

庵,安徽宣城人。他从小好学,有神童之称。康熙二十八年(1689),他到北京拜访传教士南怀仁,但南已死,他就住在康熙朝进士、后为文渊阁大学士的李光地家。李光地推荐他修《明史·历志》。《明史·历志》由黄宗羲主编,梅文鼎审阅后,指出其中谬误五十余处。著有《明史历志拟稿》三卷。李光地曾把梅文鼎的著作《历学疑问》三卷进呈皇帝,受到康熙帝赏识。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南巡,三次召见梅文鼎,赐“积学参微”四字与他。他的《古今历法通考》对回历、西洋历作了许多研究,为中国第一部历学史。

梅文鼎在数学上的贡献最为突出,他的主要数学著作有《笔算》、《筹算》、《方程论》、《几何通解》、《平三角举要》、《方圆幂积》等数十种。梅文鼎善于用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对西方算学作简明浅显的说明,很容易为一般人接受。他还总结出中法和西法相同与不同之处,对推进算学的发展,有很大功绩。

(三) 明安图和《割圆密率捷法》

明安图(1692—1765),字静庵,蒙古正白旗人,清代著名的天文历算家。清政府



于康熙九年(1670)命钦天监选择优秀学生学习天文和算学,明安图被选入成为官学生。康熙五十二年(1713)专门培养数学人才的算学馆成立,明安图转入该馆专学算学。由于才华出众,深得康熙帝喜爱。康熙帝外出“巡幸”,常命他“扈从侍直”。他担任过钦天监监正等职,多次参加重要的官修天文历算著作活动。康熙年间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杜德美,曾向中国介绍过西方新的数学成就割圆三法,包括圆径求周、弧背求正弦、弧背求正矢,但只讲其然,不讲其所以然。明安图知道这些数学结论的背后道理深奥,索解不易,积思三十余年,写作《割圆密率捷法》一书,用自己的独立钻研,解释杜德美不肯说明的东西。此书在他去世前未能完稿,其子明新和弟子续作。全书完成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割圆密率捷法》共分四卷,一曰步法,二曰用法,三、四两卷

曰法解。前两卷是明安图的遗稿,后两卷是他的子弟续作。在第一卷中,明安图论证了割圆十三术,即圆径求周,弧背求正弦,弧背求正矢,弧背求通弦,弧背求矢,通弦求弧背,矢求弧背,正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余弦求正弦、正矢,余矢、余弦求本弧,借弧背求正弦、余弦,借正弦、余弦求弧背。明安图的这些论证,是以中国传统数学为基础独立作出的,不仅揭示了被杜德美所藏匿的原有三法的“立法之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新公式,超过了当时传入的西洋算法。

二、地图学

中国测绘地图的历史悠久,但用近代方法大规模测量编绘是在清朝。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后,将西方的地理知识和测绘地图的新方法带来,与中国丰富的地理知识和传统的测绘方法相结合,非常有利于地图

《坤輿全图》

南怀仁绘制
河北大学图书馆藏
木刻
纵172厘米,横400厘米
南怀仁(1623—1688),比利时天主教耶稣会教士,顺治十六年(1659)抵澳门,后赴京供职于钦天监,1674年为康熙帝绘制此图。





《云南舆图·大理府图》

清人绘

纸本

纵53.5厘米，横65.5厘米
《云南舆图》绘制于康熙二十一年至三十七年，包括曲靖府图、丽江府图等21幅。地方舆图为日后绘制《皇舆全览图》提供了翔实的素材。

测绘水平的提高。到清朝康熙、乾隆时，随着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以及中西交往的连续不断，遂出现了用近代方法、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地图测绘活动。

康熙帝在处理政务中，感到需要有比较精确的地图。康熙四十七年（1708），他派法国传教士白晋、杜德美等人测绘全国地图，这项工作持续了十年，到康熙五十六年先后完成了对河北、山东、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地区的测量工作，康熙五十七年，在杜德美的



《皇舆全览图》(局部)

清 杜德美等主持编绘

主持下，编绘成总图《皇舆全览图》。此图的测量限于技术水平和仪器条件等，只能以少数比较可靠的天文测量为基础，其余大多采用实地测量的方法，经纬度虽不甚准确，但地图上所标各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却相当可靠，只有西藏地区由于缺乏必要的实测，错误较多。乾隆年间，对康熙时测绘的地图进行了订补，主要是改正了西藏部分的一些错误，完成了对新疆等地区的测绘和补充。

三、医学

清代医学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传染病、药物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就，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医生和著作。

王清任（1768—1831），玉田（今属河北）人，是清代著名的医学家。他二十岁左右开始学医，一生以医为业。他十分重视对人体脏腑的认识，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在长期的医疗实践和研究历代有关医书的过程中，他发现古代医书中有关人体结构和脏腑功能的记载有不确之处，于是根据自己的多次观察，绘成“亲见诸脏腑”图，并与“古人所绘脏腑”图一并附于《医林改错》卷首，以便比较研究。他还有许多新的发现，如正确区分胸腔和腹腔，搞清了横膈膜之上只有心肺，其余内脏皆在横膈膜之下；指出肺是两叶，记述了气管分到肺两叶的支气管和细支气管，纠正了前人肺有六叶两耳、二十四孔的错误说法，等等。他强调了解人体内脏对于医生治病的重要性，把医学与人体解剖生理联系起来。他的医学理论就是建立在人体解剖知识的基础上，例如其气血学说，论述气血在人体内运行的情况。他还列举了二十种气虚症和五十种血瘀症，创制方剂三十个，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瘟病学说（传染病学）的形成和趋于完整，也是在清代。明末清初人吴有性是这一学说的奠基者，著有《瘟病论》。他认为传染病的病因不是风寒，也不是暑湿，乃是感受到某种异气，或叫戾气、杂气。戾气的种类很多，某种特定的戾气可能导致某种特定的疾病。戾气的传染途径是空气和接触，自口鼻而入，人触之即病。他提出戾气说时，人类尚未发现细菌，可见他的认识难能可贵。他的理论为形成瘟病学说的完整体系奠定了基础。继吴有性之后，又有戴天章、叶桂、吴塘等人，继续丰富和发展了瘟病学说的内容，进一步确立了瘟病的诊断方法、病变的发展过程，论述了各种治疗方法。瘟病学说与伤寒学说是并驾齐驱的中医治疗外感病的两大学派。

清代医家注重对古典医书的研究和整理，有《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集注》、《伤寒尚论篇》、《伤寒论注》、《金匱心典》、《订正金匱要略注》、《金匱要略浅注》等著作问世。

《医林改错》（书影）

王清任著

第五节 各派书画与 手工艺品

清代的绘画艺术，继续着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日益占据画坛主流，山水画的创作以及水墨写意画盛行。在文人画创作思想的影响下，更多画家追求笔情墨趣，风格技巧纷繁，流派很多。清代的手工艺品亦是异彩纷呈，更加追求构思的巧妙意趣和做工的精致完美。

《仙山楼阁图》轴（左）

清 王时敏绘
纸本，墨笔
纵133.2厘米，横63.6厘米

《长松仙馆图》轴（右）

清 王鉴绘
纸本，设色
纵138.2厘米，横54.5厘米

陳子靜字無大人
方太君七十王時敏奉
帝王相碧都伯仙山
樓閣圖以爲祝郡伯仙
可以頓昂松雪若太
此幀蒼深高遠尺幅
中恍見仙真棲止入
於煙雲縹緲間筆墨
之奇非僅得于久三昧
也太夫人女歲師德可
錫琬淡余得托諸詩歌
得兩公妙墨真所謂畫
中有詩不待凡如之嘆可收
咒服之效矣
吳偉恭題



一、“四王”、“四僧”

清代绘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以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为代表的“四王”画派，受到皇室扶持，成为画坛的正统派，他们以摹古为主旨，功力颇深，山水画影响有清一代。然而，江南地区也出现了一批反正统派的画家，其中成就最为突出、影响较大的是弘仁、髡残、石涛、朱耷“四僧”，他们在政治上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艺术上抒发个性，作品往往感情



强烈，风格新颖独特。

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晚号西庐老人，江苏太仓人。擅长山水画，富于收藏，精研宋元名画。他早年多临摹之作，早、中期的画宗明代董其昌，兼学元代黄公望，风格较工细清秀；晚年以黄公望为宗，兼取元代董源、巨然等诸家，更多苍劲浑厚之趣。

王鉴(1598—1677)，字圆照，号湘碧，自称染香庵主，江苏太仓人。其家亦富收藏，他的山水画也多仿古之作，专心于“元四家”

(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尤其崇拜董源、巨然，作品运笔沉着，用墨浓润，风格沉雄。他还擅长画青绿山水，色彩浓丽而清润，自具特色。

王翬(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散人，又号剑门樵客、乌目山人、清晖主人等，江苏常熟人。祖上五世均擅画，家学渊源深厚。他的山水画有早、中、晚三期的变化，二十五岁以前为早期，主要摹仿古画；中期作品最为精彩，王时敏赞其“集古人之长，尽趋笔端，故能妙绝千古。前诸制作，固足乱



《虞山枫林图》轴(左)

清 王翬绘
纸本，设色
纵146.2厘米，横61.7厘米



《松壑仙馆图》轴(右)

清 王原祁绘
纸本，墨笔
纵118.5厘米，横54.4厘米

《幽亭秀木图》轴

清 弘仁绘

纸本，墨笔

纵68厘米，横50.4厘米



真，次则更为脱化，每仿一家曲尽其致，而超逸之趣则又过之”。他的清丽工秀、明快生动的画风，受到时人赞赏，被誉为“海内第一”。六十岁时被康熙帝召幸，主持绘制《南巡图》。六十岁以后是他的晚期，由于求画者多，作品多为应酬之作，还出现了不少代笔。王翬是“四王”中技法比较全面、成就比较突出的画家。

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麓台、石师道人，是王时敏的孙子。康熙时进士。因专心画学，被召供奉内廷，曾奉旨编纂《佩文斋书画谱》，任总裁。他的画亦遵循临古的路子，尤以元代黄公望为依归，但其画风与王时敏也有区别，喜用干笔积墨法，擅画设色山水，在设色方面颇有特色。王原祁的山水画可分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



《层岩叠壑图》(左)

清 髡残绘
纸本，设色
纵 169 厘米，横 41.5 厘米



《芙蓉鸭图》(右)

清 朱耷绘
纸本，设色
纵 121 厘米，横 42 厘米

秉承家学，与王时敏画风接近，临摹前人画迹，也多循古人规范，尚未形成自己的特色；中期形成自己的风格，笔墨比较秀润；六十五岁以后为晚期，笔墨越趋苍劲，并追求拙朴的趣味。

弘仁(1610—1663)，俗姓江，名韬，字六奇，出家后名弘仁，号渐江学人，又号无智、梅花古衲，安徽歙县人。明亡后入武夷

山为僧，云游各地后回歙县，住太平兴国寺和五明寺。他擅画山水，本色画多法元代倪瓒，构图洗练简逸，笔墨苍劲整洁，善用折带皴和干笔渴墨。他从黄山、武夷山诸名山胜景中汲取营养，师法自然，因此作品格调不同于倪瓒，少荒寂之境而多清新之意。他作的黄山诸景，深得写生传神之妙，富有生活气息。

《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局部)

清 石涛绘
纸本，墨笔
纵42.8厘米，横285.5厘米



髡残(1612—?),字介丘,号石溪,又号白秃、电住道人、壤残道者,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俗姓刘。他三十余岁时参加了南明何腾蛟组织的反清斗争,失败后避难常德桃花源,后落发为僧,参究禅学,云游各地,四十三岁定居南京大报恩寺,后居牛首

山幽栖寺。他擅画人物、花卉,尤精山水,宗法元代黄公望、王蒙。他的山水画景色不以新奇取胜,而于平凡中见幽深,善用雄健的秃笔和渴墨,层层皴擦勾染,厚重而不板滞,秃笔而不干枯。他的山水作品以真实山水为蓝本,达到了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

朱耷(1626—约1705),出身明朝宗室,是宁王朱权的九世孙。原名统𪛗。十九岁时遭明朝灭亡之痛,心情悲愤,装哑扮傻,整日一言不发,二十三岁在奉新山出家为僧。他一生满怀悲愤之情,誓不与清朝合作,性格倔强,行为怪僻,常借诗文书画发泄内心积郁。他的字、号、别名特别多,寓意也很隐晦,几经变化,体现了他的孤愤思想。朱耷为僧名,“耷”乃“驴”字的俗写;“八大山人”之号,是他五十九岁弃僧还俗后所取,他的绘画大多缘物抒情,用象征的手法表达寓意,寄托自己的感情,如画鱼、鸟,作“白眼向人”状,抒发愤世嫉俗之情。他的山水画多为水墨,宗法明代董其昌,兼取元代黄公望、倪瓒。他用董其昌的笔法画山水,却绝无秀逸平和、明洁幽雅的格调,而是枯索冷寂、满目凄凉,于荒寂境界中透出雄健简朴之气,反映了他的心境和个性。

石涛(1642—1705),本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广西全州人,明靖江王朱赞仪十世孙,出家后名原济,字石涛,别号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等。他作为明宗室后裔,清初怀着国破族灭的身世之痛,出家为僧,心情孤寂,漫游名山大川。至康熙朝,石涛画名已扬,又不甘寂寞,从远离尘嚣的安徽敬亭山来到繁华的都市南京,康熙帝南巡时,曾奉献《海晏河清图》。晚年与上层人物交往比较密切,但内心经常充满矛盾。他擅长山水、兰竹,山水多取之造化,能生动表现大自然的氤氲变幻和奇妙,技法不拘一格,随境界、意趣不同而变化,尤善用“截取法”以特写之景传达深邃之境;讲求气势,笔情淋漓洒脱,不拘小节,以奔放之势见胜。

二、宫廷画家和“扬州八怪”

清代中期的画坛,逢“康乾盛世”,也呈



现繁荣气象。宫廷绘画在皇室的扶持下活跃一时,内容、形式都丰富多样,人物画的成就尤其突出。同时,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扬州,出现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这就是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他们借绘画抒发胸臆,表达鲜明的个性,形式上不拘一格,

《梧桐双兔图》轴

清 冷枚绘
绢本,设色
纵35.5厘米,横29.1厘米

《蕉石图》轴

清 石涛绘

纸本，墨笔

纵195.8厘米，横104.7厘米



狂放怪异。

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家有焦秉贞、冷枚、金廷标等人。

焦秉贞，字尔正，山东济宁人。康熙时供奉内廷，擅画人物、山水、花卉，尤精人物，画法以传统的工笔重彩为主，并参酌西法，讲求明暗与远近，较富真实感。他奉敕作《耕织图》。冷枚，字吉臣，号金门画史，山东胶州（今山东胶县）人，为康熙、乾隆时宫廷画家。焦秉贞弟子。工人物画，尤精仕女，兼擅界画。金廷标（？—1767），字士揆，浙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乾隆年间供奉内廷，擅画人物，人物具宋人笔法，山水学“四王”。

在宫廷画家中，还有不少是西洋来的传教士，他们供奉内廷，带来了西洋画的明暗和透视法。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郎世宁、王致诚等人。郎世宁为意大利人，原名Giuseppe Castiglione，生于米兰，康熙五十四年（1715）到中国，随即入宫。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

朝。擅长画人物、肖像、走兽、花鸟，用中国画工具、按西画方法作画，形成精细逼真的艺术效果。王致诚为法兰西人，原名Jear Lenis Attiret，乾隆三年（1738年）来到中国，擅长画油画，表现人物和动物。

“扬州八怪”是指乾隆年间扬州地区一个画派的主要人物：汪士慎（1686—1759）、李鱣（1686—1762）、黄慎（1687—？）、金农（1687—1764）、高翔（1688—1752）、郑燮（1693—1765）、李方膺（1695—1755）、罗聘（1733—1799）。他们有着相近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汪士慎、金农、高翔、黄慎、罗聘终生不仕，李鱣、郑燮、李方膺一度做过小官，因不合时宜，先后被黜。他们生活于民间，对世态炎凉深有体会，性格傲岸不驯，蔑视权贵，常常借画直抒胸臆。他们在艺术上虽各有不同面貌和独特成就，但亦有很多相同之处，诸如重视个性的发挥，力求创新；在形神关系上，强调写神，善于运用水墨写意技法，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注意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以书法

《花鸟图》（册页）

清 郎世宁绘
绢本，设色
共十开，每开纵32.6厘米，横28.6厘米



《兰竹图》

清 郑燮绘

纸本，墨笔

纵134.3厘米，横75厘米



笔意入画等。他们的作品个性鲜明，具有耐人寻味的笔墨情趣和清新狂放的艺术格调。

郑燮是“扬州八怪”中最受称道的人物。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今属江苏扬州）人。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因荒年开仓赈灾，被诬告贪婪，罢官归家。后在扬州卖画为生。擅长画兰、竹、石，尤精墨竹。他提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阶段创作论：“眼中之竹”是观察客观物象得到的印象；“胸中之竹”是艺术创作构思，包括对客观物象的本质分析、个人感受及如何以特定的艺术形式加以表现；“手中之竹”是出之于手、发之于毫端的画面形象。他特别强调表现“真性情”、“真意气”，他笔下的竹往往就是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化身。他的墨竹用墨干淡并兼，笔法瘦劲孤直，具有一种孤傲、刚正的“倔强不驯之气”，布局疏密相间，以少胜多。他重视诗书画的结合，用诗文点题，将书法题识穿插于画面之中，或是将书法用笔融于绘画中，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三、改琦与费丹旭

嘉庆、道光年间，改琦和费丹旭是比较著名的人物画家，他们善画人物，尤精仕女，有“改派”和“费派”之称。

改琦（1774—1829），字伯蕴，号香白，别号玉壶外史，先祖西域（新疆）人，后侨居松江。他画的仕女形象纤细俊秀，用笔轻柔流畅，落墨洁净，敷色清雅，创造了清后期仕女画的典型风貌。

费丹旭（1801—1850），字子苕，号晓楼，又号环溪生，浙江乌程人。他画的仕女形象秀美，体态婀娜，气质娇柔，线条疏朗，设色清淡，取景藏露得宜，自成一种风貌。

四、年画

年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式样，因于年节时张贴而得名。它起源很早，在宋代已有类似年画的记载。传统的年画多为木刻水印，线条单纯，色彩鲜明。清代的年画以天津杨柳青和苏州桃花坞两地声誉最高。

“桂树升平”年画

清 杨柳青年画

这幅年画的内容是中秋节祭兔爷。传说，月亮里有只玉兔在桂树下捣药，人们由此也称月亮为“兔轮”，故祭兔爷也有祭月之意。此画标题“桂树升平”，“桂”与“贵”谐音，象征富贵，桂花又与玉兔、月亮有关，画面的标题正好寓意合家团圆、富贵平安。落款“齐健隆”。齐健隆是杨柳青早期著名的年画艺人之一。



杨柳青年画，据说至晚始于明朝弘治、嘉靖年间。桃花坞的年画也开始于明代。年画的内容包括故事、戏文、风俗、仕女、娃娃、风景、花卉、动物、耕织、时事、岁朝吉庆等方面。杨柳青年画接受了宋、元、明的绘画传统，也受到清代正统木刻画的一些影响。桃花坞的年画继承明代木刻的特点，有的深受西洋铜版画的影响，如利用细线分出阴阳浓淡，并显著地描绘阴影。

五、书法

清代亦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早期仍是帖学的天地，中期碑学兴起。碑学的发展，

为书法的发展开拓了新天地。

明清之交，许多明末遗民，隐迹山林，寄情翰墨，涌现出一批书风独特、个性鲜明的书法家，如傅山、朱耷等。傅山（1607—1684），字青主，山西阳曲人。他在书法艺术方面，追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艺术趣味，草书纵横跌宕，真率拙朴。朱耷是著名的画家，也是一位风格奇特的书法家，他临写过钟繇、王羲之、孙过庭、颜真卿等人的书法作品，也得力于董其昌，他的行书、草书最有特点，善用秃笔、藏锋，线条粗细均匀，转折圆转，布置大小参差不齐，偏中求正。当时书法家多有宗法晋唐法帖而有独特风格者。至康熙朝，由于康熙帝酷爱董其昌书法，遂出现了许多专学董字的书法家，著名的书法家有何焯、沈荃等人。何焯（1661—1722），字岷瞻，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工书法，喜临晋唐法帖，同时精于校勘古碑版。沈荃（1624—1684），字贞蕤，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的书法学米芾、董其昌，书风雍容闲雅，甚受康熙帝器重。乾隆年间，皇帝喜爱赵孟頫，朝野人士亦从尚董转为崇赵。康、雍、乾时期，由于书法是科举考试的考核项目，许多文人为“争妍笔礼，以邀睿赏”，纷纷效仿董、赵字体，遂形成了“馆阁体”书法，追求“乌、方、光”，“分行布白，纵横合乎阡陌之经；引笔著墨，浓淡灿乎珠玉之彩”。张照（1691—1745），字得天，华亭人，官刑部尚书。他擅长书法，常为乾隆帝代笔，居“馆阁体”书法家首位。乾隆时，崇尚帖学的名家有刘墉等人。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擅长行书和楷书，据记载他的小楷法钟繇、颜真卿，临“黄庭”、“落神”，行草宗智永，摩《淳化阁帖》中各家。由于他

《七绝诗》

清 傅山书



泛学诸家，被誉为“集帖学之大成”，但他并未停止于形迹之似，而是善于汲取各家用笔之长，其书法融合了赵孟頫的圆润、董其昌的生拙、苏轼的丰肥、颜真卿的浑厚，独具一格。

乾隆、嘉庆以来，书法界碑学大兴。由唐碑上溯六朝碑版，以至三代、秦汉、魏晋的各种金石文字成为书家津梁，创造出了以雄强的北碑为基础的新风，形成一个新的局面。著名的书法家有邓琰等人。邓琰（1743—1805），字石如，安徽怀宁人。他的书法兼善篆、隶、楷、行诸体。篆书最负盛名，字体与秦汉瓦当额文相近，康有为称赞他“集篆之大成”。他的隶书也很著名，楷、行、草书植根于篆、隶，“楷书直逼北魏诸碑，不参唐人一笔。行草又以篆分之法人之，一洗圆润之习，遂开有清一代碑学之宗”。

六、精美的手工艺品

清代手工艺品的整体风格趋于精致。这一时期异彩纷呈的手工艺品，表现出成熟而高超的制作技术。追求世俗审美理念的装饰非常流行，吉祥文饰风行于世。漆器和玉器



作为一个载体，特别能显示这一特点。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漆器工艺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漆器的品种很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雕漆、镶嵌漆、彩漆、填漆等。雕漆，是用调色之后的笼罩漆一层一层地涂在器胎上，积累到相当的厚度，再用刀雕剔出花纹的工艺。清代，雕漆工艺的中心转移到苏州，乾隆年间是其迅速发展的时期。这时的雕漆器花纹细、层次多，刻工也十分精巧。

铜胎画珐琅蝠莲纹花盆

清

高14.2厘米，口径31.7厘米，
底径19.8厘米

铜胎画珐琅器是以铜料做出器胎，然后把珐琅质釉料填画在器物表面。铜胎画珐琅工艺在康熙、雍正、乾隆时获空前发展。这个花盆饰以蝙蝠、莲花纹。蝠与“福”谐音，莲与“连”谐音，蝙蝠、莲花纹寓意幸福相连。



雕漆云龙纹长方盒（局部）

清

全长75.5厘米，宽17.5厘米，
高16.5厘米



竹雕“刘海戏蟾”笔筒

清 吴之璠作

高15厘米，口径8.5厘米，底
径8.7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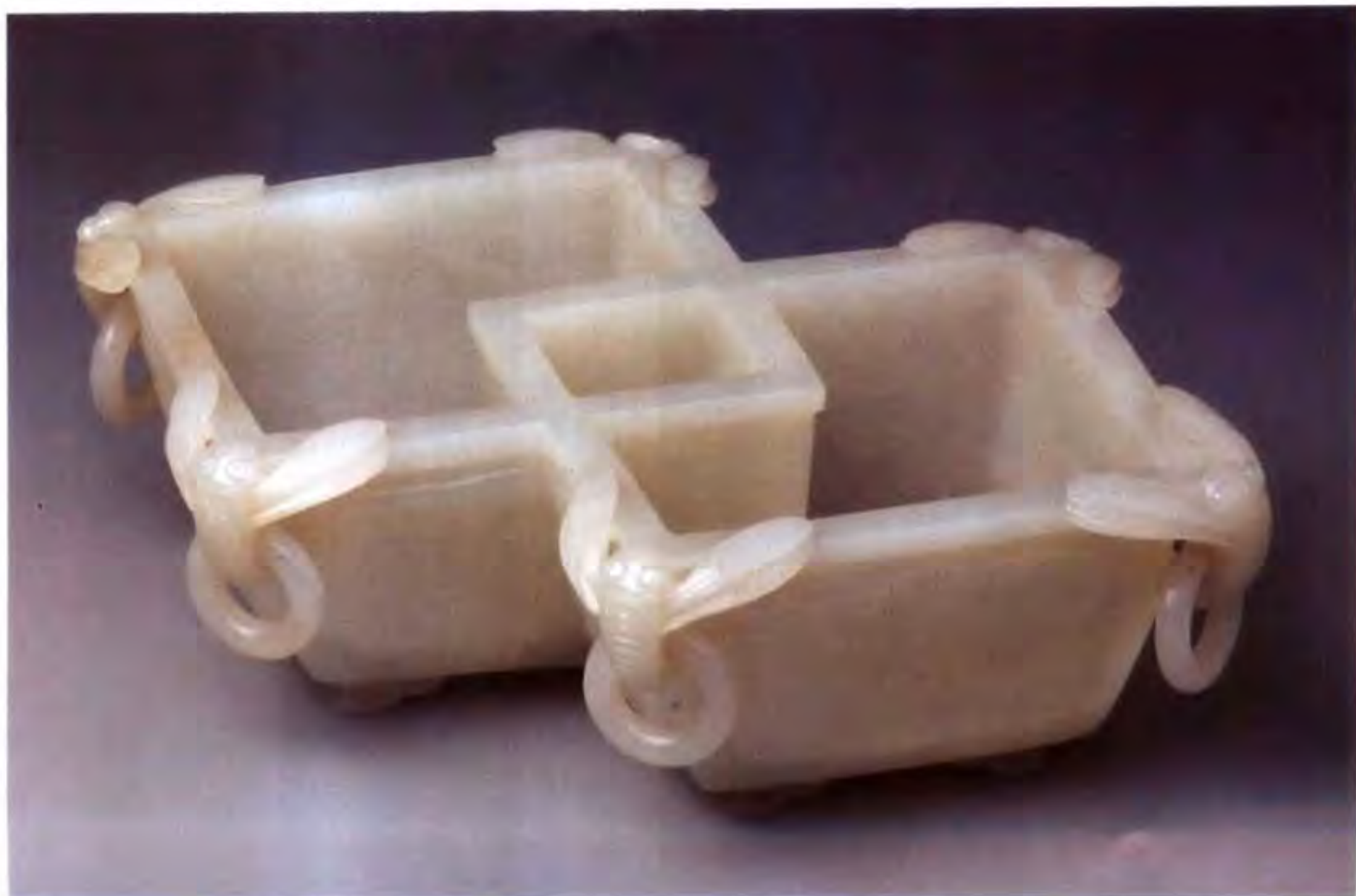
青玉六蜻蜓环耳双联洗

清

文玩玉器

高6.3厘米，长23.3厘米，最
宽口径15.4厘米

该洗造型别致，为两四角方
洗一角相交成为双联洗，其
他六角上各爬一只蜻蜓，每
只蜻蜓尾勾一只圆环，洗的
外壁刻有花纹，极富巧思。



当时，扬州的雕漆也非常著名。镶嵌漆主要是指嵌螺钿和百宝嵌。嵌螺钿漆器是在漆面上刻花纹，然后用螺钿填嵌进去；百宝嵌漆器是将金银、珊瑚、螺钿之类填嵌进去，清代扬州著名漆工卢葵生精于此艺。彩漆又称描漆，是在各色漆地上施以彩绘。填漆是在漆器表面雕刻阴线纹饰后，填入与底子不同的色漆，经磨平而成。明清时期，填漆工艺又可分多种，如镂嵌填漆、刻丝填漆等。为了达到富丽的效果，有时还在刻后的纹饰中填入金粉或银粉，即戗金、戗银。清代常常同时使用填漆、描漆、戗金几种技法。

明清时期，以观赏和装饰为主要目的的雕琢工艺发展到历史高峰，用于雕琢的主要原料为玉、石、竹、象牙、角等。工匠除集中于宫廷中的内府作坊外，还分布在全国各地，形成不同的特色和流派。就玉器而言，当时苏州、北京、扬州是玉器制作的中心。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其玉作里的琢玉名匠大多是苏州或扬州人。此外，杭州、广州、南京、九江、天津、新疆和西藏也都发展起了玉器制作工艺。清乾隆、嘉庆年间，玉

器制作业兴盛，特别是乾隆时期，皇室用玉非常普遍，因乾隆帝喜爱玉器，加上国家统一，玉石来源丰富，促使当时的琢玉工艺达到空前水平。

第六节 建筑艺术

清代，中国古典建筑艺术达到高峰，特别是中国式山水风景园林传达和表现出一定的情绪、气氛、格调、风尚、趣味，在千百年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美的精华，在清代，均凝聚于中国园林艺术的明珠——避暑山庄、圆明园之中。清代江南私家造园也出现高潮，不乏精彩之作。

一、皇家园林揽胜

（一）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又名热河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是规模宏大的清朝皇家园林建筑群。避暑山庄由宫



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组成。宫殿区位于山庄南部，殿宇亭阁，百态千姿。宫殿的平面布局采取中轴线控制，主体建筑居中，附属建筑置于两侧，基本均衡对称。每组建筑各成院落，层层套进。宫殿区虽与苑景区分置，但在造园上很好地解决了二者的结合问题。其独到之处在于将宫殿建筑园林化，宫殿周围或广植花木，或叠石为山，使宫与苑的氛围相和谐，康熙帝曾说寝宫“烟波致爽”，院中“触目皆仙草，迎窗遍药花”。宫与苑互相透景、借景，相互呼应，在景观上融为一体。宫殿区建筑分为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和东宫四组。正宫是避暑山庄内主要宫殿，据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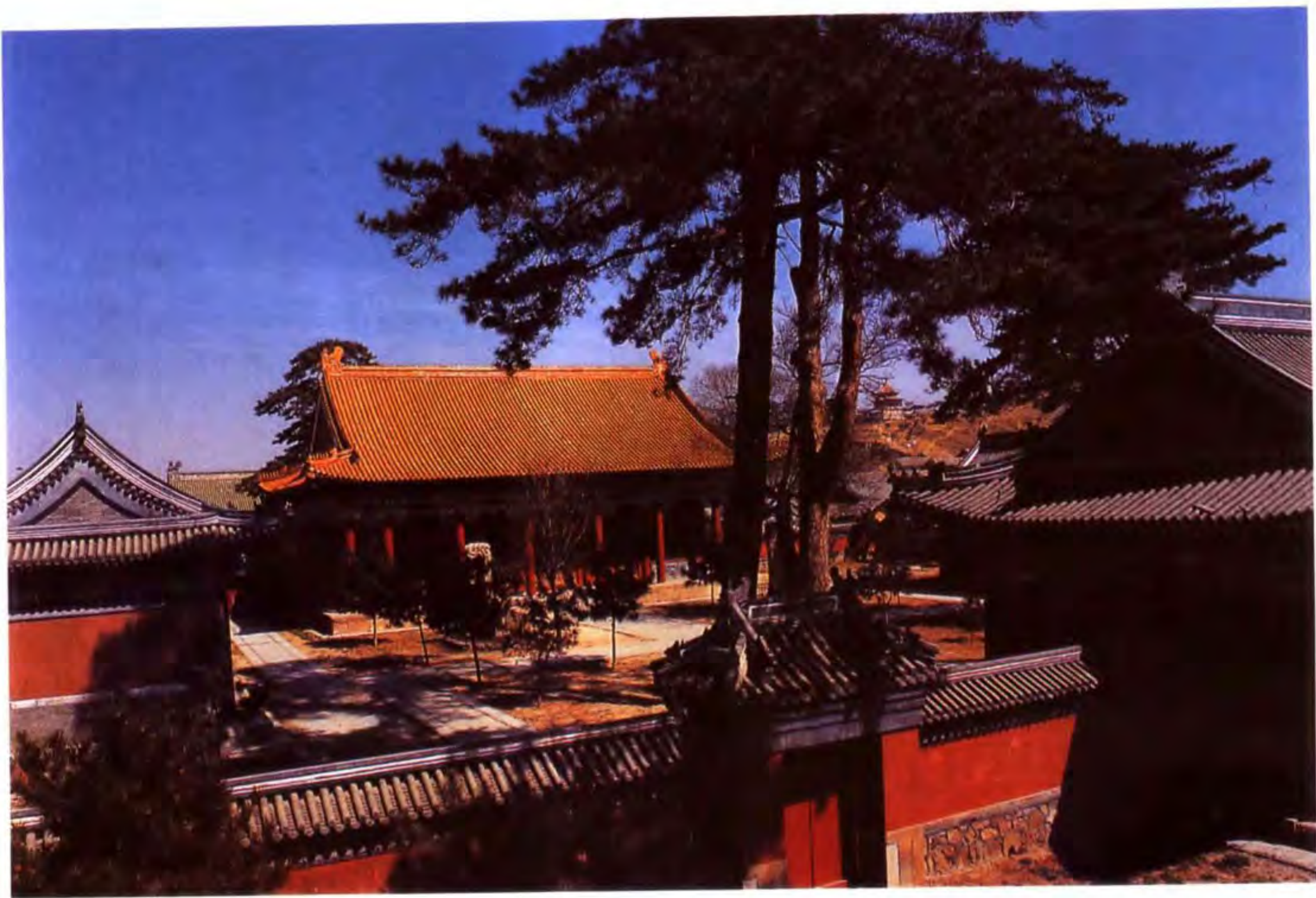
康熙帝亲题“避暑山庄”匾额

镏金铜匾
悬于避暑山庄内午门上。



环碧岛

此岛位于如意湖中，因其四周碧水环绕，故曰“环碧”。这里回廊如带，草亭、券门、粉墙掩映在一片水光湖色之中。



溥仁寺慈云普阴殿

溥仁寺是典型的汉式寺庙建筑。坐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四进院落，沿中轴线由南而北依次排列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后殿、垂花门，两侧对称置钟、鼓楼及配殿、回廊、僧舍等。

王“身居九重”的体制，组成大小不同的九进院落，分为前朝后寝，前朝为理朝之所，后寝为休憩之地。前朝的澹泊敬诚殿是正宫的主殿，建于康熙年间，乾隆时期用楠木改建，是举行重大庆典的地方。乾隆帝曾在这里接见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台吉（蒙古族称各部首领为“台吉”）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以及六世班禅。后寝部分的主殿为烟波致爽殿，清帝驻蹕避暑山庄时均居住于此。庭院里绿草如茵，古松如盖，山石散置，北邻湖区，康熙帝赞曰：“四周秀岭，十里澄湖，致有爽气。”烟波致爽殿的中厅是皇帝接受后妃们朝拜的地方。

苑景区由湖区、平原区、山峦三部分组成，分别以湖泊、洲岛，草原、林地，沟壑、泉流和多处园林建筑构成苑景。山庄内湖水的重要来源是热河泉，因泉水温热，冬不结

冰，故名“热河泉”。自石隙间涌出的泉水，静而无波，清可见底，直接融入澄湖，然后入如意湖、上湖、下湖。山庄的湖泊之胜，在于凭水借影，因水成景。澄湖北岸有“甫田丛越”、“莺啖乔木”二亭，南边为如意洲，东边是金山岛，西边有青莲岛。不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看到绝好的水中倒影，尤以金山倒影最为迷人。平原区中部的万树园，松、柏、榆、槐、柳等多种树木散置其间，从春始到秋末，林茂草盛，万树争姿。乾隆帝在这里宴赏过厄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首领和六世班禅。山庄之山，不独在峰峦秀色，也在沟壑之奇。山中建有多处建筑，或悬谷安景，或山怀建轩，巧借自然之美，陡增幽邃之感。

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13—1780），在避暑山庄之东、北外围建造了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



乐寺、普陀宗乘之庙、罗汉堂、殊像寺、广安寺、须弥福寿之庙和广缘寺等十二座庙宇，形成规模宏伟的皇家寺庙群。据《热河庭院则例》记载，“普佑寺一庙多附入普宁寺”，罗汉堂、广安寺、普乐寺“此三庙向未安设喇嘛”，其余八座寺庙由朝廷派驻喇嘛，理藩院发放饷银，且地处京师之外，后来有“外八庙”的俗称。外八庙代表了中国古代宗教建筑艺术的高超水平。其择址根据寺庙的风格和内涵，因山就水，巧借自然，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其形制囊括我国佛教建筑之汉式、藏式和汉藏结合式三大类型。这十二座庙宇，除最早营造的溥仁寺和溥善寺二座汉式寺庙外，其他寺庙无不朝向山庄，以其众星拱月之势体现出天子居中、皇权至上的政治思想及其宗教、民族政策的力量。

（二）圆明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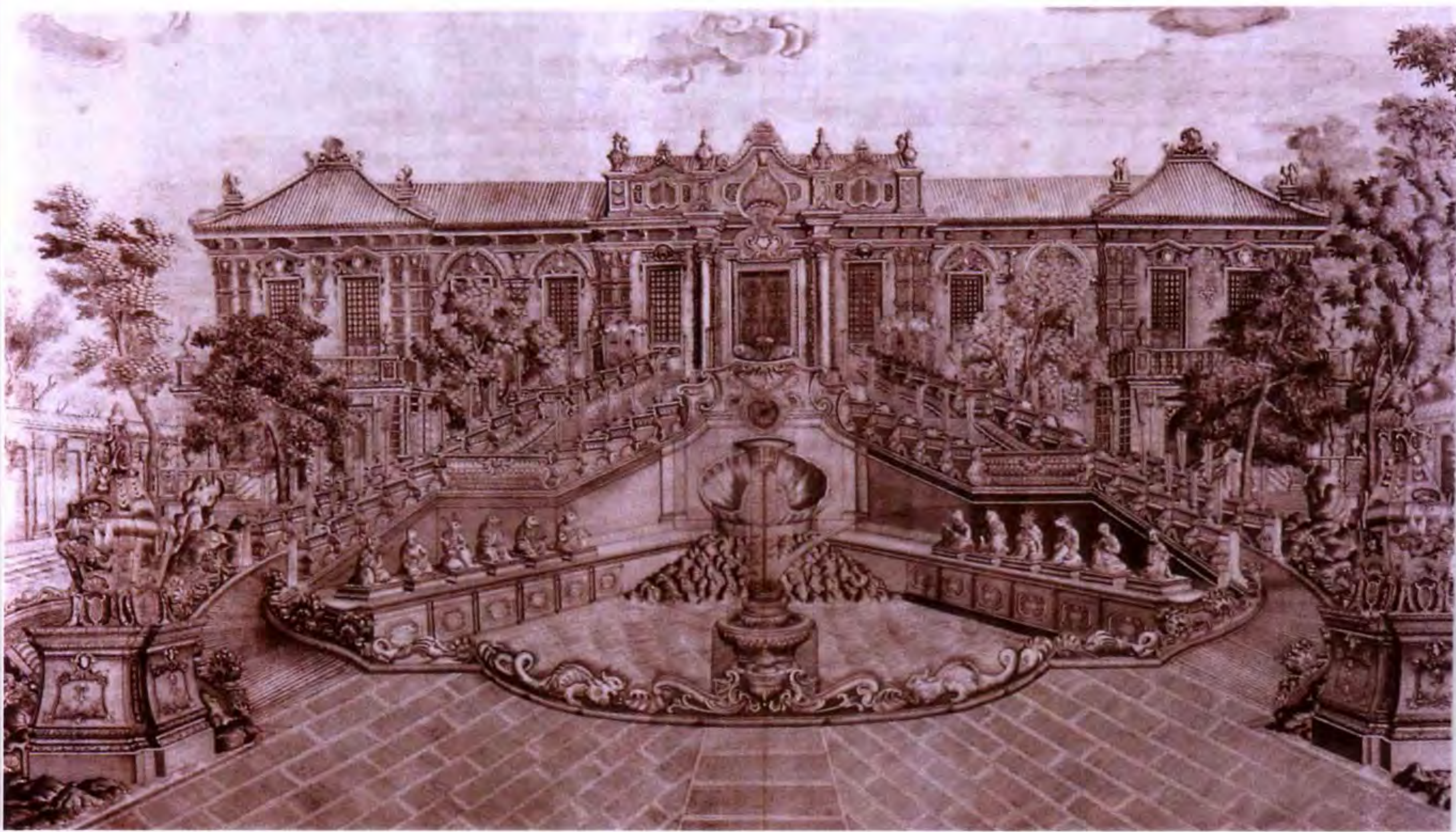
圆明园是中国古代园林中最为瑰丽多姿的宫苑园林。它始建于康熙年间，历经雍正、

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因其是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三园组成，故有“圆明三园”之说。在它的全盛时期，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建筑面积多1万平方米。

圆明园把“南雄北秀”的不同园林风格熔于一炉，把各具特色的建筑集为许多群组，配置于园内山水相结合的自然空间内，从而营造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园林景观。每个景观都经过精心的艺术提炼加工，体现某种意境，可视为一座独立的小型园林，正是“园中有园”、“景中有景”，各有其妙。各园或背山面水，如“上下天光”、“镂月开云”；或左山右水，如“柳浪闻莺”、“接秀山房”；或叠石临湖，如“杏花春馆”、“紫碧山房”；或山间环抱，如“武陵春色”等，美不胜收。圆明园的景点，善于抓住每一景观的特点，以对联、匾额、石碑等形式，予以诗情画意的题吟。圆明园又以中国传统园林艺术与西

普陀宗乘之庙

此庙是藏式风格的寺庙建筑，其总体平面布局和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相似，建筑依借山体，气势雄伟，大量平顶碉房式白台随山势纵深自由布局，没有明显的中轴线。主体建筑大红台以巨大的白台为基座，立于山巅。鎏金铜瓦的万法归一殿位于大红台的中部，乾隆帝曾在殿内接待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一行。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七十大寿，八世达赖的老师六世班禅代表八世达赖从西藏前来祝寿时，曾在殿内讲经说法。



《圆明园铜版画·海晏堂西侧》

清

纵64厘米，横110厘米

海晏堂是最大的洋楼，建成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此组建筑还包括十二生肖喷水池、蓄水池、水车房等。十二生肖铜像皆兽首人身，身着袍服。每到一时辰，代表这一时辰的铜像口中向外喷水，构成别致的时钟。正午时分，十二铜像同时喷水，蔚为壮观。

方园林建筑艺术相结合，创造了一组特殊景观——西洋楼，为中国园林艺术的发展添上耀眼的一笔。圆明园到处茂林秀木，奇花异草，十分迷人。法国传教士王致诚描绘圆明园“所有的山丘都覆盖着树林和花卉”，“岸边遍植花木，它们都是从岩缝里面长出来，仿佛自然生长的，花木四季不同”。他赞美圆明园“无美不备”，“天产之富与人工之巧并萃于是”。曾出使中国、有幸参观过圆明园的马戛尔尼说：“只有理想中的仙境可以比拟圆明园的幽美。”

二、江南私家园林拾珠

乾隆帝六下江南，促使各地官员及富豪大事兴造园林，如在盐商云集的扬州，盐商为了争得乾隆帝“宸赏”，在瘦西湖掀起造园热。明清两代，苏州始终是经济发达的地区，

优越的生活条件吸引着官僚、富豪来这里营建邸宅园林，这里是江南园林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清中叶以后，作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的广州，园林的兴建也出现繁荣局面。

苏州的网师园，原是南宋史正志的万卷堂故址，乾隆年间宋宗元因其地建为园林，借巷名“王思巷”之音，托渔隐之意，名为“网师园”，作为住宅的后花园。此园不设独立园门，由住宅轿厅或后宅门进入。园的中心置水池一方，池南岸有小山丛桂轩，作为园中待客宴聚的场所，周围还有一些辅助建筑。池北靠近内宅，是书房、书室所在，有看松读书轩、集虚斋、殿春簃、五峰书屋等，其中殿春簃是与主景区隔开的独立庭院，环境特别清幽。由于采取了以水为主和适当引出小水湾的水面布置方式，因此园林有一种



《圆明园图咏册·镂月开云》

清

烟水弥漫的水乡情趣。沿池所建月到风来亭、射鸭廊、竹外一枝轩等，形式轻巧、空透，能和池面的空间尺度相协调，高大的楼堂则退于树石亭榭之后，既富于景深和层次，又不形成对池面的压迫感。园中用石精而不滥，池周的石岸、池南黄石假山、池北花台等都是上乘之作。

建于嘉庆四年（1799）的西塘是粤东地区著名的庭院之一，坐落于广东省澄海。粤东庭院面积不大，故常用叠石造景，配以曲池小水，种植花木成阴。西塘的大门东向，进

门有小院作为过渡空间，再经圆洞门而进入大院，其右为住宅，中部为庭院，后面是书斋。这种平面布局，把住宅、庭院和书斋组合在一起，而又相对独立，是粤东庭院的特点之一。住宅前有相连的方亭称“拜亭”，是通向庭院的过渡。庭院内布置假山，山上立六角重檐小亭，并有崎岖小径穿插其间，山侧有弯曲的水池，山下洞内则有石阶相通。书斋是紧靠水边的两层楼房，楼上有廊道通往假山。登楼可见园外的河面，远望群山与农舍，俯视庭内，又可尽收园林景色。

第十二章

列强入侵



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中国已经遭到西方国家的掠夺了。早在16世纪，葡萄牙人已经来到中国，在沿海地区杀人掠船，被明朝政府用武力驱赶出去。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他们终于用欺诈和贿赂的方法，窃取了澳门。此后，西班牙、荷兰等殖民主义者相继航海东来，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一度侵占澎湖列岛，不久，被中国政府用武力收回。明天启三年（1624）又占据中国的台湾，在台湾统治达三十八年之久，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才被郑成功驱赶出去。

为了对付西方海盗商人的违法活动，清政府在乾隆年间取消了其他几个通商口岸，只留广州一处对外通商。

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完成了产业革

命，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的大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扩大殖民地，开辟新的殖民地市场。这时的东方各国，特别是“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中国，自然就成为他们扩张和侵略的对象。在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中，英国开始居于首位。

由于当时中国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英国人运到中国的商品并没有多大市场，而英国对中国的茶叶需求日益增多，因此，在中英之间的正常贸易中，中国占据着出超的有利地位。英国为了改变自己与中国贸易的不利地位，当不能用正常的工业品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时，竟然采取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卑劣手段，甚至不惜制造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第一节 鸦片战争

一、鸦片输入与禁烟

18世纪以后,英国商人为了追逐高额利润、改变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顾中国官方的禁令,非法、大规模地向中国推销鸦片。

清政府曾几次发布禁止鸦片进口的禁令,并加强了对广州海口的检查制度,但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鸦片进口的主要途径是走私,清朝的地方官员从走私中得到好处,对走私者不闻不问,任凭他们越关过卡,把鸦片送往各地。

鸦片大量涌进,吸食者不断增多,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国库空虚,中国发生白银短缺、银贵钱贱的危机。清代的铜钱是法定货币,为民间所通用,但清朝政府的赋税却是一律按银两征收。18世纪末,铜钱七八百文即可兑换一两银子,到了19世纪30年代,就要铜钱一千六七百文才能换到。随着鸦片大量输入,社会经济日益严重,银价上涨使劳动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造成了社会不稳定,禁止鸦片成为当时迫切的需要。正如林则徐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所说:“如听任鸦片泛滥,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

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清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对鸦片弛禁和严禁两种不同的意见。道光十六年四月(1836年6月),弛禁派代表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给道光帝上了一个奏折,主张准许外国商人将鸦片按药材纳税进口,使鸦片贸易合法化,把官员们从走私商人手里得到的贿赂变为国家的税收;在进行鸦片交易时,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子购

买,这样就可以禁止白银外流。在吸食上,他认为只要禁止官吏、兵丁吸食,其他嗜鸦片的人都是游手好闲、无足轻重之辈,不必去管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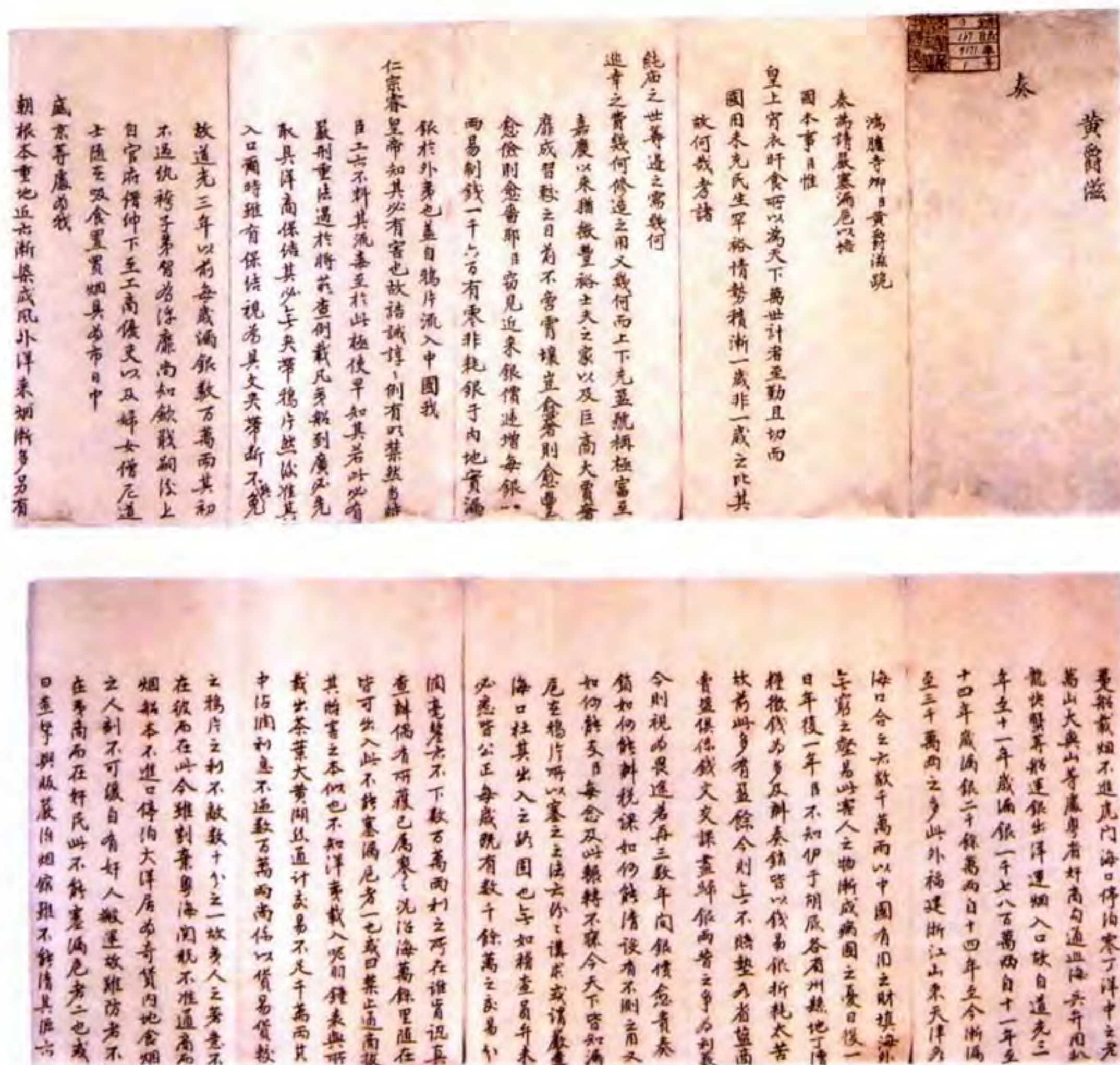
许乃济的弛禁主张立即得到多数大员的响应,但也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他们纷纷上书道光帝,驳斥许乃济的主张。道光十八年闰四月(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指出如果再不禁止鸦片,银价将越来越贵,国家库存将越来越少,后果不堪设想。他提出了一个重治吸食者的建议。他指出:鸦片不是不能禁止,以往禁而不绝,主要是因各地贪官污吏与地方豪族相互勾结、放纵走私、庇护吸烟所致。惟用重刑、极刑,才能震慑这些犯禁者。如果人人禁烟,鸦片则不禁自绝。道光帝把他的意见交给各省总督、巡抚征求意见。湖广总督林则徐坚决支持黄爵滋的主张。他还提出了禁止吸食鸦片的六条具体办法,这些措施此前已在湖广地区具体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道光皇帝也下了禁烟的决心,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838年12月31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

吸食鸦片用具

烟枪长60厘米
烟灯高10厘米,直径7.6厘米
烟斗高4.8厘米,直径6.5厘米
烟盒高3.4厘米,直径3.8厘米



黄爵滋请求道光帝禁烟奏折



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立即与两广总督邓

林则徐像



廷桢等合作，雷厉风行地展开了禁烟行动。他们首先捉拿鸦片烟贩，惩治受贿官员。二月初四日（3月18日），向各国商人发出通知，向他们说明通商之利、贩烟之罪，要求他们将存于趸船上的鸦片全部交出，并要他们保证以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在通知中林则徐称：“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由于采取的措施坚决有力，到四月六日（5月18日），以英国为首的鸦片贩子共交出19187箱又2119袋鸦片。遵照道光帝的指示，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将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销毁的方法是在海滩上挖一个池子，先将鸦片放在池中用盐卤浸泡，再投入石灰使之烧化，然后引潮水冲入大海。有些外国人



参观以后，承认销毁工作十分认真。

二、炮舰入侵

鸦片贸易是一些英国人大发横财的手段，他们不愿意鸦片贸易就这么终止，英国政府也不希望由此损失巨额财源。道光十九年二月（1839年4月），在鸦片贩子答应缴烟之后，英国驻华商务总督查义律（C. Elliot）在给英国外相巴麦尊（H.J.T. Palmerston）的报告中，建议英国政府采取迅速而坚决的行动，给予中国政府以重大的打击。巴麦尊在接到义律的报告后，认为必须用兵。英国各大城市的一些商会亦纷纷上书英政府，要求采取有效办法，保护英商人在中国的利益。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作出武力侵华的决议。道光二十年正月（1840年2月），英国政府派出了一支包括军舰、运输舰、武装轮船等四十八艘船舰、四千多人的“东方远征军”，以英国好望角舰队总司令官乔治·义律（G. Elliot）为全权代表及侵华英军总司令，义律为全权副代表，于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到达广东海面，随即宣布封锁广州。一场为保

护鸦片贸易，掠夺中国财富，占领中国市场的战争即鸦片战争开始了。

当英国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林则徐也在广州积极备战。他在虎门海口外的海面安设木排铁链，购买西洋大炮，添筑炮台、炮位，大力整顿水陆官兵，还招募了一些渔民、蛋户加以训练。同时，他还请求清政府下令加强海防。英国侵略军到达广州海面时，林则徐移住虎门，校阅水师，并且张贴告示，动员民众准备作战。

英国政府的预定战略是直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因此英军到广东后只是封锁了广州海口，而后即开始北上。然而清政府对于这场战争是没有准备的，除广东、福建外，大部分海口都没有御敌设施，士兵所用武器不外弓箭、刀矛、鸟枪、扛炮等，因此，英侵略军北上，除在厦门海面与福建水师发生冲突外，在其他地方都没有遇到多大阻力。

六月初七日（7月6日），侵略军到达定海，大肆抢掠一番后，留下部分兵力驻守，主力继续北上。七月十六日（8月11日），英军到达天津白河口，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照会交给了直隶总督琦善。英方

奏為虎門銷化烟土公同嚴實稽查現已一律完竣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等欽遵
諭旨將夷船繳到烟土二萬餘箱在粵銷燬所有嚴實杜弊並會督文武大員公同目擊情形已於
五月初三日銷化及半之時先行恭摺會
奏在案嗣是仍照前法劈箱過秤將烟土切碎拋
入石池泡以鹽油爛以石灰統候戰化成渣於
退潮時送出大海臣等會督文武員弁逐日到
廠看視稽查其間非無人夫乘機圖竊而執事
員弁多人留神偵察是以當場掣獲之犯前後
共有十餘名均即立予嚴行懲治並有賊匪於
時烟處所乘夜爬牆鑿窗偷土亦經內外看守
各員弁巡獲破案現在發司嚴審尤當按律重
辟其意近聞人來報說看者端節前後愈見其

林则徐、邓廷桢、怡良奏虎门销烟一律完竣奏折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等人将销烟经过上奏道光皇帝，道光帝在奏后朱批：“可称大快人心事。”

虎门威远炮台遗址



在照会中一再诋毁林则徐、邓廷桢在广东查禁鸦片行为无道，并提出了割让海岛、赔偿烟价等无理要求。

道光皇帝看到英舰迫近京师，十分紧张，这时，投降派也纷纷跳出来活动，攻击林则徐禁烟过激，惹来了兵祸。道光皇帝从英国的照会中得知英国兴师动众针对的似乎只是林则徐等人，于是就顺水推舟，在谕旨中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措置失当，大皇帝一定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琦善在白河口与英军会谈，说只要英军退回广州，一切问题待到广州谈判，就可以满意解决。八月二十日（9月15日）英军同意离开白河口返回广州。道光皇帝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接任两广总督，到广州继续与英国人谈判。

琦善到广州后，为了表示议和的诚意，一反林则徐所为，在军事上实行撤防、裁减水师，遣散林则徐招募的水勇，听任英军派小艇探测内河水道。在同英方谈判过程中，英方态度傲慢，动辄呵斥，一开口即言打仗。琦善同意赔偿英国鸦片烟价六百万两，但割让海岛之事他不敢做主。英军为了压迫琦善彻底投降，决定战后再商，于道光二十年十

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由穿鼻洋攻占虎门大角、沙角炮台，并向琦善提出以香港换沙角的要求。琦善立即妥协，表示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地，可把香港给予英人寄居。十二月二十日（1月12日），义律发布告示，声称已与琦善达成协议，即所谓的《穿鼻草约》，内容包括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给英国，赔偿英国六百万两，恢复广州贸易等。在条款还没有签订的情况下，英军就单方面发布了香港归英管辖的告示，并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41年1月25日），对香港实行武装占领。割让香港，事关重大，琦善既不敢当面拒绝英方的要求，又不敢擅自在英方拟订的“善定事宜”上签字，只能称病作为缓兵之计。

道光皇帝原以为英军北上天津，只是为了反对销毁鸦片，以为一旦惩办了林则徐、邓廷桢，允许英国在广州继续通商，英国很快就会罢兵。当知道英国又提出割地赔款等更多的条件时，他大为恼火，感到有损天朝的尊严，于是又倾向于主战。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1842年1月27日），他发布讨伐令，命令琦善立即对英军痛加攻剿。在接到英军攻陷沙角、大角炮台及英军对香港进行

义律为占领香港给琦善的照会



占领的奏报后，道光帝又加派他的侄子奕山为靖逆将军，调各省防兵一万七千人，到广州去和英军作战，并痛斥琦善无能，下令将其革职，锁拿进京。

英军获悉清朝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就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于二月初六（2月26日）向虎门炮台发动进攻。水师提督关天培上炮台率部抵抗，与将士数百人壮烈牺牲。英舰开进内河，逼近广州城下。

奕山到达广州后，在军事上不做部署，只想侥幸取胜，四月初一日（5月21日），派

军队乘快船出动，携带火箭、喷筒，夜袭英船。第二天，英军发动反攻，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清军一万多人退入广州城内。英军接着攻城，奕山挂起白旗投降，四月初七（4月27日）与英军订立了《广州和约》，作为停战条件。其主要内容是：奕山率中国军队撤出广州城；于一星期之内交付赎城费六百万元，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赔偿英商馆损失费三十万元。奕山迅速兑现了这些条款，英军在取得赔款后，退出虎门。与琦善、奕山的投降行径相反，广州一



三元里抗英民众誓师处——三元古庙

带的广大人民对侵略者充满了仇恨，自发地组织起来，抗击英军的侵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九（5月29日），英军二百多人到广州城郊的三元里进行抢掠时，三元里民众奋起抵抗，将英军包围。第二天，英军派来增援部队，乡民依然不退，反而聚集起更多的人。来自广州城北一百零三乡的民众几千人，竖起平英团大旗，将英国侵略军的营地四方炮台包围。这些普通的老百姓，用最简单的武器——长矛、盾牌等同敌人展开了肉搏。在这些普通的民众面前，侵略者无计可施，只好向广州知府余保纯求救。在余保纯软硬兼施的劝说下，乡民才逐渐退去。

奕山等战败投降后，却向道光皇帝谎报军情，把大败说成大胜，把交赎城费六百万元说成是代商行还清商欠，把退出广州城说成是下乡弹压土匪，最后要道光帝批准英人的请求，恢复贸易。而道光皇帝居然以“不值得与英人计较”为辞，表示同意。同时道光皇帝还认为既然英人已经退出虎门，战争也就该结束了，于是下令将前一时期的广州和沿海各省为加强防守、从外省调集的官兵一律加以裁撤。

三、战争的扩大

侵略者却不以为战事已经告终。当《穿鼻草约》的条款传到英国后，英国政府认为勒索太少，大为不满。于是解除了义律在华的一切职务，改派璞鼎查（S. H. Pottinger）为全权代表，来中国索取更多的权益。六月二十四日（8月10日），璞鼎查到达广州，立即向广东当局提出议和纲要一份，声称如中国不接受纲要上的全部条款，他就北上进攻。

奕山还没来得及将这个纲要送往北京，璞鼎查就率兵舰突袭了厦门，并在占领厦门

后，继续北上。

厦门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帝才从梦幻中醒来，急忙通知沿海各省加强防务，可是，这时英国舰队已经开到浙江海面，准备再一次攻打定海了。八月十一日（9月25日），英军向定海发动进攻。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五千守军坚决抵抗，激战六昼夜，相继战死，定海再度失陷。接着，英军又攻占了镇海和宁波，负责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裕谦在镇海失陷后自尽。

浙江连失三个沿海重镇，道光皇帝感到事态严重，派他的另一个侄子奕经为扬威将军，调集内地数省军队，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奕经从北京出发后，一路游山玩水，经过四个月才抵达绍兴，而且根本不做战事准备，同奕山一样，只想侥幸取胜。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1842年3月10日），奕经集中水陆兵勇一万多人，分兵三路企图同时收复定海、镇海、宁波三城。然而英军已探知清军的用兵计划，早有准备，三路进袭的清军都被击退，奕经收复城池的行动彻底失败。从此，清政府不敢再战，决定同英人讲和，派盛京将军耆英和原来因与侵略者妥协而被撤职的两江总督伊里布，赶往浙江同英军议和。但是英军觉得议和的时机尚未成熟，对于耆英等人的求和姿态根本不予理会，决定入侵长江，占领中国最富庶的地方。

四月初（5月中旬），英军撤出宁波、镇海，开始进犯长江。吴淞、宝山、上海相继失守，英军由吴淞口进入长江。长江两岸军备空虚，侵略军沿途基本没有受到多大抵抗就到达了镇江江面。镇江城外守军不战即溃，城内守军对英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镇江失陷后遭到英军大肆焚掠，成为一片废墟。六月二十五日（8月1日），英舰驶抵南京城外。

四、南京条约

镇江陷落，切断了南北交通。英军为了逼迫清政府彻底投降，扬言将攻打南京，并且还要接着攻打天津、北京。清统治者被吓坏了，钦差大臣耆英及伊里布赶到南京，对英人提出的议和条件无不接受。议和条件报到北京后，道光皇帝也都全部允准。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在南京城下的英国军舰上，耆英与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也叫《江宁条约》，当时清政府又名之为《万年和约》。主要条款为：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为通商口岸，英人可以携带家眷到五港口居住；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兵费一千二百万元，共两千一百万元。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43年7月22日）耆英与英人在广州订立了《五口通

商章程》（附海关税则），八月十五日（10月8日）又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附约规定中国要想确定海关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必须同英国人商量；英国人如果在中国领土上犯了罪，中国官吏无权根据中国的法律来判罪，而是要由英国的领事根据英国的法律来裁定；中国将来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英人可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等等。这样，英国又在中国取得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租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

五、列强效仿

鸦片战争前，美国的对华贸易及对华的鸦片贩运仅次于英国。《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资产阶级看到英国从中国得到了那么多的权益，非常眼红。美国总统泰禄（J. Tyler）立即派了一个特使加勒·顾盛（C. Cushing）

香港开埠图

油画

长89厘米，宽57.5厘米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正式将香港割让给英国，香港成为英国在亚洲的经济基地。



晚清时的澳门

油画

长62.5厘米，宽49厘米
明朝嘉靖以后，葡萄牙人借口晾晒货物强行租借澳门。1849年，葡萄牙澳门总督宣布拒交关税，封闭粤海关驻澳门办事处，勒令中国海关人员限期撤离澳门，强行占据中国居民的民房，进一步夺取了澳门的管辖权。1887年3月，清政府与葡萄牙订立条约，允许葡萄牙人“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

到中国来攫取权益，并且模仿英国的经验，以炮舰的威胁作为提出要求的后盾，因此和顾盛同来的还有三艘美国炮舰。加勒·顾盛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1844年2月）到达澳门后，立即同护理两广总督的程裔采交涉，表示要到北京向皇帝递国书，同中国订立永远和好条约。

清政府只得又派耆英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和顾盛谈判，五月十八日（7月3日）耆英本着“一视同仁”的原则，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与顾盛签订了《五口贸易章程》，又称为《望厦条约》。《望厦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以外，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中的一切内容，承认美国在中国享有和英国相同的一切特权，而且有些项目比英国的条约更具体，损害中国的主权更多。如领事裁判权的适用范围扩大，不只中国和美国人之间的争执，美人由美领事审讯，而且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华的争执，亦由美领事处理；在关税方面则规

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官议允”；另外还有美国贸易船只进入中国通商口岸停泊，“中国无从统辖”，美国兵船到中国各口岸“巡查贸易”，中国港口官员须负责接待；准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条约十二年一修；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等等。

《望厦条约》签订后，顾盛得意地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开得更宽阔了。”

《望厦条约》签字后不久，法国也派特使刺萼尼（T. de Lagrene）带领八艘军舰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1844年8月）到了澳门。鸦片战争前，法国在华重视传教，对华贸易远在英美之后。《南京条约》签订后，也企图乘机牟利。耆英与刺萼尼谈判后，双方于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



法国军舰上签订了一个条约，被称为《黄埔条约》。事后，耆英向皇帝报告说：“该夷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条款，一切均照英、米（美）二夷新例，字句互有异同，情节尚无出入。”这就是说，凡英国人、美国人得到的好处，都同样给了法国人。不但如此，还给了法国人一些新的特权，如对于天主教问题，《黄埔条约》就特别规定了一条：“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在刺萼尼的活动下，道光二十六年正月（1846年2月），道光皇帝又发布上谕，取消了关于中国人信奉天主教的禁令。

清朝政府与英、美、法定约后，其他西方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等也都跟着效仿，先后前来要求订立通商条约，争夺权益。腐朽的清朝统治者本着所谓“一视同仁”的原则，一概准允。这样一来，中国的大门就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了。

鸦片战争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使中国丧失了司法、海关、关税等主权，从此，中国丧失了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社会内部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公开化。洋商在各海口设有囤积鸦片的趸船及运送鸦片的“飞剪船”。道光二十二年（1842），输入中国的鸦片有33万箱，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增加到58万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靠鸦片掠夺走中国的巨额财富，残害中国人的身体。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

清朝吏治本就腐败，国库空虚，战争又使军费增加，大量鸦片进口使白银外流严重，还有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这些钱都要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负担。

第二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修约的提起

西方列强虽然通过《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了诸多的特权，但是随着其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有更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因此，他们对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愈来愈不满足。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英外相克兰顿（L. Clarendon）即训令新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包令（J. Bowring）实行修约要求。

克兰顿希望与美、法共同行动。法国为扩张在华传教活动，提高自己的声势，自然愿意支持英国。美国自与中国订约后对华贸易增长四倍，但并未满足所欲，修约亦是其所愿。咸丰四年三月（1854年4月），三国公使一起来到广州，致函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英国提出修约的主要内容是：准英人随意来往中国内地及沿海各城，实行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不得征收内地通过税，准英使入住北京。美国提出要在长江及其支流的任何口岸城市及港湾进行贸易，美国人可以进入中国内地任何地区贸易、传教、居住，并自由租赁、建筑。法国除提出类似的要求外，还要求释放非法潜入陕西而被捕的法国传教士。

叶名琛接到三国要求修约的信函后，深知此中的利害关系，采取避而不见的办法。此后，三国公使又到南京、上海活动，均没有成功。于是，他们便寻找时机，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二、英法联合，战争再起

终于，英法两国都找到了动用武力的借口，这就是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所谓亚罗号事件是咸丰六年九月十二日（1856年10月10日）广东水师捉拿海盗，在亚罗号上逮捕了十二名中国水手。亚罗号是一艘中国快艇，为了便于走私，船主曾在香港注册，但事发时登记已过期。但是，为了挑起事端，英国方面竟然提出抗议，说中国官兵无权到英国船上抓人，要求释放所抓之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两广总督叶名琛害怕事态扩大，将所抓之人全部释放。英人又借口没有道歉，不予接受。

九月二十五日（10月23日），英国海军开始行动，三天之内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兵临广州城下，并一度攻入广州城内，纵火焚烧大批民房，抢劫总督衙门。但在广州民间武力和一部分兵勇的强烈抵抗下，英军因

兵力不足，又被迫退出，占据虎门等待援军。

咸丰七年二月（1857年3月），英国政府通过了以亚罗号为借口对华使用武力的决定，派额尔金（L. Elgin）为使华全权代表，率远征军到中国，向中国提出赔偿损失、公使驻京、增辟租界、修改税率及内地传教的要求。

法国决定同英国一起行动，他们利用的借口就是马神甫事件。咸丰六年一月二十四日（1856年2月29日），法国的传教士马赖（A. Chapdelaine）因违约潜入内地传教，被广西西林县地方官吏处死。因此法国也打着昭雪西林血案的旗号，派出兵舰到达中国。

咸丰七年十一月（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俘获了叶名琛。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决定北上，直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三月（4月）联军到达大沽口外，美舰三艘和俄舰一艘也同时到达。清政府根本没有作战的准备，只想请美使和俄使从中调停。四月八日（5月20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口炮台发起攻击，守卫炮台的大员闻声先退，炮台失陷。联军很快溯白河西上，直抵天津城下。清政府慌作一团，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前往天津，向侵略者乞和。在谈判过程中，英法动辄以打入京师相威胁，提出更多的条件。在侵略者的军事威胁下，五月（6月），清政府的谈判代表与英法分别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俄美两国也借口调停有功，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及中美《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订立后，清政府派出代表与英、法、美三国特使在上海举行税则谈判。清统治者对《天津条约》中的公使进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赔缴兵费始退还广州等四项条款十分担心，想把在敌人炮口下做出的

占领广州城的法国士兵



可耻屈服，在谈判桌上说服敌人取消掉。因此，咸丰多次指令在上海同额尔金、葛罗等谈判的桂良、何桂清等人乘谈判之机修改《天津条约》，他甚至答应以免除关税来作为修改条约的交换条件。但是，英法谈判代表称，即使免除了关税也不能修改条约。这样，咸丰的幻想化为了泡影。十月（11月），清政府的代表又同英、法、美三国在上海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及《海关税则》，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

归结起来，《天津条约》和《海关税则》主要内容为：外国公使驻京；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十处为通商口岸，外国船只可来往于各通商口岸；外国人往内地通商、游历、自由传教；凡与外国人相涉的案件，皆归外国人查办；鸦片贸易合法化；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进出口货物除丝、茶、鸦片外，一律值百抽五；请英人帮办海关税务；对英

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

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天津条约》规定一年后正式换约。咸丰九年五月（1859年6月），预定换约的时间已到。这时，英法等侵略者对《天津条约》所规定的条款已感到不满足，他们要趁进京换约的时候向清政府要求更多的特权。五月十七日（6月17日），英、法公使率兵舰二十余艘、军队二千多人到达大沽口外。

清政府同意英法特使进京，但要求各国公使须按指定的路线走，随行人员不要超过二十名，并不得携带军械。英法侵略者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五月二十六日（6月25日），他们强行拆毁天津海口的防御工事，开炮轰击大沽口炮台。守卫炮台的中国军队被迫发炮还击，击沉、击伤敌舰十余艘。经此打击，英法公使只得率残余舰只退到上海。美国公使遵照清政府指定的路线入京，交换了中美

中英《天津条约》签字时的情景



《天津条约》。

英法侵略者对这样的失败是不甘心的。咸丰十年（1860）春，英法两国又派出更多的兵力和船舰来到中国。七月五日（8月21日），英法联军再次攻下大沽口炮台，随后从白河长驱直入，攻陷天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到天津议和，英法特使提出了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的条件。清政府有意不允，英法步步紧逼，派军队向北京进发，八月七日（9月21日），攻下通州八里桥，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慌忙逃往热河，任命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督办和局”。八月二十九日（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在北京烧杀淫掠、大肆抢劫。有着一百五十年历史、综合中西建筑艺术、聚集着无数珍宝和古今艺术品、收藏着大批珍贵文物和图书的圆明园，遭到了野蛮的抢劫。金银财宝、珍贵文物，凡是所能搬动的都被抢走，无法拿走的尽行打碎。最后又放火焚烧，

大火三天三夜不熄，一座世界上少有的壮丽宫苑和皇家园林变成一片废墟。

这时的清统治者已没有任何反抗能力了，惟有答应侵略者的一切条款。咸丰十年九月十一日和十二日（1860年10月24日、25日），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先后签字。《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外，又增加了以下几项内容：中国对大沽口事件谢罪，把对英、法的赔款都增加到八百万两，外加抚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割九龙司给英国。充当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又在条约中偷偷加入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沙俄也再一次借口调停有功，强迫清政府与它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美国虽未和清政府另订新约，但根据“一体均沾”的最惠国待遇，也取得了其他国家所得到的特权。

九龙是与香港毗连的半岛，英国自从侵占香港后，便以港岛为基础谋占九龙。道光

圆明园大水法遗迹





残存的圆明园文渊阁藏《四库全书》

二十七年七月四日（1847年8月14日）英国远东舰队司令马糜各厘（M.Seymour）提出了占领九龙半岛的“理由”，他在致皇家工兵司令的信中写到：“我认为迫切需要占有九龙半岛和昂船洲……是为了给日益发展的香港社会提供安全保障和必需的供应。”咸丰八年（1858年）春，参加侵华战争的一些英国军官重新提出了割占九龙半岛的建议，认为为保护英国远东日益增长的利益，需要“扩大和增加”海军基地。英军将领关于割占九龙半岛和昂船洲的建议送达伦敦以后，被英国政府采纳。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1858年6月2日），外交大臣姆斯伯里（Malmesbury）写信命令驻华全权特使额尔金：“一旦出现机会，应竭力通过条约从中国政府手中将这些地方割让给英国政府，至少要割占香港对面的九龙岬角。”咸丰十年二月二十六日（1860年3月18日），新任侵华陆军司令克灵顿（H.Grant）指挥英军第四十四团特遣队强行侵占了九龙半岛岬角——尖沙咀一带。二月二十一日（3月21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S.Parkes）强迫两广总督劳崇光签订租约，规定将九龙半岛南端包括昂船洲在内租借给英国。英法联军占

领北京以后，清统治者完全屈服，签订《北京条约》时，按照英国特使额尔金的要求在条约中增加了“广东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界内”的条款。至此，中国新安县九龙司的一部分领土，即九龙半岛今界限街以南部分（包括昂船洲在内），终于在英国侵略者的炮口下完成了由强占而强租、由强租而割占的过程。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与英国公使窦纳乐



残存的圆明园长春园画玲珑馆陶嘉书屋门上铺首

在北京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根据这一专条，英国获得了九龙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以南的租借权，包括大小岛屿 200 余个以及大鹏湾、深圳湾水域，总面积 975.1 平方公里，这也是后来统称为新界的地方。租期为 99 年。英国攫取到的这片租地，比此前霸占的香港岛和南九龙半岛的总面积还大 11 倍，水面面积扩大了约 50 倍。从此，整个香港地区便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四、沙俄侵占中国大片领土

沙俄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封建帝国，早在清前期就侵入到黑龙江流域，在黑龙江北岸建立了尼布楚城，并在黑龙江上建立了一个前哨小站雅克萨。康熙二十四年（1685）和二十五年，清政府两次派兵围攻雅克萨，击败沙俄侵略军。康熙二十八年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这个地区的中俄边界，自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沿大兴安岭向东，直到海边，以南是中国领土，以北是俄国领土。此后的一百多年，中俄之间一直遵循这个条约。

然违反条约。咸丰十年（1850），擅自在黑龙江口的庙街（今尼古拉耶夫斯克）竖立俄国国旗，设兵屯守，并几次以强大的船队在黑龙江上航行，提出两国应该以黑龙江为界的无理要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政府一面派公使随英、法、美一起活动，对清政府进行讹诈，一面对黑龙江左岸进行事实上的占领。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5月），清政府派黑龙江将军奕山同俄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瑷珲谈判，订立了《瑷珲条约》。条约中有以黑龙江为两国国界的条款。根据这个条约，中国损失了大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 6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海边的约 40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则被说成是属于中俄共管之地。两年之后，在中俄《北京条约》中，这片共管之地也被划为俄国的领土。

在割占黑龙江流域大片中国领土的同时，沙俄对中国西北地区的领土也大肆进行侵占。中国在新疆的西北国界原来是在巴尔喀什湖的北岸。道光二十七年（1847），沙俄武装侵入到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咸丰四年（1854）又把伊犁河下游一带

沙俄割占中国领土示意图

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沙皇俄国开始公



据为己有。咸丰十年(1860)沙俄在中俄《北京条约》中,硬指中俄西段是以巴尔喀什湖以东300多公里的斋桑湖和以南400多公里的特穆尔图淖尔(今俄国伊塞克湖)为界湖。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10月)沙俄又强迫清政府与它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连中俄《北京条约》中定为界湖的特穆尔图淖尔也被划为沙俄的内湖。沙俄通过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共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共侵占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144万多平方公里。

第三节 中法战争

一、法国对越南的侵略

法国侵略者为了进行领土扩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一面追随英国对中国用兵,一面对越南进行武装侵略,先后攻占西贡等城,强迫越南签订《西贡条约》,割占西贡等地。

法国的野心不仅是要把越南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而且还企图由此打开通往中国西南地区的大门。同治五年(1866),法国侵略者组织了一个探察团,从西贡出发,溯湄公河而上,深入到中国云南境内的思茅,又经过云南东北部的会泽到了四川的宜宾。他们发现湄公河不适于通航,因此转而企图利用越南北部的红河作为进入中国的通道。

为了占领越南北部,控制红河航行权,法国侵略者在同治十二年(1873)出兵袭击河内及附近各地。活动在中越边境上的黑旗军在刘永福的率领下,应越南国王之邀同法

国侵略者作战,大败法军,杀死法将安邨(F. Garnier)。刘永福(1837—1917)是广东钦州人,1875年参加天地会,1864年组织起黑旗军,1867年转移到中越边境保胜地区活动,力量逐渐壮大。打败法军后,刘永福被封为越南的三宣副提督,他的部队驻扎在越南的宣光、山西、兴化三省,控制着红河上游。

光绪八年三月(1882年4月),法军集结兵力,再次入侵河内,黑旗军奋起抵抗。光绪九年四月(1883年5月),两军在河内附近的纸桥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黑旗军又一次获胜,当场击毙法军司令李威业(H. Riviere)。法国政府任命新的统帅,加派军队,发动了新的进攻,驻扎在越南北部的中国军队只有黑旗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河内附近使法军受到挫折,而其邻近地区的清军军纪不整,一触即溃,越南北部的山西、北宁、太原、兴化等省先后被法国侵略军占领。

对于法军的节节进攻,清政府中也有一部分人看穿了法国的用意,明白越南与中国有唇亡齿寒的关系,主张不惜一切,对法一



刘永福像

战。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当权派惟恐对外战争会加深自己内部统治的危机，而采取妥协苟安的方针，派出李鸿章与法国方面进行谈判。光绪十年四月（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在天津订立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法国有权“保护”越南，中国撤回在越南的驻军。

光绪十年五月（1884年6月），法军到达接近广西边境的谅山。限令清军在三日内交出谅山，清军以未接到撤防命令而拒绝，法军强行前进，炮击清军住所，被清军击退。法国方面趁机扩大事态，反诬中国破坏条约，以最后通牒方式限清政府七日内从北越撤军，要中国为这次军事行动赔偿法国损失二亿五千万法郎，并且声称要以海军进攻中国。清朝政府虽然认为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但仍答应一个月内撤兵，并以抚恤名义付给法国白银五十万两，法国拒不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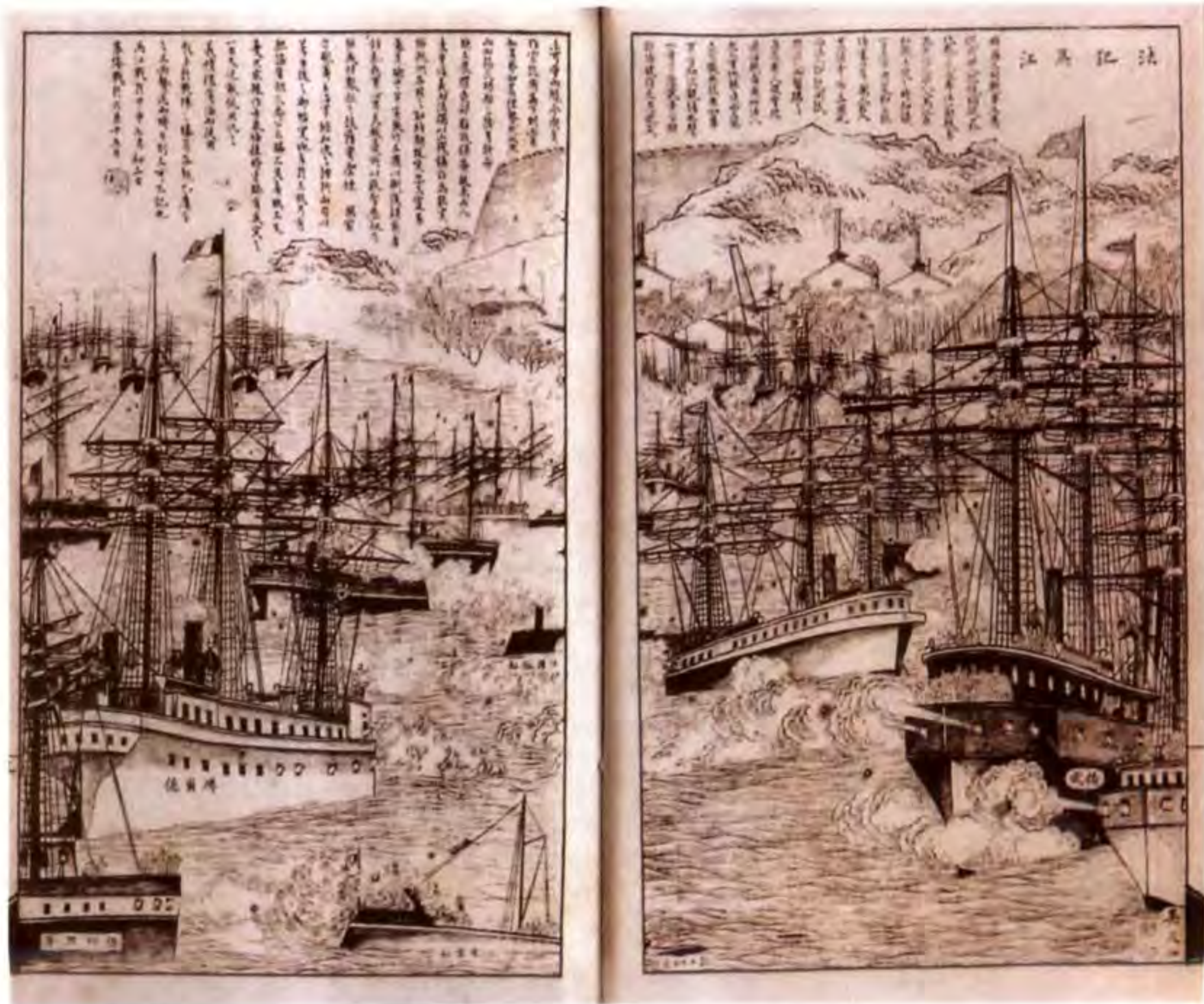
二、马尾海战

法国一面从外交上对中国进行恫吓，一面积极进行占领中国沿海港口的军事部署。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一日（1884年7月13日），法国海军舰队驶入福州马尾港。主管福建水师的官员惟恐有碍和议，既不阻止，又不设防，听任法舰同中国舰队停在同一港内。六月十五日（8月5日），法舰炮轰台湾基隆，被台湾军民击退。七月三日（8月23日），马尾港内的法国舰队向福建水师发动攻击，福建水师仓促迎战，在侵略军优势炮火的轰击下，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停在港内的中国大小兵船11艘、商船19艘全部被击沉。洋务派经营十几年的马尾船厂也全部被摧毁。

马尾海战，使得清统治者尽量避开战争、利用和谈解决问题的想法破灭了。七月六日（8月26日），清政府被迫下令对法宣战。

《法犯马江图册》

载于《点石斋画报》
描绘停泊在马尾港的中国船舰遭到法国军舰突然袭击的情形。



八月十三日(10月1日),法军再次向台湾发起攻击,占领基隆,继而又占领澎湖,对台湾采取封锁政策。

三、镇南关、谅山之战

在越南北部的战场上,法国调集大批军队,于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和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九(1885年2月13日和23日)分别攻占谅山和中国的边防重地镇南关(今友谊关),局势非常危急。在紧要关头,清朝当局起用年近七十的老将冯子材抗敌。冯子材(1818—1903),广东钦州人,早年曾参加天地会起义,后接受清政府招安,1863年至1882年任广西提督。来到前线后,冯子材收集溃散的兵勇,以决心抗法的斗志激励部下,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光绪十一年二月八日(1885年3月24日),在镇南关外,清军同法国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法军死伤千余人,其余的仓皇后撤。冯子材率军继续向前,二月十三日(29日)收复谅山。镇南关大捷的同时,北越西线的黑旗军与越南义军配合,在临洮大败法军,恢复了许多州县,法军陷于苦战。

四、“不败而败”、“不胜而胜”的结局

但是,前方坚决抗法官兵取得的胜利,却成了清朝政府乞和的资本。李鸿章一贯主张只要多少能保全“面子”就该妥协求和,这时又大肆鼓吹“乘胜即收”。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1885年4月7日),清政府颁发停战令,下令前线停战撤兵,命李鸿章继续与法国议和。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J. Patenotre)在天津签订了《会订越南条约》,清政府承认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同意法国在中越边境开埠



冯子材像

通商;规定中国以后如在广西、云南修筑铁路,要同法人商办;法人退出台湾、澎湖。从此法国侵略势力逐渐侵入中国西南各省。

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妥协投降政策,导致了“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局面,助长了其他资本主义列强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的野心。

第四节 甲午中日战争

中法战争结束后十年,发生了中日战争,这次战争从光绪二十年六月打到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4年7月至1895年3月),历时八个月。因光绪二十年是甲午年,所以一般把这次战争称为甲午战争。

一、日本蓄谋扩张侵略

这次战争是日本政府推行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日本政府是蓄谋已久、做了充分准备的。日本从1868年(同治七年)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侵略性。1871年(同治十

年),日本就找借口把琉球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于1879年(光绪五年)彻底吞并了琉球。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派兵三千多人,突袭中国台湾南部的琅峤。台湾人奋力抵抗,日军肆行焚杀。中国方面虽提出抗议,但却不敢武力抵抗,听任英、美、法调停,与日达成协议,送给日本白银五十万两作为退兵条件。

其后,日本又积极向朝鲜扩张,并做着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准备。1876年,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准许日本在朝鲜驻使通商,订明朝鲜是自主之国,否认与中国的宗主关系。光绪十一年三月四日(1885年4月18日),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天津会议专条》。其中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行文互相知照。后来日本就是利用这一条,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光绪二十年春(1894),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国王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要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日本为了给自己出兵制造借口,也极力怂恿清朝出兵,并假惺惺地表示:如果清政府帮助

朝鲜镇压起义,我政府必无他意。与此同时,日本设立大本营,秘密下达动员令,准备挑起战争。

五月一日(6月4日),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总兵聂士成率兵一千五百人到朝鲜牙山,并根据天津会议专条的规定,行文通知日本政府。这时,日本见其阴谋得逞,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派出数倍于清军的兵力进入朝鲜,占领朝鲜首都汉城。为进一步发动战争做准备。

朝鲜的农民起义平息以后,清政府建议两国军队同时撤离朝鲜。日本政府借口帮助朝鲜改革内政,不但拒不撤兵,而且陆续增兵到一万多人。中国军队被隔绝在牙山一带,孤立无援,完全落入日军陷阱之中。

在日本步步进逼、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下,清统治者只想避战求和,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列强的调停上,根本不做战事准备。主持外交的李鸿章在给叶志超的电文中说:“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他又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文

日本军队入侵朝鲜

1894年6月,日本借口保护使馆派兵在仁川登陆,蓄谋挑起与中国的战争。



中说：“日本先开战，将来各国议开衅之罪必问日。”

二、日本突然袭击

当李鸿章还在做着天真的美梦时，日本已经动手了。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日军突然包围朝鲜王宫，俘虏朝鲜国王，组织起一个傀儡政权，并迫令这个傀儡政权邀请日军驱逐在牙山的清军。李鸿章被迫决定派兵增援，雇用英国商船运兵到牙山，以为用英国船就可以得到英国国旗的保护。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当运兵船“高升号”行至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时，遭到日舰突袭，被鱼雷击中沉没，船上一千余名官兵除少数逃生外，大多遇难。与海上行动同时，日本军队在陆上也开始行动，向驻牙山的清军发动袭击。清军一触即溃，放弃阵地，逃到平壤。日本不宣而战，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七月一日（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同一天，日本也正式宣战。

清朝政府从陆上派出的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平壤，加上从牙山败退下来的军队，在朝清军共有一万四千人，由从牙山逃来的叶志



邓世昌像

超做统帅。然而，这么多的军队聚集在平壤，既不主动出击，又不积极部署防御，只是坐守孤城，等待挨打。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日军分四路进攻平壤，清军仓促迎战，分兵把守各城门。其中最英勇奋战的是守卫北城玄武门的将领左宝贵，他站在城上指挥士兵抵抗，被敌人的炮火击中阵亡。统帅叶志超一看战场形势不利，下令各军弃城逃跑，城内的军火粮饷都留给了日军。溃退的清军一口气退回到鸭绿江以北的中国境内，实际上把战火引到了国内。



甲午海战中被清军击中的日本旗舰“松岛”号

日军野蛮屠杀中国平民

日军占领旅顺后，在旅顺展开了野蛮的大屠杀，据说全城只剩下36人作为抬尸队，掩埋死难者尸体。



三、黄海大战

平壤失守后两天，中日海军在黄海发生激战。八月十七日（9月16日），北洋海军舰队从大连护送运兵船到大东沟。十八日中午准备返航时，十二艘日本军舰突然出现，向中国军舰发起攻击。海军提督丁汝昌指挥中国军舰仓促迎战。丁汝昌一开始即受了重伤，主力舰“定远”、“镇远”在不利的形势下，一直坚持战斗。“致远”作战勇猛，在受到重创、弹药将尽的时候，仍开足马力猛冲，欲与敌主力舰“吉野”同归于尽，但不幸被鱼雷炸沉，舰长邓世昌及全舰250名官兵壮烈牺牲。战斗进行了五个多小时，北洋海军舰船被击沉四艘，死伤一千多人；日旗舰“松岛”中弹起火，弹药仓爆炸，死伤一百多人。“西京丸”被击毁，“吉野”被打得丧失了战斗能力。

这次海战，中国虽然失船较多，但主力尚存，仍能再战。可是李鸿章却被吓破了胆，

说北洋海军“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命令舰队躲进威海卫军港。后来旅顺危机，丁汝昌要求率海军全力支援旅顺，李鸿章却大骂：“汝善在威海卫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

四、东北陆战

九月（10月）下旬，日军分两路进攻中国。一路从朝鲜义州渡过鸭绿江，驻守鸭绿江沿线的清军四万多人望风而逃，日军很快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丹东），十一月（12月）中旬，又相继占领了凤凰城（今凤城）、宽甸、岫岩、海城等地。另一路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意在从后路抄袭旅顺。旅顺是北洋海军的一个基地，有炮台三十座，大炮一百五十尊，最称险固，从海上直接进攻并不容易。日军从辽东半岛登陆后，并未遇到多大抵抗就占领了金州、大连，十月二十五日（11月22日），旅顺被攻占。日军在旅顺屠杀四日，妇孺皆不能幸免。

五、威海卫的丧失

两个月以后，日本陆军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以同样从后面抄袭的办法进攻威海卫，日本海军则从正面封锁海口。登陆的日军不到十天就从后路攻占了威海卫的陆上炮台，海陆发炮夹击北洋舰队。舰队中一部分将领和几个外国顾问勾结，逼迫海军提督丁汝昌投降。丁汝昌拒绝投降，并下令沉船，受部将抵制，乃服毒自尽。十二日，外国顾问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向日军投降，尚存的十一艘舰只及一切军用物资，尽归日军所有，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负责组建北洋海军，陆续从英、德等国购买新式快船、鱼雷艇、铁甲舰；拨巨款修建旅顺、威海卫军港，营造船坞，修筑炮台；在天津设水师学堂，培养海军人才。至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海军正式建成，拥有大小舰船25艘。

甲午一役，北洋海军不堪一击，全军覆灭。这是清统治者腐朽统治的结果。光绪十四年以后，慈禧太后移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北洋海军停止购船，因此在船舰的速度及攻击力上都不如日本的舰队。李鸿章为了保住自己的势力，一味避战求和，不作主动出击，更加速了北洋海军的失败。

六、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东北的牛庄、营口、田庄台相继被日军占领，辽东战场六万清军全面溃败。清统治者惊恐万状，决定屈膝投降。日本侵略者也因为国内财政困难而无力再发动大的攻势，双方开始和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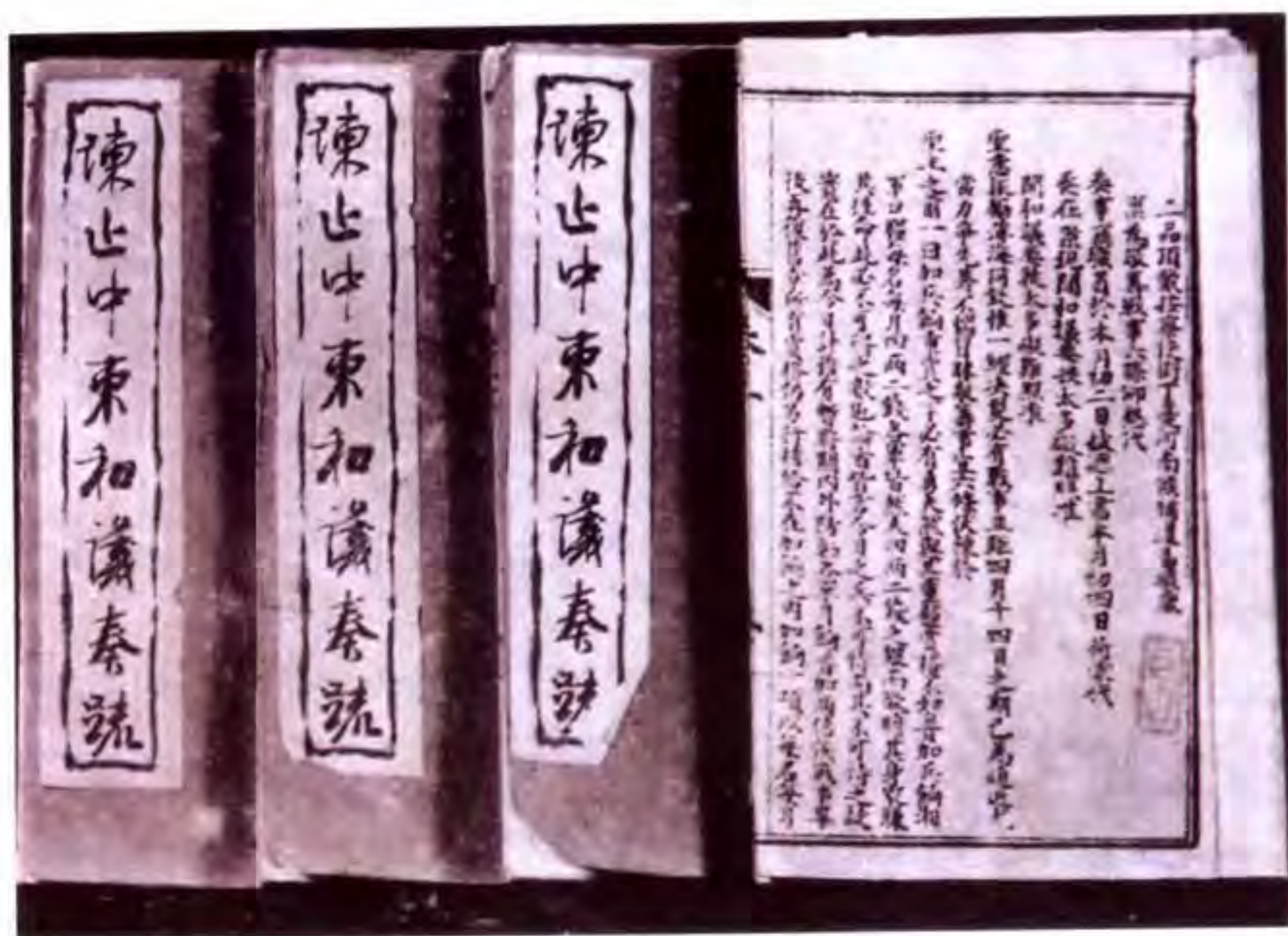
从中日战争开始，清统治者就一直在积



《马关条约》(局部)

极寻求英、俄、美等国的调停干涉，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在旅顺陷落之后，清统治者求和的心情更为迫切，派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曾任台湾巡抚的邵友濂到日本去议和。但日本政府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气焰极为嚣张，他们一方面认为逼迫清政府彻底屈服的时机未到，另一方面认为张、邵的资历太低，对他们根本不予理睬。他们要清政府派出一个有切实全权、资望最高的大员去和他们谈判。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在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谈判。在谈判中，日本代表摆出一副征服者的架势，一方面提出早已准备好的条件，要中国代表答复；一方面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作为威胁手段。日本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而要中国方面的答复只能是“允”或“不允”两句话。在日方的步步紧逼下，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与日



清政府官员反对《马关条约》的奏疏

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把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日本人得以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办厂，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第二年，根据《马关条约》，又订立《通商行船条约》，规定日本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

《马关条约》是自《南京条约》以来最为苛刻的一个条约，是日本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副沉重枷锁。它不仅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且助长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台湾被割让以后，被日本统治长达五十年之久。

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的条款，直接触动了对中国东北有着强大野心的沙俄。条约刚一签字，沙俄便纠集法国和德国出面干涉，劝告日本政府放弃辽东半岛。日本不敢得罪三国，便答应把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但又从中国索取了三千万两白银的赎地费。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收入的三倍，清政府为了向日本支付这笔赔

款，一方面加紧对国内人民的残酷剥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各种苛刻的条件下举借外债。西方列强通过借款给清政府，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这笔巨额赔款不仅大大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助长了日本统治者向外侵略扩张的贪婪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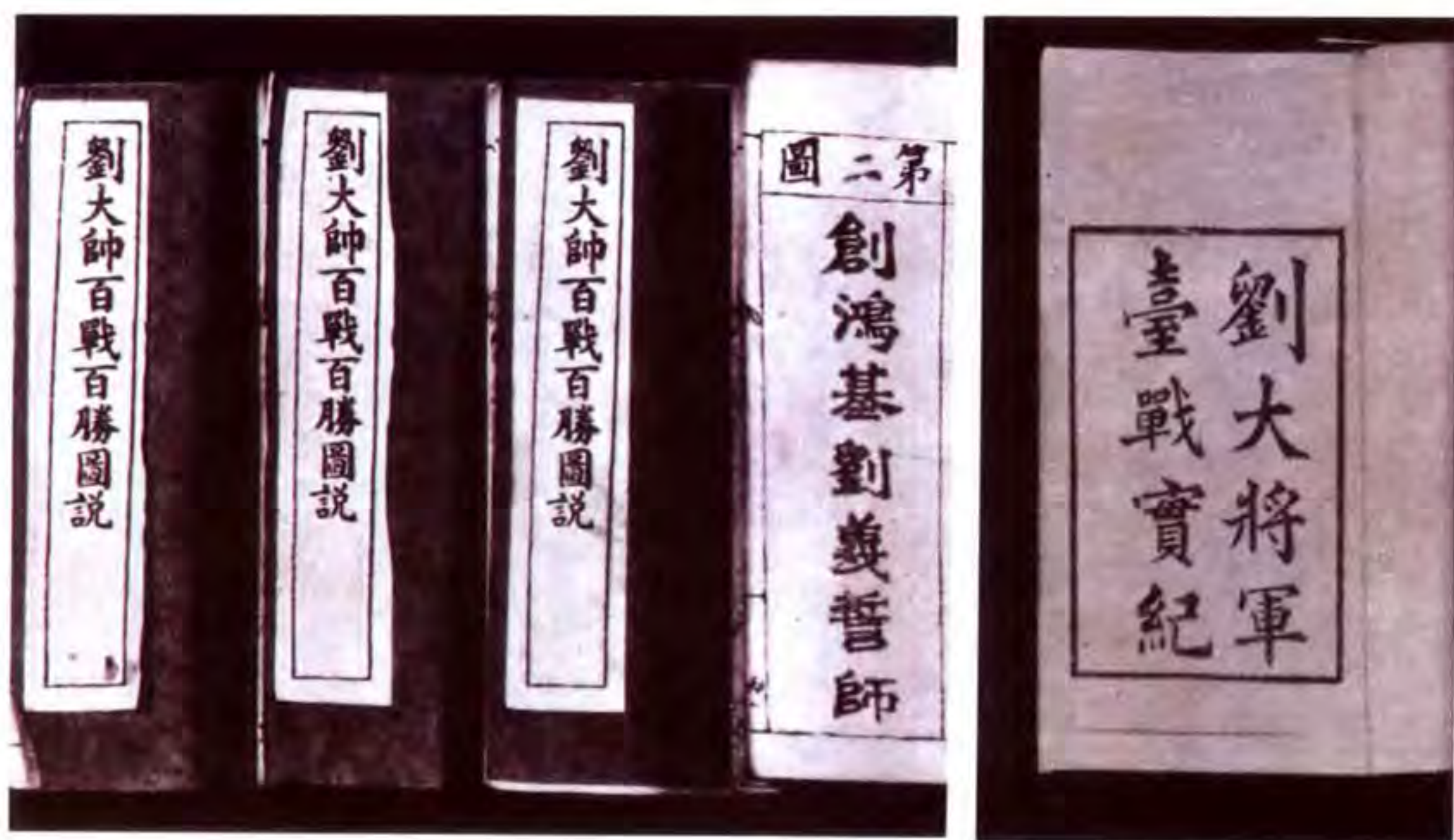
日本在中国投资办厂，利用中国的原料、人工，在中国制造工业品就地倾销，获取了比向中国输出商品高得多的利润。这也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愿望，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现在也都如愿了。

七、反对日本占领台湾的斗争

《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割地赔款、要求继续抗日的浪潮。正在北京应试的康有为联合进京会试的一千多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迁都、拒和、变法的要求。其中台湾籍举人更是义愤填膺地表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割台消息传至台湾，台湾人“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声称“誓不从倭”，“愿人人战死而守台，不愿拱手而让台”。台北人民鸣锣罢市，并涌进巡抚衙门，抗议清政府的卖国罪行。

清政府无视人民的愤怒呼声，决定如期交割台湾，命令台湾文武官员从台湾撤回；又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割台大员，前往台湾办理交割手续。五月十日（6月1日），在台湾基隆口外的日本船上，李经方偷偷与日本人办理了交割手续。

还在正式办理交割手续以前，日本军队已经从基隆东北登陆，五月十二日（6月3日），攻占了基隆，接着又迅速占领台北。台湾人民不甘心就此沦亡，吴汤兴、徐骧等纷纷组织起抗日义军。中日战争初期被清政府



反映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品

调到台湾的刘永福也表示要和台湾人民共同抗日，他亲自镇守台南，抵抗从海上进攻的日军，并派出一部分部队同义军配合作战，抵抗自台北南下的日军。

英勇的台湾军民以劣势的装备坚持抗击日本侵略者，使日本侵略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五个多月的激烈战斗中，日本侵略军死伤达三万二千多人，侵台主力、号称最精锐的近卫师团几乎被消灭一半。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军民的粮饷军火日渐缺乏，甘心卖国的清政府生怕得罪日本侵略者，一再下令严禁沿海各省支援台湾人民，刘永福几次派人回内地求援，都空手而回，这时，刘永福动摇了，他抛弃了自己率领的黑旗军和台湾人民，偷偷乘船逃回了厦门。八月二十九日（10月21日），台南陷落。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1月），日本侵略者宣布“台湾平定”，并准备在1896年元旦举行大规模的庆祝。可是台湾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继续以各种方式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斗争，等待日军所谓庆祝日的，却是台湾人民的武装暴动。1895年12月30日，黑旗军旧部林大北、林李成等围攻宜兰城。1896年1月，台北的陈秋菊、简大狮又率领

当地群众袭击台北。在台中、台南也都有抗日志士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

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政策。这种武力镇压只会激起台湾人民对日军的仇恨。在日本统治台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第五节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一、波及全国的反洋教斗争

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及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国内的地主统治阶级及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

各国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深入中国广大城乡传教，在各地建教堂，有的还强占土地房产，征收田捐租税，成了残酷剥削中国农民的大地主。一些不法教民依仗教会势力为非作歹，欺压百姓。这些都激起

义和团在北京散发的反洋人揭帖



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各地反洋教的活动此起彼伏。

在广泛的反洋教斗争中，同治九年（1870）爆发的天津教案，是前期最典型的一次。当时，天津时有拐骗幼儿的案件发生，据拿获的人犯供称系天主教堂指使；传教士主持的育婴堂这时又因传染病死去婴儿数十

名。消息传开，群情激愤。是年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近万名群众围聚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闻讯，胁迫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弹压，路遇天津知县刘杰时，又开枪打死刘杰的一名随从。群众忍无可忍，立即将丰大业毆毙。随后，天津城内的外国教堂、育婴堂、领事馆等建筑被愤怒的群众烧毁，二十名外国传教士、商人被打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火烧望海楼”。事件发生后，英、美、法、德、俄等七国联名向清政府抗议，并在天津海口和烟台集结军舰进行武力示威。清政府慌忙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及湖广总督李鸿章前往天津处置。迫于列强的压力，曾国藩答应处死所谓肇事民众二十人，流放地方官二十五人，付“赔偿费及抚恤费”五十余万两白银，并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道歉。天津教案后，全国舆论纷纷谴责曾国藩，大骂其为卖国贼。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面对着列强瓜分的狂潮，人民群众反帝情绪更加高涨，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五日（1895年5月28日），四川成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由成都而嘉定、叙州、新津，群众闻风而起，打毁教堂七十多处。六月十一日（8月1日），福建古田的秘密结社——斋教，发动群众焚毁教堂，杀死外国传教士十余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则是长期以来波及全国的群众性反洋教斗争的高峰。

二、义和团的兴起和壮大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活动在中国北方的秘密结社白莲教中的一支，主要成员为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等，以练习拳棒为主，宣称祈祷后口念咒语能刀枪不入，其基本单位叫“坛”或“拳厂”，没有统一的领导，有事

慈禧太后像



时，可由大坛发帖子邀请其他坛参加。随着西方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深入，中国人反抗外来侵略的情绪日益加强，义和拳逐渐活跃起来。

义和拳首先在山东运河两岸的农村流行，这里也是教堂、教民聚集较多的地方，以往，在教民与百姓发生冲突时，官吏不论是非曲直，总是袒护教民。义和拳则联合起来，聚众抗官，不但保护拳民，也保护平民。因此，义和拳的势力发展很快，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山东全省几乎都有义和拳在活动。

面对这种蓬勃而起的群众活动，清统治阶层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害怕其聚众抗官会危及到清政府的统治，主张进行严厉的镇压。另一种意见认为拳民的活动是由于洋人与教民扰害乡里，民间不堪其苦而引起，一味的镇压会激而生变，使其铤而走险，不如采取安抚的办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巡抚张汝梅在对义和拳采取镇压的方法失败后，遂向清政府建议将拳勇改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继任山东巡抚毓贤基本上采取的也是既剿之又抚之的方法。在此背景下，义和拳改称为义和团，由秘密转入半公开。

西方列强坚决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美国公使则直截了当地提出把毓贤撤职，换上有能力镇压义和团的人任山东巡抚。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以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袁世凯上任后，马上对义和团采取血腥的屠杀政策。山东人民恨透了袁世凯，民间流传“杀了袁鼃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有人在巡抚衙门的墙上画了一个头戴红顶花翎的大龟，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爬，以示对其的痛恨。

在袁世凯的大力镇压下，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山东的义和团开始向外转移，进入到直隶、天津，与当地的义和团汇合，掀起了声势更大的运动。义和团在所经过的地方散发揭帖，声称要杀洋人，灭洋教。四月（5月），义和团已遍布直隶全境，北京也已有义和团在活动。五月，京郊的义和团高举杀洋人的大旗纷纷进到城内。一时间，北京城内到处都有人设坛练拳。

面对京津地区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掌握着最高统治权的慈禧的态度在镇压与安抚之间摇摆不定。不镇压，一怕西方列强不答应，二怕义和团势力越来越大，失去控制，危及自己的统治；镇压，又怕失去顽固派的支持，又怕本来义和团的矛头是对准洋人的，反而会引火烧身，使得义和团掉转头来对付自己。慈禧的这种态度，决定了她在对义和团的政策上的变化不定、反复无常。

这时，西方列强一方面给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清政府严厉镇压，一方面决定直接出兵镇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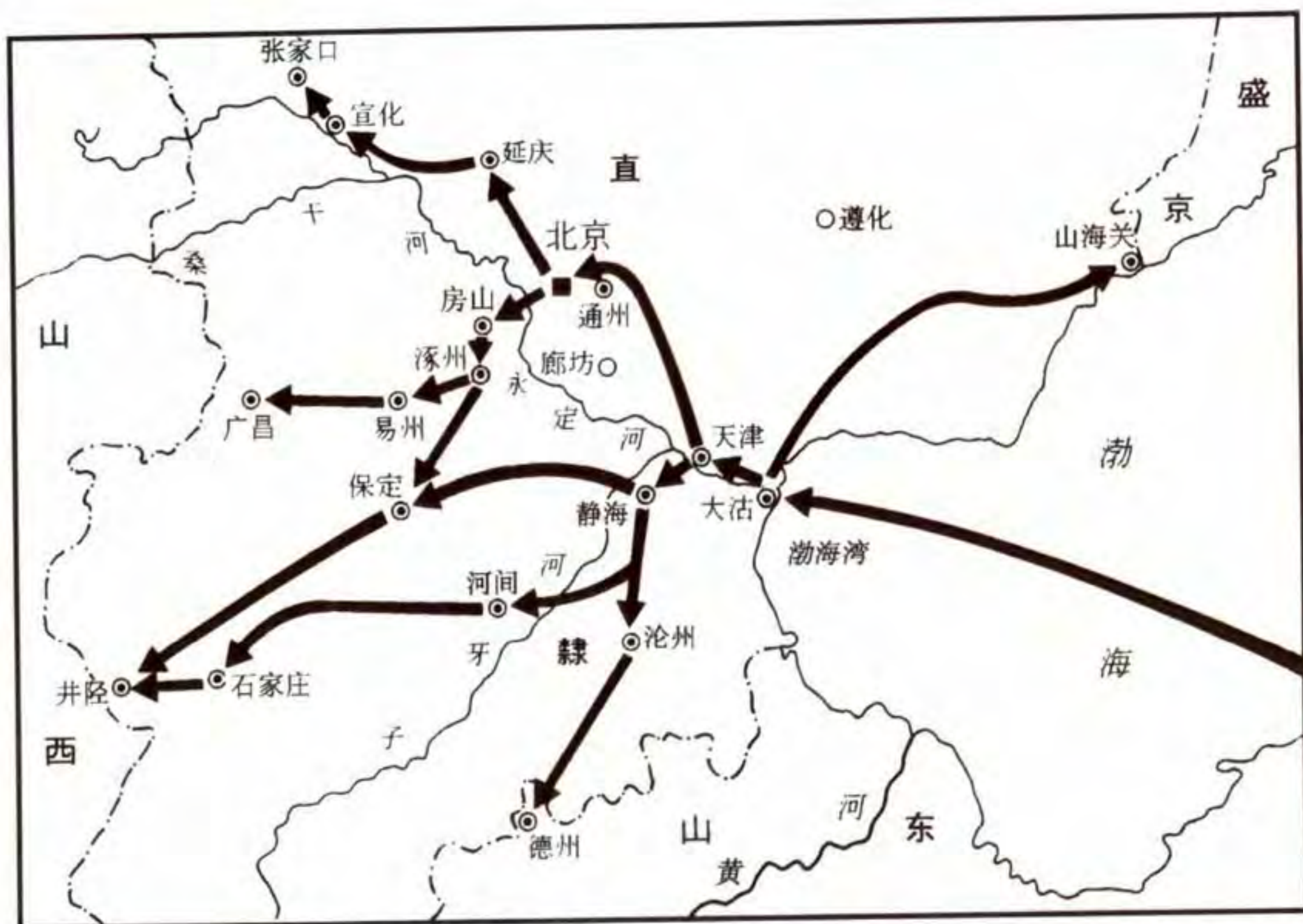
三、八国联合侵华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六日（1900年6月2日），英、美、俄、日、德、法、意、奥八国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以保护使馆为名在塘沽登陆，由天津乘火车进入北京，各国军舰也陆续开到大沽口外伺机而动。五月十四日（6月

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



八国联军侵华路线图



10日),八国又拼凑了一支两千多人的部队,由英国上将西摩尔(E. H. Serrymour)率领,乘火车前往北京。义和团将铁道破坏,并不断向侵略军发起攻击,阻止侵略军前进。本来由天津到北京乘火车只要三四个小时就能到达,但这支侵略部队费了五天的时间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由于伤亡很大,粮食接济困难,只好狼狈退回天津。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各国海军司令联合向天津大沽口炮台的守将罗荣光发出通

牒,蛮横宣称“中国军队守卫大沽口炮台于我西人伐平匪乱实有不便”,限令中国于次日凌晨将大沽炮台交出。第二天,联军以武力夺占大沽口炮台。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对列强宣战。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政府正式发布宣战诏书,给各省督抚发布招抚义和团上谕,并给义和团发放银两及粮米。慈禧太后虽然在矛盾的心理下发布了宣战诏书,事实上并没有决战的决心,既没有做任何抵抗的部署,宣战诏书也没有送达任何国家。在宣战上谕发布后的第四天,慈禧就向李鸿章等人解释说,朝廷这样做,实在有万不得已的苦衷,因为义和团声势浩大,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对于此次宣战的矛盾心情,慈禧在后来逃难时与怀来知县吴永的谈话中表露得十分清楚:“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六月三日(6月29日),慈禧又通知驻外使节向驻在国政府解释:“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

被八国联军焚烧的正阳门



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且中国自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

当时所谓的战场在北京是围攻使馆及天主教堂，在天津是围攻租界。在战场上充当先锋的是手持大刀、长矛或石块的义和团团民，此外还有部分清军参加。大批义和团民死在外国兵的枪口下。六月十八日（7月14日），俄、英、美、日、法等国的军队攻入天津城，驻防天津的清军全部逃跑，天津及近郊全部被联军占领。天津战败后，清统治当局惊慌失措，开始寻求向使馆求和，派奕訢前往慰问，并给使馆送西瓜、酒、蔬果、冰等物。七月十三日（8月7日）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总理衙门通知使馆，请求停战。

西方列强却不肯就此罢休。为了镇压义和团并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以便勒索更大的权益，他们决定派兵攻占北京。七月十日（8月4日），近两万名侵略部队由天津沿着运河向北京进发。当时，在京津之间，清政府布防了相当大的兵力，但是在敌人的进攻面



紫禁城午门外的美国士兵

前，几乎都是不战而溃。侵略军一路上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于出发十二天后到达北京城外，分别从东便门、东直门、朝阳门攻入城内。城内驻扎的清军听到敌军兵临城下的消息，都向西逃跑了。

侵略军从东边进城，慈禧太后携带光绪皇帝及一些皇族、大臣，换上便服，仓皇离宫，出德胜门逃难去了。他们经昌平出居庸关，一直逃到太原、西安。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为了扩大侵略，

被八国联军焚毁的北京民房





日军与中国巡捕屠杀义和团民

陆续增兵到十万多人，其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抢掠，以至京津之间沿途房屋大部变为瓦砾场。在北京，联军还特许官兵公开抢劫三日，而事实上，联军在占领北京期间，抢劫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市中心的皇宫到城外的颐和园，从各级官衙到普通民居，都是他们洗劫的对象。皇宫、颐和园所藏的大量珍

德军在其占领区内张贴的安民告示

在告示中提出严禁中国人民进行反抗。



宝、历史文物，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珍贵图书，均被抢劫一空。伴随抢劫的还有烧杀奸淫，凡设过拳坛的地方，都被焚毁，大批中国人被屠杀。一个英国人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是死尸，无人掩埋，任凭野狗撕啃。

在这场空前的大浩劫中，北京城所蒙受的生命、财产和精神上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德军统帅瓦德西（Von Waldersee）在他的报告和日记里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由此而死之人，究有若干，实永远不能调查。”

联军将北京分区占管，各国侵略军的司令官就是本占领区的最高执政者，司令官以下建立所谓的治安机构，具有鲜明的军事占领和殖民征服的性质。侵略军还以讨伐义和团的名义四处攻略，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都在联军的势力圈内，凡他们认为是义和团巢穴的，无论官衙民居，遇则焚毁，往往全村遭劫。

四、“东南互保”的出台

义和团运动在北方的京津地区发展起来以后，全国大多数地方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反洋教的活动。在这种形势下，英国为了保持在长江流域的优势地位，不愿长江流域发生事端。英国外交大臣授权英驻上海总领事通知两江总督及湖广总督：如果他们采取了维持秩序的方法，他们将受到帝国海军的帮助。不然，他们就派军舰进入长江，以保护侨民。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开始就坚决主张剿灭义和团，接到英领事的通知后，为免外国大批军舰开进长江，酿

成直隶、北京、天津之祸，决定行东南互保之策。在铁路督办盛宣怀的策划下，五月三十日（6月26日），由上海道余联沅和盛宣怀代表刘坤一、张之洞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中外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在此之前，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慈禧宣战时，通谕各省督抚“保守疆土，接济京师，联合一气，共挽危局”，两广总督李鸿章已决定不奉诏，现在他对张之洞、刘坤一与外国人订的这个互保条约自然完全赞成。参加东南互保的，先后有四川、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山东、浙江、福建和广东等。

这些督抚自行和西方侵略者订立互保条约，承担保护他们的责任，这在形式上显然与北京朝廷的宣战诏书相抵触。但六月二十五日，当张之洞、刘坤一和四川总督奎俊以及安徽、浙江、江苏三省巡抚联合向朝廷奏报这件事时，朝廷在答复他们的上谕中却表示朝廷的态度与东南督抚的意见相同。

这个互保章程可以使西方列强放心地在北方镇压义和团，而不必担心南方发生对他们不利的局势。

五、沙俄在东北的暴行

沙俄除了参加联军外，还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单独出兵十七万侵占东北。在占领过程中，俄军到处杀戮中国平民，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三省几乎所有主要城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海兰泡位于瑷珲黑河镇对岸，原是中国世代居住的地方，咸丰八年（1858）沙俄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侵占了该地。为

了将这里的中国人斩尽杀绝，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沙俄在这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俄军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或用刀砍，或用枪击，或驱赶到黑龙江中活活淹死，被杀害的有上万人。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东岸，《瑷珲条约》规定，这里仍由中国居民永远居住，归中国官员管理，俄人不得侵犯。但在海兰泡惨案之后，俄军又扑向了江东六十四屯。他们到处放火烧房，驱赶中国居民，把搜捕到的中国人集中到几个大房子里活活烧死，或者赶到江中淹死，或枪击刀砍，大批的中国人惨死在俄军屠刀下。接着，沙俄侵略者又公然宣布，江东六十四屯已归俄国当局管辖，已经离开屯界内的中国人，不准重返该地。这样，沙俄靠着野蛮的屠杀侵吞了这块由中国人辛勤开垦出来的肥沃土地。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沙俄在东北杀害中国老百姓超过二十万。

六、《辛丑条约》的签订

慈禧逃出北京以后，一面催令李鸿章迅速北上，授予“便宜行事”，朝廷“不为遥制”的特权，并加派庆亲王奕劻会同商办“议

《辛丑条约》签字时的各国公使





慈禧太后与外国公使夫人合影

和”；一面下令镇压义和团。现在她把责任全推到了义和团身上，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

李鸿章和奕劻虽然作为议和大臣待在联军占领的北京，但是实际上在他们和各侵略国家的代表之间并没有进行什么“议和”，有的只是各侵略国家之间的权益分配。各侵略国家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都怀着在中国扩大自己特权的目的是。因此在要不要瓜分中国、在势力范围的划分、在赔款的数量及分配、在如何对待清政府等问题上都进行了激烈的争吵。最后，列强各国接受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说，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维持清朝政权。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1900年12月20日），列强商定了议和大纲十二条。

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看到这个大纲仍能保持她的地位，立即下令全行照允，并感激地说：“今兹和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她命令全权大臣根据议和大纲同各国侵略者商谈详细条目，朝廷的态度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议和大纲确立后，联军各国代表对大纲所规定的各项细目进行了磋商。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由李鸿章和奕劻代表清政府与英、美、日、俄、法、德、意、奥、荷、比、西十一国在根据十二条大纲所订立的条约上签字。因这一年是农历辛丑年，所以习惯上称为《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空前不平等的条约，共十二条，还有十九个附件。主要内容是：（1）勒索巨额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加上各省的教案赔款，总数在十亿两以上。规定以海关税、盐税及内地关税为保证。（2）扩展北京东郊民巷的使馆区，各国派兵驻守，中国人不准在界内居住。（3）清政府必须拆除从大沽口炮台到北京沿线的全部御敌工事，并且不能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驻扎军队。而列强各国在从北京到渤海湾沿途的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塘沽、唐山、山海关等十二处驻扎。（4）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变通各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5）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违者处死。如果再发生伤害外国人的行为，各级官吏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辛丑条约》虽然名义上保留了一个完整的中国，但是这个中国已是千疮百孔。清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除田赋以外全都被列强所控制，但这还不够赔款应交的数额，因为还有旧的外债需偿付，于是，清政府下令各省每年摊派二千万两。

《辛丑条约》签字以后，清政府按照西方列强的旨意，惩处了一批主张与列强开战的朝廷大员，慈禧太后以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回到北京。慈禧太后在外避难一年，不忘搜刮，仓促出逃时，一身之外无长物，回来

时，装载行李的车辆竟达三千辆。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接连会见各国公使及夫人，进行慰问和安抚，希望通过这种举动以示中外亲近友睦。

第六节 列强对中国的瓜分

伴随着英、法、日等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列强纷纷在中国建立租界，设厂开矿，设立银行，租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主权逐渐丧失殆尽。

一、列强在中国权益的扩张

设立租界，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殖民统治的据点。通过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陆续把许多沿海及长江沿岸的重要城市开放为通商口岸，并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立租界，在租界内不仅拥有军队、警察，还有法庭、监狱、市政管理机关和税收机关，形成了一套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殖民地制度。租界成了“国中之国”，成了列



上海公共租界界碑

强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的堡垒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基地。

政治贷款，是帝国主义列强利用资本输出以达到从政治上控制中国的手段。《马关



租界内的会审公堂正在审讯中国人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1863年至1908年，英国人赫德任清政府总税务司，制定了一套由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直接控制中国财政收入，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



《条约》规定，中国需向日本支付赔款和赎回费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当时清政府的全年总收入还不到九千万两，为了支付赔款，清政府惟一的方法就是举借外债，帝国主义列强也就争着向清政府提供带有政治条件的借款。甲午战后的四年间，清政府共有三次大的借款。第一次是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1895年7月），由俄、法承借，总额四亿法

郎，合银一亿两。第二次是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月），由英、德承借，总额一千六百万磅，合银一亿两。第三次是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也是由英、德承借，总额一千六百万磅。帝国主义争相借款给清政府，是同它们侵略中国领土、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借款对中国不仅是经济上的盘剥，而且也是为了增强贷款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因此这三次大借款不仅利息重，而且还都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三次贷款的还款年限，前两次为三十六年，第三次是四十五年，而且都明确规定，不许提前还清。在两次英、德借款中，都规定了在全部还清借款以前，中国的海关管理制度不能作任何改变。可见列强是将借款作为勒索和长期霸占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手段。

海关税收是清政府的一项主要财政收入，控制了海关，就基本上左右了中国财政，还可以垄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早在咸丰四年（1854）上海小刀会起义时，苏松太道吴

1896年俄国在天津设立的华俄道胜银行



健章就与英、美、法三国领事签订了协议，由三国各派一人，组成上海的关税管理委员会，开始了中国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的殖民地制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官方任命英国人李泰国(H. N. Lay)为总税务司，李在同治二年(1863)离任后，由英国人赫德(R. Hart)继任，从此时起，赫德担任中国总税务司达四十五年之久。中国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也都由外国人担任。

争夺铁路投资和铁路修筑权，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资本输出、进行经济侵略的又一重要手段。帝国主义借修筑铁路把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抢夺铁路沿线的资源，控制铁路沿线的大片领土，从而进一步扩大他们在中国的侵略。在列强对中国的贷款中，铁路贷款次数最多，数量也最大。经过激烈的争夺，只几年的时间，全国的铁路干线就被瓜分完毕，当时，中国的改良派报纸《国闻报》曾惊呼：“中国之铁路，均西人之铁路，铁路成而中国亦遂不国矣。”

在中国设厂开矿，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

行经济侵略的一种重要方式。《马关条约》中有日本可以在中国任便从事工艺制造的条款，其他国家则依据“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纷纷来中国投资设厂，攫取高额利润。光绪二十一年(1895)，有英国资本的怡和纱厂设立；光绪二十二年(1896)，有美国资本的老公茂纱厂、鸿源纱厂，德国资本的瑞记纱厂，日本资本的上海纺织公司第一厂、第二厂、三井制药厂和英国资本的增裕面粉公司等设立。据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895—1900)，外资在华设厂共计930家，其中资本在白银十万两以上的有20家。

为了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西方列强还争相夺取开矿权。列强除了取得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的开矿权外，还尽量向别处扩展。光绪二十四年(1898)，德国取得山东境内铁路线三十里内的挖煤权。这一年，英国组织了公司，先后与山西、河南地方当局签订了采矿合同，取得了在山西、河南地区开采矿产的权利。光绪二十五年三月(1899年4月)



德国在汉口设立的德华银行

英商、法商又都取得了在四川开采矿产的权利。

在中国设立银行，吸收存款，发行钞票，是西方列强从财政金融上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实施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列强在中国设立的银行计有英国的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有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

二、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在中国抢占地盘、划分势力范围也逐渐达到白热化程度，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

甲午战争前，俄国已经通过几个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1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是并不满足，还想吞并整个东北地区。《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与法、德联合，逼迫日本退出辽东半岛，开始实施占领整个东北的计划。

沙俄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正在修建的西伯利亚铁路经过满洲地区直达海参崴，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以最短的路程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近距离处，以便增加俄国在中国及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在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的同时，沙俄已经多次派人潜入中国东北勘察路线。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俄国拟借此机会解决借地筑路的问题，点名要清政府派李鸿章参加。李鸿章到俄后，双方签订了《御敌互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条约共六款，其主要内容为：日本如侵占沙俄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两国应以海陆军互相接济军火、粮食；战时俄国兵舰得驶入中国所有口岸；中国允许俄国修筑一条经由中国黑龙江、吉林两省以达海参崴的铁路，不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可利用该铁路运兵、运粮。

根据《中俄密约》，同年八月（9月），中俄在柏林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

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的纸币



程》。通过密约和章程，沙俄政府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境内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和对这条铁路的经营管理权，在铁路沿线地区开采煤矿、采伐木材权及军警护路权，这无异于把铁路沿线地区当成了沙俄的殖民地。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1897年12月15日），沙俄又出兵占领了旅顺、大连。沙俄占领旅顺、大连是和德国占领胶州湾联系在一起。德国在参加了三国干涉日本还辽以后，作为“报酬”，向清政府索得在天津和汉口的两块租界地，但是并不满足，还想在中国占领一个海港，作为进一步从事殖民侵略的据点。德国看中了胶州湾，向清政府提出租借，被总理衙门以“恐各国援照，事实难行”加以拒绝。德国先还顾虑俄国的态度，因为在此之前清政府已经同意俄国的舰队在胶州湾过冬。光绪二十三年七月（1897年8月），德皇访俄时同沙皇探讨这个问题，俄国表明虽不支持但也不会干涉的态度。到了十月（11月），德国借口两个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县被杀，出兵强行占领胶州湾。清政府

指望得到俄国的帮助，俄国也佯称助华抗德，将军舰开进旅顺港，宣称等德国军队撤退之后，俄军也即撤退。但是，德国是不会撤退的。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月6日），德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规定中国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九十九年；在胶州湾一百华里以内的地区，德国军队可随时进驻，而中国政府如果要在这地区内发布行政命令，派驻军队，须事先取得德国的同意；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两条铁路，铁路沿线三十华里以内的矿产由德国开采；山东境内如开办各项事业，德国优先权。接着，德商在青岛组成山东矿物公司，开采胶济铁路沿线矿产。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既然德国要长久占领胶州湾，当然俄国也就不必退出旅顺、大连了。在德国和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后不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六日（1898年3月27日），沙俄即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租借”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期二十五



俄国在哈尔滨设立的东省铁路管理局



德国强租胶州湾后发布的告示

大德欽命總督膠州文武事宜大臣葉
 出示曉諭事照得近日有德官數員隨便將膠州府在遼東省轄界村北路等村居民無故強生奸計用此等事謀害德員該德員無故自衛保全性命查知此項民妄作妄為該地方官似不能防範於未幾或致德員被害則本官不得已用自主之權德員約謀害德員之正元特將德員一隊前往該地方將該家村北路等村焚毀成灰燼以懲兇頑而戒將來為此示曉諭該等居民知悉如有敢有謀害德員之事本大臣決無置之不理但望本大臣今以此舉止以杜絕將來此等情事亦元本大臣再用此項舉動請望該地方官一帶日今要嚴是奉大臣所深願者也此等其各懷遵特示

右諭通知

(1898), 在德国租借胶州湾、俄国租借旅顺、大连的消息传出后, 法国又向清政府提出了中国不得把云南、广东、广西等省让与外国, 法国修筑自越南至云南昆明间的铁路, 中国邮政局总管由法国人担任, 把中国南部海岸广州湾租借给法国等要求。清政府不敢违抗, 对这些要求原则上都予以承认, 并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 (1899 年 11 月), 同法国签订了租借广州湾的条约, 租期 99 年。

英国是在中国获取权益最多的国家, 在划分势力范围、抢占港口方面当然也不甘落后。首先, 英国势力最强大的长江流域, 是不允许别的国家插手的, 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初, 英国强迫清政府答应长江流域不割让与外国。另外, 在华南, 法国也不能完全排斥英国的势力, 因此, 英法两国于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初在伦敦协商, 规定在中国的云南省和四川省的一切权利由两国共享。当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时, 英国立即提出了租借香港对岸的九龙半岛的要求, 清政府不敢不答应。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1898 年 6 月 9 日), 双方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规定英国租借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以北及附近岛屿, 包括大鹏湾、深圳湾水面, 租期 99 年。俄国占领旅顺、大连时, 英国以保护东方商务为名, 提出租借威海卫。清政府居然认为这个要求“尚属实情, 并非无端图占”。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1898 年 7 月 1 日), 中英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 规定中国将威海卫及附近海面, 包括刘公岛、威海湾中的群岛及威海卫沿岸十英里之陆地租与英国, 租借期 25 年。

日本虽然通过《马关条约》得到了台湾及大笔赔款, 但仍想在中国大陆得到一块势力范围。日本驻华公使照会总理衙门, 以福建省接近台湾为理由, 要求清政府应允不将

年, 并规定租借地内的行政权完全由俄国管理, 中国军队不得入内; 清政府允许沙俄从中东铁路的哈尔滨开始, 造一支线至大连, 此支线经过地区, 中国不得将权益让与别国。就这样, 不但清政府花三千万两银子赎回的辽东半岛, 而且整个东北地区都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

法国的侵略胃口也很大。三国干涉还辽还在进行时, 法国就以“法与各国出为调处, 大有益于中国”之功, 向清政府施加压力, 取得了从越南到中国广西境内的铁路修筑权和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的优先开矿权。光绪二十三年二月 (1897 年 3 月), 法国强迫清政府答应不将海南岛割让与外国, 将海南岛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



福建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四日（4月24日），清总理衙门照会日使，允诺不将福建租让他国，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时间内，中国沿海的重要港湾就都成了列强的租借地，中国大部分的领土都成为了列强的势力范围。

美国的侵略野心也是极大的，美国资本家早就认定中国是美国向海外市场扩张最有希望的地方。但是就在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却忙于和西班牙在南美洲和太平洋上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所以未能在中国攫得势力范围。于是，他便提出了一个极其狡猾的“门户开放”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决不干涉列强在中国的一切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的既得利益；这些势力范围的关税、船只港口税和铁路运费对于各国一样对待。这就是说美国并不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而是要求列强开放在华势力范围和租借地，使美国在这些势力范围和租借

地内占有同样的权益。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就是把中国的大门向世界帝国主义敞开，大家利益均沾。

三、日俄在东北的争夺

义和团时期，俄国出兵侵占东北，对东北实行军事控制，实现其“黄俄罗斯计划”。此后，清政府与沙俄进行交涉，但是沙俄一直制造借口，拒不交还东三省。直到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沙俄才与清政府订立了一个《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俄军自签字之日起十八个月内分三批撤完，不准他国占据俄国所退各地段。但是，沙俄自撤走第一批军队后，就不再继续撤兵。继而又任命侵略东北的司令阿列克赛耶夫为远东大总督，悍然把东三省当作殖民地进行统治。

沙俄独霸东北，引起了其他列强的不满。首先是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日本同沙俄一样，当时正在千方百计地推行其旨在侵

英国“租借”九龙半岛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時局圖



时局图

1898年一位爱国人士所画。图中的虎代表英国，熊代表沙俄，蛙代表法国，太阳代表日本，肠代表德国，鹰代表美国。它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和清政府的昏庸腐朽。

吞中国东北、蒙古等地区的侵略政策。英国害怕沙俄独占东北和向南方扩张势力，会影响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因此，积极支持日本与沙俄对抗。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年1月），英日在伦敦签订了旨在反对沙俄的军事同盟协定。

日本有了英国的支持，遂决定与俄一决胜负。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4年2月8日），日本突然袭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正式爆发。经过激烈的战斗，日本取得了制海权，封锁住旅顺口。沙俄为挽回败局，派遣波罗的海舰队东驶，以救援旅顺口，又在对马海峡被日本舰队击溃。四月

（5月），日本陆军从辽东半岛登陆，与俄军在旅顺、辽阳、沈阳进行厮杀。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5年1月1日），日军攻下旅顺，控制了整个辽东半岛。二月五日（3月10日），日军占领沈阳。

这场战争中，沙俄几乎丧失了全部海军力量。沈阳战役时，日俄双方共投入六十多万兵力，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厮杀，结果，沙俄仍以惨败而告终，日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损失惨重。

日俄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战。中国是受害的和被侵略的国家。日俄两军交战后，炮火连天，中国无辜民众死伤无数，民房或被炸毁，或被占为兵营，俄日军队为修筑工事转运军需，经常抓捕平民逼做苦工。但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仅无力制止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这场不义的战争，而且在战争爆发后还宣布“局外中立”，划辽河以东为交战区，辽河以西为中立区。

在日俄双方都厮杀得精疲力尽之时，美国乘机出面调停。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七日（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结束了这场肮脏的战争。条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归日本保护，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及库页岛南部让与日本。《朴茨茅斯条约》严重地践踏了中国和朝鲜的主权，无能的清统治者却公然承认了两个强盗各自在东北的利益。

四、英侵西藏与《拉萨条约》

英国企图占领中国西藏也是蓄谋已久的。英国自从占领印度以后，就想继续侵占西藏，把西藏作为由陆地进入中国腹心地带的通道。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就更想通过西藏把英属印度和他们在长江流域的势力

连成一片，因此不断以通商、游历、调查等名目，要求清政府颁发护照，前往西藏进行间谍活动。

光绪十四年一月（1888年2月），英国侵略军七八千人，在拉累谟的率领下，向隆土山地区进犯。藏族军民英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隆土山、则利、亚东一带要隘相继失守。

清廷一意妥协，光绪十六年（1890年），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与英印总督兰斯顿（H. C. Lansdowne）订立《藏印条约》，清廷承认哲孟雄（今锡金）归英保护，藏、锡边界内移。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3年12月），英国以荣赫鹏为使节、麦克唐纳为军事指挥，率领一万多人的侵略军越过中印边界侵入西藏。光绪三十年三月（1904年4月），英军大举进犯江孜，遇到了西藏军民的顽强抵抗。西藏爱国兵士纷纷组织起来，用火绳枪、长矛、大刀、木棍等简陋的武器与英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战斗。英军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用洋枪、洋炮攻取藏军以土枪、土炮、木棍、石块据守的江孜城，竟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江孜失陷后，英军从六月二日（7月14日）起，向拉萨推进。六月二十二日（8月3日），英军攻陷拉萨。在英军到达拉萨之前，十三世达赖逃出拉萨，取道青海到了蒙古。七月二十八日（9月7日），荣赫鹏以武力威胁西藏的部分宗教首领在他事先炮制好的《拉萨条约》上签字。通过这个条约，英国不仅榨取赔款、吞并边境地区、扩大通商特权，还要把西藏置于英国的控制下。清政府拒绝承认这个条约，以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派代表在印度和北京先后两次谈判，结果仍没有完全废



1898年沙俄驻旅大陆军提督为霸占辽东一带矿产发布的告示

除条约所规定的内容。

五、左宗棠收复新疆与《伊犁条约》

19世纪60年代，新疆的一些上层封建主利用回民和其他各族人民爆发的反清斗争，实行地方割据，把新疆地区分裂成若干小汗国。同治四年（1865），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乘着新疆的混乱局势侵入新疆。浩罕与新疆西部接壤，在光绪二年（1876）被俄国吞并以前是一个独立的汗国。

阿古柏带兵进入新疆之后，占领了喀什噶尔，并渐次占领南疆各城。同治六年，阿古柏建立起哲德沙尔汗国，自称毕调勒特汗。同治九年，他越过天山攻下库尔勒，接着又占领了乌鲁木齐，将势力扩展到北疆。

沙俄在同治三年（1864）侵占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后，仍然不满足，还想进一步吞并整个新疆。英国也不甘落后，想把新疆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沙俄和英国都争相与阿古柏勾结，来达到侵占新疆

的目的。阿古柏则企图依靠沙俄和英国的支持,分裂中国国土,建立一个独立的汗国。同治十一年(1872),沙皇政府无视中国的主权,承认阿古柏是“独立国君主”,同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阿古柏则承诺在南疆给予沙俄不少贸易特权。英国也在同治十三年(1874)同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还向阿古柏提供武器,派出军事教官、军事工程人员为阿古柏服务。

当阿古柏的势力向北扩展,并准备进占伊犁的时候,沙俄一看时机成熟,决定抢先一步,于同治十年(1871)六、七月间,出兵强占了伊犁地区。拿下伊犁城后又四处出击,加紧扩大占领区,接近年底的时候,已经占据了包括伊犁河谷在内的7万平方公里的地盘。沙俄驻华公使向清政府宣布说,这是为了安定“边境秩序”,进行“代守”。沙俄侵略者在伊犁地区实施殖民统治,抢劫当地人民牲畜财产,残酷地剥削和凌辱当地人民,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面对新疆的严重局势,加上沿海地区警报纷至沓来,清政府内部发生了“塞防”与“海防”的争论。

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拥有北洋海

军,其地盘在天津。他从本集团的利益出发,主张“海防”为重,“塞防”为轻,应该把大量的国防军费用于北洋海军的建设,甚至主张“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他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左宗棠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反对“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应立即出兵新疆,消灭阿古柏入侵者的反动政权。左宗棠关于收复新疆的意见符合民族的利益,因而得到了国内舆论的支持。

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名义,率军前往新疆讨伐阿古柏。征西大军由刘锦堂率领,于光绪二年七月至九月,相继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清军的军事胜利,引起英国侵略者的极大不安。为了保护阿古柏政权,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提出让阿古柏“投诚”,条件是“保南八城自王”,“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企图牺牲中国在南疆的主权,维护阿古柏的统治。清政府以“交回各城,献缚叛逆”作答而加以拒绝。第二年春天,清军向天山南路进军,迅速攻下吐鲁番、托克逊、达坂城等地,阿古柏的主力被歼灭,阿古柏绝望自杀于库尔勒。阿古柏死后,他的儿子伯克胡里继续挣扎,依然自称为“汗”。清军继续出击,攻占了被残匪占据的一座又一座城市,同年十一月,收复喀什噶尔。伯克胡里等残匪裹胁当地居民五千余人和大批牲畜,由布鲁特逃往俄国境内。此后,在光绪四、五年间,这批残匪在沙俄的支持下,屡次企图打回喀什噶尔,都被新疆军民打败。

阿古柏政权被肃清后,清政府即筹画收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俄国人起先没有料到清政府能够出兵新疆而且很快地恢复在这个地区的统治,所以他们在开始占领伊犁时表

左宗棠像



示，只要清政府能够保证这个地区的安定秩序，就交还伊犁。俄国人虽然再没有借口可以霸占伊犁，但仍继续拖延。

事实上，还在沙俄攻占伊犁之初，清政府就曾派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与俄国交涉，谋求收回伊犁。可是沙俄谈判代表根本不提伊犁问题，只是询问了一大堆废话，第一次谈判就不了了之。光绪四年（1878）底，清政府派盛京将军崇厚为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去彼得堡办理交还伊犁事务。但崇厚却连伊犁地区的形势也不了解，俄国人对崇厚软硬兼施，在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1879年10月2日）抛出一个他们拟订好的条款，要崇厚在上面签了字。由于条约是在俄国的里瓦几亚签订的，所以叫《里瓦几亚条约》；又因为它专为伊犁问题而订，所以又叫《交收伊犁条约》。条约规定，俄国把伊犁地区的九城交还中国，但中国要把伊犁西部，即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以南的特克斯河流域割让给俄国。这样，伊犁虽然收回，却变成了一个三面被俄国包围的孤城。不仅如此，条约还规定中国要给俄国500万卢布作为偿金，俄国商人可以在蒙古和新疆进行免税贸易，增设通商路线，等等。

这个条约引起了清廷多数官员的愤慨，崇厚还没有回到北京，朝廷内外已经响起一片弹劾之声。清政府决定拒绝这个条约，派驻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重新谈判伊犁问题。督办新疆军务的左宗棠也从肃州



（嘉峪关）移节哈密，摆出一副决战的姿态。 1854年俄国战船入侵瑷珲

光绪六年六月（1880年8月），曾纪泽在彼得堡与俄国重新开始谈判。光绪七年一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中俄之间关于伊犁问题的《改订条约》签字。《改订条约》共二十条，条约规定：沙俄将特克斯河一带与伊犁九城交还中国，伊犁西边，也就是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地方归俄国管属；中国偿付俄国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及其他补偿费900万卢布；俄商在蒙古地区享有免税特权，在新疆南北路贸易也暂不纳税；伊犁居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国籍者，均听其便。根据此条，后来俄国侵略者胁迫五万多名中国居民携财产迁入俄境。

与《里瓦几亚条约》相比，由于特克斯河回归，中国有2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免遭割让。

光绪十年（1884），清政府根据左宗棠的建议，在新疆正式建省，进一步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

第十三章

忧患中的中国



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逐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发生了剧烈的变革。

第一节 太平天国起义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人民对官府的反抗也就更加激烈，其中坚持时间最长，也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太平天国起义。

一、洪秀全与拜上帝会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家里世代都是农民，幼时上过几年私塾，十六岁起随父兄种田，十八岁开始在本村和邻村的塾馆当老师。他也会想走科举为官的道路，但几次到

广州考秀才都没考上，心理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于是决定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自己寻找出路。

洪秀全早年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时，曾在街上得到过基督教徒散发的一本叫作《劝世良言》的小册子。道光二十二年（1843），当再一次考试失败时，他又把这本小册子拿出细读，从书中对上帝的宣传得到了启示，遂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并创立拜上帝会，向人们宣传信仰上帝，不事邪神，天下一家、人人平等的道理。

最早支持他的是同在村塾教书的同窗好友冯云山，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将被他们认作是邪神的在村塾中树立的孔子牌位砸坏，由此他们也失掉了村塾教师的职位。但他们对上帝的宣传在家乡附近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

道光二十三年他们离开家乡外出传教，



广东花县洪秀全故居

辗转到达广西贵县。由于信徒不多，冯云山转到桂平县，洪秀全则回到家乡。洪秀全在家乡两年，专心理论著述，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劝人改邪归正，拜上帝不敬邪神，指出：天下凡间，实为一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中国两千多年，被蛇魔阎罗妖所迷惑，如今乱极则治，大家应行上帝的真道，使乱世变为公平正直之世，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他的这些主张表达了劳苦大众要求摆脱剥削和压迫的愿望。道光二十七年(1848)，洪秀全又回到广西找冯云山。这时冯云山在桂平的紫荆山区经过两年多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已发展起了三千多



《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

1852年6月，太平军在湖南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檄文，誓师反清。

天王洪秀全玉玺及印文



个信徒。洪秀全来了以后，被尊为教主，订立十款天条让大家遵守。为了提高大家同邪神作斗争的勇气，他又率领信徒四处捣毁神庙。经过几年的时间，拜上帝会的势力发展很快。洪秀全见时机已到，遂决定发动武装斗争，进行起义。

太平天国反清进军路线图



二、金田起义，建都南京

道光三十年七月（1850年8月），各地的拜上帝会成员开始集中到桂平的金田村“团营”，并在那里铸造武器，编练队伍。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尊洪秀全为天王。

太平军自金田起义后就遭到清朝军队的围追堵截，经过八个月的时间，他们才冲出紫荆山区。咸丰元年闰八月一日（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攻克永安，在永安进行整顿，订立各种制度，申明军纪。洪秀全发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规定各王均受东王节制。

咸丰二年二月（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先围桂林，又围长沙，都没有成功。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阵亡。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失败和人员的伤亡而退缩，在湖南，他们发布檄文，痛斥满清统治无道，说明太平天国起义就是要扫除妖孽，廓清中华，希望大家个个起来，同力灭妖。从长沙撤围后，太平军转取益阳、岳州，在益阳获得大批船只，从岳州水陆两路挺进湖北。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攻克武汉三镇，这是太平军自起义以来占领的第一个省会。在武汉，太平军但杀官兵，不杀百姓，并广泛展开宣传，名曰“讲道理”，大批

民众参加到太平军的队伍中来。

二十多天后，太平军放弃武汉，号称五十万水陆大军，船只万余，水陆并进，顺江而下，在连破九江、安庆、芜湖等城镇后，二月十日（3月19日）攻占南京。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首都，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三、北伐和西征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在南京定都后不久，太平天国即派出了北伐与西征两支部队。北伐，就是要直捣清统治者的老巢北京；西征，是为了巩固南京而占领其上游的重镇武汉、九江、安庆。

北伐军两万多人，由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领。杨秀清给予这支部队的方针是“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糜时日”。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北伐军从扬州出发，迅速穿越安徽、河南，在郑州以西地区越过黄河，迂回到山西境内，在八月下旬进入直隶省，九月底到达天津附近的静海、独流一带。清政府惊恐万状，宣布北京戒严，放运河水挡住北伐军的进路，派僧格林沁率重兵守在天津北面的杨村。与清军对峙了三个多月后，北伐军粮食已尽，兵士受不惯北方的寒冷，手足溃烂冻毙者不少。僧格林沁率清军趁机进攻，北伐军战败，被迫南退。当时天京派出的援军正在北上，但终未能与北伐军会合。林凤祥和李开芳各带一部分军队分别守在直隶的连镇和山东的高唐，咸丰五年四月（1855年5月），全部被清军消灭。

咸丰三年四月（1854年5月），西征军在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的率领下，以战船千余艘溯江西上，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与清朝军队及曾国藩的

湘军展开激战。咸丰四年，石达开、罗大纲驰援西征军，重新占领了安庆、九江及武汉。又在江西大败湘军，克复八府五十四州县。到咸丰六年，太平军已控制安徽、江西及湖北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自此，长江千里西自武汉、东到镇江，尽在太平天国的掌握中。

四、《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农民政权，在定都天京以后，当然也要有自己的一套政策和措施。其中，最能反映他们主张的是咸丰三年（1853）冬天发布的文件《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文件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也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

关于土地问题，其原则是平均分配土地，办法是按产量将田分为九等，再按人口平均分配，不论男女，按人口多少，好丑各半，十五岁以下减半。同时规定：“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其目的就是要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



太平天国颁发给农民的田凭



太平天国颁发的商凭

会。这充分反映了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

关于社会结构，是按军事组织的管理办法来管理社会。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由一军帅统管。二十五家为一基层组织，设一个两司马管理。每二十五家设一圣库，收成时，除留足二十五家每人所食新谷外，余则归圣库，其他财产亦如此。每二十五家设一

“礼拜堂”，由两司马在那里教读圣书，讲听道理。每家出一人当兵，有警时参加杀敌捕贼，无事时为农耕田。

关于商业政策，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初期，根据“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的思想，曾一度废止商业，天京城内军民的衣食杂用都由圣库供给。但是，当时的南京，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要想废止是不大容易的。不久，商业贸易就被恢复，但规定商人开商店或作坊须呈报，经批准后发给执照。咸丰四年（1854），太平天国还铸造了各种钱币在市面上流通。

《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社会制度只是这些农民领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实际上，太平天国建立后从未真正实行过，而且也不可能真正实行。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主张进行革新，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并要求仿效西方兴办矿山、银行、铁路、报馆等。洪秀全看后十分欣赏，在上面批了“是”、“可行”或“此策是也”的字样，表现

太平天国铸造的钱币



了他们学习西方的强烈愿望。但由于条件的限制，这些措施也未能实施。

五、天朝的灭亡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久，清政府即命钦差大臣向荣率军在天京城外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命琦善、胜保率军在扬州城外建立江北大营，对天京进行钳制。

咸丰六年二月（1856年4月），太平天国先击溃了清军包围天京的江北大营，五月（6月）又击溃了江南大营，暂时解除了天京外部的威胁，但其领导集团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杨秀清开始居功自傲。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他时常责罚高级将领，甚至以代天父传言的特权要洪秀全跪在地上接受杖责。杨秀清的这些做法，使得洪秀全及其他高级将领对其极为不满，矛盾逐渐激化。

咸丰六年七月（1856年8月），杨秀清又假借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到东王府封他为万岁，洪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洪秀全于无奈之中，一面答应封杨秀清为万岁，一面秘密派人宣召韦昌辉、石达开以及秦日纲等回京勤王。北王韦昌辉及燕王秦日纲得知消息后从江西带兵赶回天京，在杨秀清没有任何戒备的情况下，攻进东王府，杀死杨秀清。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杨秀清部下及东王府两万多人被杀，天京处在一片恐怖之中。在湖北前线的石达开立即赶回天京，当面斥责韦昌辉不该滥杀无辜，韦昌辉不但不听，还想除掉石达开。石达开接到密报后连夜逃走，韦昌辉竟把石达开一家老小全部杀害。为了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其他将领杀死了韦昌辉，天京的局势得到稳定。

十月（11月），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合朝文武的拥戴，同举他佐理朝政。但是，洪秀全自杨韦事件后，对外姓疑忌日重，加封其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让他们主持军政。安、福二王昏庸无能，对石达开处处进行挟制。石达开对此不满，遂于咸丰七年五月（1857年6月）带兵出走，独立行动。他带领队伍先后转战于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都没能打开局面，又到了广西，军心更加涣散。咸丰十一年（1861），石达开率残部一万余人进入四川。同治二年四月（1863年5月）在大渡河边的紫打地陷入清军重围。石达开企图用牺牲自己和弃械投降为条件，让清军免杀其部下。四月二十七日（6月13日）石达开带着五岁幼子投奔清营乞降，被清军拘捕，押至成都处死。其部下亦被清军全部杀害。

天京之变及石达开的出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清军乘虚而入，在天京城外又建立起江南、江北大营，形成对天京的包围。 《资政新篇》（书影）



曾国藩率领的湘军亦攻下扼守长江咽喉的九江，江西各城多被湘军所得，天京的形势非常危急。

咸丰八年(1858)，太平天国的将领们在安庆东北的枞阳镇举行会议，决定由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联合作战，共同解救天京之围。八月，陈、李联合一举攻破清军江北大本营，接着又在安徽庐州的三河镇大破湘军。

咸丰十年二月(1860年3月)，为了粉碎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威胁，太平天国以围魏救赵的策略，由李秀成率兵进入浙江，出其不意攻下杭州。清廷调正在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一部分兵力到杭州增援。这时，李秀成又率兵迅速从杭州撤离回到天京城外，在陈玉成、杨辅清等配合下，于闰三月(5月)击溃和春统率的江南大营，再次解除天京之围。

击溃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决定向东发展，夺取苏杭富庶地区。四月(6月)，李秀成率兵东进，先后克复了无锡、常州、苏州、嘉兴等地，并准备进攻上海。陈玉成则率兵进占浙江太湖地区并逼近杭州。

太平军在东线作战之际，曾国藩率领湘军分路向安徽进军，逐步形成了对安庆的包围。安庆是天京西面的屏障，地位十分重要。为解安庆之围，太平军决定分路进攻武汉，牵动敌人。按照计划，陈玉成率北路军由皖北进入湖北，咸丰十一年二月(1861年3月)攻占黄州，直逼武昌。由于当时敌人全力围攻安庆，后方空虚，武汉没有多强的防御能力，此时进攻武汉的确是聪明的一着。在安庆前方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听到太平军已逼近武昌的消息后惊慌失措，直骂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但是李秀成率领的南路太平军却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而陈玉成也因安庆告急，遂从湖北撤兵回救安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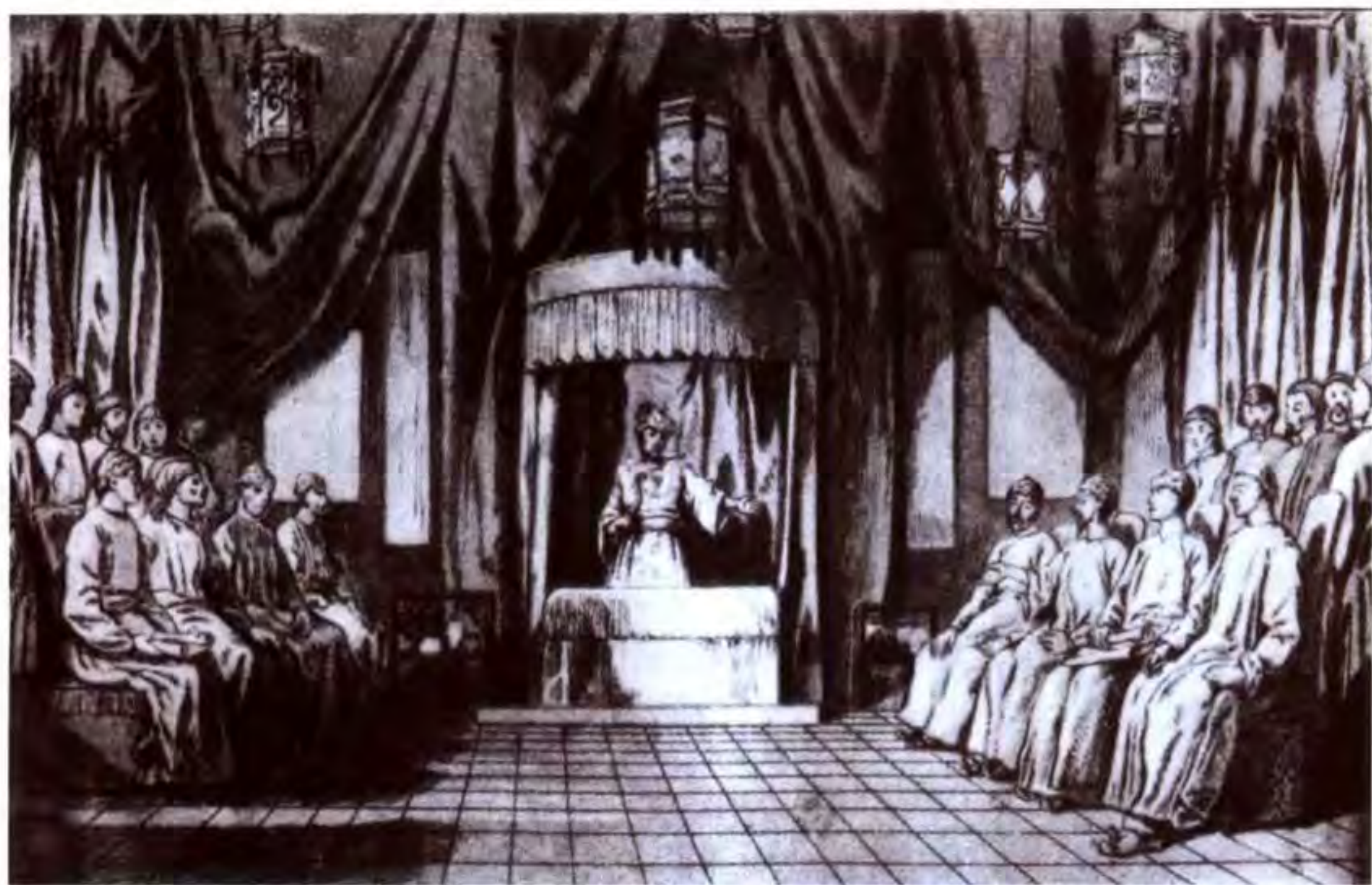
太平军安庆保卫战进行得异常激烈，却终因城内弹尽粮绝，于八月(9月)被湘军攻破。陈玉成率余部退到安徽，在寿州被叛徒出卖而遇害。安庆失守及陈玉成被害，使得西线尽落清军之手。

安庆失守后，曾国藩的湘军即着手攻取天京，李鸿章的淮军则对付东线的太平军。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西方列强在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进行过几次接触后，感觉太平天国不如清朝政府对他们顺从。为了确保在中国的权益，开始助清军进攻太平军，他们不但出动军舰帮助清军夺占宁波、防守上海，还组织起洋枪队同太平军作战。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太平军失去了苏、杭，天京城外也尽被湘军所占。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他的儿子洪天贵福继位。六月十六日(7月19日)，湘军挖地道炸开天京城墙，冲入城内，大肆杀人、抢劫，并四处放火。天京城内的太平军与敌人展开了巷战，并高呼“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的口号，纷纷烧毁物资。天京城内火光冲天，大

曾国藩像





忠王李秀成主持会议图

火七日不息。军民大部分被杀，“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天京陷落时，李秀成等拥幼天王突围出城，但是先后被捕遇害。横扫十八省、历时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失败。

六、太平军余部与捻军联合战斗

捻军，原称捻党或捻子。捻党起于清朝初年，本为淮河两岸穷苦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武装团体，以后逐渐扩展到山东、河南、苏北等地。起初主要进行抗粮、抗差、吃大户、杀富济贫等活动。活动时往往数十人或数百人为一股，谓之一捻，各捻不相统属。咸丰五年六月（1855年7月），黄河在开封以东的铜瓦厢决口，使山东西南的几十个州县和皖北、苏北的许多地方遭到严重灾害，贫苦农民和流亡贫民更加无路可走，捻逐渐由小股汇合成大股。各路捻军大会于安徽蒙城雉河集，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张乐行自称“大汉盟主”。从此，捻军声威大震，在皖北、豫东数百里的区域进攻城镇，打击清军。咸丰六年（1856）冬，太平军开始在安徽和捻军合作，沉重地打击了清统治者的势力。

同治二年（1863），捻军首领张乐行牺牲，号称梁王的张宗禹在皖北继续坚持战斗。同治三年十月（1864年11月），太平军余部遵王赖文光与张宗禹所率捻军联合，由赖文光任统帅。同治四年四月，赖文光率部在山东曹州设伏歼灭僧格林沁所部马队，杀死僧格林沁。清统治者大惊，先后派曾国藩、李鸿章督湘、淮军向捻军进攻。面对着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湘、淮军的围攻，赖文光深感“独立难持，孤立难久”，在河南许州将捻军分为东、西两支，以便互为犄角。一支以赖文光为首，东入山东，称东捻军；一支以张宗禹为首，西入陕甘，欲与陕甘回民起义联合，称西捻军。

东捻军转战于山东、河南、安徽、湖北一带，曾生擒淮军悍将郭松林，击毙淮军头目张树栅和湘军头目彭毓橘。同治六年十一月（1867年12月），东捻军在山东登莱地区，不幸落入清军重围，在山东寿光与清军决战失败，损失三万余人。赖文光率余部南走苏北，同治六年十二月（1868年1月）因伤被俘，在扬州被杀害。

西捻军入陕后，在西安十里铺设伏，全歼陕西巡抚刘蓉所部湘军，然后进入陕北，开辟了以宜川为中心的临时基地。当得知东捻军被围的消息后，立即全师东下驰援。同治七年（1868）初，西捻军深入直隶腹地，打算奔袭清朝老巢北京，吸引围困东捻军的清军，但因东捻军已经失败，原定计划落空。六月（8月），清军会同洋枪队和英法侵略者的炮船，把西捻军围困于山东境内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西捻军几经苦战，不得突围，终于全军覆灭。

第二节 求强求富—— 官僚买办办洋务

英国依仗坚船利炮，闯进了中国的大门。在同西方侵略者接触的过程中，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激起了对西方世界的探知欲，他们开始寻求有关世界各国的新知识，成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

首先这样做的人中有林则徐。当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时，为了知己知彼，即组织起一批通晓外文的人才，

从外国报刊上摘译西方动态、资料，编辑成册，供他研究。为了了解世界知识，他让人翻译英国人慕瑞编著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辑成《四洲志》，又把这些材料给了他的朋友魏源。魏源继续收集材料，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1843年1月），编纂成《海国图志》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扩充为六十卷，咸丰三年（1853）又进一步扩充为一百卷。这是一部关于世界地理、历史及西方政教国情的总集。与之性质相同的还有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通过这两部书，中国人了解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

当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后，一部分人也提出了中国应造战舰、火炮的主张。林则徐在被革职后，曾力陈“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魏源更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办造船厂、火器局。但当时这些呼声还很微弱，并不为清统治者所重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及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西方列强轮船、大炮的威力，已为清统治者中的大多数官僚所亲历，因此，向西方学习，用夷变夏以求自强，成为当时中国的一种潮流。这种潮流的倡导者，在朝中有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地方大吏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形成了当时所谓的洋务派。洋务派的新政可以概括为求强、求富两个方面。

一、求强——官办的军事工业

在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的原则下，洋务派一方面从外国购买轮船、大炮，一方面雇佣洋匠，购买洋机器造船制炮。因此中国就有了一批由国家出钱由官僚主持的军事工业。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在安庆设立

江南制造局大门

江南制造局是洋务运动时规模最大的官办军事工业，由李鸿章主持在上海成立。



内军械所，以手工生产枪支、子弹及开花炸弹等，标志着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兴起。第一个具有规模的军火工厂是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在上海主持成立的江南制造局，除了生产枪炮外，还造过军用船只。第二年李鸿章又在南京设立金陵制造局，主要制造枪、炮、子弹和军用物资。同治六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设立了天津机器局（后改名北洋机器局），主要生产火药、子弹。同治九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天津机器局亦归其主持。同年，由左宗棠主持在福州马尾设立了福州船政局，兵轮、商轮并造。

这些当时开办早、影响大的几个军事工业，共同的特点是处处依赖外国，顾问、监督、技术人员都是聘用外国人，机器设备、原材料以及零部件都是从外国购买。但是，作为顾问、技术人员而受聘的外国人，有些并不是很在行，加上封建官僚买办中饱私囊，结果是花了数倍于外洋购船之价而造出旧式之船，花大价钱造出的枪也多不合用，要用新式的枪械和装甲兵舰还需从外国购买。

二、求富的民用企业

办军事工业需要巨额款项，况且军事工业与其他工业息息相关，彼此必须配合。这时，一部分官僚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办起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及汉阳铁厂等。这些企业有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形式。

轮船招商局是民用企业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五口通商以后，中国沿海及长江流域航运都被英美等轮船公司把持，有钱的洋行买办多附于洋商名下。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招集华商股本，初仅有三艘轮船，光绪二年（1876）增至十二艘。外商决不愿中国发展起



李鸿章像

自己的运输事业，纷纷跌价挤压。招商局因有政府特许的漕运，近海业务尚能勉强维持，远洋则无法抗衡。

五口通商以后，因洋纱、洋布输入逐年增加，光绪八年（1882），李鸿章主持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分洋商之利。但是筹备工作非常不顺利，经过八年才募足股本，有三万五千纱锭、五百余台布机，但三年以后即毁于火。光绪二十年（1894），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在原址另行筹设，名曰华盛机器纺织总厂，仍为官督商办。

机器局、造船厂所需煤、铁，俱来自外 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事处



湖北汉阳铁厂



洋。曾国藩、李鸿章都认为，煤是日用之物，又为机器局、船政局所必须，如能自行以机器开采，洋煤可不阻自绝，为中国永久之利。经过调查后，认为河北开平煤矿蕴藏丰富，遂于光绪四年（1878）设立开平矿务局，光绪七年（1881）建成投产，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机器采煤的大矿。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拟在广东设立炼钢炼铁的工厂，并委托驻英公使刘瑞芬购办机器设备。由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这个拟办的工厂也就跟着他到了湖北，将厂

址选在了汉阳。光绪十九年汉阳铁厂建成，第二年开始出铁，但产品质量不佳，不能与洋铁竞争。初办厂时，张之洞的想法是先用官款将厂子办起来，然后召集商股归还官本，但当时这种办法已经行不通，只好继续使用官款。办铁厂原是为了少用外国的钢铁，结果却成了一个赔钱的包袱。

官僚办企业是带有垄断性质的，排斥商办企业。如李鸿章在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规定：“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因此，纯粹的商办企业，如果政治上没有依靠，更是难以存立。中国的资本主义不能顺利地发展，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排挤是一方面，受本国封建官僚的压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兴办新式教育

清政府在与西方国家的交涉中，深感语言不通的不便。同治元年（1862），总理衙门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教学英文。第二年，续设法文、俄文两馆。同治五年，又增设天文

福州马尾船政局



算学馆，开设了医学、算学、天文等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课程。招收学生，初仅限于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后扩大至招收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的满汉学员。继京师同文馆后，上海和广州也先后成立了广方言馆。

在举办军事工业、建立新式陆军时，洋务派官僚感到迫切需要掌握近代军事知识和技术的人才。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学堂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学堂学法文及轮船制造，后学堂学英文及驾驶。江南制造局附设有机器学堂和翻译处。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奏请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分驾驶及管轮两科。其他还有天津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

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亦是洋务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倡者为容闳，容闳认为复兴中国的根本途径在教育。同治十一年（1872），清政府首派三十名幼童前往美国学习，学习期限十五年，先入美国中学学习基础知识，然后再进入军政、船政两院。以后三年，各有三十名学生前往美国留学。光绪



七年，清政府听信管理留学生官员的意见，
北京同文馆旧址
以为出洋学生沾染外洋恶习，流弊多端，下令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

光绪二年春，李鸿章派了几个武弁到德国学习水陆军械技艺，光绪三年福建船政大臣也派出首批学生到英、法学习海军和造船。



首批赴美留学的幼童

四、洋务运动的失败

在西方列强争相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及商品输出的时候，由中国人自己办企业，应该说是起到了抵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和抵制洋货进口的作用。如果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可以得到发展。但是，这些企业一开始就是由官僚阶层倡导，由官僚掌握大权，而这些掌握企业大权的官僚买办，对于经营管理又根本无知，只知贪污渔利，商人无权过问，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虽然吸收私人股金，但规定“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亏折全部落到股东的身上，商人都不敢再添新股。加之企业内部人员冗杂，工作效率低，这些弱点使得企业本身无法顺利发展起来。

虽然洋务派看到了建立海军的重要性，却始终坚持着消极防守的原则，南洋水师毁于光绪十年（1884）的中法战争，北洋海军在光绪二十一年的中日战争中又全军覆灭，标志着洋务自强之梦成了泡影。

中国在中日战争中惨败，面临被瓜分的危机，证明进行了三十年的求强、求富的洋

务新政的失败。这时，要求改革的思想迅速高涨起来。

第三节 戊戌维新

一、维新派的舆论准备

在中法战争前后，有些知识分子已在倡导改良主义的变法。例如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提出废除八股、开学校肄习西学、设船炮局制造洋器等措施。王韬著《弢园文录外编》，主张中国急需改变“取士、练兵、学校、律例”四种旧制，而最急的还是顺应民心，认为洋务新政只能为民祸，不能为民福。郑观应著《盛世危言》，主张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主张改革最有力的是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县人，幼年致力于史学、理学、经学，后来接触到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学说及世界史地的书，有感于西方治国有术，遂强烈要求改变现状。中法战争的失败对他刺激很大。光绪十六年（1888），他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要求学习西方。光绪十七年至光绪十九年，他在广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培植维新人才。同时，为了做好舆论上的准备，他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等著作，找出各种论点，说明孔子亦是一个主张维新的人，用孔子来支持自己的变法主张，以期实现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时，康有为联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千余人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有名的“公

康有为像



车上书”。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同年六月(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宣传变法。十月(11月),在京组织起强学会,欲广联人才,鼓吹维新思想,并将《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上海强学会成立,创办《强学报》为机关报,宣传西学及变法主张。十二月八日(1896年1月22日),北京、上海两地的强学会及所办报纸被清政府封禁。但维新派的宣传活动并没有停止,同年又相继在上海和澳门创办了《时务报》及《知新报》,第二年,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在长沙创办了《湘报》。这几份报纸成为维新派的主要舆论工具。

康有为宣传变法的得力助手是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十七岁中举,第二年开始读到《瀛寰志略》和翻译的西书,并遇到了康有为,被康有为的言论震动,从此成为康有为的弟子,积极参加康有为所领导的活动。《中外纪闻》、《时务报》等主要都由他任主编。他在《时务报》的第一期上撰《变法通议》长文,论述能否认真变法是关乎中国存亡的大问题。

谭嗣同(1865—1898)也是积极主张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中日战争失败后,民族危亡的现实激发了他变法图强的思想。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著成《仁学》一书,强调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必须冲破一切束缚的罗网。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一日(1898年2月),他在家乡创立南学会,二月二十五日创办《湘报》。他是维新改良派中的激进分子,主张对顽固派展开积极的斗争,他说:“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

积极主张维新变法的另一主要人物是严



梁启超像

复。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人,十四岁时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了几年,二十五岁时被派往英国海军学院学习,两年后回国,二十八岁起,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在英国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欧洲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他认为,西方之盛于中国者,不仅在器械而且在政教风俗,其所以富强,是由于公理日伸。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翻译了赫胥黎(T. H. 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一书的前两章,并加了大量按语,起名为《天演论》。他还在天津的《直报》和《国闻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速决论》等文章,以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道理,阐发不变则亡的观点。他认为,要使中国像西洋一样富强起来,必须用西洋之术,希望提倡西学,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中国如能顺应天演规律,实行变法维新,就会“自强保种”,否则将亡国灭种。

谭嗣同像



二、短命的百日维新

维新派虽然痛斥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已到了非变不可的程度，但是他们并不想发动一场革命来推翻这个制度，而是只想在原有的体制下做一些改革。他们企图通过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他们的变法纲领，将希望放在了光绪皇帝身上。

光绪皇帝载湉(1871—1908)，生父是道光帝第七子奕詝，生母是慈禧之妹。1875年，

严复像



同治帝病逝后，慈禧择定载湉为帝，年号光绪。即位时光绪年仅四岁，一直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虽然到十九岁时名义上已经亲政，但实权仍由慈禧把持。中日战争中，光绪皇帝虽不满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掌权派对日妥协求和的做法，但也没有办法扭转时局。维新派的变法改良的纲领，使他看到了摆脱傀儡地位的一线希望。他的师傅翁同龢接触到维新派以后，亦承认变法的必要。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接着各国势力接踵而来，瓜分之势愈见紧迫。康有为继续上书光绪，大声疾呼“局势万分危机，国家即将沦亡”，请光绪皇帝及时革旧图新、实行变法。光绪皇帝看到康有为的上书，颇为赞赏，下令要康有为提供变法的具体建议。光绪二十四年一月(1898年1月)，康有为奉旨写了《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大誓群臣诏定国是，除旧布新；设“上书处”以广开言路，征集贤才；设制度局以定新制。

光绪皇帝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告诉庆亲王奕劻：“太后若不给我事权，我愿意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实行新政。新政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开始，到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因为那一年是旧历戊戌年，所以也称为“戊戌维新”。

在“百日维新”中，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维新变法的诏令，主要内容有：取消重叠机构，裁减冗员；裁减绿营军，用新法编练海陆军；改变武举考试制度，筹设武备大学堂；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试

策论；讲授西学，开办京师大学堂，在地方设立中学和小学；设中国银行，设立路矿总局、农工商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提倡商办新式工业。

维新派的变法纲领引起了清统治者中顽固派的激烈反对，更重要的是，光绪皇帝想要通过变法争得自主权，这是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因此，“明定国是”的诏书发布之后，慈禧太后立即部署反攻。在诏书发布后的第四天就将支持光绪变法的翁同龢革职，接着又重新部署了京城的防御力量，任命其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做好了这些反攻的准备后，慈禧就静观光绪的动作。

由于各方面的阻力，维新派所颁布的纲领不能得到贯彻执行，光绪在康有为的推动下，决定采取措施，打破僵局，七月十四日（8月30日），下令裁撤重叠机构詹事府等六衙门，并撤消湖广、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七月十九日（9月4日），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革职。七月二十日（9月5日），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四品衔的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

光绪皇帝的这几项措施，涉及到了人事的任免权，同时又把慈禧的亲信罢免，这是慈禧所不能允许的，于是开始与荣禄等密谋废立之事。光绪见其位将不保，便召见杨锐，让他与林旭、谭嗣同等商量对策。维新派将希望寄托在天津督练新兵的袁世凯身上。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于光绪七年（1881）投入军队，甲午战后，任荣禄部下新建陆军督办，于光绪二十一年在天津小站练兵，统兵七千人，聘请德国教官进行操练，武器装备皆由外国进口。

八月三日（9月18日）夜，谭嗣同造访



京师大学堂匾额

1898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是维新变法仅存的成果，为北京大学前身。

袁世凯，要他先杀荣禄，然后包围慈禧的住处颐和园，保护皇上，并允诺事成之后以袁为直隶总督。狡猾的袁世凯答应在慈禧与光绪到天津阅兵时杀死荣禄，但是一回到天津，即向荣禄密告了一切。八月六日（9月21日）凌晨，慈禧带人到达光绪的住处，将光绪囚禁，对外宣称皇帝生病，由她临朝训政。当天，下令逮捕维新派人士。康、梁二人分别逃到香港与日本，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及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六人被



袁世凯像

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物或同情维新者也有多人被杀。当时梁启超曾苦劝谭嗣同一起逃走，但谭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何足惜。我国二百余年来未有为民变法而流血者，流血请自嗣同始。”在刑场上受戮前，谭嗣同还高声吟颂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慈禧重新当政后，下诏恢复被裁撤的詹事府等衙门，被光绪罢免的守旧大臣一一被起用，维新派所办报刊都被取消。维新派所宣布的新政，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其余一概都被推翻。一场改良维新的运动就这样失败了。

第四节 清政府的新政与立宪

《变法谕旨》（局部）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宣布变法，此为内阁发布的变法谕旨的部分内容。

一、新政措施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政府感到了统治

的危机。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当清廷还在西安的时候，就唱起了变法的调子，搞起了变法新政，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正式颁布了变法诏，谓世无一成不变的治法，“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在以后三年时间里，清政府陆续推出一些新政举措，大体有以下几方面：（1）改革六部，除了按照西方列强的意愿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以外，还设立商部，提倡私人办工业。（2）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清廷宣布，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至此，自隋朝以来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3）成立教育机构，建立新式学堂，派出留学生。这些新式学堂包括学龄前的蒙养院、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及各级师范学堂、农工商实业学堂等。（4）改革兵制，裁撤旧式绿营、防勇，组成新式军队。清朝末年的各省新军就是在这时开始形成的。

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新政措施并不是什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內閣奉
上諭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
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蓋不易者
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今甲令
乙不妨如琴瑟之改絃伊古以來未有與革即我朝
列祖
列宗因時立制屢有異同入關以後已殊藩陽之時嘉
慶道光以來豈盡雍正乾隆之舊大抵法積則敝
法敝則更變歸於強國利民而已自攝政以來
皇太后宵旰焦勞朕尤痛自刻責深念近數十年積習
相仍因循粉飾以致成此大釁現正議和一切政
務
鑒訓以為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
乃可作後事之師自丁戊以還偽辟縱橫妄分新
舊康逆之禍殆更甚於紅拳迄今海外通逃尚以
富有貴為等票誘人謀逆更藉保皇保種之妖言
為離間宮庭之計殊不知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
也非變法也該逆等乘朕躬不豫潛謀不軌朕顧恐
皇太后訓政乃接朕於瀕危而鋤奸於一旦實則剪除
亂逆
皇太后何嘗不許更新損益科條朕何嘗概行除舊執
中以御擇善而從
母子一心臣民共見今者恭承
慈禧命宜振興嚴禁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運我中國
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更多豪傑
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為
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
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
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

么新举措。在戊戌维新期间，这些内容都被维新派提出过。这些新政也没能起到挽救清政府统治危机的作用。为了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全国各省原有的赋税加码征收，新创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层出不穷，现在又以筹款办理新政的名义自行增加捐税。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被剥削、被压迫的下层百姓不能照旧生活下去，清统治者 also 感到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于是，清统治者又打出了立宪的招牌。

二、立宪活动

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同意一些官员的建议而考虑立宪问题，决定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镇国公载泽等五位大臣在日本、欧美转了一圈，回国以后，向朝廷报告了实行立宪的三大好处：一是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可以皇位永固；二是一旦改行宪政，列国之鄙我者，转而敬我，可以外患渐轻；三是如革命党欲倡言革命，人不肯从，因此内乱可弭。他们认为欲防革命之危机，舍立宪无他道。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出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宣布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立即实行宪政，首要任务是改革官制，整顿纪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若干年后查看情景，再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到了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九年后正式召开国会，推行宪政。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欣喜万分。他们宣布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并派遣成员回



光绪皇帝像

国，以求促进立宪早日实现。一些汉族的大官僚及民族资产阶级中的部分上层人物也马上随声附和，这一部分人被称为立宪派。他们希望通过立宪运动在政治上获得部分权力，因而分别在上海、湖北、湖南等地成立预备立宪会、宪政筹备会等机构，敦促尽快实现立宪。

正当立宪派频频活动之时，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三岁的溥仪继位，其父载沣任摄政王，总揽大权。载沣进一步假立宪之名，行皇族集权之实。宣统元年一月(1909年2月)，清政府下令各省在年内一律成立咨议局。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由他筹组新内阁。在组成新内阁的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仅四名，蒙族旗人一名，满族八人。而八名满人中，皇族又占七名，被人们讥讽为“皇族内阁”。清廷的欺骗手段使立宪派企图从清政府手中分一点权利的愿望化为泡影，许多人因此加入反清行列。

张謇像



第五节 晚清经济文化的新潮流

一、近代工业的产生

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及民用企业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在这以后,部分官僚买办、中小商人、手工业者也陆续投资新式工业,中国有了民族工业。

在甲午战争以前,私人经营的新式工业是非常少的,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有

缫丝、轧花、粮食加工、火柴制造等行业,规模一般都较小。

甲午战争以后,民族企业的投资者要求自由发展工业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要求打破官府垄断,自由发展新式工业。而当时清政府因需支付大量战争赔款,财政状况十分拮据,无力创办新企业,一些原有的官办企业也无力支撑下去,有的改为商办,有的则借助于外国资本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企业的数量有了一些增加。开办较多的企业有棉纺、缫丝、粮食加工、日用品等,其他还有机械制造和修理、采煤、金属采矿业等。纱厂以张謇的南通大生纱厂规模较大,发展速度较快。张謇是江苏南通人,1894年殿试状元,1895年开始创办实业,最初投资纱厂,此后相继开办多项企业,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

面粉厂以孙多松、孙多森兄弟的上海阜丰面粉公司,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无锡茂新面粉公司为著。

一般说来,一些大官僚、大买办和大商人投资的企业,由于资金雄厚,与官场联系密切,政治地位高,在民族经济中占主要地位。而一些由中小商人、手工业者投资兴办的企业,经济力量薄弱,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低,他们不但无力抵抗外国资本,也受到大官僚、大买办和大商人投资的企业排斥,在民族经济中处于附庸的地位,发展起来也格外艰难。

二、近代邮电

中国古代主要的邮政机构是驿站,分铺递、驿递二种,铺递用人力,驿递用马匹,择地分立驿站,主要负责传送军报公文。民间往来信件,则有民间的信局办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了具有近代意义

梳棉机

1895年由英国进口,重4吨。
1899年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的大生纱厂使用。



的邮政，但是外国人办的这些邮局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同治五年（1866）起，清政府把递送各国使馆信件的工作交由海关负责。光绪四年（1878）起先后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登州、九江、镇江的海关设立书信局，兼收民信，开始发行邮票，是为中国近代邮政之始。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正式设立大清邮政局。

光绪六年八月（1880年9月），李鸿章奏请设立了天津电报总局，敷设天津到上海的电报线路，次年十月十日（1881年12月1日）敷设完工。嗣后，又从上海向南架设电线至广州，向西沿长江架设至武汉。光绪九年八月（1883年9月），又将天津到北京通州的线路敷设完。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开始敷设线路。光绪十六年（1890）冬，西安经甘肃兰州到嘉峪关的线路敷设完工。光绪十八年（1892）又将线路扩展至新疆乌鲁木齐，后新疆南北两路也都敷设完工。至此，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大部分行省及重要商业城市均已敷设电报线路，形成了四通八达的电讯网。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设立邮传



部，主要统辖全国铁路、轮船、电报、邮政诸事务，初步建成了中国近代交通邮电体系。

中国最早使用的电话机
高25厘米，底边长20厘米

三、近代银行

中国在新式银行出现以前，金融界很早就有了票号和钱庄，经营汇兑、放款、存款等业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开办银行，吸取存款，发行纸币，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财政空虚，已到无法维持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提出

1878年发行的大龙邮票
这是中国最早发行的邮票。
一套三枚，一分银、三分银、五分银各一枚，图案是蟠龙。自1878年至1883年分三期发行。





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

创办银行的办法。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在上海开办中国通商银行总行,这是中国第一家银行。这年年底,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等地相继建立分行。通商银行一建立,就表现出其垄断性,规定以后凡存解官款,在设有中国通商银行之处,务须统交银行收存汇解。此外,通商银行还有发行钞票的特权。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户部银行成立,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称大清银行,宣统三年(1911)改称中国银行,是有商股

参加的国家银行,被赋予代理国库承铸货币、发行纸币,总揽全国金融的特权。光绪三十三年(1907),邮传部又成立了交通银行,有商股参加,但最大的股东还是邮传部。交通银行掌握邮传部的“轮、路、电、邮”四政的存汇拆贷业务,是仅次于中国银行的—家大银行。

四、铁路的修筑

同治四年(1865),英商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筑了一条小铁路,试行小火车,此为火车输入中国之始。因中国官民没有见过火车,视其为妖物,结果由步军统领下令拆毁。

光绪二年(1876),英商修筑的从吴淞口到上海的铁路完工通车,全长约20公里,每天往返六次,获利颇丰。但它遭到官方和社会舆论的反对,不久后又压死一名士兵,遂被上海官方勒令停止,用二十八万五千两白银买回这条铁路,再加以拆毁,拆下的路轨等器材被弃置在上海滩头。吴淞铁路是第一条在中国运营的铁路,但却是没有经过中国允许而非法修筑的。

由清政府批准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光绪四年(1878)开平矿务局成立,次年出煤,为解决煤炭外运问题,由李鸿章奏准于光绪七年(1881)修成9.7公里标准铁轨的轻便铁路。最初为了避免旧势力的阻挠,用骡马在轨道上拉车,谓之马车铁路。后来英国工程师金达(C.W.Kinder)利用煤矿的旧锅炉改装了一台蒸汽机车,称“中国火箭号”,一次能拉100多吨煤。

由中国人独立设计、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京张铁路(北京到张家口),工程师是詹天佑。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为了控制中国,纷纷抢夺在中国的铁路修筑权,中国大

詹天佑像



多数铁路都被瓜分。中国的爱国人士都渴望独立发展中国的铁路事业，詹天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詹天佑，字眷成，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1872年，他作为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到美国留学，1875年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毕业回国后先在福州船政局等处任职，1888年受聘为中国铁路工程师。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任命詹天佑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筹画修筑从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京张铁路全长200公里，穿越地区重峦叠嶂，地形复杂。外国人对中国人自己能否胜任如此艰巨的工程表示怀疑，扬言能修京张铁路的中国工程师尚未出生。詹天佑率领技术人员翻山越岭，勘测线路，最终选定了最佳的线路和施工方案。他在八达岭地区创造了“之”字形线路，减少了工程量，同时采用两头对凿和中间竖井施工法开挖隧道，大大缩短了工期。詹天佑还改进了外国工程师发明的自动挂钩，确保了行车安全。

经过詹天佑和全体筑路工人的艰苦努力，京张铁路于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1909年10月2日）建成通车，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并节省白银二十八万两。外国工程师在仔细考察了工程以后，也不能不对詹天佑的成功表示钦佩。

五、近代教育

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转折，也引起了中国文化的转折。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部分有识之士从“天朝大国”的盲目虚骄的梦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接触、学习和掌握西方近代科技文化。

在洋务运动期间，一部分官僚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首先办起了船舶制造及武器制造等一批军事工业。为培养各方



面人才，又办起了外语学校、军事学校和专门技术学校，这是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开端。在一些学校和制造局内还附设了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

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向光绪帝提出了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兴办新式学校的主张，由于维新变法很快失败，这些举措没能得到推行，但是，百日维新期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却保留下来。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自己开办的第一所大学。在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第一个办学

京张铁路通车典礼
1909年在昌平南口举行。



北洋大学堂大门
1902年在原天津头等学堂的基础上复建，为天津大学前身，是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

《天竺图》轴

清 吴昌硕作

纵147厘米，横47.5厘米

本幅自题：“群仙祝寿。拟范湖居士，己酉吴俊卿。”己酉为宣统元年（1909），吴昌硕时年六十六岁。



章程中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管辖。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管理机关。

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后，清政府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在实行新政时，终于宣布废除科举考试，制定了新式教育制度。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发布谕旨设立学部，总管全国教育。中国出现了兴办学校的热潮。所建学校种类齐全，有从学龄前儿童教育的蒙养院到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在内的各级普通教育学校，还有各级师范学校以及培养专门人才的实业学校等。

六、近代文学艺术

文学改革不仅是内容革新，也要求形式革新。提倡文学与语文合一而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便是这一改革的表现。如诗歌提倡“我手写我口”，小说提倡“与口说之语言相近”，散文提倡“务求平易畅达”等。配合这一运动，创办了白话学会、白话报刊等。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1901—1911）创办的白话报刊不下一二百种，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这些白话报刊刊载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宣传革命思想的。如女革命家秋瑾的《敬告姊妹们》、《敬告二万万女同胞们》等文章，就是宣传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陈天华的《警世钟》，以通俗的语言激发四万万同胞齐心协力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小说方面，20世纪初，创办了专刊小说的刊物，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这些刊物多刊登一些以爱国主义和揭露讽刺为主题的小说，涌现出一批对清末社会风气、吏治腐败，封建士大夫的虚伪、贪婪、无耻等种种丑恶现象进行揭露、嘲讽、谴责的长篇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

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和刘鹗的《老残游记》，被称为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

在文学作品翻译方面，也出现了繁荣局面。许多著名外国文学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开始被中国人了解。其中最著名的翻译家为林纾，他从19世纪末翻译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起，陆续翻译了大量欧美小说。世界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易卜生、雨果、塞万提斯等的名著，都是由他第一次译成中文的。

在戏曲艺术方面，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京剧的兴起。明清时期的戏曲舞台，昆曲处于执牛耳的地位。清代中期以后，皮黄戏开始流行起来。皮黄是西皮和二黄两种腔调的合称，分别是湖北汉调和安徽徽调的主要腔调。乾隆末年，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个徽调戏班陆续进京演出。他们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并接受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于道光年间形成了皮黄戏，即今天的京剧。道光以后，皮黄戏有了较大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才艺出众的演员。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程长庚以卓越的艺术成就，被誉为京剧艺术开基创业的大师。

美术方面同其他文化领域一样，处于变革之中。新画派的崛起，新画种的盛行，西洋画的输入，这一切都给中国的美术界带来重大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后，居正宗地位的文人画日趋衰落，一批居住在上海的画家大胆破除文人画的积习，继承中国画界的革新传统，创造出泼辣、豪放、活泼、新鲜的画



《老残游记》手稿

风，从而形成了富有生气的海派画家。其代表人物有任熊、赵之谦、任颐、虚谷、吴昌硕等人。

岭南画派是晚清的另一个新兴画派，其成员都属于地处五岭之南的广东籍，所以称为岭南画派。岭南画派大胆吸收西洋画、日本画的画法，改变了中国传统画主要用线条表现对象的画法，侧重用色彩或水墨的渲染来描绘形象，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电影是近代产生的一门年轻的艺术。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L. Lumiere)在巴黎正式放映了《墙》、《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等几部世界上最早的影片，这一天便被公认为电影时代的开端。1896年8月11日，上海豫园第一次放映电影。1902年1月，外国人把影片、放映机带到北京，在前门外打磨厂租借福寿堂放映，从此，电影进入北京。以后，北京、上海建立了电影院，电影放映业逐渐发展起来。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丰泰摄制了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戏曲片《定军山》，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第十四章

辛亥革命 帝制终结

第一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事实证明，洋务派搞的求强求富，维新派搞的维新改良，都没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一些人逐渐认识到，要想救中国，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君主专制的独裁统治。

一、孙中山与兴中会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人，曾化名中山樵，故人称孙中山。他父亲是个农民，哥哥孙眉因家境艰难，于同治十年(1871)到檀香山谋生。孙眉在檀香山先是当农业工人，积攒了一点钱后就独立开荒，经营农场，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农牧业资本家。光绪四年(1878)，十三岁的孙中山也来到檀香山，依

靠哥哥的资助，先后就读于英国教会和美国教会办的学校。五年后回国，在广州和香港地区继续求学。光绪十八年，他从香港雅丽医学院毕业后，在澳门、广州一带行医。

孙中山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学说的教育。中法战争的失败对他震动很大，他经常和一些同学朋友议论时事政治，抨击腐败的清政府。光绪二十年五月(1894年6月)，他和朋友陆皓东一起到北方游历，在天津，通过李鸿章的幕僚转交给李鸿章一封信。他在信中陈述了欧洲的富强是因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认为我国也应仿行西法，以求自强。这封信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回应。

光绪二十年(1894)冬，孙中山重到檀香山，在那里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的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光绪二十一年一月(1895年2月)孙

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在会员的誓词里，他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把推翻清王朝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联系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兴中会决定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

光绪二十年三月（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恨，孙中山乘机动员兴中会成员，并联络反清会党，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但在起义之前，被清政府发觉，起义组织者陆皓东等被捕牺牲，孙中山侥幸逃到香港，后又转赴日本、檀香山、美国、英国，在华侨中宣传革命主张。

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

义和团运动以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目睹阶级压迫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上了寻求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他们翻译、阅读西方资产阶级的作品，办报纸、杂志宣传革命思想。《国民报》、《游学译编》、《新湖南》、《浙江潮》、《苏报》、《女子世界》、《中国白话报》等刊物先后在东京和上海等地出版。

光绪二十九年（1903），陈天华（1875—1905）在东京写了《猛回头》、《警世钟》两本小册子，表述了鲜明的反清革命思想，指明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下的危亡局势，呼唤人们为改变这种局势而斗争。

同一年，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邹容（1885—1905）写了《革命军》一书。这本只有两万字的小册子论证了反清的必要性，赞美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成就，主张用革命来推翻清朝的统治，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求得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地位。

邹容的《革命军》写出以后，章太炎



孙中山像

（1869—1936）在《苏报》上发表文章加以介绍。清政府逮捕了章太炎、邹容二人，封闭了《苏报》馆，制造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邹容在监狱中备受折磨死去。

秋瑾（1875—1907）是一个杰出的女革命家。她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光绪三十年（1904），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她发起成立以反清为宗旨的“共

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刊物



陈天华像(左)

邹容像(右)



爱会”和“十人会”，创办白话杂志，并写了不少宣传革命的文章和诗歌。光绪三十三年(1907)，她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号召妇女走上革命道路。同年，她与徐锡麟组织光复军，准备在皖浙两省起义，事情泄露，被清政府杀害。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宣传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组织的建立。继兴中会之后，在

20世纪初又涌现出一些革命小团体。

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学界人士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主持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被推为会长。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2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在湖南成立华兴会，到会的有百余人，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

章炳麟像(左)

秋瑾像(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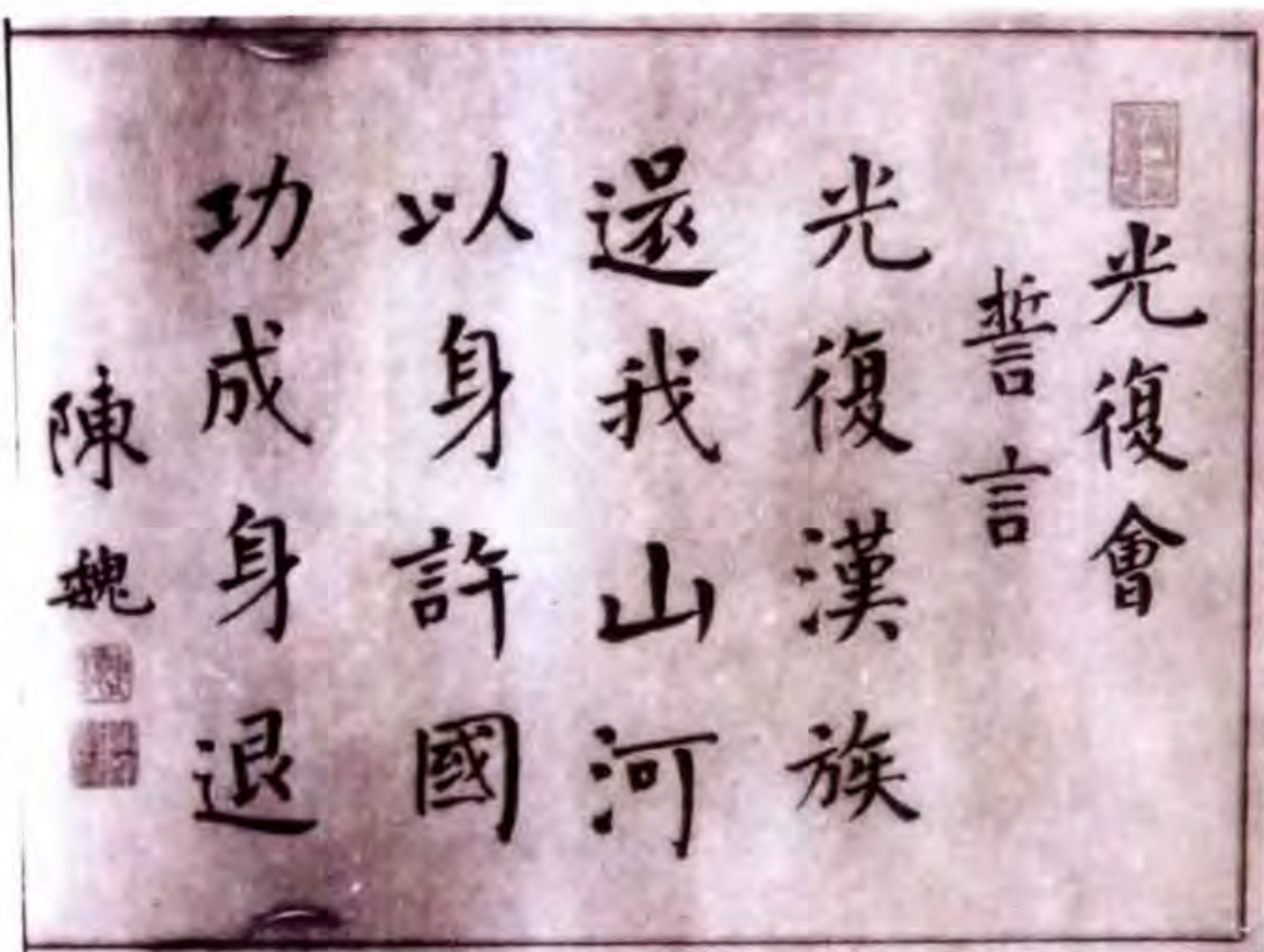
光复会和华兴会都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宗旨，华兴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他们联络一些会党作为革命主要力量，积极策划武装起义并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响应的战略方针。

三、同盟会的建立

从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到科学补习所，这些小团体都把推翻清政府作为革命目标，联络会党和新军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活动集中在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提出了明确的革命纲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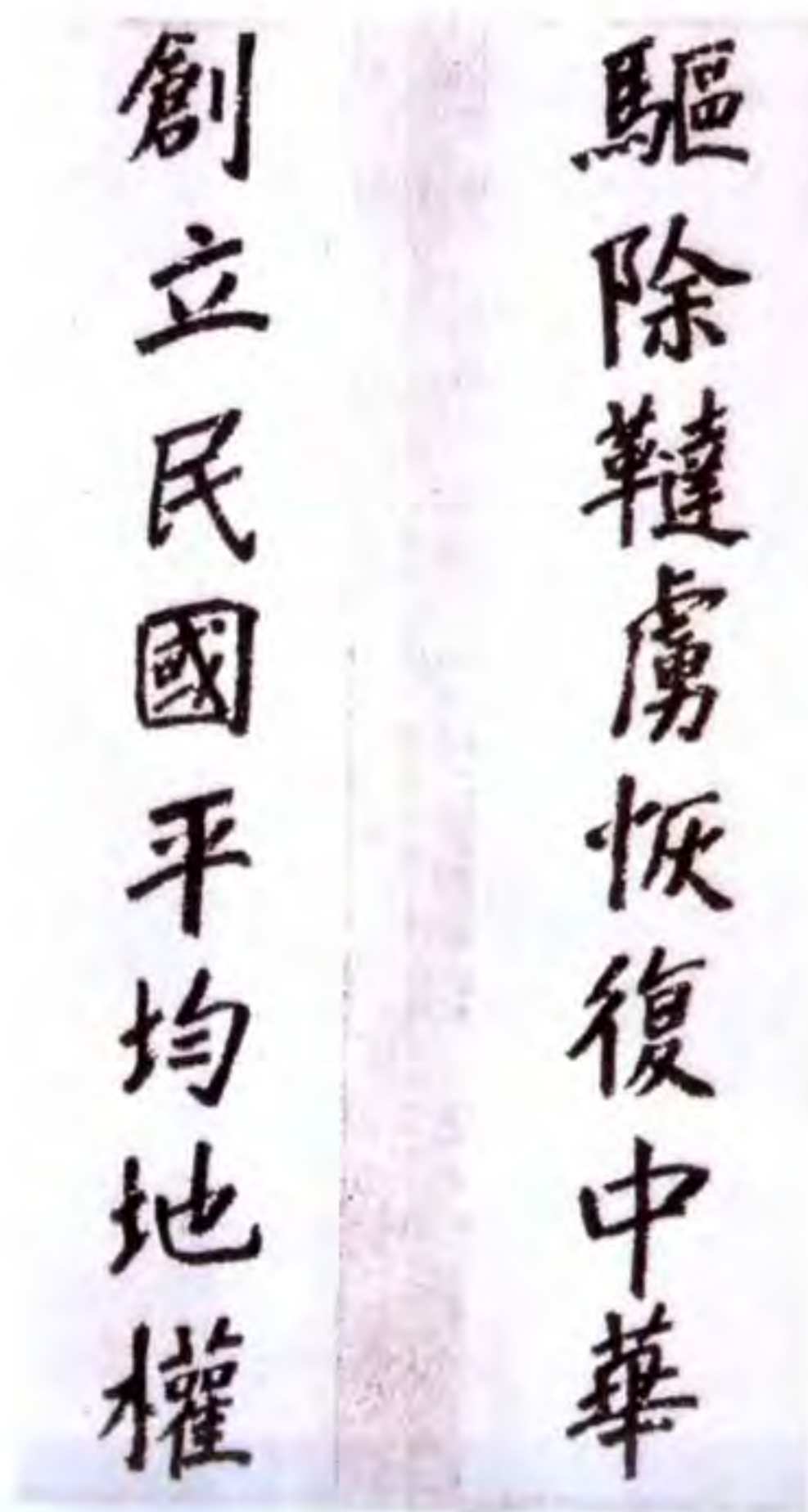
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中山到了日本，首先同黄兴、宋教仁等人商量联合起来建立共同革命组织的问题。孙中山指出，革命必须内部统一，现在各省干各省的事，互不相统，即使将来革命成功了，也会出现二十多个地方政权之间的斗争，那时帝国主义从中干涉，必然会亡国。黄兴等人赞同孙中山的主张。

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革命党人在东京召开筹备会议。到会的人员有七十多人，分属十七个省籍。会上，孙中山提议建立革命同盟会，经过一番争论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并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政治纲领。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同盟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三百多人。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代表孙中山在东京主持日常工作。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国内设上海、香港、重庆、烟台、汉口五个支部，国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光绪三十二年（1906），孙中山会同黄兴、章炳麟编定《革命方略》，规定了同盟会纲领的



实施计划和其他各项具体方针政策。同盟会成立以后，立即分派人员到国内外各地设立支部，扩大组织。一年以后，加入者达一万多人。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1905年11月），同盟会创办《民报》作为机关刊物。孙中山在



孙中山手书同盟会纲领

發刊詞

孫文

近時雜誌之作者亦夥矣。其詞以爲美惡。而無所終始。摘塗不獲。則反覆其詞。而自惑求其辭。時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謂對症發藥者。已不可見。而况夫孤懷宏識。遠圖將來者乎。夫精羣之道。與羣俱進。而擇別取舍。惟其最宜。此羣之歷史。既與彼羣殊。則所以掖而進之之階級。不無後先。進止之別。由之不貳。此所以爲輿論之母也。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泊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々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爲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治化焉。其他旋維於小。已大羣之間。而爲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虛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爲既往之陳跡。或於我爲方來之大患。要爲精吾羣所有事。則不可不并時而弛。張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視不遠。遊五都之市。見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稱也。又但以當前者爲至美。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美於歐美。猶不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墮乎後也。嗚呼。我祖國以最大之民族。聰明強力。超絕等倫。而沈夢不起。萬事墮壞。幸爲風潮所激。醒其渴睡。且夕之間。奮發振強。勵精不已。則半事倍功良。非誇獎。惟夫一羣之中。有少數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羣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羣。吾羣之進步。適應於世界。此先知先覺之天職。而吾民報所爲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學說。其理想輸灌於人心。而化爲常識。則其去實行也。近吾於民報之出世。視之。

《民報》發刊詞

發刊詞中第一次提出“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所謂民族主義，就是“驅除鞑虜、恢復中華”；所謂民權主義，就是“建立民國”；所謂民生主義，就是“平均地權”。它們集中到一點，就是堅持武裝鬥爭，推翻清朝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

四、同盟會發動的武裝起義

同盟會成立後，爲實現其奮鬥目標，多次發動武裝起義。光緒三十二年十月（1906年12月），同盟會員劉道一、蔡紹南與在湖南、江西交界地區活動的哥老會頭目共同策劃，在萍鄉、瀏陽、醴陵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參加者約有三萬多人。起義軍定名爲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發布檄文宣布破除數千年之專制體制，建立共和國，使地權與民平均，與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獲自由之幸福。起義所造成的聲勢使湖南、江西兩省的省會感到震動，清政府急忙調動湖南、湖北、江西、江蘇四省軍隊

前來鎮壓。起義軍苦戰一個多月，終因缺乏統一指揮，在各自爲戰的情況下被清軍逐個擊破。清軍四處搜捕，劉道一、蔡紹南死難，參加起義的許多哥老會頭目被殺。

光緒三十三年初，孫中山到越南河內建立同盟會支部，購置槍炮彈藥，聯絡兩廣會黨，在以後一年多的時間里，在中國西南邊境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光緒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5月），同盟會與三合會聯合，在廣東潮州的黃岡起義，起義軍攻入黃岡，但在清朝地方政府的鎮壓下，起義失敗。緊接着，孫中山又指派鄧子瑜等人前往廣東惠州聯絡會黨，在七女湖舉行起義，同惠州官方巡防營交戰了十多天后，起義失敗。光緒三十三年夏天，廣西欽州、廉州一帶人民不滿清政府的苛捐雜稅，開展了大規模的抗捐抗稅鬥爭。兩廣總督派廣東新軍統領郭人漳前往鎮壓。孫中山派人到郭人漳軍中活動，說服他打起革命旗幟。郭人漳表示，在革命軍起義後，可以配合行動。革命黨人王和順在欽州

发动起义，攻下防城后，又进逼钦州，郭人漳不但没有配合，反而向起义部队发起进攻，使防城得而复失。起义军进攻钦州北面的灵山，也没有成功，一部分起义军退入广西的十万大山，王和顺逃入越南境内，钦、廉、防起义失败。十月二十七日（12月2日），孙中山又派人进攻广西镇南关，夺取了镇南关的炮台，想与十万大山的起义军会合进攻广西，但十万大山的队伍道远难来，在清军的进攻下炮台失守。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8年3月），黄兴集合前一年参加防城之役和镇南关之役的部分人员及在越南的华侨共二百多人，进攻广西钦州、廉州、上思一带，转战四十余天，无法打开局面，败退下来。

当孙中山、黄兴在西南边境发动武装起义时，光复会在安徽安庆也发动了两次起义。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乘安徽巡抚恩铭到安庆警察学堂检阅毕业典礼时，击毙恩铭，率领警察学校学生冲向军械库，准备夺取枪支起义，被清军包围，激战六小时，徐锡麟被捕遇害。同盟会浙江支部负责人、光复会首领秋瑾在浙江绍兴组织光复军准备响应，亦遭逮捕，于六月六日（7月15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光绪三十四年十月（1908年11月），在安庆充任清朝新军队官的光复会员熊成基率马、炮两营千余名新军起义，进攻安庆，与清军激战一昼夜，未能得手。在清军的追杀下，熊成基逃走，起义失败。宣统二年（1910），熊成基在哈尔滨谋刺清海军大臣载洵时被捕遇害。

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集中同盟会的精干力量，组织起八百多人的敢死队，在广州发动起义。起义军计划分四路进攻两广总督衙门，但由于组

织不利，只有黄兴率领的一路攻入总督衙门。总督张鸣岐逃跑，与水师提督一起组织兵力围攻起义部队，双方展开激战，起义部队被打散，有的战死，有的被捉，黄兴受伤后化装逃往香港。起义失败后，广州的革命党人收殮烈士遗骸七十二具，葬于黄花岗。所以，此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五、保路运动

义和团运动以后，一些爱国绅商展开了收回路权运动，将已由外国人掌握的筑路开矿权收回由中国人自己承办。一些省还集股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准备修筑各自省内的铁路。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他们要集合足够的资金来办铁路这样的事业是很困难的。所以，商办公司虽然成立多年，铁路却迟迟不能开工修筑，因此清朝当局认为商办不如官办。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在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清政府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下令将已准交商办的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十八日，又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铁路公司。紧接着，二十日就和英、法、德、

临死不屈的黄花岗起义战士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拱手让给了帝国主义。

清政府这一举动，激起了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在四川尤其激烈。四川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就成立了铁路公司，开始是官办，光绪三十三年改成商办。计划修建东起宜昌，经万县、重庆到达成都的铁路。先后募集到资金约一千六百多万元，其来源主要是所谓“抽租之股”，就是凡田业之家，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该年实收之数，百分抽三，所以四川全省大小地主在形式上都成了公司的股东。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后，四川铁路公司在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举行股东大会，会议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选举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为会长和副会长，还派人到外省和京城进行联络请愿。七月一日（8月24日），成都全城罢市、罢课，并迅速发展各县。七月十五日清晨，四川总督赵尔丰突然拘捕蒲殿俊、罗纶等九个他认为是祸首的人，并下令开枪杀死请愿群众三十多人，造

成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面对这一事件，保路同志会的一些上层人物开始并没有激烈斗争，他们极力散布文明争路的论调，但是事态的发展却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成都血案”以后，四川的革命党人决定组织保路同志军，并联络会党，发动武装起义。以资产阶级立宪派为首的四川争路权运动，转为了武装斗争。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首先攻取荣县，在荣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清政府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和岑春煊进入四川进行镇压。但是，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却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第二节 武昌起义

同全国的形势一样，湖北地区也存在着多个革命小团体。光绪三十年（1904），武汉就出现了以科学补习所为名称的革命组织，后由于受黄兴的华兴会在湖南发动起义失败

的影响而停止活动。后来，科学补习所的部分成员又在日知会的名义下活动。光绪三十四年，这个组织改名为振武学社，宣统二年（1910）又改名为文学社。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振武学社到文学社，都注意在新军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力量。一些革命知识青年入伍当兵，在士兵中起了骨干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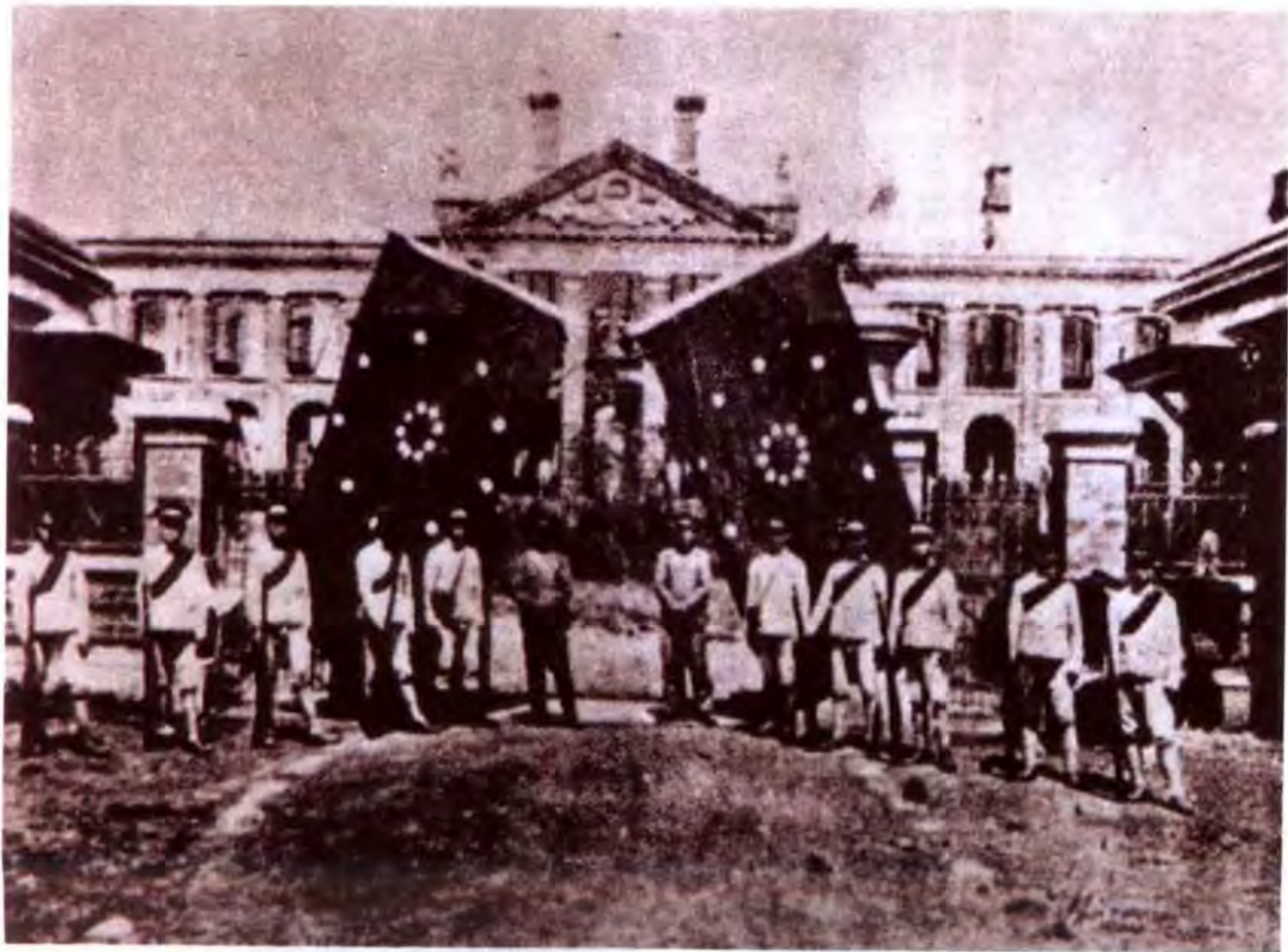
宣统二年，武汉地区又出现了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共进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它是一部分与会党联系密切的同盟会员在东京建立的。起初，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联络会党方面，光绪三十四年，在湖北地区几次发动会党起义都遭到失败。宣统二年冬，共进会的成员到了武汉，除了吸收学界的人士参加外，也着手在新军中做宣传组织工作。

随着全国各地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共进会与文学社都感觉到联合起来的必要性。经过协商，这两个组织于宣统三年八月三日（1911年9月24日）召开了联合会，讨论并

确定了发动起义的计划，选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任军政府总理。起义日期初定于八月十五日（10月6日），后因准备不及，改在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

八月十八日（10月9日），孙武在位于汉口俄租界内的机关里制造炸弹，不慎起火爆炸，孙武被炸伤，由同伴送往医院。俄国巡捕闻声前来搜查，将机关内所藏文件全都搜去，并报告清朝当局。听到这个消息后，在武昌机关里的蒋翊武和其他几个负责人感到如不赶快动手，就将坐以待毙，决定当天夜里12点以南湖炮声为号，发动起义，并分派多人到各处秘密布置。可是在当晚11点多，起义的指挥部遭到巡警的袭击，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而传送命令的人由于胆小没有将命令送到南湖炮队，因此十八日（9日）发动起义的计划没能实现。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早晨，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将刘复基、彭楚藩及因运送炸弹被捕的革命党人杨洪胜杀害，并封锁新军营



1911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

湖北军政府旗帜——十八星旗

长280厘米，宽165厘米



门，不准兵士出入。当天白天，瑞澂到处搜捕革命党，新军中纷纷传说瑞澂要派巡防营到新军各营中捉拿革命党人，就是未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也感到有受牵连的危险。到了晚上7点多，工程兵第八营的士兵发生哗变，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了第一枪。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发动广大士兵奋起响应，打死了几个企图阻拦的军官，冲出营门，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城内外各营新军及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也纷纷响应，集中起来合力进攻总督衙门，瑞澂狼狈逃跑。经过一夜战斗，革命军占领武昌。二十日和二十一日（11日和12日），驻扎汉阳、汉口新军中的革命士兵也发动了起义，武汉三镇尽入革命军掌握之中。

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上午，革命士兵中的骨干在咨议局开会，筹组革命政府。因筹备起义时被选举出来的军政府领导人在起义前就有的受伤，有的被捕，有的外逃，起义时都不在现场；同盟会的领导人孙中山在国外，黄兴在香港，一些立宪派乘机推举在起义中躲藏起来的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

督。

黎本来对革命十分仇恨，也不相信革命能真的胜利，怕由于附和造反而被清政府砍脑袋，因此不敢接受送到手的官位。革命士兵把他监视起来，另组谋略处担负起军事指挥工作。谋略处决定将湖北革命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采用黄帝纪年，以十八星旗为革命军旗，并发布《布告全国电》，号召各省响应起义。

随着武汉三镇的光复，湖北全省也都行动起来了。革命胜利在望，黎元洪的态度开始转变。在立宪派的策划下，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这天，搞了一个祭告天地的活动，黎元洪亲读誓文和祭文，正式当上了都督兼总司令。同一天还颁布了军政府的组织条例。根据条例，新成立的军政府各部人选共十八人，其中有十五人是旧官僚及立宪派，革命士兵组成的谋略处被取消。

第三节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清政府统治结束

一、筹组中央政府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闻风响应，到11月下旬，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宣布响应武昌起义，脱离清政府独立。

但是，这些成立了军政府和宣布独立的省份，掌握政权的人绝大多数是旧官僚及立宪派。其中有的是革命派掌握了政权后，又被旧官僚和立宪派窃取，也有的根本没有经过起义，而是由旧政权宣布独立变成了新都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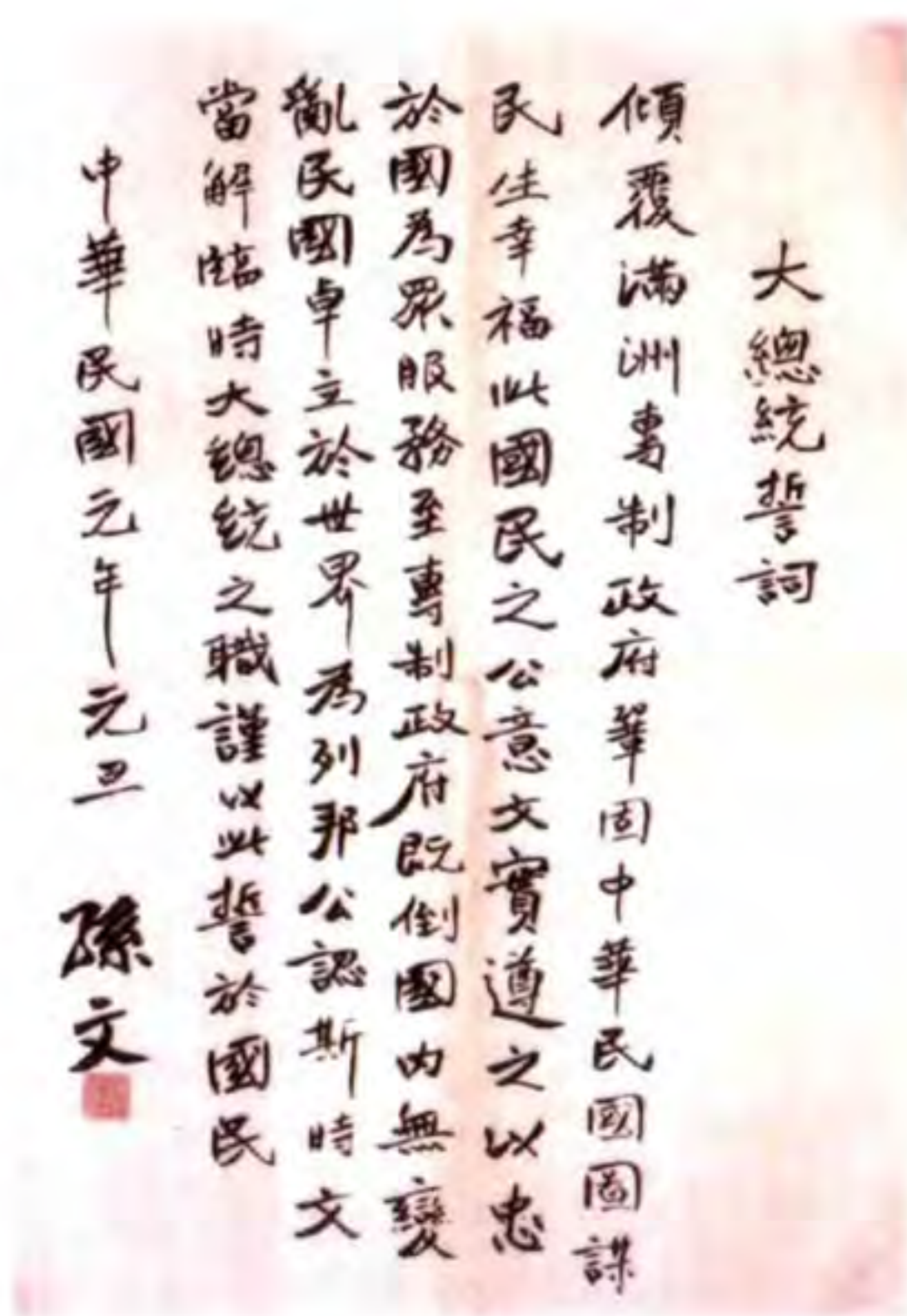
在各省相继脱离清政府独立后，建立中央政权、推翻清朝统治成为主要议题。

1911年11月，各省选出的代表在武昌集中，讨论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当时，也正是清政府起用的袁世凯率北洋军向武汉大举进攻之时，黄兴统帅的湘鄂联军节节败退，27日，汉阳失守，武昌也处于清军的炮火中。各省代表非但不认真研究如何击退清朝军队的进攻，反而在临时政府所在地及临时政府人选的问题上争论不休。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于是代表们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并于12月11日将各省代表会议移到南京举行。正当临时政府难产之际，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孙中山为革命辛苦奔波几十年，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即使那些旧官僚和立宪分子也不得不表面上拥护孙中山，赞成组织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9日，十七省代表会议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发表



大总统誓词

宣言、文告，公布内外施政方针。1月3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内阁人选，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决定采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28日，将各省代表会议改为临时参议院，作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议员由各省代表会议的代表充任。



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旧址

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民主改革法令:命令各官厅焚毁刑具,废除封建刑罚;剪除发辫,禁止缠足;禁止种植、吸食鸦片;保护华侨,禁止买卖华工;通令改变贱民地位,在法律上与其他人平等;鼓励兴办实业。教育部还颁布了改革教育的措施,如提倡男女平等,奖励女学,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废除清政府颁布的教科书,废止读四书五经等。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南京临时政府约法委员会仿照西方资产阶级宪法,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国人民组成,其主权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保护私有财产,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言论、集会、出版、通信、信仰等自由,享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等。

但是,必须看到,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占主导地位,然而它毕竟是一个同旧官僚和立宪派联合的政府,至于地方政权——各省的都督府,当权者就更多是旧官僚军阀和立宪派,因此,孙中山的一些有利于破除封建专制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不可能全部实现。

同时,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南京临时政府也不可能解决当时对内、

对外两方面的根本问题。

在对内问题上,南京临时政府不但没有去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当广大农民群众为自身的利益自发地起来反对封建剥削时,反而遭到地方政府的镇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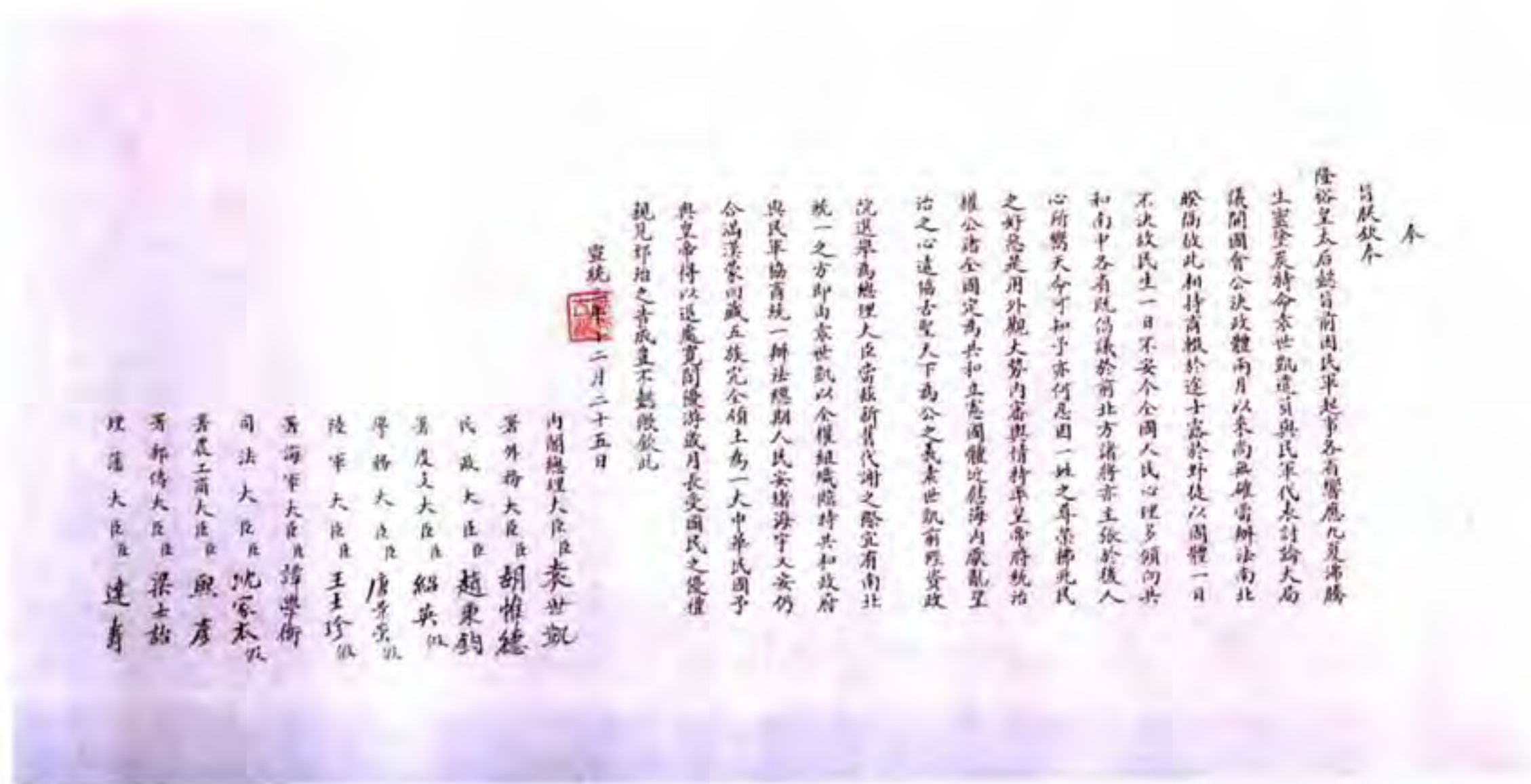
三、袁世凯窃国夺权

武昌起义以后,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重新起用袁世凯。袁世凯大耍两面派手法,他一面指挥北洋军攻下汉口、汉阳,一面派人与黎元洪联系,商谈议和,以便夺取更大的权力。武昌军政府和十七省代表会议中的旧官僚和立宪派,希望早日停战,立即响应袁世凯的提议,一些革命党人也对议和充满幻想,寄希望于袁世凯反正,实现南北统一,甚至对袁表示,若袁能赞成共和,就选其为总统。

1911年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十七省代表会议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谈判,双方就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袁世凯虽然公开声明要维持清朝皇室而实行君主立宪,但他的代表唐绍仪在会议上表示,只要袁能当上大总统,不但他自己不反对共和立宪,似乎袁世凯也不反对。最后双方同意由各省推举代

清帝退位诏书

长75厘米,宽30厘米



表，举行“国民大会”来决定。

正在这时，孙中山回国。孙中山一到上海，就坚定地表示：革命目的未达，无和谈可言。不久，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成立内阁，并组织北伐军，准备夺取北京。

袁世凯受到沉重打击，他立即指使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发出通电，叫嚷必须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帝国主义列强也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在财政上加紧对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经济封锁，致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军费十分困难。这时，同盟会内部又日趋涣散，革命派内部的分化日益加剧，对反动势力妥协的倾向普遍增长，黄兴、宋教仁等极力主张对袁世凯退让。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和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发动的北伐进展缓慢，各地的北伐队伍逐渐解体。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没有能力解决它面临的许多困难，不得不对袁世凯妥协退让。1912年1月15日，孙中山向袁世凯表示自己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接着，南北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只要清帝退位，孙中山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袁世凯见窃国夺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即开始逼清帝退位。2月5日，南京政府通过了一个《优待皇室条例》，其主要内容是：清帝退位后，其尊号不变，原有私产严加保护；皇室暂居皇宫内，日后迁往颐和园，每年由中华民国拨款四百万元供其开支；皇族世爵一律照旧。2月12日，清廷公布退位诏书，宣布退位。清帝的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二百



《京师公报》清帝退位号外
《清帝退位诏书》发布次日，
《京师公报》发布号外，刊载
了《退位诏书》及“清室优
待条件”。

六十余年的清王朝灭亡，同时也标志着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皇帝正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孙中山认为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于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他在咨文中说，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从此帝制永不留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业已达到。他还向参议院提议，“此次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举为总统，必能尽忠民国”。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2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从此，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长期斗争所取得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

参考书目

明代

-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明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
- 龚书铎总主编：《中国社会通史 明代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 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
- 齐涛主编：《中国通史教程》（古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
-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古代史参考图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简明中国历史图册》（8），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
- （美）牟复礼等编、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 （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 《利马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
- 萧蓬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 吴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
- 晁中辰：《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
- 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
- 樊树志：《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
-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
-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三联书店，2001年。
- 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 王春瑜：《明清史散论》，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
- 张海鹏等：《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
-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
-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 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 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
- 王鸿生：《世界科学技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
- 陈平原等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王宏钧：《秋海棠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冰心主编：《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

-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
- 致新主编：《明清性灵小品》，湖北辞书出版社，1994年。
- （明）张岱：《夜航船》，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
- 周群：《袁宏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 羊春秋：《徐霞客游记·前言》，岳麓书社，1998年。
- 吴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 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纲要》，轻工业出版社，1989年。
- 《中国历代画家大观·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 葛路、克地：《神游丹青》，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 陈益：《寻梦六百年——昆曲盛衰探幽》，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
- 罗玲：《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清代前期

-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
-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
- 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
- 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
- 赵展：《对皇太极所谓诸申的辨证》，见王钟翰主编《满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 冯元魁：《清王朝的兴亡》，知识出版社，1989年。
- 李鹏年等编著：《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简明中国历史图册》（8），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
- 王宏钧：《秋海棠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刘如仲：《我国现存最早的李源〈捕蝗图册〉》，《中国农史》，1986年第3期。
- 郭蕴静：《清代经济史简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 刘兰霞：《水畅河清——治河专家靳辅、陈潢》（《清代社会文化丛书·科教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
- 《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对外贸易出版社，1981年。
- 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齐鲁书社，1981年。
- 《中国古代史常识》（明清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
- 南炳文、李小林、李晟文：《清代文化·传统的总结和中西大交流的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 彭飞：《中国的戏剧》，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
- 李月辉主编：《避暑山庄与外八庙》，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
- 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 杨仁恺主编：《中国书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王玉哲主编：《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清代后期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中华书局，1985年。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

李文海、匡继先主编：《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写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故宫博物院编：《清史图典》，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近代中国报道》，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图片索引

明太祖朱元璋像	3	《直隶开垦事帖》	27
南京明故宫遗址	3	花楼机	28
明皇城校尉铜牌	4	寿字灵芝团龙妆花纱	28
明孝陵	4	水蓝印金杂花绫	29
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夜巡铜牌	5	黑地五彩云龙海水锦	30
西安右护卫后千户所百户印	6	云纹花缎便服	31
明长随奉御出入宫禁牙牌	6	松江布	31
明锦衣卫木印	7	青地番莲纹印花布	32
《大明律》封面及序	8	宣德青花海水云龙纹扁瓶	33
明御制《大诰》	8	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	34
徽州府祁门县江寿户帖	9	成化斗彩花蝶纹罐	35
《鱼鳞图册》	9	宣德青花灵芝石榴尊（左下）	35
明成祖朱棣像	10	宣德青花缠枝纹贯耳瓶（右下）	35
明城墙（内城）遗址公园	10	青花八仙葫芦瓶	36
北京皇城遗址公园	11	米黄釉阿弥陀佛瓷像	37
明北京宫城图	12	素三彩菊花耳瓶	38
《黄河运河图》（局部）	13	剔红花鸟纹长方盒	39
明长城之一——八达岭长城	14	掐丝珐琅鱼藻纹高足碗	39
定陵地下寝宫	15	江千里制黑漆嵌螺钿执壶	40
万历孝靖皇后凤冠	16	潞王中和琴	40
长陵祔恩殿	17	阿拉伯文带座铜炉	41
《平番得胜图》	19	钢剑	41
扎什伦布寺	20	明宣德铜熏炉	42
宗喀巴像	20	枫泾镇	43
明宣德铜铃、杵	21	拙政园	43
兵部报告张家口蒙汉马市完竣行稿	22	《南都繁会图卷》（局部）	45
云南丽江	22	《皇都积胜图卷》（局部）	46
三娘子像	23	上海豫园	46
《汲县移民碑》（拓本）	25	《货郎图》	47
晓耕图	26	金花银	48

大明通行宝钞	48	《郑和航海图》	77
戥子	49	榜葛刺进麒麟图	78
象牙算盘	49	《瀛涯胜览》	79
铜权	50	“五良太浦吴祥瑞造”青花瓷熏	80
皖南民居——徽商曾经辉煌的印记	50	“天下一木濠大和守藤原信重作”大铜镜	80
肯尼亚出土的明青花瓷	51	《抗倭图卷》	81
《农政全书》	53	戚继光用过的军刀	82
利玛窦像	53	朝鲜折扇	83
徐光启和利玛窦	54	《澳门图》	84
《坤輿万国全图》	55	葡萄牙人绘制的航行图	85
《天工开物》书影	55	明末为防止荷兰人侵袭在澳门建筑的堡垒	86
《天工开物》炼铜图	56	荷兰人入侵台湾时建造的赤嵌城楼	87
《徐霞客游记》	57	铜火銃	89
万历黑漆描金龙药柜	58	《宪宗调禽图》	89
李时珍雕像	58	《宪宗元宵行乐图卷》	90
《本草纲目》	59	豹房勇士铜牌	91
王守仁像	61	张居正像	91
《焚书》（明刻本）	62	《河防一览图卷》	92
《牡丹亭》木刻插图	63	明神宗朱翊钧像	93
汤显祖像	63	《东林会约》	93
《三国志通俗演义》（明刻本）	64	魏大中绝命书	94
《水浒传》（明刻本）	65	明代后期农民的卖地契	95
《仿陈老莲水浒人物卷》	65	《荒年志碑》（拓片）	96
《陈奕禧题西游记图册》	66	明兵部报告李自成活动情况行稿	96
“三言”插图	67	《饥民图说》	97
袁宏道《金屑编》书影	68	“工政府屯田清吏司契”铜印	98
“二拍”插图	68	“骁右营总兵关防”铜印	98
袁宏道手迹	69	《大西骑骞营都督府禁约碑》（拓片）	99
《蕉岩鹤立图》	70	永昌、大顺通宝钱	100
《卧石老梅图》	71	《皇清职贡图·奇楞人》	103
《李端端图》	72	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和印文	103
《万壑争流图》	73	清太祖努尔哈赤像	104
《东方朔答客难卷》（局部）	74	努尔哈赤的剑	104
《永乐大典》	74	努尔哈赤盔甲	105
北京皇史宬	75	《满洲实录·灭亡叶赫部图》	106
郑和铸铜钟	77	《福陵图》	106

满文“天聪通宝”	107
《盛京城阙图·六部衙门》	107
写在明朝公文纸上的老满文	108
皇太极调兵信牌	109
新满文《进士登科录》	109
八旗旗帜	110
八旗甲冑	111
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本牌	112
各旗佐领图印	112
《冰戏图·转龙射球》	113
大政殿和十王亭	114
大政殿	115
紫禁城太和殿	116
孝庄皇太后像	116
天坛圜丘	117
南书房原址	118
军机处值房	118
《多铎入南京图》	119
科举考场	120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像	123
康熙帝龙袍	123
《蔡毓荣南征图卷》(局部)	124
《纪功图卷》(局部)	125
荷兰殖民者向郑成功投降图	126
军用“国姓瓶”	126
郑成功像	127
《东宁陈氏番俗图册》	128
《广舆胜览图·俄罗斯人》	129
《费雅喀人画像》	129
“神威无敌大将军”铜炮	130
吉林叶赫驿站	130
《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边界示意图	131
《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之一	132
《西域图册·厄鲁特图》	132
《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之二	133
噶尔丹致俄国沙皇信件	133

《阿玉锡持矛荡寇图》	134
《抚远大将军西征图》卷(局部)	134
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像	135
黑绒嵌银花撒袋	135
乾隆粉彩多穆壶	136
敕封第七辈班禅额尔德尼金册	137
《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帝图》(壁画)	137
五世达赖金印	138
藏族龙柄铜执壶	138
《职贡图·高山族》	139
《畚族祖图》(局部)	139
云南布政使司发开荒执照	141
《耕织图·耕》(册页)	141
《耕织图·簸扬》(册页)	142
《棉花图》(扇面)	143
《农具图·金犁 金鞭》(册页)	144
《太平欢乐图·收购棉纱》(册页)	145
《钦定授衣广训·耘畦图》	146
《棉花图·收贩》	147
《耕织图·采桑》(册页)	148
《捕蝗图·用灯捉捕》(册页)	149
《河工器具图说》书影	149
《治淮图》卷	151
《黄河筑堤图》(册页)	152
《乾隆帝南巡图卷·视察黄河》	153
粉彩镂空转心瓶	154
粉彩描金海晏河清瓷尊	155
珐琅彩三友橄榄瓶	155
天蓝釉菊瓣尊	156
松石绿梅瓶	156
斗彩海水团花天球瓶	157
仿宋官窑兽耳瓶	157
镶花漆蓝漳缎女夹马褂	158
《钦定授衣广训·织布图》(左)	159
《钦定授衣广训·练染图》(右)	159
番莲纹印花布	159

红地织金云龙缎	160	古观象台	188
《永禁机匠叫歇碑记》	161	《坤輿全图》	189
《康熙帝南巡图·江宁商业》(局部)	162	《云南輿图·大理府图》	190
《姑苏繁华图》(局部)	163	《皇輿全览图》(局部)	190
北京王麻子刀剪铺店铺门面	164	《医林改错》(书影)	191
《乾隆南巡图·前门街市》	164	《仙山楼阁图》轴(左)	192
清前期对外贸易港口示意图	165	《长松仙馆图》轴(右)	192
东印度公司在澳门设立的商馆	165	《虞山枫林图》轴(左)	193
象牙	166	《松壑仙馆图》轴(右)	193
《广州十三行图》	166	《幽亭秀木图》轴	194
“永源成记”青花人物碗	167	《层岩叠壑图》(左)	195
马戛尔尼像	167	《芙蓉鸭图》(右)	195
马戛尔尼送给乾隆帝的腰刀	168	《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局部)	196
《乾隆帝给英国王上谕档》(局部)	168	《梧桐双兔图》轴	197
黄宗羲像	171	《蕉石图》轴	198
顾炎武像	172	《花鸟图》(册页)	199
王夫之像	172	《兰竹图》	200
王夫之故居	173	“桂树升平”年画	201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174	《七绝诗》	202
纪昀像	174	铜胎画珐琅蝠莲纹花盆	203
文渊阁	175	雕漆云龙纹长方盒(局部)	203
《钦定四库全书》	175	竹雕“刘海戏蟾”笔筒	204
钱大昕像	176	青玉六蜻蜓环耳双联洗	204
清乾隆时刊印的《二十四史》(书影)	177	康熙帝亲题“避暑山庄”匾额	205
《聊斋图册》	178	环碧岛	205
《儒林外史》(书影)	179	溥仁寺慈云普阴殿	206
《顺治三年进士题名碑》(拓片)	180	普陀宗乘之庙	207
《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	181	《圆明园铜版画·海晏堂西侧》	208
《大观园图》	181	《圆明园图咏册·镂月开云》	209
《红楼梦怡红夜宴图》(局部)	182	吸食鸦片用具	211
红缎织金彩绣女戏衣	183	黄爵滋请求道光帝禁烟奏折	212
《村市生涯图册·凤阳花鼓》	184	林则徐像	212
纳兰性德像	185	林则徐、邓廷桢、怡良奏虎门销烟一律完竣奏折 ...	213
几何体比例规	186	虎门威远炮台遗址	214
齐彦槐制天球仪	187	三元里抗英民众誓师处——三元古庙	215
《割圆密率捷法》	188	义律为占领香港给琦善的照会	215

香港开埠图	217
晚清时的澳门	218
占领广州城的法国士兵	220
中英《天津条约》签字时的情景	221
圆明园大水法遗迹	222
残存的圆明园文渊阁藏《四库全书》	223
残存的圆明园长春园画玲珑馆陶嘉书屋门上铺首 ...	223
沙俄割占中国领土示意图	224
刘永福像	225
《法犯马江图册》	226
冯子材像	227
日本军队入侵朝鲜	228
邓世昌像	229
甲午海战中被清军击中的日本旗舰“松岛”号	229
日军野蛮屠杀中国平民	230
《马关条约》(局部)	231
清政府官员反对《马关条约》的奏疏	232
反映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 者的宣传品	233
慈禧太后像	234
义和团在北京散发的反洋人揭帖	234
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	235
八国联军侵华路线图	236
被八国联军焚烧的正阳门	236
紫禁城午门外的美国士兵	237
被八国联军焚毁的北京民房	237
日军与中国巡捕屠杀义和团民	238
德军在其占领区内张贴的安民告示	238
《辛丑条约》签字时的各国公使	239
慈禧太后与外国公使夫人合影	240
上海公共租界界碑	241
租界内的会审公堂正在审讯中国人	241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242
1896年俄国在天津设立的华俄道胜银行	242
德国在汉口设立的德华银行	243
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的纸币	244

俄国在哈尔滨设立的东省铁路管理局	245
德国强租胶州湾后发布的告示	246
英国“租借”九龙半岛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247
时局图	248
1898年沙俄驻旅大陆军提督为霸占辽东一带矿产发 布的告示	249
左宗棠像	250
1854年俄国战船入侵瑷珲	251
广东花县洪秀全故居	253
《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	253
天王洪秀全玉玺及印文	254
太平天国反清进军路线图	254
太平天国颁发给农民的田凭	255
太平天国铸造的钱币	256
太平天国颁发的商凭	256
《资政新篇》(书影)	257
曾国藩像	258
忠王李秀成主持会议图	259
江南制造局大门	260
李鸿章像	261
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事处	261
福州马尾船政局	262
湖北汉阳铁厂	262
北京同文馆旧址	263
首批赴美留学的幼童	263
康有为像	264
梁启超像	265
谭嗣同像	266
严复像	266
京师大学堂匾额	267
袁世凯像	267
《变法谕旨》(局部)	268
光绪皇帝像	269
张謇像	270
梳棉机	270
中国最早使用的电话机	271

1878年发行的大龙邮票	271	秋瑾像（右）	278
詹天佑像	272	光复会誓词	279
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	272	孙中山手书同盟会纲领	279
京张铁路通车典礼	273	《民报》发刊词	280
北洋大学堂大门	273	临死不屈的黄花岗起义战士	281
《天竺图》轴	274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282
《老残游记》手稿	275	1911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	283
孙中山像	277	湖北军政府旗帜——十八星旗	284
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刊物	277	大总统誓词	285
陈天华像（左）	278	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旧址	285
邹容像（右）	278	清帝退位诏书	286
章炳麟像（左）	278	《京师公报》清帝退位号外	287

后记

1997年4月，我从国家文物局调动工作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时值俞伟超馆长主持的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部分）修改后重新布展。同年9月，历时九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接待观众。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俞伟超馆长、杜耀西副馆长等都有在理论研究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一套书的想法，并积极支持我和陈列部的业务人员着手去做。

这个项目得到陈列部同仁的积极参与。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启动，研究总体体例、编撰细则以及确定每卷撰稿人，接着讨论试写的样章、样条和部分初稿。在这一阶段，王冠英先生、安家瑗女士等给予很大的帮助。1998年先后担任副馆长的孔祥星先生和朱凤瀚先生都竭力支持这一项目。

2000年，朱凤瀚先生担任馆长后，继续把该项目作为馆里的重要任务安排。朱凤瀚先生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要审稿人，对全书从总体体例到各卷具体表述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展览部（原陈列部与美工部合并）主任董琦先生负责全书各卷的统筹协调，王永红女士承担了执行编务工作。该套书的编撰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一个部门，成为全馆学术与业务协作的成果。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部《文物中国史》也就有幸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的第一套多卷本古代文物与历史著作问世。



在开始构思这套书时，主要考虑到依托中国通史陈列的各位主创人员，将这套书的定位设计为：“以《中国通史陈列》的内容为主线，侧重反映中国远古以降的物质文明史，突出介绍历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通史陈列》成果的深化和延伸，充分体现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研究的学术水准，兼顾知识性、通俗性，以物带史，物史结合，全面介绍我国目前的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科有关最新成果。”全书以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原始社会到晚清，分为八卷。

几年来，各卷的作者为了实现本书的定位，作了大量的探索，特别是先动笔的前四卷更是数易其稿。有些作者甚至试写了相当篇幅的不同风格的样稿，不惜自我否定、推翻重来，为最后全书基本统一体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了保证本书的学术质量，各卷又延聘了专家学者审稿。他们严谨的学风和细致的校阅，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研讨如何处理下列问题：

首先，《文物中国史》也是一种中国通史类著作，历史框架的完整性是必须的，例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不应该疏漏和缺席。但是作为博物馆编撰的中国史，主要特点表现在以历史文物为切入点和铺叙基础。难点在于，即使是中国历史文物藏品最丰富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使本书还借用了许多全国范围考古重要发现的资料，但文物相对于历史，总是极为残缺的、片段的。各位作者只能在书中粗略勾勒时代背景和演变线索，然后以物质文明史为主线，利用已有的文物，尽可能举一反三，展开描述，以求呈现远为宏大和复杂的历史场景。

其次，学术界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各卷的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是本书的学术基础。正像我们在讨论新版中国历史陈列大纲时所表达的，要兼顾学术观点的前沿性



和稳定性。对于尚在争论的热点问题，应该清晰地表述主要的不同论点和作者的态度，供读者参考。但是本书的定位又使得上述表述局限于介绍性、结论性的文字，不过多进行考据和反映推理过程。相反，我们希望用生动活泼的、通俗易懂的笔调把学者思维所得向广大非专业读者娓娓道来。在学术与普及之间，这显然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分寸。

第三个问题是全书八卷，涉及十多位作者，前后行文的贯气与不同风格的个性如何协调。大家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全书应该在体例和内容的基本要求方面保持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在叙事方式、语言组织等方面，针对不同时期历史与文物的差异，鼓励作者展现自己的才华，寻找最贴切的格调，在浑然一体中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最后应该特别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为了此书的问世，他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辛苦共尝，自然值得一同庆贺。

李季

二〇〇三年八月六日

北京 中国国家博物馆

